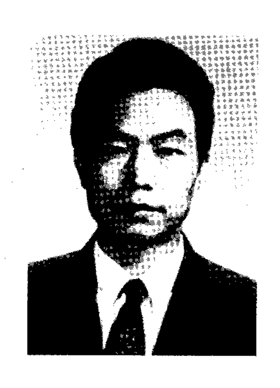


叶自成，男，1956年4月生于四川荣县；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5年任教授；主要著作有：《大过渡时期的国际社会》《叶利钦——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等。

北京出版社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叶自成 主编

致读者

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科学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更是责无旁贷。

跨世纪的伟大实践，需要能够发挥跨世纪作用的社会科学理论；跨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一批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实施了“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到本世纪末，重点培养100名左右青年社会科学学科骨干。编辑出版《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是“百人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鼓励青年学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力求产生一批能够代表世纪之交北京社会科学水准的研究成果，为北京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文库》的出版，既是“百人工程”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展现，又是北京市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库》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跨世纪的，理论水准及对人们的启迪也是跨世纪的。《文库》的作者群是一批跨世纪的青年学者，朝气蓬勃，思想活

跃，敢于迎接新世纪挑战，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和规律，这是社会科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多卷本文库，其出版需要一定的周期；周期长，使我们有可能精雕细刻出精品。入选“百人工程”的青年学者均为首都高等院校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成果显著的后起之秀，有的已在某一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尽管他们已具备较强的著述能力，我们仍然好中选优，优中择精——我们请由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组审定他们上报的著作选题和写作计划，淘汰率达 70%，可见遴选之严格；且书稿完成后还要由专家审读通过，最后由“百人工程”领导小组决定能否进入《文库》。我们之所以这样不避烦琐，不惜拙工，所求无非是：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奉献给读者。

我们和作者期待着您的宝贵意见。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编辑部

1998 年 1 月

作　者

叶自成　王福春
唐士其　方向勤

目录

序 论

地缘政治在中国的几个基本问题

地缘政治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是很近的，如人们常见到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边缘”等，其实都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概念。地缘政治在中国现在是很时髦的东西，它在国内的报刊上出现的频度越来越高。但它又是一个较陌生的概念，人们对什么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的地缘政治又是怎么回事等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国内对地缘政治的研究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工作。下面仅就地缘政治在中国的一些问题谈谈作者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指教。

（一）

什么是地缘政治？什么是中国地缘政治？

什么是地缘政治？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这是地缘政治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以下是国内外一些重要的辞典对地缘政治下的定义：

1.《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指出某些因素对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性，诸如在获得国家利益，控制海上交通线，据有战略要地等”[1]。

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上说：“地缘政治学是为认识国家力量的地理原理而将国家当作三维空间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一些特性为背景材料：如疆域、气候、

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性，如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等。每一个国家都被看成世界政治空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它的关键性成分。地缘政治学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现象结合起来，并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和解释”[2]。

3.《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说：“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定有相当的影响”[3]。

这些定义对了解什么是地缘政治学是有帮助的。但要进一步了解地缘政治学，光有这些基本定义又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国内，“地缘政治”(Geopolitik)与“地理政治”(Geopolitics)是通用的，而严格说来，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在英文文献中往往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而后者则指一般的地理政治，特别是指英、美等国的地理政治学，但为了方便起见，本书的地缘政治与地理政治两个概念是同等意义的。

2. 在范围上，地缘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这也是运用最广的一个界定。本书在多数场合下使用的这一概念，都是在这一范围内使用的；二是中等层次的，主要指比一个国家的周边范围更广泛的地区，是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三是大的地缘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把世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层次的地缘政治的，多是大国，尤其是那些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地缘政治在这一层次上多半涉及大国之间的关系。本书多使用狭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少使用中等层次的地缘政治概念，而基本上不使用过于广泛的地缘政治概念。

3. 地缘政治是确定国家的利益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是一种有益的工具，但不能把什么都归于地缘政治，特别是要把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和外交活动等概念区别开来。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较紧密的，其包括的内容也是有重合的，但也有区分，不能混同使用。

4. 影响国家政治行为的地理因素也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它们主要是指国家的疆土的大小，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领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国家的人口和民族的自然属性等要素。一个国家的地理要素对其实力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地理状况如位置、地形、地貌及气候等，对一个国家的潜力具有直接影响。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比，地理因素对国家的政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较为确定的。

5. 地缘政治有两个较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开放性，任何一种地缘政治都是把一个国家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相联系，把一国与世界各国相联系，是两国和两国以上的国家之间发生的联系，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地缘政治的活动；它的第二个特点是，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实际上，任何地缘政治的变动都是与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所说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三个世界，中心与边缘等地缘政治的重要概念，都是包含了经济和文化的内容在内的。

在用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地缘政治时，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古代历史进行研究时，能不能说中国已有地缘政治？如果说有，那么这个“地缘”又是指什么？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些界定。

首先，中国的地缘政治迄今为止，其范围主要是指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古代，这个地缘还更多的是指陆地地缘，只是到了现代，中国的地缘政治才把其眼光较多地放在了海缘上，中国的地缘政

治也随之从中国的周边国家扩大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地区内,但中国的地缘政治在范围上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还几乎没有自己的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概念。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两个,其一是受中国所在的地理位置的限制。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自己的历史活动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东亚地区,北面是西伯利亚大荒原,南面和东面是大海,西面和西南面是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这大大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其次,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比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高出许多的国家,长期以来受"中国中心论"的观念的影响,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到了现代,中国虽然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它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把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到邻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而对其他地区的关注自然要少一些。中国今天是个政治大国,也可以说是个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大国,等到它在经济、军事上发展到与真正的世界大国地位相当的水平,那么那时也许会产生中国的世界地缘政治。但今天,中国的地缘政治在很长时间内还会局限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内。

第二,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地缘政治的话,那么,这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可能会与现在使用的地缘政治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地缘政治的主体应当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是有明确的国家政权、领土和人口的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但在中国古代,这些都是处于不确定的和经常变动的状态之下,因此我们在本书研究中国的古代地缘政治时,不能以今天的地缘政治概念去生套,否则我们会处于一个矛盾的状况之中,即:要么我们根本否认中国古代有地缘政治,而这是完全违反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因为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古代在地缘政治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甚至西方的许多地缘政治家们还把中国的地缘战略思想作为经典之作加以引用;要么我们就得否认地缘政治概念的根本特征。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即把地缘政治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

因此，本书在谈及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时，既把中国的现有国土作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基础，但又不完全限于它。在本书中，地缘政治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内地缘，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把不同时期出现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地缘政治的关系；第二是次外地缘，指过去在很长时期内不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权的管辖之内，但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后来与汉族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它们与中央王朝和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的关系，看成是地缘政治关系；第三是外地缘，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处于中国疆土之外但又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地缘政治关系，这也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地缘关系。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发生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和民族，即过去曾经彼此互为"外国"和"外来民族"的国家和民族，在今天都已是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
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体系

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以至于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很少见到"地缘政治"这个词，只是近年来在介绍国外政治外交情况时，才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地缘政治的思想。这是因为在国外，地缘政治是一个极为流行的用语。如 1996 年 1 月，俄国外长普里马可夫(Primakov)上任后，就发表了许多对外政策的讲话，国内报刊在介绍他的讲话时，给读者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总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谈俄罗斯的外交，如认为北约东扩会恶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1996 年 5 月，俄罗斯报刊在谈到朝鲜问题时，又说朝鲜仍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等。受国外政治的影响，近年来，在国内，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介绍和论述地

缘政治的文章和著作。但由于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免不了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些问题。

国内在地缘政治研究上的问题至少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思想还有一些不全面的看法,还有一些偏见。如有些人还把地缘政治论等同于地理决定论,认为这一理论方法可用来阐述一个国家的利益,但在学术上方法上是不科学的。还有人在介绍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时,把西方早期的地缘政治当作西方地缘政治的主流,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放在对美国地理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Spykm an)、英国地理政治学家麦金德(H.M ackinder)等人的地缘政治论中明显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上,还有的对德国法西斯 30 年代所运用的德国地缘政治家豪斯浩弗(K.H aushofer)提出的生存空间论进行了较尖锐的批判,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给人的印象是把这些东西当作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主流,这就未免过时,因为西方二战后的地缘政治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是继承了过去的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如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M ahan)提出的海权论至今还有其积极意义和合理成分,为一些人所引用,但更多的是对地缘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对一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地缘因素决定什么什么的观点并不是主流,也就是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许多东西是可以为我们借鉴、参考和吸收的。

第二, 在地缘政治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很深。笔者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比西方好,但也不赞成什么都是以西方的论述为框架来套用。当有些学者在得出地缘政治的理论发源于西方的结论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过地缘政治?远交近攻,连横破纵是否可以称为地缘战略?汉唐宋元明清的朝贡体制,怀柔体制,羁縻体制是否也可以称为一 种地缘政治的体系?在中国的诸多的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中是否也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思想?其实中国古人在从地理因素来观察

中国古代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战略时，当然已经有了地缘政治的思想，甚至于他们所用的表述方式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早期代表所用的语言格式也有共同之处。如麦金德说“谁统治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斯皮克曼说“谁统治了缘边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统治了世界命运”。而孙子在他的不朽名著《孙子兵法》中也有“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者，为衢地”[4]。这里的衢地和前面所说的心脏地带、缘边地带等，实际上意思差不多，但孙子比麦氏和斯氏早2300多年！何以说地缘政治的思想最早起源于欧洲？至多可以说西方最早使用了“地缘政治”这一后来被普遍运用的科学概念，还可以说西方的学者们最早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但实际上地缘政治的许多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为中国的先哲们论述过了，而且在许多方面比西方的论述更为精彩。因此，我们应当对中国早期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而在这一方面国内的研究还很不够。

其实稍稍对中国的古代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著作进行一些不能算作深入的研究，都会同意笔者的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古代地缘政治思想十分丰富，而且其风格、内容、思路也与西方的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地缘政治学中的一个完整的学派。

可是长期来我国对地缘政治并不重视。在很长时期中我们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加以批判，把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当作封建的东西，对两者中的精华都未进行整理吸收。虽然我们在政治的实践中和外交中也不可免地要运用地缘政治的思想，但由于对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缺少认识，因而我们往往在地缘政治的斗争中吃大亏，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地缘政治给以高度重视。实际上，地缘政治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大王朝的兴亡，都是与地缘政治连在一起的。如西周向东周的演变，七国称霸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秦朝的兴起与它的迅速

灭亡，三国时代的魏吴蜀的鼎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两宋时宋与辽—金和西夏的对峙，两宋的灭亡，元朝的兴灭，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兴起，等等，都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有紧密联系的。

不仅中国的历史与地缘政治 连在一起，而且新中国的历史也是与地缘的斗争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地缘政治甚至也改变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的大格局。中国在 50—60 年代有几件重大的事情对以后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中国与自己最大的邻居—苏联先友后敌的变化，二是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成了敌对国家，三是在越南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四是和印度在边境进行了战争。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是十分不好的，几乎在各个方向都有不少的麻烦。

苏联在 50 年代与中国的同盟关系，由于地缘接近的缘故，使中国受益很大，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使西方感到害怕；中苏关系的破裂从表面上看来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但隐藏在其后的是苏联从沙俄时代就已梦寐以求的东西：得到中国旅顺这一对苏联海军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港口，使苏联海军能更容易的进入太平洋。同时它也是像地缘政治的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在同一地区出现两个强大的国家，而其中一个如果具有强烈的扩张欲望，那么，这两个国家迟早会发生冲突。1969 年时中国与苏联发生的边境冲突，使中国在北边重新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而又正是这种地缘战略上的重大威胁，迫使中国与另一个也是敌对的国家—美国结成了反对苏联的统一阵线，地缘政治的规律超越了意识形态：尽管中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不能阻止苏联成为中国的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同样，正是相同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把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昔日的敌人联在一起。这正是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使世界形成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格局的基本因素。

由此可见，不管人们是否重视地缘政治，它的规律都一样要对所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无视它的特点，到



后来就要以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作为代价。毛泽东在1957年时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把中国的边境分为三个大的地缘区域：西南部、北部和东部，并主张加强东部海防，对西南部和北部较为放心[5]。但后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未能进一步搞好，反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了。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突破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模式，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的遗产上进行深入的发掘。这丝毫没有轻视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意思。应当说，西方最早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可以吸取的，也是中国在发展地缘政治学时应当借鉴的，但更要做的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的工作。

那么，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也就是说，有哪些东西是与西方不同的呢？

1. 在起源上，中国的地缘政治学是自成体系，自成一家的。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这当然也是一大缺陷，但就其内容上来说，却一点也不比西方的逊色。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早期的地缘政治学所阐述的东西要深刻的多。它在现代之前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没有什么直接的渊源关系，在西方明确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之前，中国的古代先哲们关于地缘政治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自然也不能反过来说，西方的地缘政治是缘于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两者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又融于一体。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思想，并使之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合于一体，比单纯照搬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更能有益于这一学科。

把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相比较，还可以发现二者在起源上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在其早期

多是由学者提出的，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在早期几乎都是由当时的大政治家提出的。它产生于政治实践，又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因而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在早期的学术性和探索性较强，在地理与政治的结合上更侧重于地理因素，如关于所谓的地心说、缘边说、海权说，而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似乎对法国的六边形国土情有独钟等，都是把地理因素看得高于政治因素，甚至把它看成是决定性因素。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在把地理要素与政治因素结合时，往往更强调政治因素，而且也比较重视诸如经济、人心等因素。

2. 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上，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可以说具有宏观地缘政治学的特点，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微观的地缘政治学。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20世纪，此时正是西方向世界各地进行大扩张的年代，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学一开始就比较侧重于从世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地缘政治的问题。比如，它研究的重点不是对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实力比较，也不是把自己的国家的眼光盯在与自己国家的距离较近的地区，而是从全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尽管那些所谓的“战略要地”远在本国千里万里之外，但却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学，注意的中心点是自己的周边国家，它真正是一种地缘的政治，一种与本国有着直接的边界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空间的国家间关系的政治，是与在历史上有着种种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对那些距中国很遥远的地区和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只把它们放到次要的地位，认为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例如，在中国的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中，关于“缘边”的讨论和论述很多，尤其是在如何卫边、防边、管边等方面，其论述是很具体和深入的，甚至于在边民相互过境打柴捕鱼或发生纠纷时应当如何处理都有具体论述。也许在西方的地缘政治学中这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却是把它作为两国关系和睦的问题来

对待的。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从微观出发来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3．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而西方的地缘政治则强调邻居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

这是由于西方的哲学是强调人与人的竞争的，这种思想在其国际关系中体现为实力政策，把其国家关系建立在实力强弱的基础上，而在地缘政治中则强调在一个地区的空间中，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必须保持势力均衡，对本地区的大国和强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强国保持防范和警惕，可以说把所有的大国和强国都视为其潜在的敌人，而如果一个国家既是强国又是大国，那么就几乎肯定是敌人了。因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必须对这一潜在的敌人进行控制和制约，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或者使自己成为不可战胜的国家，为此就要自己先进行扩张，使自己的力量超过所有的国家。

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是产生于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认为周边国家只要不骚扰中国，中国就可以与其成为友好国家，不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攻击，中国就不视其为有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今后对中国是什么态度。这可能与中国在几千年中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大国，在哲学上则是孔子的仁义思想和中庸思想影响较深有关。它尤其鲜明的表现为中国几千年来反战的思想一直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有很强的制约性。如唐朝时尽管有唐太宗对朝鲜的战争，但他在这一过程中却受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甚至他的丞相房玄龄还冒死上谏。

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导致重大的差别。凡是西方的大国几乎都经历了大扩张的时代，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自己的领土扩张到很远的地方。例如，美国在1783年时，其领土约为153万平方公里，到1900年达到939万多平方公里，在117年间增长了约6倍多。俄罗斯在16世纪初只是东欧平原上的一个小国，面积不过为数十万平方公里，经过300年的扩张，俄罗斯帝国在20世纪初已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扩展的领土达1700万平方公里，在

300多年中平均每天要扩张190多平方公里。

而和美国、俄罗斯相比,中国尽管在几千年中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但中国的领土并不曾有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中国20世纪初的版图比2000年以前的汉朝并不大多少,比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的版图还小得多。而且,即使是扩大的领土,大部分也不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扩张,即通过战争和武力从别国手中夺取土地来扩张,而是通过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大融合而实现的。例如,越南和朝鲜在几经反复后,都先后成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近邻国家。

4.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特别重视和强调在自己周围有一个活动空间,多少带有一种势力扩张和空间扩张的意义。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强调把自己的安全界定为一个国家对自己不构成为直接的威胁。

在过去,西方的地缘政治学中有过空间扩张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谓的生存空间理论成为法西斯侵略扩张的一个理论依据。二战后,这种理论受到批判,但实际上,现在西方的地缘政治中的主流学说,依然存在着在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己所在的近地缘地区,应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它国对该地区的事务进行干涉。例如,美国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尤其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视为不许它国立足的地区,它不但不许其他国家与这一地区的国家发生政治关系,而且不许与其发展贸易关系,更不许有军事关系的发展。过去苏联把东欧地区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中的传统理论相关的。这一思想不但不许外国势力涉足这一地区,而且不许这一地区的国家自行其是,它们的其言行应得到其默认。美国和前苏联都对自己的势力范围中的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

与此相反,中国的地缘政治的主流思想,在对自己的周边国家上,中国是将自己与别的国家一视同仁的。中国并不把周边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来不搞什么近地缘的势力范围。在历史上中

国与越南和朝鲜曾经有过特殊关系，尤其是朝鲜，但这只是一个例外，即使是朝鲜，中国在长时期内也是不干涉其内政的。对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就更是如此，即使在中国力量最强大的时期，也没有把这一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明朝，尽管其海军力量无比强大，但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与对东非国家并无两样，都是当作要怀柔的国家给以优惠的。

5．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另一个特色是，地缘战略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缘战略包括地缘外交战略和地缘军事战略。地缘外交战略是指在与近邻国家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根据力量对比所制定的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的团结朋友打击敌人的总方针，是本国在进行对外活动中的力量配置、战略重点的先后次序的基本构想，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等思想。

地缘军事战略思想则更为丰富。它的著名代表有孙子、吴子等人。他们提出和总结的九地思想、不战而胜的思想，把军事战略与地缘因素和其他因素紧密的结合起来，在世界军事和地缘政治学中都有其重要地位。

当然，地缘外交战略和地缘军事战略同时又都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都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不同表现形式。

以上只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一些粗浅的表述。应当说，我们对我国的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的研究还刚刚开头，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还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对地缘政治的看法还基本上是以西方的理论体系中心而产生的。随着人们对我国的地缘政治的研究的深入，相信对地缘政治的许多问题会有新的观点。

指出中国地缘政治的特色，并不是要把中国与西方的理论对立，而是主张对中国的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更多的研究。同时也是要以西方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即使上面提到的那些特点，也并不一定都比西方的好，而只能说其中有些比西方

的要有远见,而有些则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的不足。

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当发展自己的有特长的方面。如,中国在历史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和边界纠纷问题的经验,这些可以总结为现在所用。又如中国的地缘战略思想也十分丰富,不仅有远交近攻和合纵连横,也有交近攻远等, 问题在于不要机械的套用。如现在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又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战国时代中国的许多地缘政治思想可以在今天借用,但今天毕竟不是 2000 多年前,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今天对那时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借鉴也是有限的。

当然,要全面总结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经验教训,不是这一本书能做到的。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劳动。本书只是想在这一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尝试。本书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地缘政治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对影响中国较大的《管子》《老子》《孙子》《吴子》等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了挖掘,尤其是对《管子》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秦朝以后的各朝代的地缘政治的分析,本书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对每一大的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大势给予总的论述, 同时对其突出的方面予以特殊的注意。如本书对三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诸葛亮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地缘政治思想的杰作;唐太宗时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故本书对唐太宗时的地缘政治实践和理论都进行了重点评述。宋朝也是中国地缘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它两度亡于比它弱小的北方民族,故本书对宋朝的历史从头到尾都给予了注意。当然,作为描述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的著作,本书是很不完整的,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想多数读者大概会同意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确不是源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而是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相比,它也的确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许多方面它比西方的论述要深刻得

多。

当然,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光总结过去的地缘政治的传统思想是很不够的。这首先在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本身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如,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于政治实践,实践性很强,但另一方面是它的理论性还不够强,对一些地缘政治的现象给予高度概括还不够。又如,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以陆地地缘为主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但对于海洋地缘注意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再如,中国的传统思想对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性也较差,往往不能对所在的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发展会有什么变化作出较长期的估计。这些都不能以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特色"和特点来掩饰,而应当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不足和"缺点"。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必须对西方的这些方面的长处给予高度重视,使之与中国的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使之能适应今天的地缘政治的实际情况,并为中国解决自己的地缘政治中的问题做出贡献。

(三)

对中国和外国一些地缘政治规律的初步探索

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对地缘政治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来指导地缘政治的实践。而地缘政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它是具有十分鲜明的规律的一门科学。当然,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对地缘政治的规律做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地缘政治的许多规律却也是可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人们在地缘政治的长期实践中大致形成了七大思维定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缘政治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是:

1. 富国强兵是地缘政治关系中的第一要义。清人王韬曾指出:

“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6]。任何一种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都是一个国家和相邻国家间的实力较量的一种结果。国家具有强大的实力，不一定是要进行军事威胁或对别国进行扩张侵略，对邻国发动战争。相反，实力往往是避免战争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丝毫不降低地缘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但这种外交努力得以成功的基础，还是要以一个国家的实力作保证。只有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军队和国防力量强大，才能得到相邻国家的尊重，也可使那些对本国有不测之心的侵略者不致轻举妄动。

2. 地缘政治中存在着明显的边际效应，它可表述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距离近的国家，相对于距离远的国家来说，对本国的影响会大得多。

当然它的前提是，作为比较的国家必须是在各个方面相当的，否则这种比较就没有意义。例如，不能拿美国与尼泊尔或锡金做这种比较、和地缘远近相关的国家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否则这种距离的远近就失去了意义。

3. 地缘政治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

在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周边环境，这种环境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自然环境，自然地理变化的程度相对是较小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而这种环境是变化着的，今天的敌人，可能是你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你明天的敌人。一切都是在变动中的，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每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说，国家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常数，它也是一个国家在确定它的敌人或朋友时唯一的决定因素。

这一地缘政治的规律要求在确定国家利益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本国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关系，从长远出发来考

虑问题；二是注意邻国的利益变化动向，对其政策和利益的变化趋势应有清醒估计。

4. 地缘政治的重点会随着地缘经济的重点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而转移。在一个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的重点。决定这一重点的，首先是本国的地缘安全利益的需要，可能会对本国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这一时期本国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第二是本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的变化也是地缘政治重点变化的主要依据。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加，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5. 追求大国的保护是小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本能反应。

在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中，小国对所有邻近的大国和强国都有一种担心的心理。它所惧怕的并不一定是最大的国家或最强的国家，而是离它最近，最具有威胁的国家。这种定式在地缘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是，就近与某个大国保持特殊关系，使之在受到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攻击时，能得到及时的保护，其次是使区内事务区外化和国际化，让其他地区的大国介入本地区的冲突，以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

这种小国地缘政治心态在东欧表现为东欧国家强烈要求加入北约，在东亚表现地区性结盟关系的发展和使本地区的事务国际化，以使区外的大国对本地区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某种力量的均衡。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必须首先要鼓励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一定要经常使世界其他地区继续对我们所设计的一种社会形式感兴趣"，"新加坡是在亚洲南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北亚洲和南澳洲之间的中间站，而且是一个主要的交通中心，新加坡受到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最先到来的欧洲人的巨大的注意……我希望这几个国家将继续对我们感兴趣，因为这可能造成一种更加稳定的势力均衡，更多的大国和超级大国的出现，将使小国维持其自身的利益及根据本国人民的利益争取独立的行动的愿望更容易实现，

新加坡接受美国第七舰队,也接受苏联及日本的海上力量,而且也希望英国继续留在东南亚和南亚”,“新加坡至少需要一个超级大国站在新加坡这一边,才能维持平衡”[7]。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这一定理。因此,在处理与周边小国的关系时,有必要考虑和理解小国的这种心态。

6. 边疆、边界、领土在地缘政治中是重要因素。地缘首先在于缘边、缘海,因此地缘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缘边政治、边疆政治、领土政治。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国家之间的领土和边疆往往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因此留下许多争执和纠纷,成为地缘相近的国家关系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边界上的第一枪,往往也是一场战争的前奏。如果这种领土争端又伴随着民族、宗教的矛盾,那么这一矛盾就更复杂了。解决边界问题是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关键。同样,维持边界安宁,不扩大边界争端的事态,在地缘政治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所写的关于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中,把美国的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安全就是完成如下使命的能力: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依据合理的条件保持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的特性、体制以及政府权力,使之不受外来的破坏;以及控制其边界”[8]。其中把领土和边界放在重要位置上。1996年俄罗斯边防总局局长尼古拉耶夫(Nikolaev)在谈到俄罗斯的边界时说:“边界并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我国借以进入文明世界复杂的相互关系体制的地缘轮廓”[9]。其中也对边界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给以很高的评价。

7. 地缘政治格局的追求目标是地区的实力均衡。

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举动和发展会对周边国家带来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是指对本国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更重要的是它对邻国会带来什么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对的,如邻国强大了,本国如果没有

相应的发展,或者发展较慢,就会变得相对落后。反过来也是一样。

对地缘政治规律性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的问题,如,一个国家富国强兵本是正当的权利,但它引起的一个问题是,它与本地区的均衡原则是什么关系?因为一个国家相对发展较快,就会打破地区间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如何处理和面对一国的国防力量的增强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关系的变动呢?是一国独自强兵呢,还是实行集体安全的体制?这些都是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的。

(四)
中国地缘政治的大势和安西靠北争东南的三线地缘战略体系

1. 中国当代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征

人们在说到中国的周边环境时,虽然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好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 中国当代地缘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一些。

这是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情况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和世界上一些大国如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相比,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客观因素可以说是最复杂的。

(1)中国是边界线较长,相邻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个亚洲大国,与周围各国有漫长的边界线,这也是确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依据。1996年时,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共有15个,共有陆地边界线(含界河,界湖)共22800多公里,按其与中国的共同边界的长短,这些国家和其与中国的陆地边界的情况是:蒙古,4670公里;俄罗斯,4330公里;越南,2000多公里;缅甸,2000多公里;印度,约2000公里;哈萨克,1700公里;尼泊尔,约1400公里;朝鲜,1334公里;吉尔吉斯,1100公里;老挝,710公里;巴基斯坦,约600公里;不丹,约550公里;塔吉克,约400多公里;阿富汗,92公里;锡金(不详)[10]。中国还隔黄海、东海、南海与韩国、

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与中国有陆地边界的朝鲜、越南等国相邻和相望。中国有海疆线约 32000 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约 16500 公里,有海岛约 7100 个,与中国相邻的 3 个边缘海的总面积为 468 万平方公里[11]。此外,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国家虽然与中国无共同边界或海疆,但与中国的关系素来比较密切,如柬埔寨、孟加拉、泰国等。相对而言,印度、美国、日本、印尼,以及英法德等的地缘政治的客观因素要简单一些。边界较短,相邻的国家较少些。如美国只有 3 个邻国,而且周围国家没有一个能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大概只有俄罗斯的边界比中国更长,它有 16 个邻国,边界线达 60000 多公里,其中有海界 39000 公里,河界 7000 公里,湖界 475 公里。

(2)中国周边国家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这一地区人口众多,而且周围国家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中国的周边国家拥有的人口大国有印度 8.96 亿,印尼 1.95 亿,俄罗斯 1.5 亿,日本 1.25 亿,巴基斯坦 1.24 亿,孟加拉 1.16 亿,是世界上上亿人口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此外还有越南、菲律宾、泰国、韩国和缅甸等国的人口都为 4000 万—7000 万,也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它们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达 30 多亿,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一地区也是政治制度差别很大的地区,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 4 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最集中的地区,5 个社会主义国家有 4 个在这一地区,而日本等国则一向被视为西方国家,俄罗斯和中亚等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则正处于一种过渡时期,其他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都有,既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如日本等国,也有世界最富的个人,如文莱苏丹的个人财产 1996 年达 250 亿美元,为世界首富。而世界最穷的国家和地区如老挝、柬埔寨、缅甸、蒙古、孟加拉等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新加坡、韩国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

(3)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

地区。在中国的周边几个大国中有俄罗斯。它是一个拥有大量尖端科技武器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国,又与中国有着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与中国有着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密切关系,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过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明确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发展核武器巨大潜力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日本不仅巩固其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且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甚至对军事大国的地位也未完全放弃。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南亚最大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潜力也很大。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值得给以特别关注的国家,它不但有近2亿人口,而且其经济发展最近几年来也很迅速,其在东亚的地位不断提升。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虽然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但由于其一向自命为世界领导国家,认为它在东亚有很重大的战略利益,因此对东亚地区一直不断进行干涉,对中国的许多近邻国家和近海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关系,是一个比其他与中国相邻国家对中国更有直接关系的国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决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西欧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因素外,世界其他的大国和准大国,都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和其他大国,如美国、日本、印度、印尼、英、法、德等国相比,这些国家在它们所在的地区与之相邻的大国并不多,特别是能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的大国并不多。如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与这些大国处理好关系的话,那么在地缘政治的问题上,就更要处理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

当然,这样一种大国林立、人口众多、国家数目多的复杂的地缘环境,的确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具有与别国地缘政治不同的特点。

对当代中国的地缘形势来说，和新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形势相比，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合作与友好的道路上迈开了很大的步伐。这些表现为：中俄成为友好国家，中俄，以及中国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的边界也已基本解决，中国与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冲突已经解决，中越边界的争议也有缓和，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平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因素在发展，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边界划分上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先后与韩国、新加坡、印尼、文莱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原苏联中的成员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顺利地建立了关系。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又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在发展，这既有旧因素，也有新的因素；即是一种现实中已经存在的问题，又是指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这表现在：

(1)中国的周边国家存在着核扩散的潜在危险。从技术上说，日本和印度都已拥有了随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件。日本虽然宣布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它却拥有许多用来制造核弹的钚铀等物质。印度政府近年来一直声称保留核选择的权利。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有较大的问题，1994—1996 年曾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风波。巴基斯坦为防范印度对核试验问题也有一些保留。中国周边国家的核扩散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首先会造成更加复杂的地缘安全、地缘环境等方面的局势。

(2)中国周边国家存在不稳的因素。在朝鲜半岛，朝鲜与韩国之间存在一种危险的军事对峙局势，而且在冷战结束后还有某些升温的迹象。在 1996 年 3—5 月，对峙的双方都声称要采取军事手段来击退对方的进攻。在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在近期内解决的前景，而且近年来双方都在加强军备，小冲突不断，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争端上双方的立场仍是对立的，更危

险的是,双方一旦发生战争可能会引发核军备竞赛甚至可能发生核冲突。这种地区性的冲突表面上与中国无关,但实际上会使中国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

(3)南沙问题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隐患。在中国与邻边邻海国家的关系中,领土争端是一大问题。中国的陆地边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大部解决,特别是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使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边界问题基本解决,只有中国与俄罗斯在一些很少的地段上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中国尚有与越南、不丹、锡金以及印度的边界未定,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长达2000公里都处于未定状态,涉及领土面积达12.9万平方公里。

如果说,陆地边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不会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在南沙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却可能成为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中国面临着要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艰巨任务。

(4)美国因素是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和美国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关系发展很快,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两国的相互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密切。两国本来隔着千山万水,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但由于美国谋求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在世界各国到处进行干涉,因此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被看成是美国的利益攸关的地区,因此中国不得不在自己的近邻地区和家门口与这个美洲的大国打交道。在朝鲜半岛,美国是韩国的军事同盟者,驻有美军3.7万人,在日本,美国驻军达4.5万人,美国与日本签订有日美安保条约,尤其是1996年4月美日重新签订的条约,将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扩大,明显的具有针对中国的潜在目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还有1.8万海军在其军舰上服役。美国也是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因此,美国在这一地区如何举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关系,现在的关键在

于,美国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举棋不定。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所谓“接触”政策,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是一种情况,如果是“遏制中国”的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对中国实行友好合作政策又有很大的不一样。总之,中国的地缘政治向什么方向演变,美国在这一地区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要说中国当代的地 缘政治形势,可以说是基本状态不错,自 1978 年以来变化很大,对中国更加有利,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但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在东南线局势比较严峻,对此应有清醒估计。

2. 中国三线地缘的态势及其安西靠北争东南的地缘战略体系

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大势,大至可以分成三条地缘政治线。划分这种地缘政治线的依据,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的考虑,也有经济的、军事的、民族方面的考虑,有现实的需要,也有对未来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和预测。

这三条地缘政治线是:北－西北线,指与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相邻的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 5 国。这是一条陆地地缘线,在这一线上,中国与这五国有长达 12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一地缘政治线的特点是,这 5 个国家中有 4 国过去都是苏联的成员国,而蒙古则曾在很长时间中是苏联的军事政治同盟国,因此,很自然的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对其他 4 国仍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所以俄罗斯是这一地缘政治中的中心国家。

西线是指与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一部分相邻的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与中国的西藏十分接近的孟加拉等 7 国。这是一条高原地缘线。这一线上与中国西藏地区相邻的国家的边界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地带。其中锡金、不丹和尼泊尔三国都是这地区的小国,和印度相比尤其如此。印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中国西线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国家,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最大的。

东线或东一南线是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有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与中国有陆地边界相接,如缅甸、越南、老挝和朝鲜,而有些国家与中国有共同的海域,如朝鲜和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其中越南和朝鲜是与中国既有陆地边界,又有海上疆界的"两栖国家"。加上与这一地区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柬埔寨和泰国,这一线共有 13 个国家。当然陆地和海疆相比,海缘比陆缘在这一线中具有更突出的和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这一线陆地边界只有 6475 公里,而中国的海岸线则有 16000 多公里,海疆线达 30000 多公里,而且全部在这一地缘线。因此,这一线又可以称之为海缘线,海缘是它的最大的特点。从综合的因素看,印尼和日本是这一地缘线上的两个中心国家和主要国家。

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可以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安西靠北争东南。具体来说就是:

(1)安西,即稳定西线,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的利益所在。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这一线上的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构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重大威胁。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历史上也没有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侵略,也没有给中国带来过重大的灾难。印度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重要的大国,但现在印度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较量,也没有现实的矛盾冲突可以使印度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它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点是面向印度洋,做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最有影响的大国。它的现实的地缘政治的对手是巴基斯坦。中国与印度虽然在边界地区有较大的争议,但这种冲突的最大范围也就是有限的地区性的边界战争,而不致导致爆发双方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行动。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安西为这一线地缘政治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有根据的,现实的。安西,就是说保持中国与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最起码是不恶化

这一线的关系,维持现状,支持该地区的一切旨在巩固和平、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和努力,特别要关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及其地区的无核化问题。

(2)背靠北线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基点。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基于对以下一些事实的分析和对中国与北线国家关系发展趋势的估计:

首先,中国与俄罗斯关于边界问题的最后解决,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 300 多年来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以合作的态度处理历史问题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的结果。由于俄罗斯是中国北部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对手和最可能给中国造成威胁的国家,因而中俄两国的和平友好的邻居关系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国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得到了基本解决,也是中国历代奉行的地缘战略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

其次,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也为解决中国与其他北线国家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与北线国家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之间,本无大的矛盾和冲突,而中国与俄、哈、吉、塔 4 国 1996 年 4 月在上海签订的关于在边界地区保持和平关系的协定,更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北段发展为和平友好的地区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它也为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体系的发育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和模式。中俄关系的发展也使蒙古同中国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向前推进。

第三,中俄两国在地缘政治的新的格局中都需要把彼此视为一种可以依靠和依赖的邻居,具有战略意义,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当然,俄罗斯能不能靠得住,不是一个光凭中国单方面能确定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其一, 俄罗斯强大起来之后,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新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如对中国强大

起来后会不会成为俄罗斯的强大敌人的回答一样。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别的国家不能控制和阻挡的事情。但强大的国家并不一定对其邻居构成威胁。况且,在最近的 20—30 年中,这种威胁并不会变成一种现实的威胁。其二,俄罗斯国内的反华力量会不会对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产生大的影响?从现在的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力量来看,不管什么力量掌权,对华政策中的友好方针都不太会发生重大变化,对华不友好的力量不构成俄罗斯政治的主导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并无大的直接的利益冲突的因素,两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两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趋势来看,俄罗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在其地缘政治的重点上去。这个地缘政治的重点,一是俄罗斯的西线,即俄国的欧洲区域,尤其是东欧国家; 第二个重点是俄与独联体国家,尤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很不稳定。这种地缘政治的形势要求俄国把其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这些较不稳定的地区和对俄有更重大的利益的地区去。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具有俄地缘政治的“后方”的含义。所以中国将俄视为地缘政治的“背”,应当是靠得住的,起码在最近 20—30 年间是可行的。

第四,中俄关系现行的框架已经为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为中俄两国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在较长的时间内,它不可能再急剧地向前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也没有理由发生重大的倒退。因此,两国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关系机制,使中俄两国关系相对稳定。

当然这不是说中俄两国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的冲突。正如俄罗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科尔图诺夫(Kortunov)所说:中国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一样,“客观上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对俄中关系丝毫也不能理想化和简单化。俄中关系可能包

藏着极其危险的冲突,尤其是将来”[12]。

(3)争东南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点。这个“争”字是有多重含义的。首先,“争”即斗争之义,因为这里有中国的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这种重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不斗不行,不争也不行。这里有众多的政治利益交汇,而自己的利益必须要自己去争。这里的争也是争取的争,这里也有许多发展的机会,要力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有利的机会,不可错过。这里的敌我态势还不太明朗,因此要争取更多的国家成为朋友,争取与这里的多数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发展。

这一线的地缘政治对中国来说,既是利益最重大的地区,也是麻烦最多的一个地区,还可能是将来危险最大的地区。东南线的国家和地区是问题汇集区,它存在以下10个较大的问题:

1. 朝鲜半岛的紧张的军事对抗状态在冷战后持久不退;

2. 朝鲜半岛具有核扩散的危险;

3. 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时隐时现,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拒不认罪影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4. 美日安保条约具有了超出远东的意义,如果过去这一体制被认为是针对苏联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后,这一体制不但不减弱其存在的军事意义,反而还宣布它的范围不止限于远东,因而明显地具有了针对中国的意义;

5. 我国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受到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牵制。尤其是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喧嚣日益上涨的情况下,中国对台湾的分裂主义分子的行动或多或少会引起周边地区的国家的关注。

6. 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有国际化和地区化的趋势。中国在这里的主权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7. 中国与越南的领土争端既有陆上疆界之争,又有海上疆界之争,不仅有南沙主权之争,也有北部湾和西沙的岛屿主权之争;

8. 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毒品流入中国境内有扩大的趋势;白色

毒品在中国境内蔓延很快；

9. 这一地区的军事竞争局势在冷战后仍在发展。

10.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对中国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那么东亚地区将会是美国实行这一战略的重要地区。

但东南线又是中国必须争取的地区，是不能退却的地区。因为它事关中国政治、经济最发展和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稳定和进一步的发展；也是事关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大事，从中国的长远出发，它又是中国的未来的一个极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因此，中国应将其地缘政治的重点从过去的北方转向南方，转向东南线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中国应当从一个传统的地缘国家变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缘海缘国家。

这样，中国的北线地缘、西线地缘和东—南线地缘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总体系，这三条地缘线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进行了表述，三者各有侧重，又是一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



第一章

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及其评价

人永远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之中的存在，因而其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时间与空间条件的制约，政治活动（包括一国内部的政治活动与对外交往）也不能例外。正因如此，对于地理环境给人的政治行为所施加的影响的考察，也就成为人类最早的思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家著述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种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不过，直到18世纪之前，政治地理学还只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8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赋予地理因素一种核心的定位。如同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机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理念”、或者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活动一样，地理因素被他们认为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政治地理学随之发展到了它的地缘政治学阶段——当然，政治地理学这个术语也还一直被人们所使用。

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在20世纪初的一段辉煌时期之后，由于某些地缘政治学家被认为、也的的确确对纳粹德国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因而地缘政治理论与其他曾被纳粹所利用的理论，如“团体主义（corporatism）”的理论、国家计划的理论一道，在西方学术界被打入了另册。另外，地缘政治学因其被人们认为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也被很多人视为一种“伪科学”。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进入了低潮，与世纪之初人们言必称地缘政治学的情况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地缘政治学家都与纳粹政权有关系， 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都主张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把地缘政治学等同于“地理决定论”，很多地缘政治学家自己就反对对自然地理因素的片面强调。至于地缘政治学的有关思想，更是政治家与政治学家内外政策思考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这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文献中对“政治地理”一词的频繁使用就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出于上述的原因，地缘政治学还是一直在发展（有的时候是以政治地理学的名义），当然，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而带来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巨大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学者当中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第一节·
从政治地理学到地缘政治学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或者地理政治学（geographical politics）是一个从中世纪开始便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概念。美国地理政治学家哈特相（Richard Hartshorne）把地理政治学定义为:联系人们所处地域其他特征的变化而对其政治现象的相应变化的研究。[13]另一位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威特利瑟(Whittlesey)也认为，“政治地理的核心是政治区域，……任何区域的政治含义在于它与其特定的气候、地貌和自然资源的确定的关系”[14]。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地理政治学乃是对地理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尤其侧重于对地理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差异的比较研究。

这样一种研究在西方有很早的历史渊源。实际上，也正是在远古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较低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对自然条件的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生存活动具有比今天大得多的制约作用。人们在大河流域发展灌溉与农耕、在草原地带进行狩猎与游

牧、在海边则从事商业与贸易，与之相适应，这些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的人群发展出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明显的差异自然十分容易引起人们在理论思考中的注意。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地理政治学的理论表述也最先出现在古希腊，这是因为在那里，在不大的地理范围内并存着多种多样的与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从而为学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现成的素材。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学者赫卡托斯（Hecateus）就曾描绘了一幅被划分成两部分的世界地图。一部分是欧洲（Europe，包括西伯利亚），另一部分是亚洲和非洲。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划分，而气候则是这一划分的主要依据。欧洲代表了北部的寒冷地区，亚洲和非洲则代表了南部的暖热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的气候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生存，赫卡托斯视之为主要的权力中心（有意思的是，后代的政治地理学家的观点往往与此相反，见下文）。一个世纪以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提出了把整个地球划分为5个气候带（两个寒带，两个温带和一个热带）的理论，正是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亚里斯多德(Aristotfe)认为，希腊人所处的温带在政治权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也对一个国家具体的自然条件对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认为，阿提卡的兴起就在于这个城邦具有不容易受到入侵的地理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这个半岛的偏僻及其土地的贫瘠。修昔底德把阿提卡的情况与希腊的一些富饶的地区进行了对比，指出，这些地区恰恰就因其富庶而被不断地卷入争斗之中。正是由于考虑到自然条件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在对理想的国家进行设计的时候，都把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最好的城邦在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方面

都应该适中，因为人口太多，国土太大的国家不容易治理，而人口太少、国土太小的国家又不足以保证自身的防御。除此之外，理想国家还要有一个理想的地理位置，它必须处于温带。亚里斯多德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情，……但大都细于技巧而缺少理解；……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情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禀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情，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亚里斯多德甚至认为，倘若希腊“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15]。另外，从军事的角度考虑，亚里斯多德认为，理想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军难以进入而居民却容易外出的。……中心城市的位置，照我们的理想应有海陆方面的通道”[16]。如此等等。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亚里斯多德的这样一种思路被后世的很多政治思想家所继承，只不过由于各自的政治观念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国家的环境要求也各各不同罢了。后代人一般都不再有古希腊人那样的开放观念，所以他们的理想国家一般都要建设在一个孤岛之上，以此来杜绝外部世界腐化风习的影响，像英国的莫尔（T.More）的“乌托邦”、意大利的康帕内拉（T.Canpanella）的“太阳城”。甚至英国的洛克(Locke)设想的理想国家都是这样。

古希腊人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了继续。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把整个地球分成若干个四边形，他所说的“可居住地带”（inhabitable earth）即处于这些四边形中的一个之内。根据斯特拉博的描述，这片“可居住地带”形状像战士的斗篷，外面是一个被水包围的平行四边形陆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欧洲、利比亚和亚细亚。斯特拉博认为，欧洲大陆是“最适合人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发展的一片地区”[17]，因而只有这片地

区才具有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意义，应该是地理学家关注的中心。对于那些处于"不可居住地带"（uninhabitable earth）的国家的了解对罗马人来说没有任何政治价值，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既不能妨碍我们，也不能通过他们的贸易给我们带来益处"[18]。在古罗马，这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当然，它反过来又妨碍了政治地理学在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自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在政治地理学方面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家是法国的让·博丹(J.Bodin)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博丹明确指出，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与国家政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因为自然条件制约了各民族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性格与气质。博丹认为，北方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那里的居民们性格倔强，胆大好斗，酷爱自由，因而民主制对他们最为合适，至少也应该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君主制。与此相反，南方湿热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则一方面能使人变得聪明和富于智慧，因而南方有较为繁荣的文明，但另一方面这种富饶的自然条件和炎热的气候又使人变得性格温顺、胆小怕事、缺乏反抗精神。所以暴政十分容易产生。博丹最推崇在中部地区生活的人的品性与气质。认为他们兼有北方人和南方人的长处，既不失豪放，又富于理性，因而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君主制对他们最为合适。博丹并且认为，山区与平原、内陆与海滨，这些不同的地理条件对当地居民的性格与气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19]博丹对自然条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的研究的目的是因为他自己相信，对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活与性格秉赋的人群而言，最为合适的政治体制也应该各各不同。因而对于自然条件的研究与了解就是政治家的第一要务。博丹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孟德斯鸠的研究。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

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20]。孟德斯鸠把上述自然条件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生活等等结合起来，称之为"法的精神"（l' ésprit de loi），并以此作为他的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孟德斯鸠对于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人本身的气质与秉赋的关系的认识，总的来说与博丹很相似，即认为寒带地区的人勇敢而富于进取精神，热带地区的人懒惰而怯懦。温带地区则因其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使不同的倾向和需求以及不同的德行成为可能。另外，地形、地貌以及政治力量的空间分布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解释亚洲普遍存在的政治专制制度时就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在亚洲不存在温带，"和严寒的地区紧接着的就是炎热的地区"，其次是因为亚洲广阔的大平原的存在使得强大的专制国家的建立比起在地域被山川与海洋分割成很多中小国家的欧洲要容易得多；[21]最后，"在亚洲，强国与弱国是面对着面的；好战、勇敢、活泼的民族和巾帼气的、懒惰的、怯懦的民族是紧紧地相比邻着的；所以一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欧洲的情况正相反；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比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这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欧洲之所以有自由而亚洲之所以受奴役的重要原因"[22]。孟德斯鸠还讨论了南方的多妻制与其气候条件的关系，他提出了两条理由：首先，南方气候炎热，女子一般都早熟，所以"八岁、九岁或十岁就可以结婚"，然而，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她们容易提前衰老，因而"在这些地方，如果宗教不加以禁止的话，一个男人便遗弃发妻而另觅新欢，因而产生了多妻制，这是很简单的事"。其次，孟德斯鸠认为，"在炎热的气候里，人们的需要较少，赡养妻和子女的费用也较少，所以能够娶较多的妻"。他得出结论说："欧洲的法律采取一妻制，而亚洲、非洲准许多妻制，是和气候有一定的关系的"[23]。孟德斯鸠还针对当时已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指出，"岛屿的人民

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海洋使他们和大的帝国隔绝；暴政不能够向那里伸展；征服者被大海止住了；岛民很少受到侵略战争的影响，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保持自己的法律”[24]。总起来说，对孟德斯鸠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不应该一概而论，虽然其中一些内容的确不免荒谬——为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地理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政治地理理论当中有不少思想也的确发人深省。

在孟德斯鸠之后，还有不少学者试图对社会政治现象提出地理学，或者广而言之，自然环境方面的解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Toynbee)提出的“挑战—应战”的文明发展模式当中，自然环境就囊括了他所列举出的5种挑战性刺激因素中的两个方面，即那种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恶劣的地区以及需要通过勘探、开垦和发展才能把荒野变成良田的地区都可能刺激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在其他的三种“刺激性因素”（来自某一外国的挑战、来自外部的不断增加的压力、惩罚的刺激）当中，前两者也是与政治地理学分不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汤因比的历史观中环境因素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了。

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对政治—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的另一位知名的近代学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的演说，后来又出版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书。特纳认为，美国西部存在的广阔的边疆而不是欧洲的影响对于美国社会的塑造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美国式民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边疆为美国人的开拓与进取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并且造就了美国人的性格与才智。特纳指出：“那种讲求实际、勇于创新、很快地找到应急办法；精通物质方面的情势，虽然它不够高雅，但对实现重大目标却非常有用；那

种永不满足的性格，和无穷的精力；那种个人至上，不论好歹一心工作的劲头；再加上同自由自在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欢快情绪——所有这些都是边疆的性格，或由于边疆的存在而在其他地方培养起来的性格”[25]。特纳的理论被其他的学者加以演绎和阐发，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所谓“边疆学派”，这些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边疆”的存在及其作用来解释美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边疆学说”在美国有十分广泛的影响，从肯尼迪(Kennedy)提出的“新边疆计划”到里根(Reagan)政府时期的“高边疆政策”，都可以看出“边疆”思想的痕迹。

在欧洲的传统思想当中，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古罗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在古希腊人的思考中，城邦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层次；而古罗马人则以那种帝国所特有的普济主义（universalism）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共同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都没有较大的建树（可能修昔底德除外，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上第一部国际关系史的论著）。自然，他们也就不会更多地考虑地理环境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这是政治地理学的研究长期以来更多局限于国内政治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到 19 世纪才有所改变，而正是这种改变导致了西方地缘政治学的诞生。

根据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wl Cohen)的定义，“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6]。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乃是“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海）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27]。概括起来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环境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研究对象的国际性质，这是区分 19 世纪兴起的地

缘政治学和早已源远流长的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由于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这个名称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联系太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声名狼藉，所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宁可沿用地理政治学或者政治地理学的名称，但从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显然与19世纪以前的政治地理学或地理政治学都有明显的不同，即都带有一种“世界观念”（Weltanschauung，见下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研究一并归入地缘政治学的范畴。在下文中，我们也不再对这几个术语刻意加以区分。

地理政治学之所以演化到它的地缘政治学阶段，或者说，研究者的目光之所以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而开始转向广阔的国际舞台，这个变化的产生自然有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深刻背景，那就是自近代以来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联系和国际冲突在规模和程度方面的急速增加。这一切为人们从一种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家间的关系乃至人类历史的进程提供了素材；而哲学、历史学、自然史学以及地理学的发展，则为这样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西方地缘政治学首先诞生在德国。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曾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世界政府的设想。康德的思想是充满了思辨色彩的。他认为，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自然用战争的方式使人们散居到了最偏远的地区，但它还将以同样的方式使人们相互联合起来。康德并且认为，欧洲的联合将是世界联合的第一步。康德的这种“世界观念”对后代的德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德国的地理学也具有强烈的思辨因素。当然，德国人也并不都像康德那样在书斋里构筑他们的世界体系。亚利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就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史学家和探险家之一。洪堡在南北美洲的山川与丛林之中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以其广博的自然史

知识与德国的卡尔·里特尔（Karl Ritter）一道创立了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整体论思想的德国的地理学学派。洪堡和里特尔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强调人、国家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里特尔还进行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地域划分。他首先把整个地球划分为两部分——陆半球和海半球，其分界线是一个穿过秘鲁和南亚的大圆圈；然后，他再把陆半球一分为二：旧大陆与新大陆。前者因其东西向的延展而在气候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后者则因其南北向的延展而在气候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他把每一个部分都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它们由自己的规律来支配，并且密切影响着各区域的历史进程。这正是里特尔从1822年到1859年连续发表的19卷本巨著《地理学及其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所阐释的主题。由洪堡和里特尔所开创的德国地理学派在两个方面为后世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首先就是这个学派强调人类生活空间的整体性以及地理学的人文色彩，其次由于它既强调地理研究中的整体性，又强调它的区域性，从而为后人对各地域的比较研究提供前提——而这些也正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

至于说地缘政治学的真正的创始人，则是非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西·拉泽尔（Friedrich Ratzel）莫属。拉泽尔出生于1844年，后来成为莱比希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秉承了洪堡和里特尔的地理学思想，相信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以及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他同时也接受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达尔文(C.R.Darwin)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反映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哲学观念。1897年，拉泽尔发表了《地理政治学》（Politiche Geographie）一书；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虽然他自己尚未使用"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拉泽尔提出，政治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明确地把国家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这本著作的主题。他认为，国家乃是一

个空间性的有机体，因而，与自然界的所有有机体一样，它必然地具有必须适应于它所生存的环境的一面，又必须具有不断生长发育，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求得自己的生存的一面。据此，拉泽尔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成就，也就相应的具有两个方面的标准，即第一，看它是否能够成功地适应它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第二，作为一个“空间有机体”，看它是否能够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而增强自身的力量。拉泽尔据此还提出了后来在德国被广泛使用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用以指一个国家的健全发展所需要的地理条件。拉泽尔强调指出，这样一种领土扩张既包括对弱小国家的吞并，也包括对未开发的又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地域的征服。拉泽尔认为，国家扩张的动力来自于国家自身的生命力，而且它是没有终极的。也就是说，国家永远不会停止它的扩张过程，否则它就会被比它更为强大的国家所征服。另一方面，国家的不断扩张又可以促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富于进取精神，因为唯此他们才能治理这个不断扩展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拉泽尔看来，国家的生命过程决不仅仅是一种领土扩张的过程，而且也是国家全面成长的过程。拉泽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的疆域不可能是永久不变的，因为国家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因而不可能被压制于生硬的界限之内。国家的形式和力量依赖于它的居民，而它的外向性的运动则体现为其所占有领土的收缩或者扩张”[28]。

拉泽尔的理论在今天听来自然是充满了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色彩。但是，在当时的德国，这一理论却倍受青睐。因为它不仅把当时思想界最为流行的达尔文进化论、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论以及传统的德国哲学和地理学融为一体，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当时在德国已经逐步滋生的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思潮。至于拉泽尔本人，他倒是不像后来的那些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一样，把他的理论视为某种实际政策的基础，他不过是试图为国家的政治过程提出一种地理学的解释。对于这种理

论可能的实际影响，拉泽尔也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曾经担忧地表示：认为“一个国家唯一的物质性因素就是它的疆土。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种诱惑，把政治组织的基础首先视为国家的疆土，似乎它就能把那些总是离散的人们聚合成为一个整体”[29]。

最先对拉泽尔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作出积极反应的是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与拉泽尔不同，契伦首先是一位政治学家，并且是一位彻底的国家有机体论者。契伦于1901年出版了《国家有机体》（Staten Som Lifsform）一书，就是在这本书中，他首创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即英文中的geopolitics）这一术语。实际上，就契伦的本意来说，他是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理论（Staatswessenschaft）——国家的有机体论。据此，契伦提出了有关国家的5个重要的变量：地缘政治、经济政治、人口政治、社会政治和法律政治。但是，契伦又认为，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国家的生命最终操纵在人的手里”[30]。可见，契伦并没有把地理要素作为国际政治生活的唯一决定因素。在他看来，之所以提出地缘政治的理论，其目的只是要引起政治家们对于一直被他们所忽视的政治生活中地理因素的注意。

根据契伦的定义，地缘政治学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加以认识的科学”。由于国家是一种空间的有机体，因而疆土就是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契伦在此完全接受拉泽尔的观点，认为富于生命力却又空间有限的国家以殖民、兼并乃至征服的方式扩展其疆土是一种绝对的政治规律。契伦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得出了一个让他自己深感忧虑的结论，那就是：中欧（包括他的祖国瑞典）处在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俄国的威胁之下。契伦认识到，单凭瑞典或者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消除这一威胁，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德国。但是，契伦又认为，当时的德国也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因此他提出了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中心

的中欧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邦联的设想，这个邦联将分别以顿克尔克、里加、汉堡和巴格达作为它的四角，囊括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契伦并且认为，这样一个新的力量中心肯定会为英国所不容，所以，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终将不可避免。考虑到当时已经邻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这样一种观点在德国颇具影响。

这样，到20世纪初，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就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的气候了。不过倒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的理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政治军事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与纳粹德国时期的情况不一样。另外，就在同一时期，在其他国家，像美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地缘政治理论。战后随着这些理论的进一步综合，使地缘政治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在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理论纷纷出现，这本身就是当时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结果。正如1904年一位评论家所说：“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政治家还只在几个棋格子里走棋儿，而棋盘上的余部都空闲着。但是现在，世界业已成为一个星罗棋布的棋盘，政治家的每个行动，都要考虑一下棋盘上的所有棋格。”地缘政治学的繁荣，正是这样一种考虑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麦金德及其地缘政治理论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也产生了一种真正具有“世界观念”的地缘政治理论，这就是美国航海史学家、战略学家、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所提出的“海权论”。与地缘政治学的其他创始人不同，马汉并不是一位地理学家，他的结论来自于他对航海史和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即他对于历史上通过海军的行动对海洋的政治控制与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大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马汉提出，制海权，特别是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国家力量的至关紧要的因素。[31]他列举了影响国家实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地理位置、地形、疆域、人口、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认为其中地理位置的作用最大。马汉以英国的历史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适中，这样既可以使它对陆上潜在的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又可以使它相对免于入侵的威胁，英国的舰队可以从其战略基地方便地集结以进行防御或者对大陆港口实施封锁。

从全球范围来看，马汉认为，以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为界的北部陆半球因其活跃的贸易和政治活动，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其中，马汉尤其关注于亚洲，特别是北纬 30－40 度之间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带，他称之为“争执中的和可争执的中间地带”。他声称，这片地区乃是一片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它过去是、而且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是俄国与各海权国家争夺的焦点。马汉之所以把俄国和各海权国家作为对立的两极，是因为他感觉到，俄国的自然条件使它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之可以不受阻止地向四周扩展它的力量，从而主宰世界。他指出，俄国军事扩张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这种企图。马汉还预测道，俄国对上述地带的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它的两翼而不是中心，其目的是争取新的出海通道。马汉提出，相应地，对俄国扩张的遏制也就应该在中亚的两翼进行，尤其是不能让其进入远东以威胁西方海上国家的贸易通道。其方法是由英美结成同盟控制亚欧大陆边缘的战略基地。[32]但是，马汉又感到，要全面遏制俄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较为可取的出路是建立一种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平衡。马汉的具体建议是可以给俄国提供一定的领土补偿。他认为，可以让俄国占有满洲里，中国的首都则迁移到长江沿岸，使之处于西方海上国家的直接影响之下。马汉指出，中国的分裂将不可避免。[33]

马汉对他的海权论中的沙文主义思想并不加掩饰，实际上，他

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忠实信徒。马汉写道："我们四周全是争斗；'生存竞争'、'生存竞赛'这类说法对于我们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只有当我们不再思考它们时才能意识到它们的意义。国家与国家到处都在以兵戎相见；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毫不例外。"[34]马汉明确表示，他的海权论是要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他还认为，传统上把美国和欧洲分隔开来的地缘政治观点已经过时，美国因其处于两大洋之间，将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此外，美国还应该涉足欧洲大陆内部的事务，只要那里的纷争对美国哪怕只有局部的、间接的影响。[35]需要指出的是，马汉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包括担任过海军部助理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velt)。至于马汉关于大陆国家与海上国家的冲突、亚洲与欧洲的冲突、俄国与西方的冲突的理论，则不仅预示了后来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而且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实践中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

马汉的海权论提出后不久，就得到了英国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的回应，从而使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对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哈特相有这样一段评论："不管怎样，它已变成对世界权力进行分析和预测的课题，成为现代地理学对人类政治的世界观念的最杰出的贡献"[36]。麦金德自己则认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够对整个世界舞台上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某种逼真的认识，并且可以找出一条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普遍历史进程的某些方面的地理学因果关系的规律。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那么这条规律因其能够把国际政治中一些相互竞争的力量引入人们的视野而可能会具有实践的价值"[37]。这就是说，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学理论，同时也反映了独特的一种世界史观。

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于 1861 年出生于英

格兰，曾分别于1883年和1884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和近代史学学位，他对于战略学和地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麦金德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是人而不是自然在行动，但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控制权。我所关注的是普遍的物理制约机制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因果联系"[38]。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的《地理学月刊》上发表了《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一文，首次系统阐述了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当然，这一理论后来经过了他自己的多次修改，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始终如一的。

麦金德的世界史的地理观，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世界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陆上国家与海上国家反复斗争的历史。而陆上力量的中心，即所谓的"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则是欧亚大陆的中央（大致相当于前苏联的领土范围）。麦金德认为，亚欧大陆中部平坦的大草原曾经便利了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而十字军东征则被麦金德看作是欧洲人对于亚欧大陆中心的第一次攻击。麦金德提出，在哥伦布时代，这种大陆与海洋的对抗对于海洋一方有利；然而，随着一个世纪以来交通运输系统和武器系统的发展变化，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向大陆一方倾斜。他写道："一代人以前，蒸汽船和苏伊士运河增加了海上力量相对于陆上力量而言的机动性。……然而，横贯大陆的铁路网正在改变陆上力量的环境，而且，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亚欧大陆封闭的中心地带"，"因其向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的扩张而导致的力量平衡向枢纽国家的倾斜，将使它们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发展航海力量，这样，一个世界帝国的出现就为期不远了"[39]。

1919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麦金德在这部书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大陆心脏学说"，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首先，"枢纽地带"的地理范围被进一步扩大了，囊括了东欧和西伯利亚，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heartland）；其次，包括亚洲、欧洲和非

洲的大陆块被麦金德称为“世界岛”。也就是在这部书中，麦金德提出了他那人所共知的著名论断：“当我们的政治家在与被他们击败的敌人进行对话时，某个小天使会时不时地向他们耳语：‘谁统治了东欧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就统治了整个世界”[40]。

麦金德的上述论断被很多人视为“地理决定论”的经典表述。但麦金德自己却认为，“如果你不愿意让地理学服务于战争战略的话，那么它必须作为和平战略的基础”[41]。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的目的是要提醒大英帝国它的霸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的话，那么战后他经过修正的理论则是试图要为世界和平提供一种地理学上的保证，为凡尔赛的谈判者们提供一种思维的框架。经修改过的“心脏地带”的地理范围大大向西和向北扩展，这本身也正是 1904 年到 1919 年的世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地理变化的反映，即“东欧的重心已经从彼得格勒转移到柏林”。麦金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德国的投降和俄国的崩溃而告终，也就是说，海上力量似乎再次取得了对陆上力量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已经失效。这是因为亚欧大陆本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并没有改变。麦金德在这里指的是“心脏地带”那种战略上易守难攻的特性、辽阔的范围、丰富的资源以及日益发达并且把这片土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铁路交通网等等。麦金德写道：“德国舰队在福尔斯海湾的投降的确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清醒，并且从长远来看，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大陆上的大部分有朝一日会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力量之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建立起一支不可战胜的海上力量吗？”[42]

因而，麦金德提出，海上力量为了保持自己对于陆上力量的优势地位，或者说，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必须阻止“心脏地带”被某个统一的力量中心所控制——实际上就是阻止德国和俄国可能的联合。麦金德希望通过

凡尔赛体系在这两个大陆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系列的“缓冲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南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与此同时，麦金德认为，未来的国际联盟应该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一种力量均衡，使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向联盟挑战，为此，一个以英美为首的托管制度将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麦金德看到了“大陆心脏”西移的趋势，但在他的心目中，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仍然是对海上力量的一个主要的威胁的来源。麦金德曾于1919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南俄罗斯的高级专员，他所写的报告中认为，随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俄罗斯沙皇帝国的兴起”，布尔什维主义将像燎原大火向印度席卷而去，从而创造出一个对民主国家而言非常不安全的世界。[43]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麦金德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且提出了“大陆心脏学说”的第三种版本。新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他于1943年发表的《环形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当中。麦金德在此再一次对“心脏地带”的范围进行了修正，使之与苏联的版图完全重合了：“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论，我们可以足够准确地说，苏联的领土就相当于心脏地带”[44]。其次，麦金德首次提出了“陆间大洋”（the Midland Ocean）的概念。陆间大洋实际上就是北大西洋。它有法国作为其桥头堡，英国作为其水上机场。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地区作为其训练有素的人力、农业和工业基地。麦金德认为，这是一个除去心脏地带之外能够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维持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地区。显然，新版本的理论反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政治地理的重大变化，麦金德自己称之为“我的第二个地理学概念”[45]。

“第二个地理学概念”既反映了战争的进程，也反映了麦金德对于未来的期望。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它首次由一支庞大的驻军守卫着”，一旦苏联打败了德国，那么它将成为最大的陆上力量。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修

改了他原来对苏联的立场。他希望出现一些“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据点”，它们将传递一种能够“从德国人的头脑中清除那种黑色魔法的……清洁的与德国人相反的哲学”。这些堡垒包括“广阔的……拥有足以阻挡德国侵略者的兵力的天然要塞”和所谓的“陆间大洋”及其周围的海域与河盆。[46]麦金德在此实际上是呼吁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联盟。这样一种联盟一方面固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麦金德自己的地理观变化的结果。

这种修正正是他的文章中所谓“环形的世界”的含义所在。下文还要提及，由于20世纪绘制地图的各种新的投影方法的出现，旧式的麦卡托投影的局限性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觉察出来。麦金德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在用等距离投影方法绘制的地图上，心脏地带的空间尺度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陆间大洋”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世界上的力量均衡不再处于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之间，而转移到北极与季风带之间的心脏地带与陆间大洋地带。麦金德1943年绘制的地图还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了一个弧形的“真空罩”（mantle of vacancies，都是一些沙漠和荒野地区），将两大力量中心适当地分隔开来从而使之免于直接的对抗。麦金德认为，这实在是一种“平衡的人类世界”，他“为这种平衡与自由感到欢欣”[47]。麦金德地理观的变化还来自于他对于政治力量概念的理解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第三个版本的“大陆心脏学说”中，枢纽地区不再是便于运动的地区，而是建立在人口、资源和内部联系基础之上的“力量堡垒”，这就大大降低了亚欧大陆东北部边缘及其内部的沙漠和荒原地带的重要性。不过，麦金德总是远远走在他的同代人的前面。正如他提出陆上力量对海上力量的威胁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一样，在他的“第二个地理概念”问世之后很长时间内，西方人却依然深深沉迷于大陆与海洋的对抗而不能自拔，从对德国的热战走进了对苏联的冷战。

大约与此同时，在欧洲和美国还出现了不少与麦金德的“大陆

心脏学说”大同小异的地缘政治理论，其中包括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以及美国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J.Spykman）等等。他们的理论都可以被看作是麦金德理论的变种，因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把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对抗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

费尔格雷夫的理论与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非常类似，他本人也采用了“心脏地带”一类的术语，并且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了地理学的解释。费尔格雷夫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由环境与能源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因而，历史上欧亚大陆中心的游牧民族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迁移和攻击乃是因为它们必须扩大自己有限的能源供给量；而在近代历史中欧洲北美之所以成为世界力量的中心，也正是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新的能源（煤炭）的主要产地恰恰位于从东往西横贯欧洲的一个带状区域以及美洲大陆的同类地质构造带。费尔格雷夫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气候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费尔格雷夫的理论与博丹和孟德斯鸠的观点非常接近。费尔格雷夫认为，由于温带地区的能源有限，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节约与开发新的能源，而在热带地区，由于其能源供给非常丰富，在那里生活的人反倒是“精力匮乏”，这成为“欧洲先进而非洲黑暗”的根本原因。当然，总起来说，能源问题在费尔格雷夫那里还是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他认为，主导资源是人类前途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不过，费尔格雷夫的理论具有较少的决定论色彩，因为他看到了自然资源的可替代性，比如说，石油、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对于煤炭的替代。他并且提出，由于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仓库，因而也许在未来科学技术的作用下，热带地区将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理含义。

不应忽略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马汉以后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在麦金德的影响之下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世界的地理中心的理论，但与欧洲人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美国人关注的焦

点远远超出了欧亚大陆。以提出大陆漂移学说而著名的美国地理学家汉斯·魏格纳(Hans Weigert)认为，在欧亚大陆寻找"心脏地带"的传统实际上是在绘制地图时旧有的麦卡托投影的结果，因为在按照这种投影方法绘制的地图上，美洲大陆被排挤到了世界的边缘。魏格纳对麦卡托投影的批判鼓励了各种新的投影方法的出现，而根据这些投影方法，世界的"心脏地带"也就相应的从欧亚大陆转移到了美洲甚至是北极地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是斯皮克曼。按照新的投影方法，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大力量中心：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后两个地带被他称为所谓的"内新月地带"），对于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就表现为包括南北美洲大陆的西半球和包括心脏与边缘地带（rimland）的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对抗。另外，斯皮克曼认为，在欧亚大陆上，并不是"心脏地带"反而是"边缘地带"构成对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胁，"上个世纪旧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就是海上通道周围的英国海上力量与试图冲破其周围的包围圈的俄国陆上力量的对抗"[48]。他并且提出了一个对麦金德的上述著名命题的修正："如果说在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中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49]。当然，这种学说与当时其他的地缘政治理论一样，也受到了具体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各国的对外政策提出理论上的依据。斯皮克曼理论的实际含义就是，德国与日本的结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有可能控制上述三个世界力量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势，美国要保证自己的实力地位，就只能与英国结成战略同盟。由于三大力量中心的理论，以及俄国与英国在欧亚大陆的边缘的争斗的理论构成了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的基调，因而在他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设想中，由美国主导的三大力量的平衡就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与此相适应，斯皮克曼也不赞成彻底消

灭德国和日本的实力，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应该成为制约苏联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企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美国还必须在“边缘地带”保持优势的军事存在——这些观点成了战后的杜鲁门主义直接的理论先导。

·第三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与纳粹政权的地缘政治政策

上文提到，20世纪前半期成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它们都具有某种“世界观念”，也就是都试图为人类历史进程提出一种地理学的解释，这个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被发展到了极点。也正是这样一种极端化的地理政治观点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最终成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扩张政策的理论根据。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以及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惩治使得德国人普遍具有一种痛苦和屈辱的心理。这样一种心理与德国传统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当时盛行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混合在一起，使得不少德国人愈加迷信武力，渴望复仇。自然而然地，这样一种情绪在地缘政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豪斯浩弗出身于一个牧师之家，并且早年从军，在帝国军队中于1908年晋升到了上校军衔。也就在这一年，豪斯浩弗奉命出访日本。日本之行对豪斯浩弗产生了终生的影响。正是这次旅行使豪斯浩弗首次对地理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兴趣，也使他沿途亲身体会到了英帝国的海上力量。到达日本之后，

他不仅考察了日本的扩张政策，而且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调查。回国两年之后，豪斯浩弗就发表了《大日本》（Dai Nihon）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豪斯浩弗离开了军界，并且开始了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系统研究。

地缘政治学之所以得到豪斯浩弗的青睐，是与当时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对德国的制裁之一就是大大缩小了战后德国的版图——德法边境被恢复到了1879－1881年普法战争之前的状态，莱茵河左岸的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占领15年，在德国东部，波兰的独立得到了承认，而且为了给波兰提供出海走廊，东普鲁士从德国领土上被划了出来，但泽则变成了在国联保护下的一个自由市。德国人对这样一种安排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豪斯浩弗自己就明确表示："我们的故土的残缺不全是令人不能忍受的"，那些被分割出去的土地必须归还德国，进而，全体日尔曼民族必须聚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50]这成为豪斯浩弗地缘政治理论的根本目的。1924年，豪斯浩弗出任了在他协助之下建立起来的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出版的刊物《地缘政治学刊》的首任主编，自此，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缘政治学研究队伍在德国逐步形成了。

豪斯浩弗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他曾经高度评价后者190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的文章，认为它是"在所有地理学的世界论点中最伟大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几页地缘政治学杰作更伟大的作品"[51]，而麦金德所提出的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冲突的理论则"是一曲铿锵有力的古老旋律……它所谱写的当今世界政治的曲式就像曾被谱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样"[52]。当然，豪斯浩弗虽然接受麦金德的理论，但他的出发点与麦金德却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说后者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海上力量的霸权的话，那么前者的目标则是赢得陆上力量对于海上力量的优势。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对立

由于德国的战败而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现实意义。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普遍认为，英国是德国最主要的天然敌人，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以海上力量对陆上力量的胜利而告终，英国和美国一起将会更便利地确立其世界霸权，并将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推向整个世界，从而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威胁和发展的障碍，"当他们（指西方列强）把持了世界之后，他们就会要求社会停止前进"[53]。

对豪斯浩弗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拉泽尔，尤其是后者关于"生存空间"的理论和国家的有机体论，这些理论同样由于德国战败以后的处境而对德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针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领土安排，豪斯浩弗和其他许多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都认为，德意志国家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个性的有机体，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扩展其地理空间。希特勒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德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土观念："人们规定着并且改变着国家的疆界。一个国家成功地获得了过多数量的领土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它永久占有这些领土的更高的保证。充其量它只不过证明了征服者的强大和被征服者的软弱。而在这种情况下，强权即是真理……如果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是不扩展其领土就注定要毁灭的话，那么获取领土的权利就能变成一种义务……德国要不就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要不就没有德国"[54]。豪斯浩弗自己也公开表示："伟大的民族必须突破狭小的空间……它必须冲破在过去的年代中由于被压制和被支解而形成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如果整个地球不为最优秀的民族开放，那么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55]。

这一时期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与任何有机体一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必须满足一系列的需要，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对于生存空间的需要，而对于一定的生存空间的有效占有本身，又证明了对过多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的合理性。国家作为一种有机体，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吸收周围的弱小组织的能

力。基于这样一种出发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德国的生存空间的扩展提供理论上的论证和指导。与此同时，这批地缘政治学家的工作也得到了大肆宣扬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纳粹党的青睐。1924年创刊的《地缘政治学月刊》的出版者库尔特·沃温克尔(Kurt Vowinckel)就是一个纳粹党人。1931年，在德国又出现了一个名为"地缘政治学工作组"的组织，作为《地缘政治学月刊》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机构。"地缘政治学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充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对他们而言，地缘政治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领域，而且是一种利用地理和历史所提供的材料的'基本的原则和内心的态度'"[56]。1933年纳粹党上台掌权之后，对于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使它得到了最高级的官方承认和国家的资助。该研究所实际上成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官方的理论阵地。豪斯浩弗自己对他的同事们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不要太狭隘，而要从大陆与海洋的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进行思维，从而使你们的方向能够与元首保持一致"[57]。他并且明确指出："地缘政治学是对领土权利的一种义务，是对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地理区的权利一种义务，这个地理区不仅指帝国疆界范围内的土地，而且是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区"[58]。

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学本身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念，即对于世界历史的一种地理学的解释，而与此同时，世界史又被他们等同于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征服史。豪斯浩弗认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生长完全是由其地理环境条件所决定的，是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存在的国家与这个国家赋予了人格特征的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地缘政治学应该而且也必须成为国家的一种地理意识"[59]。根据这样一种理论，种族与土地（Blut und Doden）就具有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一种国家的天然疆界与持续的领土扩张之间的动

态关系。天然疆界反映了一种理想，反映了一个特定的民族为完成其使命而必须达到的目标。这样一种理想为各相邻国家所共有从而又使它们相互冲突，由此成为人类政治史的基本动力机制。所以，“边界就是战场而并非(在国家之间)进行划分的法律规范”[60]。战争就是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没有一种哲学或者社会理想主义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世界的巨大时钟的发条不是欢乐，而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61]。豪斯浩弗表示：“自然与环境先于和超越于政治与道德，……而一旦被归因于或还原为物理的和机械的机制，政治就非政治化了，道德也就中立化了”[62]。

上述观点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出发点，从这种 观点出发，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阐发了一整套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理论体系。首先就是关于“泛区”（pan－region）的思想。豪斯浩弗认为，泛区的观念就是“在空间中寻求其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63]。换言之，也就是根据上面所提到的“种族与土地”的观念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区域划分。每一个泛区既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文化空间，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空间。它不仅应该具有辽阔的地域和充足的自然资源，而且还应该沿经线方向而不是纬线方向延伸，以此保证其内部能够具有尽可能多的自然地理区域。在不同的场合，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提出了三个或者四个所谓的泛区——泛美地区、泛欧非地区、泛东亚地区和泛俄罗斯地区。这几个泛区将分别由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主导，最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将来自于这些泛区之间的力量平衡。泛区思想对于德国的实际意义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德国应该成为巨大的泛欧非地区的主宰力量。为此目的，德国就必须突破《凡尔赛和约》对它所施加的限制，实现向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的扩展。

在向东扩展的问题上，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在其与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之间表现出了一些矛盾之处。地缘政治学家们，包括希特

勒在内，都把德国东部辽阔的地带看作是德国的“命定空间”（Schicksalsraum），这一“命定空间”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的大草原。实际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命定空间”与麦金德所说的“大陆心脏地带”在地理上大致是重合的，这片辽阔的地区因其巨大的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生产能力而对国土狭小的德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设想德国应该占领这片地区，也曾信誓旦旦地宣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在具体政策方面，豪斯浩弗的观点却与希特勒不同。豪斯浩弗从1913年开始就一直主张建立俄、德、日三国同盟，以形成一条“撇开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横贯大陆的通道”。豪斯浩弗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并不是因为他不认为“心脏地带”对于德国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是觉得德国应该吸取拿破仑当年的教训，不能指望通过军事征服而只能通过外交和秘密的途径来实现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况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体系中，德国与苏联有着相同的处境，即它们都是在世界上被遗弃和被排斥的国家，它们完全能够形成一个“被排挤的大陆联盟来反对国联的海权统治的世界强权”[64]。他并且明确提出：“不要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而再次危及（德俄）两国协调的空间生存的地缘政治基础了”[65]。正因此，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地缘政治中的所谓“泛欧非地区”并没有把苏联包括进去，相反倒是划出了一个“泛俄罗斯地区”。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曾被人们认为是豪斯浩弗对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结果，以及陆上力量首次联盟以对抗海上力量的第一步。一位评论者认为，“对于那些用心研究过左右着德国领导人的政策制定的观念的人来说，苏德协议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这些观念与纳粹纲领中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低级人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咆哮无关……它们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英国帝国主义的武库中偷窃而来的……如果不是因为那位后来对于纳粹政策具有决

定性影响的人，即豪斯浩弗将军的话，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的这些观念在德国很可能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注意。”[66]

然而，希特勒向东征服俄罗斯的念头无论如何是不可更变的。他在《我的奋斗》中就曾明确表示：“在与俄国结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必要立即想到战争，而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将为此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结盟的目标当中没有包括一个战争计划，那么这种同盟就是无意义的和无价值的。同盟只能为斗争而结”[67]。因而，1941 年 6 月，就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不到两年的时候，希特勒便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对于希特勒的这种冒险举动，豪斯浩弗和其他的许多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都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当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还在相持不下，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不能不让地缘政治学家们心惊胆战。尽管如此，豪斯浩弗等人还是对希特勒的行动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俄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泛区”，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学家们还把所谓的“日尔曼文化区”扩展到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白俄罗斯和第聂伯河流域的整个地区，德国的“生存空间”的问题也再次得到了他们的强调。实际上，在豪斯浩弗的观念中，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儿子奥尔布雷克托(Albrecht Haushofer)曾透露：“我父亲清楚，德国处于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俄国）之间一种非常艰难的地位，而且在大陆心脏（俄国）与德国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体系所以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联盟。他曾说过，德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与一个在一家漆黑的瓷器店里可以自由行动的人相似。他明白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打碎瓷器，因而他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平静下来，耐心等待，或许他能够自由行动的时机会出现”[68]。豪斯浩弗为使德国避免在两面作战中遭到失败而进行的唯一的流产了的尝试就是积极支持德国纳粹头子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诱使英国与德国议和的苏格兰之行。

德国向西扩张的主要障碍自然是非英国莫属。英国之所以被德

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们视为帝国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麦金德的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历史性对抗的理论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英国被认为是旧的世界体系的代表者和主要的维护者。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完全同意麦金德的论断，即进入 20 世纪之后大英帝国已经走上了下坡路，“这个帝国的广阔的面积、地理上的支离分散和不纯一性使它愈加笨拙，难以控制”[69]。另外，航空技术的发展也被看作是对英国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空中力量使得大陆国家能够克服海洋的自然阻碍对海上国家进行攻击。豪斯浩弗因而认为，大英帝国的“空间控制并非无敌……它已变为我们当代的一个最成问题的政治结构”[70]。结论就是，海上力量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世界属于陆上力量。当然，这样一种转折并不会自动到来，因而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

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地缘政治学十分关注的第三个地区就是东亚。上文提到，豪斯浩弗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兴趣主要就来自于他的日本之行。终其一生，豪斯浩弗都一直认定，日本只会是德国的朋友而不会是敌人。他早在 1913 年就提出，“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的利益共同体将会是绝对牢不可破的。”[71]从此之后，豪斯浩弗不放过任何机会鼓吹德日之间的同盟。一位评论者甚至认为：“豪斯浩弗对于德日同盟的鼓吹，这一他的地缘政治动力体系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应该被认为是他真正杰出的、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成就。”[72]

总的说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纳粹政权的侵略扩张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自觉的论证与支持，而且，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生存空间”的理论以及关于国家对外扩张的自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论都不过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极右势力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体现，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科学性。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完全变成了纳粹政权的工具。正因此，地

缘政治学在战后被很多人认为是扩张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还不能停留于上述过于抽象的理解。就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政权的扩张政策的关系而言，应该说，地缘政治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德国前纳粹阶段的一种右翼思潮，而这样一种思潮又被纳粹所利用。因此，有人认为，“尽管卡尔·豪斯浩弗并没有参与《我的奋斗》的写作、修改或者评论，但他的确为希特勒提供了可供采用的一套公式以及一些措辞巧妙的术语，他们在后来的时期与纳粹的主张一拍即合”[73]。但是，学者们毕竟并不是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连豪斯浩弗自己，一生中也只不过与希特勒见过三次面。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地缘政治学家们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论证和宣传。另一方面，纳粹德国实际采取的对外政策与地缘政治学家们的理论也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尤其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比如说，对苏联的进攻以及德国始终没有控制住地中海地区的航道，这些战略决策与学者们的观点都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如果希特勒完全听从地缘政治学家们的意见就能征服世界。纳粹德国的失败，原因在于它所追求的内外政策目标使之注定要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所以，虽然说对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但如果把纳粹的暴行完全归因于地缘政治学，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彻底的地理决定论，即把地理环境作为国家行为的全部根源，诸如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对抗、德日俄的联盟等等都被认为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理论的全部内容都不具备任何的真实性。理论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当然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论题——大陆与海洋的对抗，具体说就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国家与以英国为代表的海上国家的对抗——所反映的现实，实际上

乃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不过是试图为这种对抗寻找一种地理学的解释。地缘政治学家们没有意识到，这几个国家（包括豪斯浩弗所钟情的日本）真正的共同点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晚，所以在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它们都不得不在国内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而在国际上则必须为自身的发展寻求新的空间——不是地理空间，而是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的可能性。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考察上述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内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诸多新的启示。

·第四节·
战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

如上所述，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发展到了它的极端状态。但是，即使在德国国内，随着纳粹政权的末日的临近，不少原来为希特勒的扩张政策摇旗呐喊的地缘政治学家也纷纷背弃了法西斯政权，逃亡到英美等国。纳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本人则在1946年因担心盟国对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的调查而自杀身亡。因而，纳粹德国的覆灭，不仅意味着带有浓厚的地理决定论色彩的旧地缘政治学的终结，而且也标志着地缘政治研究的中心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从欧洲转到了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于传统的旧地缘政治学而言，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批判和发展的一面。前者表现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乃至于某些思维方式仍然被人们所使用；而后者则体现为在对环境因素的考察中，决定论的色彩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学家也开始注意到了环境作用于

人类政治行为的途径和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人类政治行为对于环境的反映的多样性，此外，地缘政治研究中旧的、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对立与冲突的逻辑也开始逐步让位于多元主义的、相互合作的逻辑。如果说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是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某种反映的话，那么战后新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和变化则正是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政权的密切联系使得这一门学科本身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排斥，甚至于连地缘政治学这个称谓在大量的文献中也被敏感地避开了。在更多的场合，人们往往使用政治地理学或者地理政治学这样的术语来替代原先地缘政治学的语境位置，尽管其所指并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在战后 20 多年的时间内，地缘政治学在西方可算是“盛极而衰”，似乎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主要是限于对旧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和论点的评论与争辩，并没有太多新的理论建树。理论上的转折发生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样，当时又是一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转变时期。战后形成的僵硬的两极对峙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松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与此同时，南北矛盾日益明显，与东西矛盾一道成为政治家们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一种变化反映到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当中，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要素必须被赋予新的内容，而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因此赢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烈的政治变化再次对于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各国在失去了旧日的对手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一个分裂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西方而言的地缘政治含义需要再次予以重新考虑，西方地缘政治的理论研究又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战后初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事实上是以对所谓的地理“枢纽”或者“心脏地带”的讨论而拉开序幕的，这些讨论包括上述麦金德

对于自己的理论的订正以及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带”的理论。这样一种讨论很快就由于冷战的出现而获得了十分真实的意义。替代原先的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冲突的，是现在新出现的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冲突。美国地理学家魏格纳在1949年发表的《大陆腹地的重归》一书中提出，苏联和美国战略中心地带的北迁过程使得这两个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地理关系，这两个地区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心脏地带，它们都“紧靠着极地附近的两侧而且彼此命运攸关”。稍后，美国人德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又进一步提出了所谓“飞行员的世界观”（airman's global view），进一步阐发了魏格纳的这种思想。与斯皮克曼和魏格纳一样，德塞维尔斯基在绘制地图时采用的也是以北极为中心的对角等距离投影。在根据这种投影制成的地图上，非洲与南美洲被分得很开，而美苏两国便取代了欧洲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至于这种投影方法的实际基础，则是上文提到的航空业的发展而给北极地区所带来的新的战略意义。德塞维尔斯基断定，随着航空时代的到来，制空权而不是制海权将成为一个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不就控制整个地球上的空中大洋，要不就一无所获”[74]。他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分别集中于美国的工业心脏和苏联的工业心脏的两个空中势力圈，这两个势力圈的力量大致相当。因而“如果我们没有头脑发昏的话，我们将不会去发动有限的战争。……事实在于，在与共产主义的苏联或者中国相连的所有地域，共产主义的力量都不可能通过有限战争而被遏止。……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把我们自己的大陆心脏变为一个由此能够向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起攻击的坚不可摧的堡垒”[75]。

另一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胡森（D.J.Hooson）也认为，从苏联的自然资源、人口、农业潜力和工业增长速度来看，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对西方而言难以对付的世界大国的迹象已经确定无疑地表露出来。而且，随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迅速开发，苏联的经济重心会逐

渐东移，这对于苏联自身和整个中亚地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胡森提出："在这个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伏尔加－贝加尔地带有着成为一个真正的陆地大本营的种种迹象"[76]。实际上，在整个50年代，也就是冷战最为紧张的阶段，绝大多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都用一种充满了敌视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欧亚大陆，他们相信，西方人关于"欧亚大陆中在地理上令人迷醉的圣地（的信念）……已经由于这里正在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基座而得到证明，如今这个基座控制了从易北河到南中国海的广大地域"[77]。从这些论断当中，人们不难分辨出麦金德的小天使的喃喃耳语。

进入60年代之后，两极对立的僵硬的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出现了松动，中苏论战和中苏的分裂使得曾经被西方人望而生畏的欧亚大陆的巨大的红色地图出现了裂痕；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独立性的增强也使得西方世界团结一致的神话成为泡影；同时，亚洲和非洲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不会简单地把自己从属于两大对立的集团的事实都向地缘政治学家们表明，那种传统地缘政治中的过于简单化的两分法以及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已经不能够反映世界局势新出现的发展和变化。科恩（Saul Cohen）就是一个较先把这种变化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对之表示欢迎的地缘政治学家。科恩反对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僵硬的两极对立模式，认为地区化的趋势对于世界的稳定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趋势。在科恩提出的反映这种趋势的区域性世界图景当中，他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划分标准，即用所谓的地理战略性地区（Geostrategic Regions）和地理政治性地区（Geopolitical Regions）来对世界进行不同角度的划分。前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海权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也可能还包括一个将会出现的"第三个世界"，即所谓的"印度洋高原王国"。至于每一个地理政治性的区域则指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上大致同质的区域，它可能由一个大国，也可能由一批小国组成。在每一个区域内都有其自身相对稳定的地理政治结

构及其人口和经济中心（所谓的“定居地”）与原料产地和未来的可开发地带（所谓的“内陆区”）。每个地区内部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性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存在的根据（raison d'etre）。

科恩认为，在这个区域化的世界图景中，乔治·凯南(Geerge Kennan)所提出并且为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遏制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作用，而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显得缺乏目标和混乱不清，在实践上则只能徒劳无功。总的说来，科恩认为，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对立的思想已经使西方世界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对抗的战略战术的牺牲品。此外，科恩还看到了西欧各国力量的增强以及中国日益独立于苏联的事实，认为这两个地区非常可能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外的两个新的世界力量中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科恩提出，在未来的世界中，美国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是征服与对抗，而只能是和平共存。当然，和平共存也是可能的，但“这件事的大前提就是，全球政治体现在各等级（estates）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78]。

科恩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把多元性引入了地缘政治领域，从此以后，不同角度的地区化研究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一个热点问题，包括哈斯（Haas）、多伊奇（Deutsch）和埃茨欧尼（Etzioni）等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都对地区一体化进行过研究。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地缘政治区域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划分，而是多层次的地缘与政治内容的叠加。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康托利（Cantori）和斯皮格尔（Spiegel）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可以被划分为彼此叠加的三个层次的等级体系：美国、苏联和中国构成所谓的“主导体系”，它们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行为主体；拉丁美洲、西部非洲、中东、西欧和东南亚则被合起来称为“从属体系”，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受到四个相

互关联的模式变量，即内聚力水平、通讯网络、实力水平和关系结构的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第三个层次则是所谓的内政体系，也就是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康托利和斯皮格尔认为，如果对这个三层次的国际体系进行下一步的划分，还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介入体系”，它反映了大国通过组织行动机构在其自身区域之外的活动范围。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和英国被认为是有能力操纵“介入体系”的五个大国，而由此形成的区域性国际集团的例子则包括美洲国家组织、英联邦和法语共同体等等。由于并非世界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直接相关，因而地区主义就可以弥补“在解释链条上的一个失落的环节”[79]。

到 70 年代，西方地缘政治学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的产生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以及诸多新的问题，如生态、能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等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使研究者们不仅仅着眼于地缘政治中政治力量的交互作用，而且更多地开始考察地缘政治对于人本身的含义，也就是说不仅仅对于现实的国际力量对比进行地缘政治学的解释，而且还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取向出发，或者对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加以评判，或者提出某些新的地缘政治构想。后者进一步开阔了地缘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地缘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的偏移，即从传统的大陆与海洋的对抗（在冷战中表现为东西方的对抗）更多地转向富裕与贫困，即北方与南方的对抗。

较早反映了这样新的研究方向的人是美国的哈维(D.Harvey)。哈维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缘政治过程，揭示了资本的空间聚集而造成的财富与权力的敛聚效应。哈维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分工的理论以及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剥削与奴役的理论，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这个以贫富分化作为基本特征的分裂的世界的出现。哈维强调，只有用各种共同合作的社会结

构来取代资本主义，才能使这个分裂的世界得以重新弥合。哈维的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地理学意义的考察，在美国学者沃伦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表述。所谓“世界体系”，就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由“中心”与“边缘”地区构成的整体。前者包括欧洲与北美，它的形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且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中心。在“中心”地区的四周，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国家和地区即形成了“边缘”和“半边缘”地带。沃伦斯坦认为，“中心”与“边缘”由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联成了一个整体，“中心”地带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对“边缘”地带的剥削与奴役，这成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因而“边缘”地区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将不可能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它们只有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是经济落后地区“反边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沃伦斯坦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在西方国家遭到了不少的抨击，但也有人对这一理论的地缘政治含义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美国人泰勒（P.J.Taylor）就认为：“沃伦斯坦对世界经济的探讨，为地理学家们重新回到全球性分析提供了机会，而没有对麦金德加以任何仿效。如果说麦金德指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他因此而久负盛名）以及心脏地带内部的对抗的话，那么沃伦斯坦的探讨方法则是把南北对抗放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80]

当然不能说南北关系已经处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但东西方的对抗已经不再是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唯一关注的对象却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有的学者甚至再次更变了地图的投影方法，以强调对于南方国家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 1980 年《勃兰特报告》（《南方—北方：一项寻求生存的计划》）的发表而达到了一个高潮。《勃兰特报告》明确提出：“人们显然反对把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的简单看法。……总的来说，‘北方’和‘南方’基本上是

'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虽然哪一方都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集团。"[81]这项报告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东西方对抗的逻辑的一种强有力的挑战。

70年代以后西方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研究的视野有了较大的扩展，除发展问题之外，环境、生态和能源等等问题也都成为地缘政治学家的考察对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的诞生。这种地缘政治学认为，一个国家力量的基础，在于它的自然、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的总和，正是这种综合的力量构成了国家的行为基础。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伽洛瓦(Gallova)。伽洛瓦认为，战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的要素结构。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要素如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幅员、地形与气候、人口与资源等等之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而这些因素足以彻底改变人们对于国家力量的传统的看法。举例来说，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扩散使得敌对国家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这些国家的相对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等等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另外，伽洛瓦指出，传统地缘政治学并没有考虑到人的群体行为对于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影响。然而在事实上，信息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以及居民直接干预国家的政治过程这种现象的普遍蔓延完全可能会把人类引入与核灾难不相上下的深渊。另外，传统地缘政治学只把着眼点放在地球上面，尤其是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上面，但人类的活动与影响领域已经远远扩展到了宇宙空间，因而新的地缘政治理论不能不考虑各国现在和未来对于宇宙的征服及其力量的对比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82]

当然，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上述新的发展并不表明从麦金德开始的传统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极大地改变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从而为地缘政治学家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麦金德的"小

天使”又卷土重来。大陆与海洋的冲突再次成为不少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个方面，美国人布热津斯基(Brezezinski)颇能反映一些西方人的观点。如果说原来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主要的着眼点在于自然与环境因素的地理分布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的话，那么当前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则把注意力投向了民族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上面。根据这样的一种视野，传统上的东西方的冲突的内容不再是一种争夺制海权的斗争，也不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是变成了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争斗。布热津斯基指出了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上“激烈动荡的旋涡”，它的“地理界限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划成一个长椭圆形。它由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83]。这个长椭圆形的边缘，也就是欧亚大陆上各种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但是，布热津斯基并不只是一般地考察这些不同民族的冲突的问题。实际上，他关注的重点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而一个可能的突出的表现就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84]他一再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一项理想主义的乐观政策”[85]，呼吁美国支持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同时推动北约东扩，以此作为限制俄罗斯的“帝国的冲动”的主要手段。这样一种主张，被不少的俄罗斯人认为是试图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制造新的一轮“冷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亨廷顿(Huntington)在其引起了诸多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反映了类似的观点，只不过在亨廷顿的语汇中，“文明的冲突”替代了“地缘政治”。问题是，文明的冲突也总要具体化为一种地理的表述。亨廷顿据此曾

绘制了一幅地图，用以反映“文明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由北向南，沿着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然后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向西把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和原南斯拉夫的其余部分分开。在巴尔干半岛，这条分界线与历史上哈布斯堡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王国重合。[86]亨廷顿列举了这条分界线两侧的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认为这条分界线附近也就是未来世界中文明的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场所。人们可以把亨廷顿的地图与以往的地缘政治学家们所绘制的种种反映大陆与海洋的对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的地图做一个对比，自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也足以证明西方地缘政治学传统中冲突的逻辑在今天的延续。

·第五节·
对西方地缘政治学的评价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至今为止，已经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诸多的理论流派。在各流派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甚至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一面。实际情况往往是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不仅理论观点大相异趣，而且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思维取向方面也出现较大的分歧。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G. Parker)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划分为六个大的思想流派，即一、两极论；二、边缘论；三、三元论；四、环带论；五、中心论；六、多元论。两极论以麦金德的理论为代表，它把世界的权力分为相互排斥和冲突的两个大类，认为它们之间的争斗决定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边缘论则以斯皮克曼为其代表人物。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从两极论脱胎而来的，但它反对把对于海洋或者“大陆心脏”的争夺作为历史演变的基本动力机制的说法。边缘论认为，事实上是各国对于边缘地带的控制的欲求引起了最根本

的世界性冲突。三元论从理论上看很像是两极论与边缘论的结合，它反映了“第三势力”对于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的一种介入。三元论在地缘政治学家当中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但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当中却有一段时间大行其道，成为对于冷战后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以及作为对于一种稳定的世界格局的规范性探索。环带论是地缘政治学各理论流派当中最为渊源久远的一个，因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类似的理论。环带论认定特定的气候带是影响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初的环带论者与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等人一样，认为温带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欧洲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后来，费尔格雷夫提出，亚洲季风带各国也应该被包括进北半球的世界权力体系当中。豪斯浩弗的所谓“泛区论”也具有环带论的色彩，只不过他用在经线方向延展的环带替代了水平的气候带。帕克所说的中心论指的就是沃伦斯坦等人提出的以中心－边缘的对立为特征的世界体系论。最后，多元论反对世界存在任何特定的权力中心的观点，既主张权力中心的不确定性，也主张多个权力中心存在的可能性。多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索尔·科恩。

对于流派纷呈、观点各异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人们的评价自然也是各不相同。某些地缘政治学家，如豪斯浩弗等人固然是把地缘政治学视为揭示国家行为的唯一的科学；而另外的一种极端看法则干脆彻底否认地缘政治学具有任何的科学价值。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断然宣布：“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它把地理因素提高为绝对因素，说它应决定国家的实力，因而也决定国家的命运。”[87]当然，这都是过于极端的论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都认为环境因素是国家行为唯一的决定因素，而即使持这种观点的地缘政治学家也并不简单地认为地理环境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实际情况要复杂

得多。当然，在此不可能对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则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环境因素的问题。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就是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尤其是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影响的考察。但是，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情况就表现得比较复杂，因为地理环境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相反，它总是与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资源，与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的人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决定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环境与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自然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正因此，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内部不仅仅存在着绝对的地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区别，而且在对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强调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区别。也就是说，对于不少西方地缘政治学家来说，地理环境各种因素起作用的范围和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某些因素总要比别的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对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们眼中起支配作用的环境因素的“漂移”的考察本身，就有助于人们对于地缘政治学方法论的了解。

事实上，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是人类航海技术发展的一个副产品。这首先从马汉的“海权论”中得到了反映。这种理论典型地表明了海上运输、海洋资源、以及海军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实力的影响。随后，陆上运输系统的发展，尤其是铁路和公路系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改变了海洋与大陆的资源相对优势，这是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的实际背景。20 世纪初期航空技术的发展，又再次改变了人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如果说铁路运输系统的发展使得原先让人们感到难以接近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和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话，那么航空技术的发展则使在空中连接欧亚和北美大陆的最短的通道——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了。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在 1921 年就曾写道：“飞机在行动和方向

上拥有完全的自由；它能在最短时间内抄任何一条捷径，往来于罗盘上的任何一点，即进行直接飞行。……凭借这一新式武器，战争的威力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射程，而可以直接达到交战国所在地方圆数百英里以内的所有陆地与海洋。……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差别不复存在。”[88] 实际上，早在 1904 年麦金德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他的《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一文时，就有人提出，随着陆上、海上和空中交通手段的发展，麦金德所提出的地缘政治观念很快就会失去意义；未来成功的强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能力以及发明和科学能力的人们将能够击败所有别的人，而不论他们是处于大陆的中央还是海岛之上”[89]。至于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出现，更是改变了不少人的地缘政治观点，上述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伽洛瓦的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向来就不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的一种简单的和机械的反映，相反，只有联系人类技术的发展和变化，才能理解地缘政治的真正含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条件的能力；但从反面来看，地缘政治学也恰恰反映了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人类行为的边界，可能这样一种理解更能体现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更容易揭去长期以来这种理论上面被人们蒙上的那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地缘政治学家们极言这种或者那种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的内政外交的支配作用，无非表明了某种技术优势与地理环境的组合，或者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或者成为人类行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一旦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这种优势或者障碍也就不复存在。当然，由于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而地缘政治学也就始终能够根据新的技术发展找到自己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眼中的地理观念实际上不是自然地理的观念，

而是人文地理的观念。正如索尔·科恩所说："地缘政治观点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随着对这种变化的性质的解释之不同而不同。"[90]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地缘政治评论家斯普路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斯普路特夫妇虽然始终承认地理环境对于说明国家行为的重要性，但也一直批评大多数地缘政治学家过分强调某一种地理因素对于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定性作用，又不能充分估计科学技术进步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环境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对人的行动发生影响：第一是当有关的人类行为者能够对某些环境因素加以认识、理解和考虑；第二则是某些环境因素可能限制了人们根据对他们的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91]正是因为地理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总是通过人对环境的认识而实现的，所以斯普路特夫妇强调特定时代的人对于环境因素的认识，而不仅仅是环境因素本身对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他们曾针对地图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指出："我们希望加以强调的结论仅仅是：人们的态度以及政治家的决策都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地理现实的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观念看起来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习以为常的那些地图。"[92]而不同的地图本身又只不过是人们特定的地理观念的反映而已。

斯普路特夫妇并且认为，对于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之所以充满了混乱，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地区分环境因素对于决策者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政策实践的影响。为克服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这些缺陷，他们提出了地缘政治研究中的生态学的观点，主张对于自然与非自然因素、地理与人文因素、客观环境与主观环境进行综合考察，他们认为生态学的方法是沟通对于国际政治的各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材料的一座桥梁。"生态学的观点及其参考背

景——人一环境的关系以及某些关系的理论的观念——为外交政策分析以及对国家能力的估价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果的方法。”[93]应该说，他们所谓的生态学的方法是地缘政治理论的未来发展中一条较有希望的道路。

其次是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以及国际政治的宏观格局的关系的问题。强调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关系自然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这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当然，从严格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到类似上述斯普路特夫妇的生态学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间还存在着不少过渡性的理论形态。地缘政治学之所以往往被一些人等同于地理决定论，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主要的地缘政治学家都过分强调了地理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像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论”等等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决定论的色彩，更不用说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了。当然，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类似的“决定论”的表现，像人口学中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政治学中的人性论等等，但这些极端化的理论表现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本身的科学性。地缘政治学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地缘政治学中决定论的色彩日渐淡薄，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综合的、多角度的视野来考察地缘政治的现象，这应该说是地缘政治学走向科学化的一种反映。

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的特点还表现在这一理论所谓的“世界观念”的问题上，即它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地理因素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制约因素。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和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的理论都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实际情况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政治力量的地理分布决定着地缘政治学家们眼中的政治地理景观而不是相反，当然不能否认某种较有影响的地缘政治理论对于一定时代人类的政治行为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至少就影响了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

的思维，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更是具有长期的影响。正因为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不过是该时期国际国内政治现实的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反映，所以在20世纪不长的时间内，西方地缘政治学才经历了不同形态的理论发展。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眼中的政治地理景观从一元论到多元论、从对抗的逻辑到合作的逻辑的转化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格局在这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上文曾介绍了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对于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六个主要流派进行的划分。帕克在另外的地方指出，“这六个流派都在谋求解释世界秩序的真正性质，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是以演变和发展的方式相联接的。因此，与其将这六个流派看成相互排斥的真理，不如将它们视为对某些特定时代的说明，而且只有在某些综合情况下才充分有效。”[94]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特劳斯·于佩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说：“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95]

在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法国的地缘政治学派独树一帜。上文介绍主流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时候没有提及法国的地缘政治理论，恰恰是因为法国学派的理论与其他的地缘政治理论相比，在最根本的思维取向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法国学派始终高扬地理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坚决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国的地缘政治理论甚至不能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这个概念来加以囊括。与主流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相对照，法国学派尤其能够显示出它独特的思维特征、学术传统与其独特的理论贡献。

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先驱是保罗·维达尔·白朗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与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白朗士也注意到了海洋与大陆的两分，但与所有当时的地缘政治学家不同的是，如果说他们多多少少都采取了一种大陆与海洋的对抗的观点的话，那么白朗士就是地缘政治学中西方普济主义（universalism）

唯一的代表人物。白朗士预言，海洋的一体性和海上交通的便利为海上民族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英国正是通过赢得制海权而形成的海洋帝国（Oceana）的第一个范例。维达尔认为，随着英国海外省的不断扩大，世界统一很可能是一种不太遥远的前景。维达尔的世界帝国的观念固然随着英国殖民势力的衰落而不再为人所提起，但是，所谓的“维达尔传统”（la tradition vidalienne，或者 l'ésprit vidalienne）却始终是法国地缘政治学的灵魂。

“维达尔传统”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这个传统强调地理研究的整体性。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特别赞赏拉泽尔的人类活动乃是环境整体的一个部分的见解，坚持地缘政治学的考察对象应该是地理区域而不是国家。这样一种前提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论。首先是从维达尔开始的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一直认为地缘政治学应该是一门具有最高综合性的科学，维达尔自己也认为，不能想象地缘政治学可以抛开人文地理学这个整体。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用社会地理景观（pays）这个词来指代一种特定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地域性单元，也是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单元。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当 20 世纪初各国的地缘政治学家都或明或暗地把地缘政治学与国家、战争和冲突联系起来的时候，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在这个方面却多多少少能够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不愿谈及战争和战略等问题曾被视为一个奇特的现象，但法国人戈布莱（Y.M.Goblet）在 1935 年的确公开表示：地缘政治学应该是“超越于所有其他科学之上的一项和平事业”；它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具体的现实，因而“神秘的民族主义是空洞无物的”。另外，在像欧洲的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独立等问题上，法国人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客观与理智的精神。德芒戎（Demangeon）在 1920 年就曾指出，“虽然世界的联合曾按照欧洲的模式形成，但是现在这种欧洲人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起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势力多元化。” 另外两位法国地缘政治学家昂塞

尔（Ancel）和菲弗尔（Febvre）也曾就英国殖民体系的衰落和东方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指出，帝国体系已经经不起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只有像印度、伊斯兰和远东这些地区才是未来真正的政治、理性和道义上的权力统一和具有深远世界意义的现实所在。[96]

"维达尔传统"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地缘政治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Ladis K.D.Kristof)有一段概括，那就是："现代地缘政治学家查看地图，并不是为了弄清自然迫使我们做什么，而是要弄清自然建议我们做什么，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选择。"[97]维达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曾明确反对地理学研究中的决定论倾向，提出地理学者应该把其注意的焦点放在研究产生独特环境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上。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们相信："物质环境包含着多种可能性，只有人类自身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人对物质世界的关系中，人（应该）被视为一个积极而不是消极的行为者。"[98]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猛烈批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称之为"伪科学的地理决定论和荒唐的种族思想"，并且认为，地缘政治的"神秘主义成为日尔曼强权意志的侍女……地球是这个梦幻城堡的基石；它被裹上了'天然'领土的伪装，而日尔曼人成了上帝的选民"[99]。

从"维达尔传统"出发，法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仅对于法国的安全问题，也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合作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的设想，其核心就是欧洲联合与国际合作的思想。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们提倡一种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边界的互透性，认为只有开放而不是隐藏在高墙后面的社会才会产生高度的文明。法国地缘政治学中的"维达尔传统"对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让·莫内（Jean Monnet）等法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欧洲联合的进展，应该说正是

"维达尔传统"的一种成功的实践。

最后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与冲突的思想。这种思想从麦金德开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那里得到了一种扭曲的发展，后来又被斯皮克曼所继承，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冷战后期，由于苏美缓和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抗的理论一度失去了原先的市场，但随着冷战结束，由于西方失望地发现它的价值观念依然并不能通行于全世界，同时由于非西方国家民族传统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冲突的逻辑又出现了渐居上风的趋势。上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趋势的反映。

一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倒是对这样一种冲突的逻辑做过一番解释，在他看来："主要的陆地国与海洋国在素质上各不相同，往往不能通过竞争或其他形式的相互交往而融为一体。每逢某一陆地强国力图把疆界往外推，争取出海口，从而扩大力量对比的范围，使其力量达到这一体系的大陆区的外延，而海洋大国对此又决心抵制到底时，陆海之间的对立就变得尤为突出。"[100]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家或许认为这样一种结论来自于对历史的观察。的确，历史上有过俄国向西争夺出海口而发动的战争，也有过德国试图争霸世界的战争，但总起来说，海洋国家之间以及大陆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少于所谓的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冲突。至于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则它们与西方的第一次交往就是西方大国，不管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对它们的殖民掠夺。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如何能够证明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心中的那种莫名的恐惧呢？

原因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探求，那就是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酷竞争以及各国对这种竞争的不同反应。正是在这场竞争当中，所谓的海洋国家，即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首先建立了优势的地位，并且随之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议会民主制度，但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看到的，英美的这种优势的存在，对于后起的工业

化国家而言却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后者，包括法国、德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等国家要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不得不采用与英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如强调国家干预和公民的集体利益等等。许多西方人可能感到不解的一个现象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受到西方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反倒成为最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却非常简单，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再按照西方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因而出路只有两条：或者通过另外的方式达到西方的文明水平，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避免两类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但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普济主义的观念，即相信自己的文明模式和价值体系必须为整个世界所遵循的观念无疑强化与扩大了这种冲突。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与地缘政治理论的冲突观念非常相似的观念，那就是深信只有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才能带来永久和平，而所谓的“极权和专制”则都是战争的根源，这是冷战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依据。如果可以把这种理论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理论”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它与地缘政治学的冲突理论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实际上如出一辙，因为在所有这些理论当中，冲突双方的“成员”都是大致相同的两类国家。

由此可见，并非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行为，倒是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指它的冲突理论)以某种扭曲的方式反映了现实世界政治斗争的图景。正如美国学者艾伦·亨里克森(A.Henrickson)所说：“一个人可以视地图这样的东西为纯主观的表义文字，或视其为同客观现实只存在数学关系的构想，甚至仅仅视为历史物质过程的反映，而不具有独立的力量。……那些帮助人们指导和解释战争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成为战争的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性地图，则是留在人类心灵上的铸痕，它们不仅是人类经验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的想象力镌刻成的。”[101]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要成为一门彻底的科学，人类要学会和平共存，那么西方人

首先就应该彻底清除地缘政治理论传统中，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那种关于东方与西方、大陆与海洋的冲突的阴魂不散的“想象”。在这里，上面提到的“维达尔传统”的确应该得到发扬光大。

第二章

20世纪西方大国及俄国外交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虽然地缘政治是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且20世纪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对于西方各国的外交政策实践都有明显的影响，诸多的西方外交家和政治家也都曾对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理论表示不同程度的兴趣，但是，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纳粹德国政权之外，西方各国都没有公开地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自己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学本身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而各国不同时期主要决策者所推崇的理论也各不相同，地缘政治的考虑又总是与其他的考虑，像实力均衡或者集体安全的考虑结合起来的，因而也就很难从某种特定的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对于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作出评论。处于上面的考虑，本章将把重点放在对各西方大国不同时期外交政策中地缘政治因素的分析上面。也就是说，主要不是从某种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判断，而是着重指出它们的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中所反映的地缘政治战略。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美国世界霸权的建立与巩固

美国自其独立战争（1776—1783年）之后，为避免卷入欧洲各国的外交纷争，直到本世纪初，一直奉行被概括为门罗主义的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当然是与美国当时的实力和地位相一致的。

这就是，当时的美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对欧洲局势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又可以阻止欧洲各国对于美洲事务的干预。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及其经济力量相应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看到了美国的利益所在，这样一种“关起门来”的外交政策指导原则自然就会引起日益增加的不满。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的海权论的出现，正是美国外交战略转折的一个征兆。实际上，麦金莱(Mckinley)政府（1897—1901年）提出的所谓“大政策”（large policy）即反映了美国已经突破了门罗主义的冲突框架，其具体反映就是美国在菲律宾和加勒比海地区与西班牙的争夺，以及在中国与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角逐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美国的这些对外政策实践表明，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只属于美洲了。

马汉在其《1660—1783年海上强国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美国完全有可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海军与商业力量。马汉的海权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对众多的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美国的助理海军部长、后来又担任了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S.Roosvelt)，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海上扩展一时之间成为美国人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西奥多·罗斯福在其任助理海军部长时给马汉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后者对于美国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建议。罗斯福写道：“毫无疑问，你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你所提出的建议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可能还知道你的信在帮助我清楚地表达我头脑中某些一直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问题方面起了多大的作用”[102]。罗斯福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更是公开声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103]当时狂热支持马汉的理论的另一位美国政治家是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曾经写道：“中立政策是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在建国之初为美国对外关系制定的伟大原则，但是以为我国的对外政策就停

留在那里，或者让这些基本原则以任何方式束缚美国人民的前进，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代的运动整个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的统治区域的集中，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合众国决不能落伍。”[104]

洛奇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门罗主义已经不太适合美国的需要了。实际上，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对外扩张的举动，美国官方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门罗主义，但也的确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按照一位美国学者的说法，那就是在麦金莱—罗斯福时代“新的政治框架中，门罗主义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在西半球保护美国的利益上，而不是保护和捍卫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而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应该保护的那些不证自明的人的权利上”[105]。罗斯福自己也明确表示：“美国在西半球坚持门罗主义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在那种出现了错误或者关系重大的场合去充当一种国际警察的角色，不管它是多么的不情愿。”[106]到1910年，罗斯福更进一步地指出：“当英国能成功地在世界维持列强的均势，那很好。然而，假如她因这种或那种原因，作不到这点，美国有责任插手，至少是暂时地恢复某种均势，不管我们的努力是对准哪一个国家或集团的。”[107]

从1913年开始的威尔逊(Wilson)时代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威尔逊被称为一位“普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不像以前两届政府那样公开宣扬扩张主义和实力政策，这可以从他热心创建国际联盟的实践以及他所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看出来。当然，并不是说威尔逊就没有他自己的地缘政治观，但应该说，他的地缘政治观点比起他的前任们来说要显得陈旧和落伍。首先，威尔逊的地理观是平面的，即他并没有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确立美国的利益重点，这自然也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基本立场。其次，在美国的安全问题上，威尔逊依然坚持认为大西洋为美国免受外来的入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保障，这当然是一种早被麦金

莱和罗斯福抛弃了的观点。这里牵涉到威尔逊与门罗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威尔逊作为一个“普济主义者”，又参与了创建国联的行动，表明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他都把美国的利益与整个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当然是大大突破了门罗主义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已经使国际联盟条约承认门罗主义的合法性（不是把门罗主义作为国际联盟盟约的基本原则，而是承认“国际协议和仲裁条约或地区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认为自己捍卫了美国的门罗主义传统。威尔逊主张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就是上文提到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推崇者参议员洛奇。一般认为威尔逊的国联章程被美国国会否决是美国公众对于门罗主义的迷恋，实际上，洛奇的观点非常能够说明问题，那就是，美国之所以不能参加国联，是因为国联可能会对美国的主权造成威胁。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美国支配世界的欲望不应该被局限在国联的框架之内。这场冲突典型地表明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平面”的地缘政治观与“立体”的地缘政治观的矛盾。

、从1932年开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年代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由于威尔逊的美国加入国联的计划遭到了国会的反对，所以后来的几位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都吸取了这个教训，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存在着一种“照顾孤立主义的情绪”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且一直延伸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的最初几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历与他的叔父西奥多·罗斯福有几分相象——他们都是业余地理爱好者，都研究过马汉的理论，并且也都担任过海军部的官员，地缘政治学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最初也认为，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它的安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并以此作为外交政策中“孤立主义”的主要依据，虽然他通过在美洲采取“睦邻政策”把门罗主义从美国单方面的宣言变成了美洲国家间协同合作的协议。不

过，罗斯福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问题上的观点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改变。他在 1937 年提出，“现代世界具有一种共同性和相互依赖性，它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都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108]罗斯福的这样一种认识可能主要是来自于当时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经济灾难，但也有事实表明，他已经把这种世界一体性的认识扩展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当中，那就是他曾命令国务院为军事目的占领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屿。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1939 年 11 月，地缘政治学家包曼（Isaiah Bowman）曾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用麦金德的理论说明了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即希特勒不可能满足于有限的领土要求，他的真正意图是要尽可能地把德国的领土往东欧扩展，同时获得更多的海军基地，最后形成对英国的威胁。罗斯福在给包曼的回信中表示接受他的观点（“你关于德国的最终目的……的见解使我非常感兴趣”[109]），随后他因向法国出售军用飞机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又表示，“希特勒的意图在于统治欧洲”，因而莱茵河边界线的安全的确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莱茵河成了美国的边界的时候，罗斯福回答说并非如此，但一旦莱茵河边界线受到威胁则整个世界的安全也就受到了威胁。而如果这些地区被希特勒所控制，那么德国的行动就可以不受限制。[110]到 1940 年法国战败和英国军队被迫从欧洲大陆撤退之后，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就更加明晰化了，那就是设法在不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使战争结果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在这段时间内，罗斯福反复说明航海和航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因其地理位置而获得自身的安全。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罗斯福则表述了一种与麦金德十分类似的观点，“如果我们听任美国之外的世界落入（轴心国）的控制，那么轴心国在欧洲、不列颠群岛以及远东获得的船舰制造设施将会比整个美洲现有的和潜在的船舰制造设施

多得多——不仅是多，而且多两倍或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倾其全力把它的海军力量翻一倍甚至再翻一倍，但轴心国由于控制了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将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物质资源使其力量超出我们好几倍”[111]。

在远东，罗斯福政府原先奉行的与其他西方国家保持海上力量平衡的战略由于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不得不加以改变。为对日本加以某种程度的约束，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几项对美日贸易中的一些战略物资进行限制的决议。罗斯福自己表示，“我认为在欧洲，在非洲和在亚洲的敌对局势都是一场全球性冲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欧洲的利益和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同样的威胁。……我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战略必须是一种全球性的战略，它要考虑到任何一条战线，并且抓住每一个就会为我们的总体安全服务。”[112]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试图影响战争的进程，但还是恪守着美国不卷入实际冲突的原则。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以及随后德国对美国的宣战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并不是说美国主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地缘政治观点因此发生了什么转变，但是，美国对战争的卷入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从一种观念变成了一种事实。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国务院在 1942 年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声称：“我们强烈感觉到，（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待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113]。随着美军在世界各地的推进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国军事基地在各大洲的建立，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就实实在在地扩展到了全世界，并且，战争本身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地缘政治观点。如罗斯福所说：“毫无疑问，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少数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可以轻轻松松地赢得这场战争，然后爬回一个美国洞里去，并且在他们身后把洞门关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挖出一个深

大可以对付那些掠夺成性的野兽的洞来。……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现代战争的装备被那些侵略性的国家所掌握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生存，或者其他国家——不管它是在岛上还是在大陆上——的生存在一夜之间可能带来的后果”[114]。

人们都了解的历史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盟国对法西斯力量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战时的同盟的分裂和苏美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于这样一种转变，我们也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某种解释。如上所述，罗斯福曾经受到麦金德和包曼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那就是如果有某个国家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那么它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问题在于，无论是麦金德还是包曼的理论都没有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既然如此，那么如果说美国人有理由担心德国人可能会占据“心脏地带”的话，那么他们也就同样有理由担心别人，比如说，俄国人对这片地区的控制。而且，对于许多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家而言，当他们提到与海上力量对抗的陆上力量的时候，他们指的多半正是俄国人。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就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二天，当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就公开声称：“如果德国战胜，我们应当帮助苏联；如果苏联战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就那样让他们去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115]当美苏还作为盟国与纳粹德国作生死斗争的时候，美国国内俄国威胁论的声音已经甚嚣尘上了。

这样一种声音的代表人物就是斯皮克曼。斯皮克曼被称为美国的豪斯浩弗，因为他特别强调地缘政治与实力政策的结合。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的基本思路，但又对麦金德的理论进行了一点修正，即认为所谓的“心脏地带”本身不在欧亚大陆内部，而是在它的边缘，具体来说，就是在东欧和远东一带。因此，斯皮克曼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就反复强调，美国在战后如果要保持自己对国际局势的控制的话，就必须防止上述“边缘地带”落入苏联之手。事实

证明，斯皮克曼的观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虽然罗斯福本人一般被人看作是美苏合作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但从他战时的对苏政策来看，也明显地表现出在边缘地带对苏联的力量进行控制的一面——在欧洲，罗斯福的设想是，在东欧问题上暂时不与苏联摊牌，在巴尔干地区则形成一种东西方的均势，最终从这个地区挤出苏联的势力；在远东，罗斯福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办法，即通过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换取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承诺。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对苏联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保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出现一片缓冲地带。当然，罗斯福的这种对苏政策还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他认为由于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所以在战后不仅无力与美国对抗，而且还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而他所设想的安排完全可以赢得苏联的合作。

在罗斯福去世之后不久，美国的对苏政策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造成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当然很多，但西方与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争夺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应该说，从罗斯福到杜鲁门(H.Truman)，美国对于欧洲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考虑基本上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杜鲁门发现，苏联并没有按照罗斯福的设想行事。他感觉到，苏联无论在东欧、中欧和近东地区都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从而使美国在这些地区建立缓冲地带的设想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性。杜鲁门得出结论说："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抗议，领域次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116]他显然已经下决心对苏联的势力进行全面的遏制了。

杜鲁门对苏联的强硬政策除了得到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的论证之外，更得到了他的特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于1946年9月起草的一份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的支持，而这一份报告几乎就是斯皮克曼的理论的翻版。克利福德报告提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已经被一个庞大的均势强国所控制，海洋国家如果要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均势，就必须遏制住这个国家向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报告宣称，“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里雅斯特这一条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他们现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它们决不能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苏联的企图就是“沿着它的中部和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或者无力与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克利福德就此对美国提出的对策是必须以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把苏联的力量控制在它目前所占据的地区，即“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扩张”，以保证“至少在近几年中，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将不落入苏联的范围之内”。然后再通过为那些防守苏联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从而使遏制战略扩展到中间地带以及整个世界。该报告声称，为达到此目的，美国甚至必须做好原子战和细菌战的准备。[117]

克利福德的报告实际上是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之前白宫所进行的一种理论上的准备。到 1947 年 3 月，杜鲁门即在一份针对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准备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扩张”进行全面的遏制。这项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具体实施包括在欧洲进行的以巩固西欧、对抗苏联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和随后北约的组建。在亚洲，杜鲁门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解释就是：“美国的战略边界已经不再是南北美洲的西部海岸：它们乃是位于亚洲大陆的东海岸。相应地，我们根本的战略任务就是确保在亚洲大陆的港口不会集结和派遣出较大的两栖力量。”[118]据此，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又分别与南朝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在上述条约的基础上，美国于 1954 年 9 月与各相关国家共同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和《东南亚集体防

务条约议定书》，后来参加国还有所扩充，从而最终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形成了一个对苏联和新中国的包围圈。美国的这种对苏联（后来又加上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用斯皮克曼的理论来概括，就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一种美国的军事优势，以此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的企图。[119]这一基本思路一直是冷战前期美国对苏战略的指导原则，只不过随着后来苏联力量的扩展，尤其是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美国试图"遏制"的对象和范围也相应地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罢了。如一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所指出的：从杜鲁门到肯尼迪时期指导着美国对外战略政策的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观念"排斥了对边缘地带的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考虑，以及它们对于美国的安全的真正的地缘政治含义"[120]。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不仅没有能够遏制住苏联力量的发展，而且在它自己的家门口还发生了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在东亚，美国也遭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美国的"遏制"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地缘政治观念到了尼克松(Nixon)时代才开始出现了一些稍带根本性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本身也是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反映——那就是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也迅速提高。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力量却呈现出下降之势，而在国外，越南战争也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总的来说就是世界已经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我们的视线被越南问题挡住了，我们看不到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大的变化，……同我们在二战结束以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作梦也想象不到的那种挑战"[121]。面临这样的形势，尼克松的结论是："我们决定继续在世界上发挥

我们积极的领导作用”,“70年代的新情况要求创造性地对美国的领导重下定义,而不是要悲哀地放弃美国的领导”[122]。这种新的定义的根据,就是一种不同于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观念。

上文提到,到了60—70年代,在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家当中,出现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地缘政治观,尼克松本人显然受到了这种新的观念的影响。尼克松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存在着五大经济力量,即西欧、日本、中国、苏联和美国。“这五大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及其发展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123]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地缘政治观念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就是把“无差别的全球主义”(indiscriminate globalism)转变成了“有差别的全球主义”(discriminate globalism)。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以求得各种力量的均势。尼克松曾指出:“国际关系中的战后时期已经结束了……那时我们面对着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世界。今天,那个世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单个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增强了,但国际共产主义的统一却瓦解了。原先的那个统一体的一致性已经被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所撕裂。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中国,原先曾被友好同盟捆在一起,但从60年代中期之后已经变成了仇人。”[124]这样一种认识,成为尼克松较为务实的地缘政治战略的基础。

对于尼克松政府的地缘政治观念,基辛格(H.Kissinger)曾经做过一些解释,他认为:“在美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它把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较量,还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统,它倾向于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解决问题,也有一种合法主义的传统,它把国际问题视为司法案例。但是,并不存在地缘政治的传统。”[125]“我用地缘政治的这个词来指一种态度,它把注意力投注于对平衡的寻求。”[126]尼克松政府寻求地缘政治的平衡的努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善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强调西方各国共同负责的

原则；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使越战“越南化”；对苏联采取一种既对抗又对话的方针，既在中东和非洲等地区与苏联展开激烈的争夺，又在裁军和人权等等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谈判，力求迫使苏联让步；最后就是改善中美关系。尼克松认为，美国主动改善中美关系，是他的均势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三角战略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中苏竞相与我们搞好关系”，其结果就是美国“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小”[127]。基辛格则进一步对此提出了地缘政治角度的论证，即如果中国在战争中被苏联击垮，那么不仅美国的利益要受到威胁，而且还会使苏联的力量向西方集中，这样的话，连日本和西欧也会向苏联屈服。[128]

从此到冷战结束，尼克松政府的这种带有多元化特色的地缘政治观念基本上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当中得到了继承。当然，多元中也有重点，那就是美苏之间的争霸与对抗，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美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在卡特(Jimmy Carter)执政的前一阶段，美国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所谓的“人权攻势”，反对美国过分炫耀武力。但是，由于苏联借此机会在亚洲的阿富汗、非洲的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处处得手，并且悄无声息的研制和部署了 SS20 导弹，这种“人权外交”受到了朝野的一致反对。由于“人权攻势”的失效，卡特政府后期以及里根和布什(George Bush)政府时期都以较为强硬的对苏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点。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er)的一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 80 年代初期美国的地缘政治观：“苏联通过在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地区建立均势前哨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地缘战略的范围。苏联在埃塞俄比亚、也门和阿富汗建立的据点威胁

着中东地区那里（对西方生命攸关）的油田，而且也的的确确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以往这些基地和设施都是中立的，或者能为我们所使用的。”[129]对于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的一位外交官总结道：“在莫斯科看来，欧洲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东是冲突的战场但也拥有潜在的机会；而中国则是一个危险的邻居……苏联防务开支的增长与我们自己从越南的撤军以及国内要求我们在世界上扮演一种更加平和的角色的压力使得莫斯科信心大增，以为‘力量关系’正在向对它有利的方向移动。苏联领导人正越来越频繁地直接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后盾在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莫桑比克、印度支那和尼加拉瓜建立它的影响力前哨。”[130]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里根政府为自己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对苏联再次进行全面的遏制，“我们的地缘战略目标总起来说就是保持有效的遏制，维护我们的同盟，与重要的地区性强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阻止变化的发生，并且与各地区性国家一起缓和紧张局势，解决突出的争端”[131]。

作为这样一种战略的具体体现，里根在军事战略方面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以此确保美国能够在全球几个地区进行长期的全面战争。随后，他又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力图在总体战略力量方面压倒苏联。在地缘战略方面，里根也采取了一种与苏联全面对抗的方式。针对苏联的扩张，里根宣称：“作为我的对外政策基础，我决定我们必须给俄国人送去一个尽可能强有力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当他们为恐怖分子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以颠覆民主政府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政策应建立在实力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132]在欧洲，美国提出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并且要扩大西方联盟的体系。在中东，“虽然印度洋和波斯湾离我们的边界十分遥远，但那里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以及它们与我们和与西方的良好关系对于我们而言却具有明显的和实质性的联系”[133]。在南非，美国也因为那里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里根政府也非常重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我们并没有把太平洋视为‘美国湖’，但我们的确承认我们在这个地区具有的责任和合法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一直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为此而自豪，而且也为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福利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自豪。”[134]里根本人声称：“一系列政府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局面，行将结束。”[135]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实践被人们认为是向冷战最紧张时期的两极体系的回归。

苏联是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实力对抗的高潮中耗尽了元气的。到 1988 年布什出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苏联的颓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美国政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再次展开与苏联的争夺，这就是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超越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促使苏联东欧向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过渡。1989 年以后东欧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化，一直为西方所疑惧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苏联也最终于 1991 年 12 月分崩离析。在此期间，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变化，德国于 1990 年 10 月实现了统一，华沙条约组织也于 1991 年 3 月宣布解散。至此，东西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结束。除此之外，在另一条战线上，即在与第三世界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也赢得了军事上对伊拉克的决定性胜利。西方舆论认为，布什政府打赢了两场战争——苏美之间的冷战和海湾的热战。

针对苏东剧变和海湾战争之后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布什开始频频谈及“国际新秩序”的问题。这个“新秩序”的核心，就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以西方的价值观来一统天下。人们将这样一种世界格局的设想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看起来，地球在布什的眼中又再一次变成了一个平面。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赢得了两次战争的英雄却没有赢得美国公众的支

持。布什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负于克林顿(Bill Clinton)，而后者对布什最尖锐的抨击就是："赢得了冷战，但输掉了（美国的）竞争力"，指以前的政府过于看重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而忽略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克林顿顺次把确保美国的"解决安全"、"重建我国的军事力量"和"传播民主的价值观念"作为他的三大政策支柱。当然，这样一种战略选择，是以克林顿政府对于冷战后世界的基本估计为基础的，那就是东西方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于苏联，而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第三世界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相应地，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的重点也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与欧洲和日本展开"贸易战"和技术竞争，以保证美国的经济安全；支持俄国的叶利钦政府，以确保俄国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平稳过渡；对世界上发生的地区性冲突则采取"逐点解决"的办法，以限制美国介入的数量与程度。但是，这样一种对外政策原则很快就招致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批评。就对前苏联地区的政策问题上，不少人指责克林顿政府低估了这个地区地缘政治上的复杂性，而且对于俄罗斯向西方式民主制过渡的前景过于乐观。他们列举了俄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扩张主义的倾向，以及俄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来证明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个新的帝国出现的可能性。近来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独立性的增强都使这样一种论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布热津斯基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至于在对第三世界政策的问题上，也有不少人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逐点解决问题"的立场，主张从整体性的观点来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美国的反应，亨廷顿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十分悲哀地注意到，美国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赢得了对伊拉克的军事上的胜利，但从政治上来说，美国却遭到了失败，因为萨达姆(Sad dam)不仅没有被赶下台，而且因为他与美国的公开对抗，他在阿拉伯世界不少人的眼中反而成了一位英

雄；另外，海湾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增强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他注意到的另一个事实，就是虽然苏联东欧发生了政治上的剧变，但中国却并不像西方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走上同样的道路，更没有向西方俯首称臣。这些都是美国人不曾料想到的结果。亨廷顿进而把第三世界国家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一种“文明的冲突”。而并非巧合的是，上述这两种批评反应到地图上，其结论却又是非常相似的。[136]还没有迹象表明麦金德的小天使的耳语已经对美国当前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确也正处于调整中。至少，克林顿已经不可能安安稳稳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早在 1993 年 5 月就曾表态说：“有人说……我们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承担领导责任。……的确，美国面临着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许多挑战，但对我来说，这只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国际性介入，而不是更少；更积极地推动民主进程，而不是更少；更多地激发我们的领导能力，而不是更少。”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美国的“领导欲望”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时，并不能排除它重新回到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观的可能性，因为正如不少观察家所表明的，这样一种挑战最可能的来源依然是欧亚大陆——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

·第二节·
英国、法国和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一)
从海洋到大陆——地缘政治与英国外交

“均势外交”是长期以来英国外交的一项指导原则。所谓“均势外交”，在 20 世纪以前，主要是针对欧洲大陆而言。即把维持

欧洲大陆各国的"均势"作为英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大陆上的各个国家，英国一般都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英国尽量避免大陆上出现某种强大的、足以支配整个大陆局势的力量中心。一旦这样的一种中心出现，英国的一个确定不变的反应就是与其他的大陆国家结盟，最终恢复各国力量的基本平衡。对于这种"均势外交"，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一段精辟的概括："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4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国家却始终如一，这是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他还更具体地指出，英国的政策，就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它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137]这样一种政策的体现，就是英国不断地变换它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当然与此同时也就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对手。曾经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Sir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对这种政策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解说，那就是："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

"均势外交"是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反映。由于被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分开，英国在20世纪之前比起欧洲大陆国家而言具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只要欧洲大陆保持了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格局，英国的独立一般来说就不至于受到威胁。因而，大陆上的力量均衡实际上乃是英国的安全的一种保证。英国这种"均势外交"的政策在19世纪下半期又被称为"光荣孤立"的政策。但是，也就在这段时期，欧洲和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欧洲，德国迅速崛起，在外交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而在世界范围内，美国

因其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而构成了对英国传统地位的严重挑战。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英国不可能再继续奉行原先那种与小国结盟对付大国的政策。随着 1904 年英法协议和 1907 年英俄协议的签订，英国终于走出了"孤立主义"的阶段，但是，"均势外交"仍然是此后英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某种摇摆和不确定性，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国内对于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本国的地位缺乏一种共识，而且英国公众和各个政党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在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上面。对于当时的欧洲形势而言，英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俄国。虽然说麦金德关于"大陆心脏"的理论以及他对苏维埃俄国力量增加的担忧在英国本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但出于传统的对于大陆强国的防备心理，使得英国最终对德国的扩军备战采取了一种默许和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法国。法国虽然在战后得到了德国在领土和经济方面的赔偿，但它最大的担忧就是德国的东山再起。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发起"非战公约"，密切与小协约国的关系等等，希望对德国形成某种约束。对法国，英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虽然战时两个国家曾作为盟友共同抗击德国，但战后英国又担心法国力量的过分强大会破坏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因而，英国对于法国提出的许多要求都采取了一种半心半意的态度，与此同时，还用各种方法促使德法和解。实际上，英国既希望德国能够对法国有所约束，也希望德国能够在稳定东欧地区的局势方面发挥作用。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策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西方大国之间各怀异心、貌合神离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关系造成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局势的不稳定，也使纳粹德国的战争企图未能及时得到遏制。

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是针对 20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而对其外交政策作出了系统性的调整，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如果说"均势外交"的政

策的基础是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头号世界强国的实力的话，那么“三环外交”则是英国在国力明显衰退的前提下，结合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试图继续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的一种政策尝试。丘吉尔在提出“三环外交”政策的时候，明显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一种地缘政治观念。他指出：“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化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三环中的每一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138]

“三环外交”的设想实际上反映的是英国的一种愿望，即利用它自己在所谓的“三环”当中的特殊地位来发挥其在英联邦、英语世界、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作用（在最后一个方面至少也要寻求一种与美国共同领导西方世界的角色，或者说是“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139]），维护它在全世界的利益，并且与它们共同的敌人相对抗。与“均势外交”时期不同，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是有明确的敌人的，那就是苏联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环外交”所体现的，正是应该与陆上力量（苏联）相对抗的海上力量的同盟，英国是从共同的敌人出发去找寻自己的盟友的，因而，在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形成当中，大陆与海洋的所谓“历史性对抗”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一点在英国战时内阁于 1944 年成立的战后规划委员会在当年 11 月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就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该报告认为：战后对英国的“战略利益可能构成严重威胁的两个欧洲国家，一个是重新复兴的德国，另一个是俄国”，报告并且提出，如果俄国变成了英国的敌人，那么

在欧洲大陆德国可能是唯一能够对英国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不可能阻挡苏联势力的扩张，因而，未来可能建立的西欧集团与美国的合作就非常必要了。[140]可以说，这份报告奠定了战后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基础。

具体来讲，英国的"三环外交"包含了以下一些方面的地缘政治内容。首先，从英国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关系来看，"三环外交"谋求与它以前的殖民地和自治领之间通过把帝国体制改为联邦体制，发展一种适应于时代的新的联系，以此尽可能地保持 19 世纪以前英国形成的那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多多少少平衡苏美力量，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在历史上，英国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本土工业的发展扮演了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角色，而且也为英国与其他的殖民地国家的竞争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在北美 13 州独立之后，从非洲西海岸经好望角到印度洋至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印度）这条航线被称为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诸多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都对如何维持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出谋划策。曾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寇松就认为，英国必须用强有力的政策来维护它在各处殖民地的利益，另一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沃恩·科尼什（Vaughan Kornish）则感觉到，在新的时代大英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他为英国提出的方案就是通过建立一种"联邦帝国"的体制来维护英国与其海外殖民地与自治领的联系。英国政府实际上采纳的是后一种方案，因而于 1931 年成立了英联邦。但在此之后，英国政府依然深切地认识到，原来的殖民地的独立，不仅对于英国，而且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都是一种威胁。针对印度的独立问题，当时的英国首相埃德礼曾经表示，如果印度不再留在英联邦的话，则"它就成为一个反对欧洲人的亚细亚运动的领袖"，而如果相反，则"就极可能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某种类似联盟的组织"[141]。正是出于这

样一种考虑，英国千方百计维护英帝国和后来的英联邦的完整性，通过提高各成员国在联邦中的政治地位，放宽英联邦成员国的政治条件，以及建立“帝国特惠制”（后来改称“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等等政治和经济措施，在50年代以前，基本上维系了英联邦各成员国之间较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同时也使所谓的“帝国的生命线”基本上保持了完整性。

在“三环外交”的第二环中，美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文提到，英国为了防备来自苏联的威胁，必须倚重美国的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英美联盟也是海上国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核心。20世纪英国国势的衰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受到的沉重打击使英国不得不诉诸于美国的支持。为了强调英美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英国在西方联盟当中与其他的西方国家不同的地位，丘吉尔将其称为“英美特殊关系”，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英国在战后感到自己已经无力在巴尔干地区与苏联争夺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向美国提出了让后者介入的要求，心甘情愿地让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等政策措施把整个西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然，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也并不能完全掩盖英美之间的矛盾。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英国乃是英美之间竞争中的输家，而它又总是不能忘怀自己昔日的荣耀。英国前首相艾登就曾不无苦涩地提醒道，如果英美关系处理不慎的话，那么英国自身的衰退就将不可避免。并且英国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美国，这就决定了它对自己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敌人——苏联——的一种双重态度：即总的来说是与整个西方盟国一起对其进行遏制，但又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与苏联比较接近，使之成为在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中的一个筹码。

“三环外交”的第三环即指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传统上，英国对于欧洲大陆一直采取了上面提到的“均势外交”的政策，这在实际上就是把自己视为一种独立于这片大陆之外又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战略一直延伸到冷战之后。虽然丘吉尔

本人是欧洲联合的积极鼓吹者之一，但他又明确地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的一体化过程。他曾经表示："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142]1952 年 1 月欧洲煤钢联营成立的时候英国首相艾登(A.Eden)又再次表示："这是一件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能做的事……因为英国的利益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陆。"[143]总起来说，在 50—60 年代，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积极参加欧洲大陆的各项重大的外交活动，又置身于一体化之外。而英国采取这样一种立场的原因，除了它长期以来地缘政治战略的传统之外，尚有另外两个方面的考虑，即首先是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对欧洲和世界事务施加影响而不愿意受到另一个超越于它的力量的制约；其次，"三环"中的前两环也对英国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牵制，况且英国在战后初期还依然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英联邦而不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身上。

英国的"三环外交"政策在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调整的原因自然是英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结果，首先就是英国殖民地体系瓦解的结果。随着 60—70 年代汹涌澎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英国最终于 1968 年放弃了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也就是放弃了对于所谓的"帝国生命线"的武装保护。另外，由于英国自身经济的衰落，作为英联邦重要的经济纽带的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也分别于 50 和 60 年代相继瓦解。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英联邦对于英国而言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的大大减弱。另一方面，英美关系在事实上也不如"三环外交"政策的创始人所预想的那么顺利，因为两国的实力毕竟相去太远，美国并不可能与英国分享对于西方国家的领导权。无论在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还是越南战争期间，英美的矛盾都有突出的表现。至于所谓的"特殊关系"，也只能是英国单方面的提法，美国对此虽然没有否认，但

也没有向英国一样积极的回应。正因此，英国前首相希思(E.Heath)不再提“特殊关系”，而代之以英美“自然关系”的提法。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英国内部出现了重新估计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呼声，要求英国首先发展与西欧国家的联系，认为这是英国的唯一出路。[144]

实际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也由不得英国长期徘徊在这个富有生机的国家组织之外，否则它将对欧洲事务最终失去发言权，因为西欧日益密切的一体化使得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的政策失去了意义。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Macmillan)就曾表示，如果英国始终呆在西欧统一进程之外充当反对派，那么它将不仅会遭到大陆人的反对，而且也会陷入苏联人的圈套。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终于使英国改变了长期坚持的立场，于1972年正式加入了欧共体。当然，尽管如此，英国在欧洲统一的问题上，与欧洲大陆的国家的立场还是有所区别的。在撒切尔夫人(Thatcher)当政期间英美关系又有些回升的迹象，但即便如此，英国还是在1984年提出了一个建立欧洲内部市场的建议，这说明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英国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又不参加《欧洲社会宪章》等等。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历史事件的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大概可以算是英国长期的地缘政治传统给它留下的一笔遗产了。

(二)

以合作求安全——法国外交中的地缘政治观念

从历史上看，法国外交一直存在两个不变的重点，那就是防范来自德国的威胁和与英国的争夺。这两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占有不同的地位。当法国的势力比较强大，足以对欧洲局势加以控制的时候，与英国的争斗就会占上风，如拿破仑时代就是如此；而当法国的力量比较弱小的时候，对德国的防范就会成为法国外交

的第一要务。而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后者就取代了前者，成为法国外交中的头等大事。这种情况当然是法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的一种反映。

进入 20 世纪之后，法国为了抗拒德国的侵略，与英国和俄国结成了同盟，并且最终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为了解除德国对于自己在未来的威胁，法国一个十分迫切的要求就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它的周边形成一种对其有利的地缘政治安排。这样一种要求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Clemenceau)。他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提出：德法之间应该以莱茵河为界，并且在莱茵河左岸的日尔曼居民区建立一个在法国管辖之下的自治政权，除此之外，他还向德国提出了数额庞大的赔款要求。但是，克里孟梭的要求由于英美的反对而未能得到实现。英美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的方案，而是许诺通过国联等国际组织、设立非军事区和德国解除武装的办法来为法国的安全提供保障。虽然法国最后接受了英美的方案，但由于凡尔赛条约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通过，而英国事实上对于保障法国的安全又是半心半意，法国终究成了德国又一次侵略的牺牲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法国主张通过法德和解和国际协议的方式保障法国乃至欧洲的安全的代表人物就是白里安(A.Briand)，他曾在 1925—1932 年期间担任法国的外交部长。如上所述，这样一种主张也是当时法国地缘政治学家当中所谓“维达尔精神”的反映。为此，白里安于 1928 年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B.Kellogg)一同发起并签署了《非战公约》，宣布签字国放弃使用战争作为政策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白里安认为，《非战公约》的签订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次年，白里安又在国联第十届大会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建议，他在其演说中指出：“我认为像欧洲这样在地理上聚居在一起的各个民族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联邦关系；这些国家的民族随时都要进行接触，讨论他们的利

益，作出共同的决议，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就能够共同对付。我要努力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145]这届大会曾委托白里安起草一份关于欧洲联邦的备忘录，在1930年5月正式提交给国联各成员国的这份备忘录〔作者为亚历克西·莱热(Leger)〕中，法国政府提出，将要建立欧洲主权国家联盟。取消关税、组建共同市场、成立欧洲议会和常设政治委员会等等措施，以防止欧洲再次陷入战争。应该说，这项倡议是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但由于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心怀异意，法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对之表示反对，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早已打乱了各国的阵脚，所以它并没有得到人们真正认真的响应。在26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当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对这份草案表示完全的赞同，至于英国，则更是明确地反对建立任何专门的欧洲机构。虽然白里安本人在此后还为欧洲联邦进行了一些努力（在“欧洲联盟研究委员会”的名义之下），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不过是徒劳无功。不久之后，欧洲就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标志着30年代的“欧洲联邦”构想终成泡影，白里安以联合求安全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然使欧洲联盟的进程完全中断。战后，法国领导人出于对德国的防范与仇怨，马上再次提出了肢解德国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使鲁尔和莱茵地区国际化、萨尔在经济上与德国分离，同时向德国索要巨额的战争赔款。但是，这种要求再次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英国出于传统上的“均势外交”的考虑，不愿意在欧洲出现一个其力量占有明显优势的法国，同时又希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对苏联向西扩张的屏障，所以丘吉尔成了欧洲联合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至于美国，则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反对过分削弱德国的要求，虽然当时主要是针对苏联而言。战后，由于遏制苏联的需要，美国也积极主张欧洲的联合和德国的复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被迫作出了让步，除了萨尔地

区按照法国的愿望成了一个“和法国联合在一起的社会民主自治”的国家之外，法国放弃了使鲁尔地区脱离德国的要求，而且这个地区在经济上也未能实现国际化，而只是建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几个国家共同组成的鲁尔国际管制局对其进行管理。

法国终于放弃了对德国的不妥协的立场是欧洲联合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且在此之后法国采取一系列主动的姿态成为欧洲统一的积极推动者，因为法国所面临的选择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如果不能通过削弱德国来取消后者未来的战争能力，那么就在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当中通过法国的领导地位实现对德国的约束。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Pidurre)就曾表示：“法国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目前的使命就是要使法国成为欧洲联合的先锋。”[146]丘吉尔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呼吁：“在与德国和解的整个过程中，给法国在欧洲恢复自己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机会。千年的争吵几经使欧洲限于衰败，并且几乎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现在该是结束这种争吵的时候了。旧账是永远算不清的。报复是代价最高、耗费最大的劳民伤财之举……，让利害关系最大的法国带头把日尔曼民族带回到欧洲大家庭里来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挽回自己的失败和恢复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147]

欧洲联合在战后的第一次举动是1948年5月在海牙由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协调委员会组织的“欧洲大会”，这次会上普遍表达了一种欧洲联合的愿望。同年7月，皮杜尔根据大会的精神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送交布鲁塞尔条约的5个签字国（法国、英国和荷、比、卢)讨论之后，成立了一个由这几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研究和发展欧洲联邦常设委员会”。随后又决定定期召开“部长委员会”。虽然在欧洲联合的问题上英国与其他几个国家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但1949年1月这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还是决定成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并且最后商定，“欧洲委员会”将对欧

洲经济合作组织（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而于 1947 年成立的机构）的 17 个成员国开放。

欧洲委员会于 1949 年 5 月 5 日成立，最初有 10 个成员国。作为法德和解的尝试性的一步，该委员会在同年 8 月向西德和萨尔也提出了邀请。然而，这一邀请马上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德国人认为，萨尔的代表席位应该包含在德国的代表团之内，对此法国和萨尔政府坚决反对。这实际上反映了法德在萨尔地区的法律地位的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它不仅推迟了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日期，而且也使法国人(当然还有德国人)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能提出一项能够理顺法德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让法国从德国那里得到真正的安全感的方案，那么无论是法德和解还是欧洲联合都必将会困难重重。这正如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所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尔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148]

1950 年 5 月 9 日由法国提出的舒曼(R.Schuman)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案。正如法国学者迪罗塞尔(J.B.Duroselle)所说，舒曼并不打算设计一个完整的政治机构，以此来实现欧洲的政治一体化；相反，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首先（在法德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最后达到消除法德宿仇的目的。舒曼为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找到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形式就是由一个有法国和德国参加的国际机构来共同管理鲁尔地区的煤炭与钢铁的生产—— "把法国和德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机构的管理之下，并欢迎其他欧洲国家参加"，这样一种在生产上相互依赖的关系将使"法德战争不仅在思想上不可能，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149]。舒曼计划的意义在于，由于战后一段时期鲁尔地区的煤炭资源既是德国整个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又为法国洛林地区的钢铁工业提供了重要的能源供应。如果由一个有法德参加的国际机构对这个地区的煤钢生产实行共管，则既可以保证法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又可以通过对煤炭与钢铁的控制，有效地

防止德国军事工业的重新崛起。另一方面，由于舒曼计划强调通过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实施具体的管理工作，因而也容易被德国人所接受。因而，舒曼计划为把法德和解的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问题的结合找到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形式。可以说，舒曼计划为法国人找到了一个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德国的戒备心理，又不太会招致德国人的反感的方案——实际上，德国人不仅不反感，而且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它也为冷战开始之后急于重新回到欧洲的德国提供了一条最好的渠道。正因为上述的考虑，所以舒曼计划虽然是一个经济合作的方案，但它的着眼点却是政治性的，对此舒曼计划的主要设计者莫内(J.Monnet)说得非常清楚："法国的建议，从主观上来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就其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称之为道义性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建议的着眼点是想在第一阶段首先实现法国政府的这一政治目标，并不过多地去考虑某些技术性的困难。"[150]

根据舒曼计划，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于1951年4月18日正式组建了欧洲煤钢联营，虽然在萨尔地区的地位问题上法德双方依然存在一些矛盾。当然，应该说欧洲煤钢联营在其成立之初的发展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而且，法国人随后提出的在诸如运输、农业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扩大欧洲国家合作的方案也没有被采纳，至于关于欧洲防御合作的普利文计划更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毕竟是向着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的方向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它既大大地改善了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景观，更重要的是，舒曼计划所体现的思路，的确指出欧洲走向联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因此，煤钢联营在经过了最初的蹒跚学步之后，到1955年的墨西纳会议之后，欧洲一体化就基本上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57年，欧洲煤钢联营的6个成员国又分别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条

约都于第二年生效，把合作领域扩展到了商业、贸易、关税、农业、运输以及原子能等等方面，而且，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比起煤钢联营来说在欧洲联合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7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内，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英国、爱尔兰、丹麦和希腊先后加入了共同体），而且其合作领域也进一步扩展。1970年，共同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签署了《关于欧洲政治统一的报告》，并且确立了4年一度的外长会议和3年一度的首脑会议制度，1979年，共同体又举行了首次欧洲议会的选举，从而向欧洲政治联盟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法德合作被人们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火车头”。戴高乐曾经说过：“由于欧洲统一的重要性——这种统一首先要求巴黎和波恩合作，我认为必须尝试把历史的进程颠倒过来，使我们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使同盟的力量和才能联合起来。”[151]这段话是法国的以合作求和平的体现了“维达尔精神”的地缘政治观念的一种非常精辟的表述。这样一种地缘政治观念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德国统一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最后依然还是占了上风。应该说，法国并没有对德国的统一提出过分苛刻的条件，而是把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作为容纳统一以后的德国的一条唯一的途径，这反映了当年莫内的思路的一种继续。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为冷战后法德和解的实现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乃至欧洲本身的复兴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三）
通过欧洲重返世界——战后联邦德国的地缘政治与外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作为纳粹政权的殉葬品与后者一同被历史永远埋葬了，但是，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那种充满了沙文主义气息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穷尽德国人在地缘政治方面

的天赋，战后西德的外交史本身就是地缘政治的一部成功之作。

纳粹德国投降之后，德国的领土被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别占领，从此之后，德国的命运注定就要受到这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由于西方国家与苏联战后矛盾的迅速激化，原德国的西部和东部占领区的领土上分别于1949年9月和10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国家。德国由此正式地一分为二，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分裂好像是被永久化了。

东西方的冷战、两个德国的分裂，以及四大国分别对两个德国的监督与控制，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战后无论是西德还是东德外交中强有力的制约力量，也是两个德国的任何外交举动都不可能回避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两个德国外交活动中，可以回旋的空间是十分狭小的。是听命于各战胜国的操纵、在别人所划定的范围内循规蹈矩，还是主动地、但又以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突破种种障碍，组建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积极的一员，甚至最终实现两德的统一，这就成为对于战后两个德国的政府的一大考验。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劣迹以及战后人们对德国普遍的防范乃至敌视的心理，这样的选择就显得尤为艰难。

但无论如何，西德政府还是作出了后一种选择。从现在来看，战后至今的西德外交可以分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三个大的步骤：首先是通过与西方结盟而重新回到欧洲，其次是通过与东方的接近而扩大西德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最后就是通过加速西欧联合而实现德国统一，并且以欧洲为背景确立德国的大国地位。

西德刚一建立，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Adenauer)就把与西方国家的联盟作为他的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为此阿登纳甚至不惜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以德国中立化为条件实现德国统一的建议。阿登纳的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选择只有联系他心目中的西德长远的战略政策才能得到解释，而这种战略政策就是恢复西德的国际地位，并且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实现两德的统一。当然，在这个问题

上，阿登纳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即他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敌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讲，阿登纳的考虑是这样的：无论从地缘政治的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德国面对的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苏联，如果西德不希望被苏联所控制或者受到苏联的威胁，那就只有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而为此西德就必须主动地与西方结盟。不仅如此，西德还必须促成包括自己在内的西欧的联合，因为阿登纳一直认为，只有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才能防止那种“来自东方的经常不断的威胁”[152]。当然，与西方结盟，这也是西德自身的一个迫切需要，因为只有西方，尤其是西欧，在当时的情况下才能为西德的外交提供唯一的活动舞台。至于人们所期待的国家的统一，也必须在欧洲联合的大背景之下实现。这是因为一则只有西德首先与其他的西欧国家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消除人们对于德国统一的政治、军事后果的疑虑，二则联合起来的西欧对于迫使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让步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分量的砝码。用阿登纳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一体化成功了，那么无论在关于安全问题或重新统一问题的谈判中，我们都能把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砝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因素投向天平盘上去。”[153]

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角度来说，西德的这样一种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战略自然是它们所期待的，因为冷战开始之后，西德就成为西方与苏联对抗的前沿，而一个与西方结盟的，强大的西德的存在，对于整个西方对苏联的遏制圈来说，无异于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堡垒。另一方面，英美等国认为，把西德纳入西方联盟，也是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一种非常便利的途径。所以，接纳西德就成为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正因此，阿登纳争取与西方结盟的外交努力很快就为西德赢得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信任。1951年3月，美英法三国先后放松了对西德的内政、经济和外交的限制，放弃了对西德的联邦和州的立法监督，给予它部分的外汇自主权，并且允许它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同年5月，西德被吸收进了

1949年成立的欧洲委员会。随后，美国又提出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到1955年，西德又加入了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由此获得了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

在与西方结盟，尤其是重返西欧的过程中，西德与法国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文提到，法国最初的态度是要求肢解并削弱德国，使之不再有挑起战争的可能性。这种态度因为英美的反对和调解而有所转变，但要使两国真正坦诚相待还需要付出诸多的努力。从西德方面来说，就是要设法在不过分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使法国消除，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西德的疑虑。阿登纳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自己认为："我一直把始终不渝地争取和法国建立成友好睦邻关系看成是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必须不顾一切困难、挫折和失望坚持这个目标。必须作出不断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法德之间如不建立友好关系，欧洲的联合是难以想象的。……跟法国取得谅解乃是西方团结的基本前提。"[154]阿登纳还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心为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作出一切可能的贡献。我们认为，法、德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就是任何一种欧洲联合的核心内容。"[155]所以，当法国政府提出舒曼计划之后，阿登纳立即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和合作的态度，他曾经以一种十分理解的口吻转述过舒曼对于这项计划的考虑："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质。在法国，人们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会进攻法国，反过来说，他也可以设想，在德国，人们也有安全的要求。重整军备首先总是在煤、钢的增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起舒曼所建议的那种机构，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够完全觉察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那么这对法国将起到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156]他自己表示："煤钢基础工业的联营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我认为这就是法国政府的决定所具有的及其重大的意义。"[157]

阿登纳在为实现法德和解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通过他在萨尔问题上的立场可见一斑。上文提到，1950年欧洲委员会在邀请西德参加时也向萨尔发出了邀请，使之成为委员会的准成员国。西德为此推迟了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时间。但最后还是阿登纳作出了让步。阿登纳曾在事后解释说："虽然萨尔问题的处理并不是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坦率地交换意见的途径，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予以解决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拒绝更为重要得多的欧洲合作，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158]后来，阿登纳又同意了法国提出的给予萨尔地区在政治上实行自治的要求，其目的也是为了法德合作的大局不至于受到影响。

阿登纳之所以钟情于法德合作与欧洲统一，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还与他对于美国的一个基本估计有密切的关系。美国自然是西德与苏联以及受到苏联支持的东德对抗的主要的支持者，但是，从地缘上来看，美国毕竟远离欧洲，而且，阿登纳自己也逐渐意识到，美国与欧洲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美国的欧洲政策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其出发点与欧洲国家并不是始终一致的。阿登纳曾经表示："我们的形势是由我们直接与苏联接邻所决定的。判断这种形势的出发点是：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美国。美国人曾经给予欧洲许多慷慨的援助，但是，他们一作出反应，或好或坏，都嫌快了些。美国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民族，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们还不能确切知道美国将抱怎样的态度。"[159]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无论是西德还是整个西欧，为了在与苏联的地缘政治对抗中获得真正的安全，也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强盛，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这样一种力量只能来自于法德合作基础之上的欧洲的联合与统一。

对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尤其是东德，阿登纳一直持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一方面，他始终不承认东德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地位，在一切场合都称之为"苏占区"或者"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声称西德“在德国完全获得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唯一的合法的国家组织”。1955年阿登纳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访苏，随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阿登纳考虑到德国统一的问题不可能绕过苏联，而且他也不满意美英法三国在德国问题上越过西德直接与苏联谈判的做法，并不表明他对苏联的认识在当时有了什么变化。所以在与苏联建交之后西德马上就提出了所谓的“哈尔斯坦主义”，宣布不同苏联之外与东德有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建交，一方面表明了西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此在国际社会中尽可能地孤立东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60年代，苏联的力量日益强大，并且有直逼美国之势，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西方的压力来实现两德的统一的可能性显得日益渺茫。至于意在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的实施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形成了对西德外交的一种极大的约束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陷入被动。形势的发展要求西德人正视它的东面的地缘政治现实。

阿登纳是最先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晚年终于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如果两个德国的分裂长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西德应该如何调整它的外交政策呢？与勃兰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东方政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

实际上，在勃兰特在其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新东方政策”之前，西德已经有一些人提出了承认东德、与东南欧所有国家建交，以及两个德国都加入联合国的方案。包括勃兰特(W.Brandt)本人，作为前任西柏林市长，从他与“东方”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当中也早就意识到，西德与东德的统一只有通过与对方的接触而不是隔离才能实现，只有通过促使对方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而不是使双方的分歧永久化才能实现。用他自己在1962年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需要建立尽可能多的真正的接触和有意义的联系，……这样一种办法可以使对方发生变化。”[160]因此，勃兰特在1968年

出任联邦德国首相时能够系统地提出一整套新的对东方的政策，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根据勃兰特的表述，“新东方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加强西德与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联系；承认欧洲的边界现状（主要是承认波兰与东德交界的奥德-尼斯河边界）；承认民主德国作为第二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并与其建立一种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加强两德之间的交往，“以接近促转变”，用和平的方式最终实现两德的统一。勃兰特自己对这一政策的解释就是：“只有通过缓和及克服欧洲的分裂才能克服德国的分裂，这是一个需要坚强的力量和需要时间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完全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国家的统一现在还提不到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人民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来安排德国两部分的相互并存和相互合作的生活。”[161]

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苏美关系的缓和为“新东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适宜的国际环境。1970年8月，西德和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年12月，西德又和波兰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与此同时，在西德的积极推动下，美苏英法四国也就柏林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于1971年9月签署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确认柏林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地位。柏林问题的基本解决促成了两德政府的直接谈判，到1972年11月，双方终于签署了《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的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紧接着，西德又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达成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至此，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动。应该说，“新东方政策”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当时来看，它使得西德摆脱了因奉行“哈尔斯坦主义”而在外交上面临的窘境而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西

德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东西德的直接交往使得两个德国都可以在处理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美英法四国的干预；而对于西欧其他国家而言，“新东方政策”明确提出把德国统一的问题放到欧洲统一的框架之内解决，这就进一步打消了它们对于西德尚存的疑虑，同时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新的触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来看，这一政策也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缓和。至于从长远来看，“新东方政策”在最终促进两德统一方面作出的贡献就更是不可磨灭了。

“新东方政策”在勃兰特的继任者施密特(H.Schmidt)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后者更强调达成东西方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均势”，认为“保持均势，是有效防御和改善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162]。对于苏联，施密特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就是“我们欧洲人要去掉这样的错误印象，即认为我们可以征服俄国，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因而，施密特在出任首相之后仅5个月就出访了苏联，表示要继续奉行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在施密特任内，西德既始终保持着与苏联的政治对话渠道，又积极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并且变成了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西德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当然，在强调与“东方”的联系与交往的同时，西德政府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忽略与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欧各国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在施密特任内，法德共同推动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欧洲议会的选举，并且还提出了法德军事合作的设想，把欧洲统一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80年代末苏联东欧局势的剧烈变动为德国的统一带来了一个天赐良机，这个机会被西德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虽然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Kohl)在针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十点计划”中明确表示将不再按照“小步子”的办法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对于“新东方政策”是一大突破，但德国的统一基本上还是在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加

深的背景下进行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又是对“新东方政策”的一种延续。当然，统一之后的德国与以前的西德毕竟是不同了，它已经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统一前后苏联东欧的剧变也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所以，无论德国的东方政策还是“西方政策”都必须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德国的统一是在取得西方盟国的谅解的情况下，而且也是在欧洲统一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但即便如此，人们对统一后的德国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多少，尤其是德国统一前后的一些举动，比如说科尔在不与西方各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公开宣布了他的“十点计划”，以及抢在欧共体之前承认克罗地亚的独立等等，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因此，如何协调与西方，尤其是与西欧各国的关系，是德国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此，科尔的态度是，要真正取得人们对德国的信任“只有一种办法，……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统一必须齐头并进”。德国前外长根舍也表示：“德国对外政策只能是及其深刻的欧洲政策，建立欧洲联盟，最终建立在欧共体范围内的欧洲合众国……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实际上，要完全获得西欧各国的信任，对于德国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德国一再强调德国是统一的欧洲范围内的一员，但人们依然还是有“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的争论，有欧洲的统一就是各国“向德国交出主权”的说法。因此，如何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处，对于德国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考验。

在德国的东方，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造成了一大片地缘政治的真空，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德国来自东面的军事压力。德国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援助扩大自己在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同时积极支持北约东扩的计划，以此为自己求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当然，在东方，德国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依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虽然德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希望以此密切两国的关系，但俄罗斯反对北

约东扩的态度始终非常强硬。虽然俄罗斯目前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它依然是德国东面一个强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又使得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的作用大大减弱了，欧亚大陆的这两个大国又要面对面地打交道，而如何打好这种交道，对德国又是一大考验。考虑到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局势尚存在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个考验的难度就显得更大。统一以后的德国已经反复明确表示，不会把自己的活动舞台局限在欧洲范围之内，而是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与美国一起担当“领导伙伴”，要“在全球从政治和经济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责任”[163]，但如何处理好与它的东方和西方的国家的关系，仍然是决定德国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发挥的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节·
俄罗斯（苏联）[164]的地缘政治战略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部，正是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仅仅是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就足以激发人们产生无穷无尽的想象；而且，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俄国（尤其是苏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西方大多数地缘政治学家和外交家眼中潜在的或者现实的敌人，西方的大多数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政治战略都是以俄国作为敌对的一方而提出来的。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对于俄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政治战略的介绍就十分必要了。

俄罗斯从早期的莫斯科大公国发展到20世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到19世纪时，俄国已经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的陆上大国。

在俄国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俄国的统治者们很早就把为自己争夺若干出海口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他们似乎比马汉要早得多地意识到了海洋对于一个内陆国家而言的重要意义。俄国在17和18世

纪与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都与它争夺出海口的企图有关。在北方的战争的结果是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它在南方争夺黑海出海口的努力却失败了。自 18 世纪以后，西欧各国迅速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的力量对比，1854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已经开始享用工业革命的成果的英国和法国与依然停留在封建农奴制之下的俄国的一次正面的较量。这次较量自然是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终，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它争夺黑海出海口的意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它向西扩展势力的势头也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成了俄国国内的社会变革，但它并不能打消海洋对于俄国人的诱惑。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国人又再次提出了黑海的问题，作为它在英法一方作战的条件。1915 年，英法答应战后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峡将划归俄国。1916 年，俄国又分别与英法达成协议，规定战后大亚美尼亚，即土耳其的黑海沿岸地区划归俄国所有。沙皇俄国把这次大战视为完成它在“黑海地区的历史任务”的最好时机，但未等大战结束，十月革命就爆发了。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战争，并且废除沙皇政府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所以俄国的疆界最终还是没能延伸到黑海之滨。

十月革命实际上也同时标志着旧的沙皇俄国的瓦解。按照苏俄政府与德国签署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波兰、立陶宛、库尔兰、里夫兰和爱斯特兰脱离了俄国，乌克兰和芬兰则获得了独立。虽然苏俄政府于 1918 年 11 月宣布废除了该合约，但在 1917—1919 年，苏俄政府又先后承认了芬兰、土属亚美尼亚、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托维亚以及白俄罗斯等国家的独立，这样，俄国的疆界就大大缩小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包围，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主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是维护周边的安全。据此，苏俄政府在 1921 年分别与伊

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宣布“放弃历届沙皇政府对波斯所遵循的压迫政策”。当然，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非常希望能够突破西方国家的包围。所以当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之后，苏俄就在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控制波兰是当时的中心战略目标，因为如果控制了波兰，就可以使俄国与当时爆发了革命的德国联成一片，这样既可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对俄国本身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好的保障。只是后来战局发生了对苏俄不利的转化，而西欧的革命运动也很快进入了低潮，使得苏俄的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原帝俄境内在十月革命后独立的一些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它们并且于1922年12月31日共同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恢复了革命以前的部分领土。此后一直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前，苏联的疆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但应该说，作为列宁的继承者的斯大林的地缘政治观念与沙俄时代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的。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就是苏联重新占领了芬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从而再次获得了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苏美英三国的一系列关于战后领土问题的谈判中，苏联又成功地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一个缓冲地带，这些国家后来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权，并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在苏联的东方，苏联以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使得盟国承认了外蒙古的地位，并且要求中国的大连港国际化（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除此之外，苏联还获得了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的领土。至此，苏联不仅基本上恢复了原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而且终于在远东地区获得了另一个出海口。可以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同时也为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巨大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确立了苏联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由于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样一种地位显然被进一步加强了。如果说在战前苏联的地缘

政治战略主要着眼于守势，着眼于对国土的防卫的话，那么战后它的地缘政治战略就逐步地转为攻势，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苏联的影响，并且与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争霸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当中，除了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执政的后期之外，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大致说来，这种地缘政治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在苏联的外围建立一系列的安全地带而进一步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第二个层次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冲出西方的遏制圈，在欧亚大陆的边缘获得新的突破口；第三个层次就是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扶持亲苏政权以及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影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苏联在战后争取到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优势地位之后，即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加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诸如在这些地区驻扎军队、在这些国家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施加影响等等。冷战开始之后，先是敦促东欧各国立即实现“苏维埃化”，向社会主义过渡，随后又通过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使得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以外）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与苏联结成密切的同盟，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苏联还通过在东欧的“大清洗”，消灭了这些国家内部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党政军领导人，以此来保证东欧国家与苏联保持高度的一致。因为斯大林认为，东欧地区不仅是苏联与西方在“军事上的缓冲地带”，而且也是苏联抵抗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心理挑战的外部防线”。在对东欧的控制方面，苏联遭到的唯一的失败就是未能使南斯拉夫就范，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战后初期，这种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苏联的国内政治有一些松动，但在东欧的问题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与斯大林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必须保证苏联对这一地区的绝对的控制而不允许东欧任何

国家转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此，苏联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消除西方对东欧国家可能的影响（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证），另一方面则是对东欧国家偏离苏联的路线的任何尝试都加以严厉的压制。因为苏联人认为，这些国家只有在内政外交上都与苏联保持一致才能确保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为了使苏联对东欧各国内政外交的干预合法化，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苏联还提出了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宣称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及其命运都必须由“社会主义大家庭”来加以决定。

在苏联的东部和东南部，苏联通过于1945年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获得了长春铁路以及旅顺和大连港的使用权，而且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又与中国在1950年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且再次与中国政府一同确认了外蒙独立的事实。通过这些条约，苏联在东北亚的安全体系也基本上成型了。当然，由于中国并不会完全听命于苏联，不愿意接受苏联所提出的若干有损于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的要求，所以中苏之间最终出现了分裂。应该说，中苏分裂，是苏联在远东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大失败。

苏联地缘政治战略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突破西方在欧亚大陆边缘为对它进行遏制而构筑的防线。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苏联就已经表现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企图。一方面是在伊朗驻军，并且在苏占区内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是宣布废除1925年签订的《苏土互不侵犯条约》，要求土耳其“归还”卡尔斯和阿尔的汗两个边境地区，同时要求修改1936年缔结的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蒙特娄条约。除此之外，苏联还积极支持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地中海地区。正是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并且直接成为冷战的导火线。

杜鲁门主义就是为遏制苏联在希腊的行动而提出的。由于西方的政治军事压力，以及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苏联只好放弃了首次向南扩张的企图。

苏联再次向中东的扩张始于60年代后半期。由于英国宣布放弃它在苏伊士运河远东的防务，美国又深陷于越南战争中而不能自拔，苏联获得了一个向中东地区“填补真空”的大好时机。它通过向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等办法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1967年的“六·五”战争以后，苏联又进一步向埃及派出了两万多军事人员。并且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海、空军基地。苏联在红海和波斯湾地区的存在对于西方国家的利益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苏美两国在该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苏美对中东的介入是60—70年代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战火连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争夺由于苏联1979年12月底借阿富汗发生内乱之机而公开出兵这个南亚与中东之间的国家而达到了高潮。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其控制波斯湾和南下印度洋的一个重要步骤，苏军在阿富汗的存在构成了对西方在海湾地区的利益的重大威胁。由于就在同一年伊朗爆发了革命，新政权断然宣布同时与苏美决裂，美国使馆人员甚至被扣为人质，从而使美国扶植伊朗使之成为抗衡苏联势力的希望完全落空。伊朗的丢失使得西方在中东再没有可资凭据的地区来拱卫波斯湾和阻止苏联南下印度洋，而苏联的10万军队进入阿富汗就更是陡然增加了对西方的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Carter)提出了所谓的“卡特主义”，宣布将把等同于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原则运用于波斯湾地区——“任何外部力量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重大利益的侵犯；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击退这种侵犯”。

苏联在欧亚大陆找到的第二个突破口就是越南。1956年法国

军队撤出越南之后，美国为了确保在东南亚对中国的遏制，开始向南越的保大政权和吴庭艳(Ngo Dinh Diem)政权提供支持，拒不执行日内瓦大会所作出的关于在越南举行大选的决定。到1964年，约翰逊(Johnson)总统进一步作出了轰炸北越和向南越派驻地面部队的决定。由于越南战争最终被证明是美国为自己背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所以尼克松上台以后就提出了“使越南战争越南化”的政策。1973年美国与越南各方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承诺在60天之内从南越撤出全部军队。美国的撤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在东南亚形成了一片“力量真空”，因而1976年越南南北方统一之后，苏联便于1978年11月与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也是一份军事同盟条约，因为条约第六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相互进行协商。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的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相互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在此之后，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据称，在中越关系比较紧张的80年代初，苏联每天就向越南提供300万美元。除此之外，苏联还在越南派驻了上万名军事顾问，并且取得了越南的金兰湾和岘港等重要的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苏联的力量在东南亚的扩展不仅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压力，而且也是它在欧亚大陆突破的另一个重要步骤。苏军在金兰湾和岘港的存在与美军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存在形成了直接的对抗。不仅如此，苏联力量在东南亚的扩展还与它对阿富汗的入侵遥相呼应，从而形成了一种包抄马六甲海峡，遏制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的态势。至于苏联支持下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入侵和苏联对菲律宾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就更使它控制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了。

苏联地缘政治战略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霸权。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只是苏联在这个方面的一次较早的

没有成功的尝试。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苏联明确表现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势力的企图。它在70年代中期以后分别向北非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南非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提供过军事援助、修建过军事设施、甚至派出过古巴的军队。与苏联的这种全球战略相适应，苏联也提出了系统的海洋战略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担任过苏联海军总司令的谢·格·戈尔什科夫(Gorshkov)。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是武装斗争的极为有效的和必需的工具，同时，在和平时期，它又往往被用作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海洋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因此，海军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会遇到很多限制，而在和平时期，这些限制往往不便于使用其他军种达到政治目的。"他着重指出："目前，出现了一个为经济和军事目的瓜分和开发海洋而斗争的新阶段。世界海洋正在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特殊扩张的对象。很明显，在这场斗争中，海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将占有重要地位。"正因此，戈尔什科夫得出结论说："苏联远洋舰队的建立，可以同不久前发生的许多对世界政治起决定影响的重大事件相媲美。"[165]

苏联的这种全球攻势导致了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苏美军备竞赛。对于苏联自身来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扩张政策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的结果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国民经济的元气。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呼吁缓和和裁军，宣称"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希望能够把苏联从军备竞赛的战车上解下来。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无回天之力，苏联的衰落已经无可挽回。这个泱泱大国在与美国争夺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盛极而衰，以国家的解体而宣布了自己的终结。对于苏联的解体，人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不断对外扩张的战略应该为此承担一份主要的责任。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第一，俄罗斯的地理空间再次大大缩小，国家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它苦苦挣来的入海通道也再次受到了钳制。解体之前的苏联领土面积为 2240 万平方公里，而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则只剩下 1700 万平方公里，从综合国力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俄罗斯西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加上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俄罗斯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的在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原苏联版图内作为共和国联盟欧洲部分的心脏地带的莫斯科现在变成了一个“边疆州”，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软腹部”乃是处于一种裸露状态。除此之外，由于上述各原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俄罗斯的北方的出海口被限制在芬兰湾的狭窄地段，而在其南方，黑海方向也只有伏尔加格勒的一片比较狭窄的出海口岸，而且黑海海峡还必须与乌克兰、格鲁吉亚两国一起分享。这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既大大限制了俄罗斯的行动能力，又不可避免地使它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

第二，由于统一的联盟国家出现了分裂，在俄罗斯周围纷纷出现了一系列的独立国家，而且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结构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现在俄罗斯的陆上疆界为 1.4 万公里，其中有 60% 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接壤，在这些疆界当中，合法划定的还不到 20%，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Lukin) 1995 年 3 月 14 日在俄罗斯《独立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 70% 的疆界处于无保障状态。也就是说，在这 70% 的边界线上都有可能发生领土纠纷。另外，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变成的独立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和武装冲突对于俄罗斯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冲突、以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等等，都已经不

同程度地导致了各种外部势力的介入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比如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这个地区的渗透就完全有可能使简单的边界冲突演变成为伊斯兰文化与斯拉夫文化（或者说东正教文化）的冲突，从而有使这种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俄罗斯《红星报》1995年2月3日的文章预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后苏联地区可能发生80～85起武装冲突，阵亡将士可达50万，将有800多万和平居民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俄罗斯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边界冲突及其可能的影响，一个对它来说更为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向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扩展。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国家出于对俄罗斯的担忧而纷纷提出了加入北约的要求，据此，北约于1993年6月开始讨论制定向东扩展的问题。此举引起了俄罗斯上上下下的一致不满，因为在华约已经解散之后北约反而提出了东扩的问题，这不仅被视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而且也被视为对俄罗斯的一种敌视和对其安全的一种威胁。虽然由于俄罗斯的反对，北约提出了一个与中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但一方面是俄罗斯国内对此依然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对在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积极要求加入北约的国家（如波兰）中进一步引起了对俄罗斯的担忧与疑虑。围绕这个风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明显地出现了疏远。这当然只会进一步强化那些要求加入北约的国家的决心，而西方也根本不会放弃北约东扩的设想，尽管这个过程会变得比较漫长。当然，北约东扩是否真的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在俄罗斯内部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北约的这种做法本身就足以激化俄罗斯人的反西方的情绪，而事实又已经证明，这样一种情绪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总的来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依然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压力。就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双方在最初曾经有过一

段时间的“蜜月期”，但很快这种“蜜月期”就被叶利钦总统所说的“冷和平”所取代。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双方都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对于俄罗斯来说，它逐步意识到，西方版本不可能给它带来它所期望的繁荣与富足，相反，西方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背着俄罗斯的情况下对波黑实施空袭、北约东扩等等，倒使俄罗斯人感觉到前者对他们依然存在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至于西方国家，它们通过俄罗斯5年来的形势发展也慢慢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并不可能像他们原先所预想的那样顺顺当当地走上西方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他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在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身上依然保留着专制主义的传统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因而对它不仅需要援助，同时还要加以控制和防范。许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包括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都持有这种看法。双方这种各不相同的认识自然只能使它们渐渐疏远而不是不断接近。如果我们采用斯普路特夫妇的术语的话，那么俄罗斯与西方这两种相互之间的认识，也构成了它们相互之间不太和睦的地缘政治环境。

总起来说，用卢金的话来讲，就是俄罗斯目前处于非常糟糕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中。而俄罗斯也正是根据这种形势制定了它的地缘政治战略。这一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稳定周边的形势。在这个方面，俄罗斯尤其强调发挥独联体的作用。为此，俄罗斯大力推动独联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体化进程。1993年的独联体阿什哈巴德首脑会议上在独联体原有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国家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首次设立了独联体主席这一职务，作为独联体的常设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首脑，并选举叶利钦(Yelsin)为第一届主席。到1996年3月，独联体国家在一体化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的条约，提出将在保持各方主权、保持平等互利、不改变现有国界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在经济、科学、教

育、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分阶段加深一体化的措施，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共同体”。同一个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又宣布已经就组建设有超国家结构的“国家联盟”达成了协议。4月，俄白两国总统即在莫斯科签订了“主权共和国共同体”条约，叶利钦在签约后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率先作出这种选择的国家，这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Lukasenko)也认为：“俄白共同体不仅不会妨碍，而且将促进独联体的合作。”俄白共同体的建立对于独联体的未来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不是说独联体的所有国家都会走上这条道路，但叶利钦的确是希望这个共同体能够为独联体的一体化提供某种典范。

在经济上，独联体于1993年成立了由各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组成的“协作协商委员会”，其职能是执行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的决定，制定和协调在所有合作领域的合作方案。同年9月，独联体各国又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规定了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到1994年10月，独联体又建立了第一个职能性的超国家经济管理机构——“跨国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根据各国政府所移交的权限，在能源与运输、货币与支付等方面负担一定的管理职能。1995年，独联体阿拉木图元首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经济联盟参加国用法律形式相互调整经济关系和统一经济活动条件的决议》，作为该决议的具体实施，独联体各国在1996年1月签署了《关于加强支付联盟和海关联盟的协议》，这表明，独联体正在朝着统一市场的方向稳步迈进。

在军事与安全方面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过程也出现了明显的进展。早在1992年5月，独联体部分国家就签订了一份集体安全条约，这个条约得到1993年12月独联体国防部长理事会会议的补充。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协调机构——独联体军事合作参谋部，作为国防部长理事会的常设机构，并规定了各成员国分摊的经

费的份额。1994年7月的独联体国防部长理事会提出了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和在重建独联体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建立防御联盟的构想，这一构想反映在向次年阿拉木图首脑会议提交并获得通过的《关于集体安全的构想》等三份文件当中。目前，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安全问题上采取的办法是，除了促进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之外，还普遍与独联体各成员国签订了双边的安全条约，并以此作为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

除此之外，为尽量减少原苏联地区的暴力冲突，独联体11个成员国曾于1992年3月在基辅签订了一个《关于独联体军事观察团和维和力量》的协定，到1995年2月和1996年1月，独联体各成员国首脑又分别签署了《关于维持独联体和平与和谐的备忘录》和《关于预防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在独联体境内扩散的构想》，准备建立一种防止和制止武装冲突的快速反应机制。

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应该说是俄罗斯稳定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积极加强与亚洲各主要国家的联系，其目的在于既在独联体的外围地带争取一种良好的地缘政治空间，又重新树立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以此作为与西方相抗衡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在这个方面，中俄关系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自1992年叶利钦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为中俄关系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之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联系都不断地扩大。1994年，叶利钦在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在中俄两国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构想。在此之后，中俄两国的高层领导人不断频频互访，并且签署了一系列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文件与协议。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期间，双方又进一步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为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俄罗斯一方面与中国积极配合，解决两国东段边界的问题，另一方面

又一再声明不与台湾建立官方的国家间关系。除此之外，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也表现出与中国积极合作的姿态。在1996年3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上，当会议对欧洲联盟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进行表决时，俄罗斯在1990年以后首次投了反对票，采取了与中国站在一起的立场。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既是它认识到与自己这个最大的邻国处理好关系不仅有利于自己周边的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利于自身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因为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俄两国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而且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在寻找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应该说，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正常化的、平等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于中俄两国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除中国之外，俄罗斯尤其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1994年6月，俄印两国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并宣称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几乎全部问题”。俄罗斯甚至有官员认为，如果中俄印三国能够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行动一致，西方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了。另外，俄罗斯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日本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的立场，日本对俄罗斯的贷款有了很快的增加，而且两国政府都在从具体问题入手，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创造“新的气氛”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苏联解体和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淡后，现在又开始逐渐转暖，两国之间的经贸与科技合作已经得到了恢复，而且在军事领域也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俄罗斯对于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Kozyrev)已经作为观察员多次列席了东盟国家的外长会议，1995年3月，俄罗斯又正式提出了申请加入亚太经

合组织要求。

俄罗斯目前在亚洲地区展开的积极的外交活动，与苏联刚刚解体之后那种向西方“一边倒”的立场表现出了明显的对比。正当西方一些人对与俄罗斯未来的外交战略走向争论不休的时候，俄罗斯内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俄罗斯乃是一个“欧亚国家”，有人甚至认为：“今天在俄国，欧亚主义的特色思想可能把政治现代化同后现代主义的精华结合起来。相反，纯粹西方化的思想却遭到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有力抵抗。在这种形势下需要认真研究欧亚主义的方案，因为俄罗斯社会不仅需要工艺上的大转折，也需要精神上的大转折，其规模之大，不亚于欧洲史上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对亚洲的回归，其意义就绝对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了，它同样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新的思考。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欧洲防止西方国家力量的渗透，目前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北约东扩的抵制。对于北约东扩的问题，俄罗斯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1993 年叶利钦曾对波兰表示，后者加入北约并不违反俄罗斯的利益。但仅仅一个月以后，叶利钦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在写给北约领导人的信中认为，北约东扩会引起动荡，因而不应该继续下去，至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国家的安全，则应该由两者来共同加以保证。俄罗斯军方则表示，如果北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则后者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防御构想，包括改编与重新部署武装力量，修改作战计划等等。由于俄罗斯的反对，北约于 1994 年通过了美国提出来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国家原则上都可以自愿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北约同各参加国分别进行双边谈判而确定与各国的关系；北约不为与之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通过协商寻求解决办

法；北约对于任何想与之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敞开大门，但这种关系只能作为正式加入北约的准备等等。

俄罗斯原准备在1994年3—4月间签署有关“和平伙伴关系”的文件，但这一年4月北约在不与俄罗斯协商的情况下空袭波黑塞族武装的阵地的行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原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Grachev)针对这件事表示：“我们有个印象，即我们的伙伴背着我们采取行动”，他并且指出，俄罗斯不接受“和平伙伴关系”中的“主仆关系”，“和平伙伴计划应当依据平等原则，不能像主人指使仆人一样”。叶利钦也表示：“和平伙伴关系”的模式不完全与俄罗斯的领土规模、政治和军事势力相称；俄罗斯和北约的伙伴关系“从规模和深度上说必然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同年12月，北约外长会议作出决定，将在1995年考虑正式接受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问题，由此使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俄罗斯不仅拒绝与北约签署“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建立定期磋商制度的框架文件”，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了美国所支持的关于制裁南斯拉夫联邦的决议案，至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上，叶利钦更是与克林顿发生了公开的争吵。1995年2月，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北约东扩将会损害“真正的安全新格局”的形成以及导致“欧洲和世界转向旧的或新的分离界限”。同年9月他又表示，如果北约东扩，那么“我们将有两个集团，将分裂成两个阵营”，并且可能使欧洲变成“真正状态”。格拉乔夫也宣称，如果北约迅速扩大，俄罗斯将停止执行《欧洲裁减常规武器条约》的规定，延缓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并有可能在最容易受威胁的地区建立类似华约那样的军事集团。在1995年俄罗斯总参谋部拟定的一份建议中甚至提出，如果北约真的东扩的话，那么俄罗斯将把核导弹重新瞄准捷克和波兰。

由于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北约东扩暂时受到了阻碍，1995年

10月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做出决定，在1997年以前不审议东欧国家的入盟申请。但是，一方面，对于西方与东欧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取消，另一方面，北约东扩的风波已经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难以弥补地受到了损害。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的反西方情绪也日益高涨，有人甚至认为北约东扩表明，西方正在对俄罗斯进行新的一轮“遏制”，俄罗斯再次面临与西方的“冷战”。

俄罗斯在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在东欧地区以及一些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展开了地缘政治的争夺。1995年2月，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访问了南斯拉夫，3月，俄罗斯即迅速与南联盟签署了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协定。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Chernomildin)也分别访问了斯洛伐克和波兰，与这两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协议。在斯洛伐克访问期间，切尔诺梅尔金答记者问时一再反问：为什么东欧国家要急于加入北约?

看起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争夺对于东欧和原苏联的非俄罗斯地区的影响力方面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双方关于北约东扩的冲突只是这种争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依然把欧亚大陆的中心看成是未来的国际性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同时对于俄罗斯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越来越没有信心，并且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将试图恢复对于原苏联地区和东欧的控制，他们肯定不会放弃在俄罗斯周围建立某种自己能够控制的安全体系的努力。至于布热津斯基则更是明确提出了“巩固前苏联境内地缘政治上的多元化”的建议[166]。就俄罗斯方面而言，虽然它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它依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况且从传统上来看，俄罗斯也是一个“不甘寂寞”，不甘受制于人的国家。当前，俄罗斯把“恢复大国地位，确保传统势力范围，维护民族根本利益”作为它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这种战略与西方控制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建立

“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目标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不能找到一条彼此都能接受的、真正和平与平等共处的道路，而西方人又不愿意放弃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冲突的传统观念对于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么由于它们各自的战略目标的冲突，双方冲突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二部分

地缘政治在中国



第三章

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地缘政治在中国的全盛时期

中国在西周时代,甚至在此之前的夏商时代,已有了地缘政治的萌芽,所谓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一种地缘政治的体系。它是中国古代处理国与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一种模式,后来的朝贡体系,是对这一制度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七个大国,它们为了争夺霸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思想。从管子到孙子和吴子,再到后来的纵横家们,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中,洋溢着地缘政治的战略和策略的智慧,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齐秦吴魏等国都曾称霸一时,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地缘政治的精彩的场面。不论从思想的深度还是对实践的巨大的作用上,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都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杰出的地缘政治家辈出的时代,一个对后世的地缘政治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时代。

·第一节·
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地缘政治大势

(一)
地理状况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中华文明发源于东亚地区。从地理上看,东亚是一个独立的区

域:它的东边和南边是大海,西边是在人类文明初期不可逾越的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边是寒冷的大荒原,这把它和世界的其他地区阻隔开来,中华文明也因此保持着自己很强的独特性。中华文明成长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带,是典型的农业地区。这一特性使中华民族在很长的时期内具有很强的保守性,经济上自给自足,思想上以自我为中心,视周边地区为不开化的落后地区。这一自然地理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帝国相比,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大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帝国等,都是极富侵略和扩张性的帝国,先后把众多的国家和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中华帝国在历史上虽也有过短暂的扩张时期,但基本上是靠不断开发周边地区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不是扩张战略,不是进攻战略,而是防御战略、固守战略,是和平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有所研究的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在其著作中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要这样做的。中国认为,它不需要外部世界,在许多方面中国超出了它,任何扩张和文化改宗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防御,即一个深信自己文化优越的民族筑起壁垒,锁起国门,以防止野蛮人的侵入。……那种隔绝又是距离、地理和语言诸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中国文明和独立自足性和与外界隔绝性。”[167]

(二)
夏商周时的地缘略况

发源于现今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到公元前 2100 年时,即夏朝时开始产生地缘政治现象。当时夏朝的地缘政治情况大致可以概括为,前期是夷夏纷争,中期是诸夷归夏,后期是夷夏多事,导致商汤联

合东夷灭夏。《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夏后氏太康失国，夷人始叛，自少康之后，世服王化，遂兴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汤革复命，伐而定之。"[168]就是说，夏的灭亡与夏和周边的方国的关系恶化有关。到公元前16世纪时，作为夏朝时的一个方国，成汤联合其他小方国，开始了新的地缘政治争夺。成汤自征伐葛、载起，先后多次对其他方国进行了讨伐，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消灭了韦、顾、昆吾诸国，最后灭夏。

700年后，原本是西方小国的周国，在商纣王无道时揭竿而起，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汉水流域，对商形成了地缘包围。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兵4.5万，联合了8个南方小国，趁商纣王大军外出征伐，起兵伐商纣王，商纣王来不及从外调回其主力，匆忙拼凑奴隶上阵，结果奴隶军队倒戈，周军得以在牧野大败商纣17万军队，灭商。

之后，周又进行了地缘扩张，先后灭了71个小方国（也有说99国，降65国），中华文明也随之扩展。

在商、周时，逐渐形成了中国、中华和华夏等概念。当时的各小方国称商、周为中心国，在《诗·大雅》中把周和各诸侯国称为中国，到东周时，在北方的周和周朝的诸侯国称中国，而南方的楚、吴、越等称为蛮夷，西边的秦称为戎狄；后来，楚、吴、越和秦等国先后合于华夏，并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蛮夷和戎狄成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另外，中国西部地区称为西夏，东方的大国诸侯合称为东夏，东西夏称为诸夏。又，周朝时人们崇尚赤色，而"华"字有"赤"之义，因此周朝的人又称为"华人"或"华族"。另外，周朝的文化也比周边地区其他部族为高，所以文化高的地区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合称为"华夏"。华夏即中国。[169]

在夏商周朝时，地缘政治大致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华族，第二层是夏各族，第三层是四夷，华夏是中心，而四夷为外围。当时的观念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在这一个基础上,形成了夏商周时的地缘政治体系,即以天子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当时的制度可以用“五服”来概括,即“五服之内所封诸侯,朝贡皆有时,各依服数以天事,故曰服事”[170]。《国语·周语》中也说:“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在这里已经对当时的地缘政治体系的根本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这里的服,即服事天子,以京城为中心,500里内为甸服,这是京师所在之地,臣民要经常向天子进贡并晋见天子;甸服之外500里为侯服,这里的统治者要向天子进贡并经常派兵保卫京师;侯服之外500里为宾服,或为绥服,这里的统治者要保卫边疆;甸服、侯服和宾服是以华夏人居住地为主;第四层是宾服之外500里,为要服,要服即边服,主要对华夏之外的蛮夷人,“要”就是“事以文教礼也”,使之与王朝保持某种较松散的关系,不要求他们经常进贡和晋见,但也使之不反叛朝廷,即后世所谓“羁縻”;对远离蛮夷的戎狄,对之以荒服,即因其多为游牧民族,居所不定,故对其更加宽松,风俗皆由之,“来不拒去不禁”,也是一种羁縻之策。[171]

在周宣王时,周朝在公元前827年至前789年的近40年中,曾与周边的非华夏部族进行了长时期的征战。他命部下在西北攻西戎,在东南对荆蛮、淮夷、徐方作战,又命大臣经略中原,大的战事就有5次;周幽王在位时,与戎族的关系继续处于敌对状态。秦庄公的兄长即为戎人所杀。秦庄公死时,长子世父不愿即位,让于其弟,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172]。

西周多次与蛮夷和戎狄作战,终于导致了政权危机。周朝诸侯申侯引西夷和犬戎等攻幽王,周幽王举烽火征各诸侯,但周幽王过去为讨王妃欢心,曾多次举烽火并击大鼓以让王妃发笑,后幽王屡举烽火,诸侯也不至,所以这一次诸侯也不发兵,周幽王因此被戎人所杀,西周由此灭亡,中华历史也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

（三）
春秋战国时的地缘大势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地缘政治明显分成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内地缘，即有着同一种文化，同属一个民族，实行同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周朝的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对它们具有生死存亡的关系。

在春秋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势力还大体相当，因此它们相互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在这200多年中，先后存在过13个大的诸侯国，小的国家则有130多个。它们就像是当今的联合国，共处于东周这个大的联合体中，但每个成员又是一个标准的“主权国”：它们有统治者，有军队，有管辖的领土，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着有效的管理，在对外事务上大多有自己的外交权。因此，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联系非常紧密，同属于一个大的国家实体之中，但它们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是一种国与国的关系，互称为“外国”、“外邦”。它们之间既有着共同的利益，又有许多相互矛盾和斗争。

在共同利益方面，主要体现在各诸侯国反对和抵御周边非华夏部族的侵扰上。例如，公元前706年山戎攻齐，郑太子忽曾率师救齐，并大败戎师。

但各国相互关系更多的体现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霸”与“以礼事大”的关系，体现为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和诸国之间为各国的利益的结盟关系，以及结盟关系的频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霸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由于这种霸国经常变化，并不是长期不变的，隔一个时期，一个霸国又会为另一个霸国所代替，因此这种体系可以称之为周期性的霸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霸国是中心，打着天子的旗号，对各国发号施令。当然，霸国也要考虑各国的一些共同利益，维护周朝这个联合国的国际秩序，但主要的还是维护霸国

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一霸国体系在齐桓公称霸时最明显。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隰朋等修齐国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举贤任能，齐国日强。公元前681年和前680年，齐策动陈、蔡、邾和曹等国攻宋，并在前679年时与宋公、陈侯、卫侯和郑伯的盟会中确立了齐国的霸国地位。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开一次盟会，并由霸国来主持会议，成为霸国体系的主要形式。

公元前681年、679年和667年、651年，齐桓公曾多次会周公、鲁侯、宋公、卫侯、郑侯、许男、曹伯等于癸丘（今河南考城县）等地。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联合国大会”。公元前651年9月，各诸侯国再次盟会于癸丘，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条约”。条约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公元前579年，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次经调解达成的和平：在宋国的调停下，晋国与楚国和好成功，双方在宋国西门外达成和平友好条约：“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灾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堵，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灭之”[173]。当时，在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等大国诸侯的主持下，东周这个“联合国”曾有多次盟会。例如齐桓公就曾一匡天下，九盟诸侯，打着周天子——“联合国”的旗号，开了多次大会，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在霸国体系中，如果霸国对较强的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攻击听之任之，就会削弱其霸国的威信，因此，霸国总是对体系中的非法行为进行干预。公元前666年，楚伐郑，齐桓公就率齐、鲁、宋兵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制止了楚的进攻。公元前659年，楚人再侵郑，齐桓公再次与鲁、宋、郑和曹等国盟会，商议救郑之事。公元前658和657年，楚不顾各国的警告攻郑，齐国就于公元前656年率各路诸侯发兵讨伐并迫使楚国议和；公元前645年，齐第三次发兵攻楚，与各诸侯国再次阻止了楚对徐国的进攻。在这一

时期，齐桓公还曾干涉一些小国的内政，如公元前 655 年，齐桓公曾与鲁宋陈卫郑许曹等 7 国之君盟会，商讨制止在晋国发生的内乱。

在齐桓公之后，又先后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称霸。

当时总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是大国主导，大国吞并小国，一个大国联合一些小国进攻另一个大国，大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形成五霸争雄的局面。这也为地缘政治学说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第二层地缘是次外地缘，即周朝体系中的诸侯国与当时的 30 多个蛮夷戎狄部族的关系。周朝各大国是这一体系的中心，而非华人部族则是外围。尽管后来许多部族与汉民族发生了大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现今的江南在战国时为楚越之地，成为中华民族早先较发展的地方，但在一个时期内它们也曾属于蛮夷之地，在当时毫无疑问对各诸侯国来说，它们都是“外”这一范围。这种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有时候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攻打蛮夷，有时候一些国家勾引蛮夷进攻另一个国家，还有些时候是几个蛮夷部落联合攻打诸侯国。但总的来看，是周朝各国忙于对付中原各国，无力它顾，因此蛮夷部落对各国的侵扰要多于周朝各国对他们的进攻。

不仅是西周的灭亡与之有关，而且蛮夷对一些诸侯国的侵扰对其产生的影响也特别大。齐桓公的称霸，一方面与齐国在管仲的辅助下，整治国内得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齐国带头抗击狄戎的侵扰有直接联系。公元前 664 年，齐桓公作为当时的盟主，曾发兵攻戎以救燕人；公元前 661 年，当狄人攻邢时，齐又发兵救邢；公元前 660 年，狄人攻卫国，卫兵不愿为卫国作战，狄人得以灭卫，又是齐出面联合宋人收卫之遗民 730 多人，又立卫宣公之孙为新的卫国君主，后又赠卫文公钱财衣物等；公元前 658 年，齐桓公又率诸侯为卫国修筑楚丘城，并恢复卫国；公元前 649 年，齐桓公再次为卫筑城郭，以抗狄人，又使大臣击戎于晋，使管仲击戎于周。由于齐抗击狄人有功，周

天子以王礼待管仲；公元前 646 年，齐率诸侯为杞国筑城；公元前 644 年，戎侵周，周告急于齐，齐征调诸侯兵士防守周城。在 20 年中，齐桓公领导的齐国先后 7 次带头抗狄与戎，因此在各诸侯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秦国的兴起也与抗戎和狄有关。公元前 778 年，秦国庄公之兄为戎人所杀，与戎人结下深仇。公元前 771 年，秦襄公在犬戎攻周并灭西周时，因护送周平王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获岐山以西之地；公元前 766 年，秦襄公发兵攻戎，至岐山而死；公元前 750 年，秦文公发兵攻戎于岐，大胜，扩地至岐。至秦穆公时，秦势力大增，遂于公元前 623 年用戎臣由余之谋，发大兵攻戎王，灭其国有十二，并地千里，遂称霸西戎。

总之，第二层地缘对春秋时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的变化起了很大影响。

进入战国时代，中国的地缘又有了重大变化。除春秋时代的内地缘—第一地缘和次外地缘—第二地缘，即周各国与非华夏部落的关系外，又有了第三地缘，即外地缘。这是周各国与更远的非华夏部落的关系，如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开始密切。

在内地缘方面，战国时代形成了楚、秦、韩、赵、魏、齐和燕七国争雄的局面，各国的力量大体相当，斗争更加激烈，因而地缘政治的地缘战略的运用也更加频繁，各种地缘政治的理论也相继产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代一个重大的不同是，春秋时代各国还维持着周天子名义上的统治秩序，大国所争的一是在列国中的名分、地位，二是力图从别国那里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财富，但一国要明目张胆地吞并另一国，是要受各国反对的。进入战国时代，周天子的地位已名存实亡，各大国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的斗争尖锐化，各诸侯国的国君相继称王，表明都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因而这一时期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一大国吞并另一大国的局面。在这一斗争中，胜负主要

取决于两点：一看各国的实力的强大，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又并非唯一因素；第二也要看各国在斗争中的地缘战略运用是否适当，这从战国整个时期可以看出来。

在战国初期，按人口多少依次排列的顺序是：楚—500万，魏—400万，齐—400万，秦—300多万，韩、燕各200多万，赵200万；

按军事和经济实力，楚、魏、齐、秦四家相当，赵、燕、韩三家稍弱。

从地缘形势来看，魏、韩、赵三家最不妙，处在四面被包围的状态中。

从综合的实力看，楚为第一强国，魏国次之，秦、齐再次之，再后是赵国和燕国，最后是韩国。进入战国中期，秦、楚和齐逐渐强大，形势变得复杂起来。韩和魏离秦最近，因而最先提出各国合纵抗秦的主张，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两国的君王未能将这一战略方针贯彻到底，对燕和赵来说也是如此。一开始，合纵国军队曾取得过联合抗秦的胜利，但是各国在联合中不能齐心协力，彼此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最终导致了亡国的命运。实际上，只要其中的两国紧密联合，秦就很难吞并各国，尤其是齐、楚两个大国，本身的实力已和秦不相上下，若再与任何一国结盟，秦国也很难一并天下。因此，也可以说各国的失败是败在地缘战略的重大失误上。

与此相连，秦国的胜利除了有商鞅变法的基础外，制定正确的地缘战略是重要原因。秦国在春秋时代已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地缘政治的行动，就是比较沉重地打击了西边的蛮夷，使秦能在战国时代全力对付各国。更重要的是，秦王先后两次调整了自己的地缘战略，并始终执行了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秦国的胜利表明，在一组地理接近且实力相当的国家中，制定正确的地缘战略是多么重要，它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意义至关重大。

·第二节·
《六韬》和姜太公的地缘政治思想

在西周的400多年历史中,姜太公作为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在灭商兴周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姜太公在运筹策划时,也较多地考虑到了地缘政治的因素。文王即位后,任用姜太公,首先在内政上下功夫。作为商的西方属国,姜太公裕民富国,广致人才,发展经济,使周从弱变强;然后,姜太公对商朝的其他属国做工作,联合和拉拢商朝周围的方国,并设法调解虞、芮两方国的矛盾,公平地处理其领土纠纷,在时机成熟时又从地缘战略上着手,先攻商都朝歌的边缘地区,相继征服了太戎、阮、共等方国,又消灭了商朝的重要属国邗、崇和黎等,对商形成了地缘包围;最后,利用商军主力外出征服东夷,西线防御空虚之机,对商发动了最后的决战,一举灭商。

战国时人们对姜太公、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策略进行总结,编成了《六韬》一书。这本书虽然有不少内容是后来人的借题发挥和编造,但其中也多少反映了姜太公的思想。这本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兵书,而且也包含了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

(一)
仁义地缘

仁义地缘指的是,即以正义和公正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拥护,仁义不仅对内,而且也用在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上。周文王在第一次见到姜太公时,请问何以才能收揽人心而使天下归附,姜太公答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

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174]

周文王遂拜姜太公为师。在姜太公看来，武力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以正义和公正取胜服人。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要利益均沾，让各国都能分享利益和欢乐，而如果谁想独霸天下，独占天下的利益和好处，则将为天下之公敌。这一思想在书中还多次提到，在下面这段话中也可看到这个意思：

“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事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175]

因此，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持仁义，即主持公正和正义是最重要的。

（二）
敬众和亲地缘

敬众和亲地缘，即互尊互敬互利地缘。在与周文王探讨保卫国土的方略时，姜太公又进一步发挥了仁义地缘的思想，认为应对天下各邦一视同仁，“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行仁义就是要“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当然，要做到敬众和亲，首先要治理好本国，使本国富强。“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176]

（三）
地缘战略思想

《六韬》对如何在军事斗争中利用地势和地理也有许多论述。当然这些思想不一定是姜太公本人提出来的，但也是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总结。《六韬》主张“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武韬·发启》)[177]，即认为不发兵，不用战车，而用智谋取胜才是最高的艺术。《六韬》还强调用兵对于国家的兴亡事关重大，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龙韬·论将》)[178]。它还尤其强调用兵时国境的重要性，认为“兵出逾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龙韬·论将》)[179]，因此在国境外作战不能长久。书中还对“九败之地”作了论述：“太公曰：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人伏我两旁，又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是谓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隘，所从出者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翳茂林木，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于两水之间，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人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还，此骑之困地也；淤下沮泽，进退渐洳，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进退诱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者，骑之死地也。明将之所以远避，暗将之所以陷败也。”(《犬韬·战骑》)[180]这里提出的败地、围地、死地、没地、竭地、艰地、患地、陷地、困地等，在军事地缘战略学上有其重要价值。

《六韬》还提出了文伐的思想，即在与地缘接近的邻国进行交往中，要用各种方法削弱敌人，使其处于混乱和内乱之状态，以有利于我。但在其中有许多糟粕，很明显是战国时代的策略家们的邪道。如在文伐十二法中说，要阴赂左右，辅其淫乐，赂以重宝，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等，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节·
地缘政治大家—管子与齐国称霸

管子(?—前645)名夷吾,字仲,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为“仲父”。他在任期间,对齐的政治经济进行了重大改革,使齐国日益富强,成为当时第一强国,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方面是大政治家,而且在外交方面也是一个大外交家、大地缘政治家,在辅助齐桓公时,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地缘关系、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思想,对后世的地缘政治理论有很大影响。后人把他的思想和论述整理成《管子》一书。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借笔,但《管子》一书仍不失为研究管子思想的重要文献。管子的地缘政治思想主要有:

(一)
富国强兵乃地缘政治中立足之根本

管子说:“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181]

那么怎样才能在地缘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呢?管子对富、强、胜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管子·制分·第二十九》)[182]。这里的事,是指富国的生产事业;数,是指强国的政策措施;理,是指获胜的大道理;制,是指控制天下的纲领,所以富国强

兵的关键还在于一国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

在《管子》一书中,国家富强也不仅指兵力多少,财富多少,更重要的是一国国民的精神状况,因此它把精神文明看成支撑国家的栋梁。管子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第一》)[183]。

(二)
精辟地论述了地缘关系中的大国、小国及其关系

在一组地缘接近的国家中,自然会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之分,但管子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把国家分为三种:

管子把国家分为大国—万乘之国,中等国—千乘之国和小国—百乘之国。前有大国,后有中国,这种国家叫"抵国"。后有大国,前有中国,这种国家叫"距国"。国土正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衢国"。一个国家如是衢国,就特别危险。百乘小国是衢国,其君主叫寄食之君,因为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举兵相攻,必然把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打败了大国,也要以土地用于分赏,实际上等于没有领土。千乘之国是衢国,国土可能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是衢国,国土也会受威胁。因此,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处境是很不妙的。(《管子·国蓄·第七十三》)[184]

"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佚亦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管子·枢言·第十二》)[185]

这就是说,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固然与国家的强弱有关,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中的名声与信誉

如何，会影响它的地位。而国家的威望主要在于德与义，在于它的政策。管子把那些国富民强，德义高，不强加于人，不恃强惹事生非的国家，称为制国。它之所以能控制局势，主要不在于国强，而在于为各国所信任，因而能最终控制局势。那些人不多，兵不强，却又好用本国实力制造是非，依靠同盟，偷取名利的，必然最后会受人控制；而那些看风向，顺大流的国家则处于二者之间。

国家在地缘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领土多少，人口的多少：小国不一定就会亡于大国，大国也未必就不会亡。管子认为："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管子·法法·第十六》）[186]又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子特别指出，国家大小强弱都会发生变化，"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治者，复弱；众而不治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87]。总之，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关键在于国家的政策。它可以使"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188]。

不管国大国小，都必须从地缘政治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一国必须与周边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管子》曰："天下皆治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89]又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邻国亡焉。……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190]就是说，一国兴亡与邻国的情况变化有很大关系：邻国有事，其他国家可能有所得，也可能有所失，有可能兴，也有可能面临灭亡的危险。而邻国举措不

当,很可能正是它的敌对国得利的原因。

管子特别提出了大国的地缘形象问题,说那些欲争重国、霸国和王国的国家,必须借重于待胜之兵,必须能威加于国,取信义于天下。如果“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管子还告诫大国的当权者,不要以大自骄,否则会物极必反,事与愿违。他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从,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管子·重令·第十五》)[191]如果谁恃强自骄,借大自傲,就必然会走向反面。

在大国的地缘政治中,重要的是要得人心。管子在总结当时的经验时说,“今有土之君,……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第十》)[192]

(三)
提出了多种地缘战略和策略

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管子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策略。

(1)近亲远礼。“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管子·枢言·第十二》[193]。远近,指区分各国的边界距离,而体,是指对近国要亲近,对远国则以礼

相待。

(2)“全近而攻远”。管子指出：“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全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94]就是说，一国的统治者应善于运用智谋，掌握时机，制定正确的策略，在地缘接近的各国中，可以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也可以用大国牵制小国。

(3)服近而强远。即征服近国，威胁较远的国家。

(4)审时度势。分别敌国之强弱大小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管子的地缘战略和策略主要在《霸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管子曰：“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95]这段话精彩地论述了在大国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一国采取什么战略和策略才可以为本国争得最有利的地位。关键固然要以本国实力为本，但在相同的实力面前，运用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却可以出现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大国强国，在联合谁，反对谁，什么时候采取什么行动，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智慧。

管子又指出：“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正，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是故先王之伐

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形危之。二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考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96]在这段话中，管子指出，一个有志于在国际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和有所作为的君主，不能走极端，要有正确的地缘战略。虽然在这里管子指的是大国的霸权主义地缘战略，但其中也有十分精彩的观点。他认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受普天下的攻击，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做法是容纳小国，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做法是屈节事强，其失误在于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凡只靠用兵想取胜的，没有不失败的，必须首先定好谋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与盟国的关系，然后才能有所动。这才是一个国家的正确的策略。

与此相连，管子认为在地缘政治的斗争中，应该从全局，从总的战略影响来考虑问题。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

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管子·霸言·第二十三》)[197]就是说,精于谋略,形势,再有强大兵力,就可以控制大国和强国,对己有利,而如果恃强专破一国,而无意中导致别的邻国强大起来,则会导致本国的衰亡。

(四)
提出了对地缘接近的国家关系中的几个原则

(1)不结盟政策。"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约束和结纽就是现在的结盟。结盟终会导致解体和破裂。国家的行为应当合乎"时"与"义",即合乎天理和正义,"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管子·枢言·第十二》)[198]。只有以公理和正义来指导国家的行为,才能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

《管子》上还说"'请问先合于天下而无私怨,犯强而无私害,为之若何?'对曰:'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攻于人而勿得,所橐者远矣,所争者外矣。明无私交,则内无怨。与大则胜,私交从则怨杀'。"(《管子·侈靡·第三十五》)[199]那么,如何才能倡导天下联合而又不使人觉得是在结盟,反抗强暴而不使人认为是以为报私怨?要如此就应做到,对强国应诚恳而有道义,对弱国应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做好事不自夸为仁,对别国有恩而不自居有德,这样本国活动的范围就很大,争取到的友国也会多,尤其重要的是对友国应明确本国不结党营私,友国就不会有怨心,友国多,就是胜利,而结党营私多,则怨恨与攻伐也多。

(2)不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来解决边境问题,不进行土地扩

张。“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管子·枢言·第十二》)[200]管子指出,“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管子·大匡·第十八》)[201]就是说,要扩张土地必会经常动兵,动兵必使人民贫困,要人民忍受贫困就只有进行欺骗,从而失去人民信任,导致国内动乱,最终危及统治者本身。管子不仅这样说,而且也劝齐桓公把侵占的土地归还于各国。齐桓公想干预诸侯的事务,管子劝阻说,应首先与邻国亲善,归还其邻国的领土,订正与邻国的边界,要南征就要归还鲁国的常、潜两地,向西则应把卫国的台、原、姑等地还给卫国,向北则要把燕国的柴夫和吠狗之地还给它。这使齐国在各国中建立了威信。

管子还指出,如果与邻国进行战争,可能导致国内政局失去平衡,导致政权危机。因为对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本国的富人更富,贫者更贫。商人可以借此发战争财,使国家的财富大多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国君对此无能为力。从而使国家的轻重失准。(《管子·揆度·第七十八》)[202]

(3)要善待邻国。首先,对邻国的情况要“八观”,从各方面进行了解。既为邻国,就必须密切注意邻国发生的各种变动。管子提出要从8个方面对邻国进行观察,即一观知饥饱,二观知贫富,三观知侈俭,四观知虚实,五观知治乱,六观知强弱,七观知兴灭,八观知存亡。(《管子·八观·第十三》)[203]管子认为,“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管子·侈靡·第三十五》)[204]就是说,知邻国的情况事关本国的存亡。其次,大国和强国对小国和弱国应给以一些特别的优惠。齐桓公问管子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管子答曰:应使“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有道之

君也”（《管子·四称·第三十三》）[205]。就是说，大国应首先搞好本国的事情，然后应对邻国从经济上给以援助，对邻国示以友好之情。这才能算是一个有道之君。第三，管子还特别提出要对邻国进行开放，要充分利用地理接近这一特点。管子说，“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其国门，辱知其神。缘地之利者，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承从天之指者，动必明。辱举其死者，与其先人同；公事则，道必行。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管子·侈靡·第三十五》）[206]就是说，一国应顺应地利，参悟天地的规律，可使行动方向明确。开放国门，可以研讨外国的好的东西，对本国也是有利的。

（4）要治理好边疆，整顿好边疆，不要在边境造事，以保证边境安宁。

齐桓公请问“为边若何？”管子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费千金，称本而动。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侯而内事。”又说：“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使其内无使其外，使其小无使其大。弃其国宝使其外，遗与而败；称其宝使其小，可以为道。能则专，专则佚。椽能逾，则椽于逾。能官，则不守而不散。众能，伯；不然，将见对。”（《管子·侈靡·第三十五》）[207]就是说，要管好边疆，就要请教边民了解情况，使边民任事，并采用其谋划。还要严明边界标识，并作好兵备，防患于未然。尤其是要使侦察人员克尽保卫的职守，经常向上报告边情。边民和外交人员不能有私心，否则就成为内奸。

保持边疆安宁的传统，就是不对外侵略，保持小心谨慎而不对外好大喜功，否则就会脱离盟国而失败。

（五）
论述了天文地理对人性格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管子·水地·第三十九》）[208]管子认为，水具有一切，是万物之本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性格：“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敢。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管子·水地·第三十九》）[209]管子甚至认为，一国之民心好坏，统治者的好坏，都能从一国的水的好坏看出来，水纯则民心正，水清明则人心平易。这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仔细想来，确很有道理。当然，这水纯水清已不能是原始和古代的自然状况，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从被污染的状况中重新使其清纯，这正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管子看来，春夏秋冬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乃至于“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失败）”，因此贤明的统治者应善于根据四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久长。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四守有所，三政执辅”（《管子·四时·第四十》）[210]。就是说，国家施德应春天始，夏天发展，刑罚就在秋天和冬天。国家每月都要按节令治理，才可以长

久。否则就会败亡。在《管子》中还有《度地》和《地员》篇，分别对国家的地形和地质及其对国家的影响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六）
提出了经济地缘思想

管子主张对地缘接近的国家在互利基础上实行开放政策，尤其注意经济资源的短缺与利用外源的问题，但又要把基点放在国家的积蓄和自备上。

古时对于国家有重要意义的资源，一是盐，二是粮，但如果国家缺盐缺粮，还能不能有所作为呢？《管子》中有齐桓公与管子的一段对话："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命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管子·海王·第七十二》）[211]管子认为，可让有盐国卖盐给本国，充分利用他国的资源来解决本国的问题。

那些土地少而贫的国家，更要重视与别国进行谷物的流通，要实行"以重藏轻"政策。

"管子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212]管子认为，一国君主只要经营好粮食就可解决国内粮食不足的问题。除了在国内控制之外，也要到国外去谋解决，主要是用高价收买，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储藏粮食。

这种地缘经济政策不仅对解决本国的问题有用，而且在影响别国的政治上也会产生作用。“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具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管公州之余焉，以乘四时，行栏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被，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具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213]这就是说，现在各诸侯掌握天下的余财，因此大国应利用季节的变化，对市场进行操纵，使东西南北相补助，对各地进行调节。在诸侯分立时，用直接掌握物资来对付各国，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财利充足则使之流通，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地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管子还认为，齐国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地缘政治中发生影响。他说，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有三，而齐是其中之一。“楚有汝汉之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214]而盐是必需品，无盐则人会浮肿，所以盐对保家卫国，特别重要。管子让齐国把盐卖给那些缺少盐的梁、赵、宋、卫等国，而且只收黄金，这使黄金大量流入齐国，齐国又可以用它来收购齐国必需的物资，丰富了国内的经济。

管子虽然提出利用外国资源，但立足点还是放在国内，反对过分倚重于各国的“权与”。“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天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又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具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

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管子·事语·第七十》）[215]管子认为，用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发国内，使人民丰衣足食，并且有较多的节余，特别是要贮备粮食，这才是立足于各国的根本因素。

管子不仅在当时提出了上述地缘政治思想，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加以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下是一些实例：

用经济战和经济封锁、经济制裁办法使敌国归顺。

鲁国和梁国百姓以纺织为业者多，为使两国归顺，管子让齐桓公带头穿两国制造的衣服，齐国上下仿而效之，故意使齐国在棉纺上依赖两国，并以重金收买之。鲁、梁两国国君就让百姓大量织布，一年之后，管子下令不准再进口鲁、梁两国的布，并封闭关卡，不与两国通往来。又过了几个月，鲁、梁两国无法继续织布，但粮食在短期内又生产不出来，粮食价格比齐国高 100 倍，只好请求归顺齐国。

莱、莒两国砍柴与农业并举，管子又使齐国提高柴价，诱使两国放弃农业，但未过多久，管子又让齐国停止收购柴禾，两国的粮价也上升，最后也不得不归顺齐。此后，齐国还如法炮制，先后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和衡山国的兵器，诱使其放弃农业，然后又停止收购，并封闭关卡，造成三国的粮食紧张，使三国不得不归顺于齐。

这些是管子把轻重之术用于地缘政治的成功范例。

又如，在齐桓公当政初期，管子为了在各国中间树立齐国的威信，做了许多事情。宋国伐小国杞国，齐国就帮助它修城，还送给兵车百辆，甲士千人；狄国侵邢国，邢国国君逃至齐国，齐国又如此办理，再一年，狄国又攻卫，齐国还是给以封赐。同时，齐国对其他小国也给与了许多优惠，如，以大马换小国的狗，以豹皮换较次的鹿皮。管子还让齐桓公根据各国和各大臣的情况，有选择的派使节到各国去，终于使各国对齐国产生了信任。一开始，齐国的“霸权”地位是

靠行仁义树立起来的。

当狄国再次侵略小国时，齐国出头，号召各国派兵制止，各国都响应，出兵打败了狄军。后来当齐国受到吴国的进攻时，各国诸侯自动出兵援助齐，以至于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到，吴国的军队就退走了。

管子死后发生的事情也反过来说明管子的智谋。管子死后，齐桓公不听管子病中对他的忠告，用人不当，又内不量国力，外不计邦交，而征伐四邻，使国力大衰，齐桓公死后不久，称霸 40 多年的齐国就为宋襄公打败。从此再也没有重现往日的光辉。一个大国就这样衰落了。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

（一）
《孙子兵法》和孙武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思想

孙武是中国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家，是当时的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为吴王阖闾任为将，后率吴军大破楚国之兵，为吴国打败楚国立了大功。后人根据他的思想整理出《孙子兵法》，成为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经典，也是一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著作。孙子的思想从这方面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论述了地缘和地理对国家政治军事的重要性。

孙子在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216]但用兵打仗不能不熟悉地形和地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篇）[217]只有对地势地理有充分的了解而后用兵，才能得地利，在战斗中取胜。

（2）《孙子兵法》从政治军事立场出发，对地缘和地理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总结出了地理和地势的基本的特点。

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计篇)[218]即所谓天,就是指四季交替,昼夜的更替和冷暖的变化,而所谓地,则是指路程远近,地势平坦或险阻,地形开阔或狭窄,是否有利于进攻或退守。兵家有五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而这五法是建立在对地势的了解基础上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219]就是说,首先要根据战地地形的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决定,其次,根据这一决定,再来估算战场的大小,再估计敌我双方可能投入的兵力,进行总体的衡量,最后,才能估计出作战的胜负。

故了解地形是行军作战的第一件事。“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因此应先进占战地,可争取到主动,后到达的就疲劳被动。“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战场越大越是这样。(虚实篇)[220]所以“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篇)[221],必定会打败仗。

孙子把军事地形分为六种:“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地形篇)[222]又把地势分为九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九地篇)[223]

(3)在深入研究地形地势的基础上,精辟地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之下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孙子兵法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提出了超越军事和战争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思想:“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224]孙子认为,战胜敌人有四种方法,最好的方法,不是使用武力,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是以谋略取胜,不经过战争就取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用孤立敌人等使其屈服;第三是使用武力威胁,压服敌人,最后也是最下策的方法才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来战胜敌人。而在这四个方法的选择过程中,哪一个都要运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谋略。

孙子认为,仅知道地形和地势有什么特点是不够的,必须善于根据这些特点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提出,“圮地无舍”,即在多山林、险阻和沼泽之地不要驻军,“衢地合交”,即在四通八达之地,要多与友邻结交;“绝地无留”,即在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不要久留;“围地则谋”,即在四面为险阻之地,一旦被围难于逃脱之地要多用智谋;“死地则战”即在前无出路,后无退路,面临生死存亡之地,只有死战才能求生。(九变篇)[225]又说,“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在隘形之地,“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在险形之地,“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在远形之地,“战而不利”,应避之。(地形篇)[226]

在《九地篇》中,孙子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指出:在“散地则无战”(在本土做战会对士兵情绪有影响),“轻地则无止”,即在敌人境内作战不要停留,“争地则无攻”,不要在敌人占领必

争之地后再发起进攻；“交地则无绝”，即在敌我来往较多的地区，要保持军队的联系；“重地则掠”，在敌境重地可从敌人手中夺取粮草。(九地篇)[227]又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就是说，地形地势变化也会影响人的士气和情绪，必须对此给予重视。孙子指出，“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九地篇)[228]总之要根据不同地形和地势下士兵的心理采取不同的办法。

最后，孙子还提出要知敌的思想。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229]又提出了向敌方派间谍以知敌的主张，认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用间篇)。[230]

(二)

吴起与四面皆敌的魏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吴起是卫国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440 年，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先事曾子学儒家经典，这使其后来形成的法家和兵家思想带有儒学的色彩。他先在鲁国为将，后为鲁穆公所斥，于公元前 410 年前往魏国，先后担任大将和西河太守等职，辅佐过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君主长达 27 年之久，曾统兵与周边大国大战 76 次，其中全胜 64 次，并在魏国内推行改革，为魏国向四面发展并拓土千里，使魏国成为战国时期首先崛起的强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虽然后来为魏国佞臣所迫而离开了魏国，到楚国为相，并也使楚强大，但他的活动却是以魏国为主。后来传世的《吴子兵法》，也主要是以他和魏文侯和魏武侯的对话形式来表述的，主要反映了魏国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对策。

吴子在其中表现的思想是：

(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魏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最为不好，它四周前后左右都是魏国的敌对国，魏与当时的六国都有过战事。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魏国必须加强战备，而为此又首先要治理好国内。吴起对魏文侯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子·见魏文侯》）[231]就是说，光讲仁义不修武德也会亡国，面对敌人不敢进战，这不是义；等将士死伤再行怜悯，也不是仁。因此必须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争准备。

(2)关于慎战、备战、重战和少战的思想。吴子认为，在兵争纷起之时，必须兴义兵，起义战，以义兵义战反对不义之战。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在战争面前，君主应教育民众不惧战也不好战，而是以礼义治军，并做好作战的思想准备。"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图国第一》）[232]就是说，用礼义来教育民众治理军队，使之明白道理，则在势力强大时可以战，在势力小时也可以坚守。吴子认为，身处四面受敌之境的魏国，"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即对战争应有所戒备，有所戒，就可远离祸患。（《料敌第二》）[233]

但任何战争都是对国家有一定损害的，因此即使在势力强大时，

也要少战和慎战。吴子提出："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第一》）[234]

（3）正确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大势，面对众敌不惧不怯，利用矛盾，攻其弱点，各个击破。

魏国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是："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之兵四守，势甚不便"，魏武侯对此十分忧虑。吴子就根据地缘政治的大态势，精确地分析了六国的特点，并提出了正确的制敌之策。吴子说，齐国人性情刚强，国家富饶，君臣骄横奢侈，政令松弛，军队规模庞大，阵势却并不坚固，可以分兵击之；秦国人性情强悍，地形险要，政令严格，赏罚必信，士卒勇敢，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魏国可以各个击破；楚国人性情懦弱，国土广阔，政令烦苛，民众疲惫，阵势整齐而不能持久，魏国可以与之进行游击战，消耗它，拖垮它；燕国人性情忠厚老实，好勇尚义不会使诈，军队阵形善于守而不善于机动作战，魏国可对其集中兵力，围而歼之；韩赵两国地处中原地区，人们的性情温顺平和，政治稳定，民众对战争已疲惫，士卒无决死拼斗的意志，不善实战，因此魏国军队可以对其强攻强击，予以打击。（《料敌第二》）[235]

（4）对敌作战要以对敌国的地缘政治情况进行分析为前提。吴子认为："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料敌第二》）[236]也就是说，对地大人众，军力强，又有邻国帮助和大国支援的国家要避免与之作战。

（三）
《孙膑兵法》与孙膑的地缘战略思想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据称为孙武的后代，原名不详，因其曾受

膑刑(去掉膝盖骨),故世人称之为孙膑。孙膑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6—301年,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指挥家。孙膑早年曾与庞涓同为著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先生之学生。庞涓嫉妒孙膑之才,将其骗到魏国加以陷害。孙膑后到齐国,以其军事才能被拜为军师,并在齐对魏国的两次战争中发挥了其杰出的军事天才。他指挥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后又在马陵之战中歼灭了魏军主力,使庞涓兵败自杀,齐国因此威望大增,孙膑也以齐孙子名扬后世。在记载他的兵法的《孙膑兵法》中,不仅表现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而且也有精彩的地缘政治的论述。

(1)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慎战、备战和少战"的思想,反对对邻国进行战争,战争只在不得已时才进行

孙膑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237]就是说,不论胜或败,都不能经常进行战争。因为常兴兵者必亡,好战者最后也会受辱。但战争事关国家存亡,又不得不察,否则,被人战败,就会削地危国。所以对战争必须有所了解,有所准备。"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见威王》)[238]只要有所准备,就会减少战争的危害。对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应切记,"主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威王问》)[239]一个国家的富强在"休民",而"其伤在于数战"(《篡卒》),[240]只能"不得已而后战"(《月战》)[241]。

(2)地理和地势对战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孙膑认为,对战争来说,天时、地利和人和都是十分重要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说:"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月战》)[242]他

对天时对战争的影响十分重视；又说，“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八阵》）[243]在《地葆》篇中，孙膑尤其对地形和地势对军事活动的影响给予了精辟的分析：“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五者皆不胜。南阵之山，生山也；东阵之山，死山也。东注之水，生水也；北注之水，死水。不留死水也。五地之胜，曰：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地葆》）[244]“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245]

(3)知敌为制敌之必要条件

孙膑把“知道”列为“恒胜五法”中的一个，（《篡卒》）[246]认为不了解敌人就无法战胜之。他指出，“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八阵》）[247]。把“知道”作为安邦定国之重要因素。

(四)
其他兵书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1)《司马法》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司马法》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思想之总结，相传齐景公时的军事家司马穰苴的思想是其主要来源之一，在战国中期被后人整理成书，后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我国著名兵书之一。

在这本书中，已经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它认为战争可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两类，正义战争的目的在于“讨不义”和“诛有罪”。“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248]就是说，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进行战争，而在于进行什么样的战争和为什么进行战争。既然战争是不可免的，因此必须对战争有正确的认识：“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第一》）[249]一个国家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以“兴甲兵以讨不义”和“诛有罪”。

因为战争多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因此《司马法》还较多的论述了一个大国对处理与其他邻国关系的一些基本思想,认为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秩序负有主要责任的大国,应巡视诸侯各国,如发现有违反共同道义的,就应兴义兵进行讨伐。但一旦进入这个被讨伐的国家,那么“多国部队”的官兵就应该是侠义之师,不骚扰当地的百姓,还要为这个国家整顿秩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法》中提出了大国和“霸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六条原则:即“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共利以合诸侯,以小事大以和诸侯。”(《仁本第一》)[250]就是说,大国可以通过封土裂疆,政策法令,礼义诚信,借助财富,重用谋士和依靠军事威慑去影响各国,更重要的是要与各国同舟共济,同甘苦共患难,使小国尊重大国,大国亲近小国,各国能和平相处。

《司马法》还为各国制定了应共同遵守的9条原则:“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仁本第一》)[251]即:恃强欺弱的应加以限制和削弱;残害民众的,起兵讨伐之;对外侵略的,共同声讨之;国内治理不好的应贬之;依险固守不从众命的出兵击之;残杀至亲的,坚决惩罚之;放逐国君的就给予严厉处置;违抗命令凌侮王政的,应孤立制裁他;内外淫乱,行同禽兽的,就应消灭之。

(2)《尉缭子》书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尉缭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著名兵书,为中国《武经七书》之一。尉缭子相传是生活在公元前369—319魏惠王时期的一位名将,也有说是战国中期秦始皇的一位大将。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列强争霸之时必须立足国内,内治才能外强。《尉缭子》



指出:"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制谈第三》)[252]

第二,不可争战,但须备战。《尉缭子》认为,战争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不好的,故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武议第八》[253]。但是战争性质有所不同,一国须以正义之战对不义战争,所以作者又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武议第八》)[254],特别是在战事纷起之时,不能不谈兵备,"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令上第二十三》)[255]。

尤其要提到的是,《尉缭子》本是一本谈兵作战之书,但它却超越了战争本身,把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作为其向往的目标。书中说:"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原官第十》)[256]并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天下无私,内外皆治。作者说:"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如天下无私,"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治本第十一》)[257]。这虽然含有空想之意,但也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地缘思想。

·第五节·
老子、墨子等人的地缘政治思想

(一)
老子的和平地缘政治思想

老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孔子的生卒年月约为公元前551—479年)。在《老子》一书中,老子表达了他的和平地缘思想。老子从他的无为哲学出发,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以

"道"治天下。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战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第三十章》)[258]老子认为,得道之主,不应武力逞强于天下,用兵会引起消极后果,大战之后,必有荒年,所以必须适可而止。又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259]就是说,兵器和战争都是不吉祥的东西,只有迫不得已才使用它,更不能以打仗杀人为乐事,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对待它。

老子还对大国和小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主张大国小国各安其位,和平相处。他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260]老子认为,大国对小国应谦下,以取得小国信任,小国对大国应尊重,也可为大国所信任。但大国应特别对小国尊重。

老子还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261]这段话虽然过于消极,使各国相互封闭,但却也表达了老子向往和平的愿望。

后来的道家也继承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庄子》曰:"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人间世·第四》)[262]他认为与邻近的国家交往一定要用诚信,使相互之间和顺亲近,而与远方国家交往则必定要用语言来表示相互间的忠诚,不论远近,都要与各国和平相处。又说,老子表述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是真正的

太平盛世，而各国交往过多，使人想入非非，“内弃其亲而外弃其主子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胠箧·第十》）[263]认为这会导致天下大乱。

（二）
墨子的非攻和平与兼爱互利思想

墨子是战国初年鲁国人（约公元前468—376年），他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主要是非攻和平和兼爱互利。

（1）非攻和平思想

墨子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因而倡导“非攻”学说。他指出，战争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由此产生的饥饿又使广大民众无以为生；战争对人民财产造成破坏，尤其是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比盗贼行为不知坏多少倍，大军所到之处，“侵掠如火，掠乡分众，掠于原野”；战争还造成生灵涂炭，死伤无数，当大国进攻小国之时，“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天志下》）[264]。征战时，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仅在路上死的就不计其数，在战争中，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大兵如市，人死如林。墨子特别反对大国对小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而提出用正义的防御战争来制止不义战争。墨子主张，“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265]。“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266]如对战争无所准备，“则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七患》）[267]。又主张各国联合行动，以阻止大国侵小国，并共同解决各国之间的问题。“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服之可立而待也。”“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

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则可“易攻伐以治我国”（《非攻下》）[268]。

墨子曾为反对不义之战而进行游说，并成功地阻止了楚国对弱小的宋国的进攻。公元前440年，墨子听说楚国将攻打宋国，就亲自到楚国进行劝说，并同时派大弟子率人去帮助宋国进行防御。到了楚国，墨子运用自己的智谋，终于说服了楚王和他的重要谋臣公输般，制止了一场战争。墨子还曾对齐国的攻伐兼并进行抨击，并对齐国国君说明，大国攻小国，不仅对小国不利，对大国也会有危害。

(2)兼爱互利思想

为了使各国摆脱“争于战国”的局面，墨子提出兼相爱和交相利的思想，认为人与人应实现“爱无差等”，即不分民族和血缘以及身分，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助，为别人就像为自己。墨子还把兼爱解释为仁与义。墨子说：“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此则天下之害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兼爱中》）[269]只知自爱，不知爱他，使得天下战事纷起，所以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若“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则“诸侯相爱不野战”（《兼爱中》）[270]。在墨子看来，只要各国都像对自己那样对别国，彼此都互相帮助，就一定能和平共处，对各自都有利。这在当时虽有乌托邦色彩，但却表达了墨子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地缘政治的理想。

·第六节·
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纵横家的地缘战略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事纷繁，地缘政治力量变化莫测，因此集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于一身的纵横家为各国统治者所重视，并由此成为战国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为各国统治者出谋划策，对战国时的地缘政治形势影响极大，凡是能正确运用他们的

地缘战略思想的，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就有所改善或大大提高，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秦国在战国初期势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但它借助于地缘战略的正确运用，由战国初三强之一变为最强国，而楚国、魏国、齐国等大国和强国却在地缘战略方面犯有重大失误，不能坚定地执行合纵制秦的战略，最后归于失败，使秦得以统一天下，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政治外交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大师。由于后来的统治者多对其进行贬低，因此他们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未能为人们所认识。但实际上，就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而言，他们在整个世界思想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在他们身后，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再有他们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不再有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人类地缘政治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一）
鬼谷子的纵横术和地缘战略思想

鬼谷子是战国时思想家，也是中国纵横家的开山祖师，他的学说奠定了后来地缘战略的基础。他的谋略思想主要包括：

捭阖术。鬼谷子认为，分开，开放为捭，而关闭，封闭为阖，一捭一阖，即纵横驰骋，大开大合，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是世间变化的基础。他说：“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自古之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乃可捭，乃可阖；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既欲捭之，贵周；既欲阖之，贵密。……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故捭者，或捭而示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

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捭阖之道，……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捭阖第一》）[271]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可以把握的，要通过事物的阴阳、刚柔和开放与封闭来观察。开放或封闭，捭阖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体现，事物的变化都是通过一开一闭来实现的，把握了这一规律，就可以用它来从事任何事情。

抵巇术。鬼谷子曰：“物有自然，巇者，罅(xia)也；罅者，峒也；涧者，成大隙也。”“可抵而塞，可抵而郤，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又说，“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以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抵巇第四》）[272]在这里，抵，就是指弥补不足，堵塞漏洞，就是说，当事物出现裂隙即发生变化之时，可以通过抵术使其闭塞，可以通过抵使其停止变化，或使其变小，或使其消失；当人们看到出现变化之时，就应制定正确的办法；当世道可以治理时，要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让它继续下去，如果世道已不可补时，就用抵使之彻底破坏。总之，可用各种方法来抵，对五帝圣明的政治只能抵而塞之，而当残暴统治时，就是要用抵将之打碎，夺取政权。在当今诸侯混战之时，只有善于斗争才是强者。而当世道不需要抵时，则应等待时机，当世道可抵之时，就应制定相应的谋略。

忤合术。鬼谷子曰：“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时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

之以忤合之术”，“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忤合第六》）[273]。就是说，必须善于根据世上情况的变化而选择自己的利益所在，权衡左右，做出取舍，决定应当离开谁，反对谁，与谁合作，团结谁。在这里，忤，就是背反，反叛，逆反，抵触，分离；合，就是附合，合作，团结，迎合。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要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取舍。做决定时的前提是，对自己的力量要有正确估计，对处于变化中的各方的力量和长短也要有正确分析。尤其应当提出的是，鬼谷子在这里已经提出了根据情况可以合纵，也可以连横的思想。这是后来的合纵连横术的先声。

（二）
连横合纵的地缘战略

在战国时期运用地缘要素来制定战略是十分流行的。如商鞅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山之西，都安邑，与秦并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吾王贤圣，国事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而伐魏，魏不支秦，以东徙，然后据秦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274]

鬼谷子的两个弟子一为张仪，一为苏秦，两人分别成为连横战略和合纵战略的重要人物。

当时的形势是，七国争雄，西有秦，东有齐，中间的五国从南到北为楚、韩、魏、赵、燕，呈纵线排列，因而中间五国再加上齐为纵，而秦与任何一国的联合都约略呈横状。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形状。由于当时各国的阵线并不明朗，所以各国在谁联合谁上也并不总是固定的，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形势表明，不论是谁，都必须要有自己

的地缘战略，要有自己的盟友，都要设法分化和瓦解敌方的阵线。因此，纵横家们奔走于各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穿梭外交，向统治者们力陈自己的地缘方略，一国不行，就去另一国游说，因此同一个纵横家向不同的国家推销的是相同的或不同的地缘战略，但大致是连横说或合纵说。

(1)张仪与连横说

张仪(?—前 310)是战国时纵横家，魏国人。他在公元前 329 年游说入秦，公元前 328 年，被秦惠王任为相，首创连横战略，为秦国后来兼并各国立下大功。后秦国统一时，李斯曾在《谏逐客书》中评价说："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至今。"[275]张仪有很高的智谋，在运用地缘战略方面尤其得心应手，后司马迁作《史记》时，专为张仪写了列传，对张仪杰出的智谋表示肯定。

张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思想及其实践，主要表现在他根据秦国的地理特点和各国的实力，为秦制定了破纵连横的战略，就是在其他各国已有联合抗秦之势时，采取破坏其联合，伺机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先是说服燕王与其反秦盟友赵国拉开距离，拆散了最初的反秦联盟，后又把魏与韩作为秦国首攻的对象，离间两国的关系，先使魏国与秦友好，为此说秦王将秦所占魏之曲沃、占焦二地归还于魏，后又让魏与秦结盟，并把魏之十五城池献与秦，以示对秦的友好。后来魏作为秦的近邻在对外战略上举棋不定，为秦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在秦吞并巴蜀势力大增之后，就对秦的近邻魏和赵发起了进攻，先后迫使两国屈从于秦，处于秦的控制之下。后来当另外的两大强国齐与楚结盟反秦时，张仪又为秦制定了拆散齐楚合纵的战略，并把攻击的目标定为距秦更近的楚国，而把齐国放在后边去解决。在对楚国的外交和军事斗争中，张仪又表现了他的远谋大略和地缘政治的远见。他先见楚王，把秦的土地割让给楚，使楚主动放弃

了与齐国的同盟，与秦结为兄弟之国，而在楚与齐无故绝盟的过程中，楚齐关系交恶，使齐王倒向秦一边，而秦国又拒绝兑现许诺给楚的“600”里地，只给“6”里，使楚王受辱，向秦发兵进攻，正中秦的计谋，结果秦大败楚。在这一过程中，张仪的思想表现了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深刻的理解。下面的一段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将知以武。且夫为纵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纵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战国策·说楚怀王三》)[276]

当时魏国是一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中，张仪也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对魏襄王陈说过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劝其投靠强大的秦国。在其说辞中也充满了地缘政治的思想：

“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劫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魏不北，魏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求无危不可得也！秦挟韩而攻魏，韩怯

于秦,不敢不听。秦韩为一国,魏之亡可立而须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战国策·说魏襄王·卷二十二》)[277]

(2)苏秦与合纵说

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地缘战略,最早起源于魏国,在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中魏败于齐后,实力已不如齐,为免遭齐秦合击,魏惠王与齐国国君在徐州相王,即相互承认对方为王。魏惠王的相国惠施所制定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方针得以实现。之后,在秦国任大良造的公孙衍为张仪所排挤,又到魏国为将,继承了合纵说并加以发展,使合纵战略趋于形成。但在合纵战略的实现过程中,最得力的还是苏秦。苏秦(?—前284年)曾先入秦事秦,不为重用,后到燕,为燕昭王重用,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大间谍,他奉命入齐反间,在齐国任为相,利用相国之职为燕国传递了不少情报,为燕国谋了不少利益。为燕国利益着想,苏秦也采用了合纵战略,到处游说,发动韩、赵、魏、齐、燕等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放弃了称帝的野心,并被迫归还所占的魏和赵的部分土地。后苏秦的间谍行为暴露,被车裂而死,但苏秦的合纵战略却为后人所重视。

苏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是,韩赵魏燕等国是当时的小国,不断遭受各强国的进攻和掠夺,小国单独与之对抗没有力量,只有联合起来与大国抗争。而当时的东边大国齐国也是这些小国的潜在威胁,因此也应对齐国有所防备,尤其要防止齐国与秦国联合起来。为了阻止秦与齐结盟,就先把齐国拉进五国联盟之中,使之与秦国交恶,然后再联合其他国家来反对齐国。苏秦的地缘战略也有一定的成效:它阻止了齐与秦的结盟,为燕国争得了时间,使燕国大将乐毅后来能有机会大举攻齐,并大破齐兵,使齐国元气大伤。但由此也造成了秦国一国坐大。问题的关键在于,韩赵魏燕四国不能长久合作,在联合战线中,各有各的主意和图谋。

尽管苏秦的合纵战略没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但在他对当时的地

缘政治的分析中,尤其是在对燕国和赵国、齐国在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利益之所在,应采取的战略的分析,在今天读来还是相当精彩的。下面几段话可以大致反映出他的智谋:

他从赵国写给燕王的信中说,对燕国来说,有三种前景,即"事之上,齐赵大恶;中,五和,不外燕;下,赵循合齐,秦以谋燕"(《纵横家全书·自赵献书燕王》)[278]。他为燕王谋划说,我的策略就是联合韩国梁国谋取秦国,防范赵国。又说,使赵齐两国交恶的办法也有很多,"以恶可也,以辱可也,以与赵为大仇可也"(《纵横家全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279]。处处为燕国着想。

在《说齐闵王》中,苏秦的地缘政治思想表现得很充分。他指出,第一,在多国发生冲突的形势下,一国,即使是一个像齐国那样的大国,也不能处于冲突的中心。"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过去齐与韩魏共伐秦,分地不如韩魏多,与秦作战也不太猛,但秦却独归咎于齐;又天下遍用兵矣,十国之间彼此为敌,为何各国偏偏能一致对齐不满?皆因齐"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第二,在邻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应保持足够的冷静。"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必须"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从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亲",就是说,要明察形势的变化,不要急于结盟,不要相互用人质抵押,不能急躁。最重要的是要认清本国的利益所在,因为"形同忧而兵趋利也"。各方都是为了争夺利益,应"约于同形则利长",要与形势相同的国家结盟,利益就会长远。第三,在冲突中不要先打第一枪,不能先发动战争。苏秦认为,过去吴王夫差之灭亡,在于"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

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即使那些善战者,纵然这个国家的土地得以保存,也不能使这个国家长治久安。“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用兵穷者亡”[280]。

最能体现苏秦的地缘战略思想的,是他为赵王说当时的地缘大势。苏秦曾精辟地分析说:“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传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韩、魏臣于秦,秦无韩,魏之隔,祸必中于赵矣。”因此,苏秦力主合六国之力,抗秦之攻,必使秦国不敢小看各国。“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出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战国策·从燕之赵》卷十九)[281]

(三)
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

范睢(?—前255年),战国时魏国人,先事魏王,后为人陷害,入秦,为秦昭王任为客卿,后又为相,曾为秦国的强大作出过贡献。他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就是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

略。在张仪的连横战略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远交近攻思想的内容,但范睢进一步总结了以前秦国与各国争夺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地缘战略,大大推动了秦国外交战略的发展,使秦国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他对秦昭王说:

“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范睢认为,秦的战略失误在于“越近攻远”,故常劳而无功。“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有能害。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一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说秦昭王(四)》卷五)[282]范睢的战略思想是:第一,先就近控制秦之较弱的邻国魏和韩,以壮大秦的声势;第二,然后,秦再以韩、魏为依托,向南击楚,向北击赵,这样就可控制当时的两大强国齐—秦之间的广大地区;第三,秦把对齐这一最强大和相距最远的国家作为征服的目标。而对齐的征服又可反过来巩固秦对魏、韩和楚、赵的控制。达到统一全中国的最后目标。远交近攻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可说是秦国在战国时期地缘战略的大转折。此后,秦国的兼并进程大大加快了。

(四)
韩非子对连横合纵的批评

韩非子(约前 280—前 233 年)是战国时韩国人,也是战国时期

著名的法家。他才学超人，但始终未为韩、秦国的统治者所重用。后为其同学秦国相国李斯害陷死于狱中。韩非子在当时对纵横家的连横合纵说持批评立场，主张一个国家把重点放在强国上，认为那些纵横家们大多是为个人私利来宣扬连横说或合纵说的，他在《五蠹》篇中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韩非子说：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从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职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公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283]

韩非子在这里指出，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中的哪一派，就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横，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

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侍奉大国实行连横,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一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一天下,指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大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所以国家安定强大,谋事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因此,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韩非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邻敌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第十五》)[284]就是说,在地缘政治的斗争中,一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本国的实力基础上,否则,即使外交再好,也难逃灭亡的命运。

第四章

秦——唐时期的地缘政治大势析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秦朝立到唐朝灭,在这 1129 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地缘政治明显呈现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势力强大时,由于地缘政治大失误,导致一个强大的王朝迅速灭亡。如秦朝和隋朝都是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朝代,但这两朝维持的时期都不长,很快为兴起的新王朝所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连年对外战争迅速激化了封建王朝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同时又由于对外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力量,使其对内统治较空虚,导致无力镇压内部的反对者。第二种趋势是,在新朝建立之初,在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藩属国的关系上较和缓,等到力量强大时,再对付周围的敌人。汉唐时的地缘政治有较多的共同处。它们对其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对手的战略和策略也较相同,都实行先和亲,后用兵的策略。在其力量强大时,都先后对北部的强大的敌人给予了有力的打击,对其边境的安宁,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其统治得以长久。这也反过来说明,地缘政治对维持政局的稳定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

·第一节·
秦汉两朝的地缘政治

(一)
秦朝的地缘扩张与秦之勃亡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统一的大秦帝国。秦在战国时期的斗争中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与秦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正确有很大的联系。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六国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合纵抗秦的地缘政治战略。“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人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285]

在统一中国后，秦朝地缘政治的重点也随之由“内地缘”转向“次外地缘”和“外地缘”。

当时的形势是，在秦朝周边地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稳定的成形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方面，秦朝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统一六国后，把六国的土地都完全并入了秦的版图之内，并且向南向北都有了较大的扩展。但当时秦帝国周围的少数民族仍对秦朝不时进行骚扰。它们对秦王朝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并不了解，也不知道秦朝是否已成为它们的威胁。尤其是西边的羌族，活动在今天中国的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部族众多，力量也较强，特别是北方的匈奴，还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北方的燕、赵和秦的边患，为阻止匈奴的侵扰，三国都沿边缘修筑了长城。因此，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就把北方的匈奴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秦朝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按说，秦统一中国后，势力大增，强盛一时，何以仅存 10 多年就瓦解了？究其原因，除秦始皇突然死亡，苛政太猛，秦二世昏庸，赵高与李斯争权等偶然的个人因素和内部因素外，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是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秦朝失误在于，在连年征战之后，秦朝不顾天下百姓的疾苦，又发大兵进行地缘大扩张，对外进行侵略，使刚创立的秦帝国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又陷入了灾难的深渊，秦帝国也因此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而崩溃。秦朝对外

扩张引发了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动摇了秦朝的国本，纵使秦朝有天下无敌的军队也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正如汉时主父偃所说："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垂，琅牙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秦也。"[286]

秦朝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有三大失误：

第一，发30万大军击匈奴。公元前215年时，秦始皇谋臣之一卢生在其所奏《录图书》中说："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287]。秦统一不到10年，秦始皇就在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大兵北击匈奴，并扩地千里。而当时灭亡的六国贵族还在活动，在寻找机会，秦军大兵在外，不利于巩固新生的统一大帝国。同时，秦始皇又让大公子扶苏去监军，距秦朝政治中心太远，因此，当秦始皇卒死在外巡途中时，赵高和李斯等得以篡改秦始皇的遗诏，使年幼的秦二世为野心勃勃的赵高所操纵，而较有威信的扶苏和蒙恬皆受死。如扶苏即位，有蒙恬和李斯等辅佐，则秦帝国还可延续。这是秦朝最重大的失误。

第二，为防匈奴发数十万人修筑长城。"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威振匈奴"[288]。实际上，当时匈奴对秦帝国的威胁并不严重，而秦朝采取的这一防御政策却对秦朝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压力，使广大的老百姓生活于沉重的劳役之下，民不聊生，只好揭竿而起，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第三，对南越进行征伐。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北线事未了时，又发兵数万对原楚国以南地区进行征伐，并设三郡，徙50万民众于这一地区，公元前210年，又派大将赵佗发大兵攻今之越南地区，

为安阳王所败，后置大军于此，准备再侵。在两条地缘线上同时作战，更进一步削弱了秦朝国内的兵力。

在短短的10多年中，秦帝国同时展开三个重大的活动，而每一件事都是需要全力以赴的。这正好证明了战国时代许多思想家所一再指出的真理：好战者必亡，穷兵者必灭。在秦始皇发兵之初，李斯曾上书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中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但秦始皇不听。(《纵横家全书·主父偃·谏伐匈奴书》)[289]

后来汉朝的许多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严安（汉武帝谋士）指出：秦"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以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故使天下大乱。而在统一之初，秦王"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从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严安认为，"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纵横家全书·严安·谏汉武帝书》)[290]

（二）
汉朝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经略

(1)汉朝的地缘扩张

在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经过几年的战争，取得了政权，再次统一了全国。在最初的50—60年中，汉朝的主要政治任务是要巩固

政权。而当时政权的主要威胁在于汉初分封的诸王不断谋反,而且多为内外勾结,对汉王朝的威胁很大。从公元前201年即汉高祖刘邦刚刚坐定天下的第二年,韩王信就勾结匈奴反汉,刘邦不得不亲自发兵反击;公元前197年,代相陈希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叛汉入匈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结闽越、匈奴谋反;最严重的是公元前154年,吴王、楚王、胶西王、胶东王等七王,南结闽越,北连匈奴,起兵反,史称七王之乱,对汉朝政权形成重大威胁。在处理与各诸侯分封的关系时,刘邦也运用了地缘政治的计谋。如刘邦曾采纳谋臣田肯之计,不将地势险要的秦地和山东分封给诸王。田肯对刘邦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291]在这些叛乱一一被镇压之后,汉政权才得以真正巩固。

在对外方面,汉初由于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对外用兵较为谨慎,能不用兵就不用兵。如当时的南越王赵佗反叛汉朝,起兵攻占了汉朝所属之桂林等地,刘邦并不马上出兵攻灭之,而是派陆贾前往南越,劝说赵佗息兵。陆贾对赵佗晓以地缘政治的道理,劝说道:汉朝"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而王(指赵佗)众不过数十万,譬若汉一郡耳,何乃比于汉!"后汉与赵佗达成协议,赵佗可称王,但须向汉称臣。双方皆满意。[292]

在此基础上,汉王朝继秦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地缘扩张。这一扩张期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实力比秦朝时有了大发展,如人口从秦时的约3000多万增至大约4000万,至公元5年时增至5959万人。汉武帝因此奉行地缘扩张政策,发动了3个大规模的对外征战行动。一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征服了南越,并在秦朝时派往越南的大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的基础上,设立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由汉王朝直接

管辖。后来南越地区的名佳将索诗为汉交趾太守所杀，由此引发了其妻征侧和妻妹征贰领导的反汉的“二征起义”，在汉兵镇压之后，汉在越的统治有所改变，对越人习俗较为尊重。第二是在汉武帝时期进行了对朝鲜半岛的战争。西汉初年，在燕王卢绾叛汉时，有燕人卫满率千人进入朝鲜，后在朝自立为王，都王平壤，史称卫满朝鲜，后汉朝约为汉之外臣，使其“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但在公元前100年时，汉武帝命卫满孙右渠入朝，但右渠拒绝，汉武帝遂发兵攻之，后卫氏集团内乱，遂为汉灭。汉因此在朝北部设置真番、临屯、乐浪和玄兔四郡。

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征战是对西域进行的战争。公元前127—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大兵西伐，不仅恢复了秦时对河套地区的统治，而且汉军一直打到中亚地区，在此设立河西都护府，下辖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

经过这几次大的地缘扩张，中国的版图是大大扩展了，其权力范围比秦时几乎要大出一倍。

(2)汉王朝的北—西北地缘大患

不能把汉时的地缘形势仅仅描述为汉朝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和征伐。实际上，周边的非汉民族和部落对汉朝的侵扰也是极为频繁的。对汉的主要威胁西部是羌族，北部在西汉时是匈奴，东汉时是匈奴和鲜卑。

①匈奴对汉朝的侵扰

匈奴是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主要游牧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北部一些国家的威胁。进入秦汉之交，匈奴冒顿单于统一了各部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它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南灭楼烦、白羊等，其统治地域西起葱岭，东至辽河，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对西域各国也有控制权。其势力范围几乎与秦汉之初相当。在秦汉兵纷马乱之际，匈奴趁秦汉王朝忙于内争，无力它顾，不断向中原地区进占，特别是在汉初，匈奴还重新占据了河套地

区。[293]

进入汉朝之后，虽然汉王朝对它采取绥靖政策，但它还是不断骚扰汉朝。下面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一些重大的匈奴侵扰事件：

公元前 201 年，犯太原；

前 182、181 年，匈奴两犯狄道，攻阿阳，掳走 2000 汉民；

前 177 年，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掳上郡；

前 169 年，匈奴掠狄道；

前 162 年，匈奴连年侵扰，杀略人畜，云中、辽东最甚；

前 148、144、142 年，匈奴侵燕地，攻雁门，入上郡取苑马，杀死 2000 人；

前 129、128—120 年匈奴多次犯上谷、辽西、渔阳、雁门等地，其中仅前 128 年入塞内就杀 4000 余人；

前 126 年犯代郡杀略千余人；前 125 年在上郡，定襄杀数千人；

前 102 年，入云中、酒泉、张掖等地，杀数千人；

直到前 56 年，在汉军的打击下，匈奴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归附于汉，势力大减；到前 48 年，匈奴再次分为南北二部，其中南匈奴附汉，北匈奴又为东汉和南匈奴击败，西迁远去，而南匈奴又分为五部，并逐渐融入汉文化，成为中国诸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匈奴的威胁才算有所减轻。但实际上，直到汉灭，都一直有匈奴与汉兵作战。

②西羌对汉的侵扰

在匈奴对汉的抢掠日盛一时的时候。西边的羌族也与匈奴勾结进攻汉区。公元前 112 年，西羌结匈奴攻安故，围枹罕，并助匈奴入五原，开始了西羌对汉王朝长期的侵扰。东汉时，西羌趁汉朝内乱，发兵攻西海等；公元 34 年，先零羌掠金城、陇西；公元 35 年又攻临洮；后又有勒姐、吾良、烧当等羌族对汉王朝的攻击。至东汉中期，羌族在各处攻汉，使汉军顾此失彼，颇为狼狈。至公元 118 年汉兵为防羌人耗费军费 240 亿，兵士死者不可胜数。

③鲜卑对汉王朝的侵扰

在匈奴势大衰之时，原居东北的鲜卑势渐强，当北匈奴西迁后，鲜卑取代了它的地位，成为对东汉的一个新的威胁。因此自东汉中期之后，鲜卑与东汉的战事频繁。从公元120年，一直到公元186年，几乎年年都有东汉与鲜卑的战事。

(3)两汉王朝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①和亲地缘，即通过汉朝公主与匈奴首领联姻，保持匈奴与汉王朝的和平共处。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追匈奴至平城，为匈奴兵所围，七日后方解围。刘邦曾一度想发大兵攻之，但为大臣娄敬所谏，并接受了与匈奴和亲的建议。公元前198年，刘邦使人往匈奴和亲，以后的几十年中，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是其基本政策。对匈奴的一再反复，汉也以宽容之道容之。如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反约对汉地进行侵扰，后来左贤王向汉文帝表示悔过，“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汉文帝对此复书表示“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并表示，如果单于能按信中所说，约束部下不再违约，汉与匈奴可再为兄弟。[294]直到汉武帝时，汉王朝在约60年中一直以和亲为主，汉皇帝与匈奴的单于约为兄弟。公元前192、174、166、155、152和135年，汉朝有多位公主嫁与匈奴为妻。此外，汉王朝还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丝织品、粮食和酒等，还允许匈奴与汉人做生意，进行贸易。

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汉还与匈奴实行这一政策。汉之所以实行和亲政策，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汉初的几位皇帝都接受了秦灭亡的教训；第二，汉建立后不久政权还不稳固，忙于对付诸王的叛乱；第三，怕对匈奴用兵费时长久，一耗财用太多，二又担心率兵之将生乱，因此汉初的几位皇帝都较谨慎。每当有皇帝起用兵之意时，便会遭到大臣的谏阻。

主父偃曾谏汉武帝说：“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

集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295]

另一位谋士严安也说："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岁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296]

和亲政策在汉初的几十年中，为汉朝与匈奴的和平相处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政策后为历朝所用，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②远交近攻，经略西北，勇击匈奴。

即使是在和亲时期，虽然汉朝对匈奴采取了和平政策，但匈奴这一游牧民族很难约束，匈奴侵扰边境之事时有发生。汉文帝的重要谋臣晁错在论汉时的地缘政治大势时已经提到了制服匈奴的思想。他说："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应以其长技与"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297]。又说，"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就应树立汉朝之威信，应"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即应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如果匈奴来犯而不能打击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

降服了。[298]在汉武帝时,汉朝兵强马壮,遂下决心要解决匈奴这一北部地缘大患。汉武帝一方面派兵南下伐越,东进攻朝,之后把其重心放在对匈奴的战事上。

汉武帝从过去的地缘战略中汲取了经验，决定先联合西域为匈奴所迫害的各族一起反匈奴。这就是汉王朝的“远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欲与大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欲联络乌孙及其他国家攻匈奴。虽然这两次出使都未达到联合攻匈奴的目的，但却为汉朝后来经略西北铺平了道路,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迅速发展,使汉在远击匈奴时得到各族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遂于公元前127年起,多次出兵攻匈奴。由于匈奴系游牧民族,其后又无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匈奴的进退余地相当大,每当汉大军出击时,匈奴就采取逃跑战略,使汉军对匈奴的作战极为困难，不得不在远离供给线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但往往难以持久。一旦汉军退走,匈奴又卷土重来,双方又重新处在原来的状态。虽然匈奴在汉军的打击下,一再受到严重的挫折,但都不能给与其彻底和毁灭性的打击。有时候本来占优势的汉军还会为居劣势的匈奴所打败。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大规模出击匈奴起,一直到公元90年左右北匈奴主力为东汉大将军窦宪所灭,200多年中战事不断。

在速战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汉王朝也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为了长期与匈奴作战,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行政机构,又发数十万人前往屯田;同时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对亲汉的匈奴重新实行和亲政策,并给与大量的物品。

但连年对匈奴的战事以及后来给南匈奴大量的钱财，也大大削弱了汉王朝的力量。如公元91年时,东汉一年用于西域的军费就为7480万，还要付给南匈奴10090万，以至于司徒袁安反对再给北匈奴劳费以平息与北匈奴的战事。[299]

但总的来说，两汉对匈奴的地缘战略是奏效的，在东汉灭亡之前，匈奴中的顽固反汉的力量已被赶到遥远的地方，不再对汉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后来的各大朝均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所灭的命运相比，汉朝的地缘政策和地缘战略算是最成功的。可以说，汉的灭亡主要在于内部原因，而与北方的地缘威胁没有直接联系。

·第二节·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缘政治

(一)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地缘大势

在东汉末年，统一的中央王朝崩溃，全国陷入了空前的大混乱。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先是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在公元 265 年晋统一后的中国，大体恢复了西汉时的版图，但从公元 304 年起，这一短暂的统一很快瓦解，再次陷入内乱。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先后出现过东晋、刘宋、齐、梁和陈，这些王朝虽然先后都试图恢复汉时的帝国，但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广大的北方却先后为匈奴、羌、氐、鲜卑等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统治，这些政权有公元 304—439 年时的五胡十六国，即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北燕、夏等国；从 386 年至 581 年存在过的北朝的几个政权，即北魏、北齐、东魏、西魏和北周，大体上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建立起来的政权。虽然这些民族后来都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但在当时，相对于汉人来说，他们却是“外人”，是在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外的“夷狄”。在汉时期，这些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汉政权的统治下生活的，但在汉政权开始瓦解时，他们开始起来征服汉人。因为中国的地缘形势是，在汉政权的周边守卫边境的大多是归顺的游牧民族，所以在汉政权

混乱时，他们很容易脱离汉人的控制，并与在外未归化的本民族重新成为一体，共同向汉人所居的较富裕的地区进行劫掠。可以说，正是这些“蛮夷”灭亡了西晋，并征服了中国的广大的北方地区。他们所占的地方甚至比汉人政权所统治的地区面积还要大。而南北朝对峙的结果，是在北方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政权基础上统一了全国。鲜卑族的拓跋部在386年建立北魏，后有东魏和西魏，以及在西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周，北周灭齐，后来汉族和鲜卑混合血统的北周将领杨坚统一了全国。

从政治和军事上说，是北方民族征服了南方的汉族，如果不是因为汉文化比北方民族要高得多，汉民族就会因此而灭亡。魏晋南北朝时发生的事情，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具有典型意义：居于南方的汉人尽管军队和人数以及财力都比北方的非汉族要强大得多，但汉政权的战斗力总是不如北方。除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善骑善战之外，南方的汉政权内部的纷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只是后来重演的历史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汉文化征服政治上的统治者，使统治中国汉地的北方民族很快被融进了中国汉文化的大锅之中，成为中国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北方民族的文化也丰富了汉文化，但总的来说是汉文化征服了北方民族。

所以，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的角度上说，南方的各汉政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是失败的，或者说这些政权根本没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是，中国的西北—北部的地缘问题是靠被敌人的政治军事的征服以及统治者的文化上被统治者的征服而解决的。在这场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较量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汉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从文化上的胜利得到了补偿。而北方民族也没有痛苦地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南进，进入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进入生活更富裕的地区。

(二)
三国鼎立与诸葛亮的地缘战略思想

在这一时期,虽然在外地缘上汉政权是失败的,但在内地缘政治上却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在运用和发挥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传统上,还有很精彩的篇章。

当公元220—222年间形成魏、蜀、吴时,三国的力量可说是大体上旗鼓相当。三国所辖的地区差不多,名义上魏国拥有汉时的西域地区,但实际上这一地区早已脱离汉政权的统治。只不过魏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稍强一些。也就是说,三方都有机会获得统一中国的可能。三国相争的结局,除了看三国在内政上的领导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地缘战略的地缘决策的运用和实施。

在这一方面,蜀国的得失尤其值得总结。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诸葛亮在地缘战略方面表现了其非凡的才智。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地缘政治智谋的运用十分突出。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刘备规划了据巴蜀,与魏、吴成三足鼎立,联吴抗曹的地缘战略。他指出:

“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下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300]

诸葛亮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三点:(1)刘备应避强就弱,不与强曹

和强吴对抗，而到荆、益这一政治对抗相对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谋求政治发展；(2)利用荆州和益州的地缘优势，据险而守，同时内修政理，等待时机，图谋复兴汉室；(3)实行合纵地缘战略，与东吴结成战略联盟；(4)实行近交远攻地缘战略，与西边的诸戎和南边的蛮夷实行和抚政策，将矛头对准曹军。后来的实际表明，诸葛亮的这一地缘战略是基本合乎实际的。因此，可以说，诸葛亮的这一地缘战略是诸葛亮杰出的智慧的结晶，也表明了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缘政治家。

在曹、吴都已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诸葛亮运用地缘政治的智谋，使蜀汉得以顺利发展。公元 208 年荆州牧刘表病死，刘备为刘表之子刘琮所排挤，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借东吴使者鲁肃到荆州悼念之机，与鲁肃一起到柴桑见孙权，与东吴达成了联盟抗曹的共识，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奠定了两国军事同盟的基础。后来两国曾经多次联合行动，使强魏受制，不得不有所顾忌。如公元 234 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南北策应，夹击曹魏。直到蜀国最后快亡国时，吴国都还曾派兵援助。

在据守蜀时，诸葛亮在致力于发展生产时，又运用地缘政治策略巩固蜀的统治。他与马谡制定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安抚南夷的策略，率军征服南部地区，他用计七擒孟获，使其对汉心服口服，安定了蜀南，为诸葛亮北伐的大略扫除了后顾之忧。

但诸葛亮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有重大失误。首先是在蜀国归还荆州上，蜀不按原先两家达成的协议将荆州归还，一再找借口拖延，致使孙权派吕蒙偷取江陵，蜀大将关羽兵败被杀，伤了两家和气，其实不如干脆将荆州交还于吴，既可巩固孙刘联盟，又可将屯驻荆州之主力回收于蜀内，加强蜀军力量；而刘备在关羽被杀之后，不以大局为重，却报私仇，起大兵伐吴，结果大败而返，死于白帝城，使蜀元气大伤。

对诸葛亮最有争议的是他率军五次北伐。一方面，蜀国以一方

之地，小国之民，却能以小伐大，争取主动，使强魏处于被动地位。史书上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重而已，使彼孔明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301]这一评价是比较公允的。但如果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则北伐并不是蜀这样一个小国的最佳的决策。诸葛亮五次出兵，可以说每次都是劳而无功，未能使蜀国有任何实际利益，且连年征战，大大削弱了蜀国本来并不强大的兵力和人财物力，诸葛亮自己也因此“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沾襟”。这加速了蜀国的灭亡。即使要实行这一战略，也应从“联吴抗魏”的战略转变为“联吴攻魏”的战略，不应蜀、吴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自为战，缺少战略上的配合。从军事和战役的角度说，诸葛亮北伐的智谋为后人所称赞，但从地缘军事战略的角度说，却是一大失误。

·第三节·
隋唐地缘政治之得与失

（一）
隋唐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大分裂，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汉时为中国统一的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为各边缘地区的军阀所控制，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崛起了一些强大的游牧民族的政权。它们与后来统一了中国并力图恢复统一的大帝国的隋唐政权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经常进行战争。即

使是在盛唐时期，也未能完全解决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与这些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说来，隋唐时期的地缘关系主要有：

(1)与北部的突厥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地缘关系

自匈奴在汉朝时期逐渐衰落以后，中国的北部曾一度平静，后来是鲜卑族在北部地区称雄。公元4世纪时，原在今鄂尔浑和土拉河一带游牧的柔然族突然崛起，它曾附属于鲜卑拓跋部，后至阴山，5世纪时组成联盟，迁居漠北，创立军事组织，与北魏建立了关系，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一个部族。但到6世纪时，原臣服于柔然的突厥人从其游牧的阿尔泰山一带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其土门首领的领导下，突厥部族于公元552年发兵大破柔然，建立起突厥汗国，成为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在中国北部兴起的又一强悍的游牧民族国家。不久，突厥又于木杆可汗在位时期，在553至572年间不断扩张，使其统治的地区包括了东起辽海，西至今里海，南自沙漠，北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在内的广大地区，强大的柔然和契丹也为其所灭。突厥趁中原各地内战不休，势力大衰之时，向汉人所据地区扩张，迫使北方的北周和北齐向其称臣，每年都向突厥进贡大量的丝绸织物和其他贡品。突厥的他钵可汗还曾对人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北齐、北周)孝顺，何愁没有财物。因此，在隋唐时期，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关系。

在北部的边缘部族中，在唐时还有突骑施和回纥对唐朝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2)与吐蕃的关系

公元7世纪时，在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新的王国——吐蕃国，精明强干的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唐王朝曾把公主嫁给他，使唐与吐蕃和睦相处。但后来的吐蕃王与唐朝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成为唐朝的一大地缘对手，特别是在西北和西部地区，吐蕃攻陷了唐朝的一大片地区，在南北朝时失去在隋朝时收复的西域重又脱离汉政权。

(3)与南诏的关系

在649年间,在中国南部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后其首领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地区,曾统治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但后来南诏在强大起来后,与唐王朝关系恶化,于公元750年时归吐蕃反唐,在793年,南诏首领又表示归顺并与唐王朝一起对吐蕃作战;这一关系维持到829年,这一年,南诏再次反唐,在四川等地与唐军争夺,还对周边的骠国、弥臣、昆仑国、水真腊国等发起进攻,直到唐朝后期才灭亡。在唐朝时期,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多次交恶,几次反复。

这三个关系是隋朝和唐朝时期对汉政权较有威胁的地缘关系,尤其是北部的突厥,对隋、唐两朝的政治影响都很大。

(二)
隋朝重蹈秦朝地缘政治大失误之覆辙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583年灭陈,统一全国。后至隋炀帝,于618年灭亡,仅存30多年。和秦朝一样,也是时间最短的一个朝代。在其统治的全盛时期,隋朝也未能恢复到汉朝时的疆域,只不过比分裂时的南北朝有所扩展。在内政方面,隋文帝时,隋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一定发展,在许多方面恢复和发展了汉时的制度。为何隋朝只兴盛了30多年就灭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地缘政治方面犯有重大失误。

隋朝建立后,首先面临的是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在隋朝建立的第二年,突厥内部发生了大分裂,东西二部之间进行混战,势力大大削弱。隋朝利用这一机会对突厥作战,向西部进发,608—609年,隋朝在西域击败突厥,在东汉末年西域失控近300年后,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在对突厥的外交中,隋朝的地缘政治还基本上是正确的,实施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取得较大成效,迫使东突厥承认隋的宗主权。

但在隋炀帝时期,隋朝不断向外用兵,连年对外发动战争。在这

一时期，隋朝先后与越南、吐谷浑等国作战。为了支持军事扩张，隋朝把大量的人财物都用在对外战争上。它一方面对突厥用兵，另一方面又耗费大量国力修建长城和运河，使得刚从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争摆脱出来的百姓重又陷入灾难之中。尤其是它对朝鲜的战争，更使天下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在隋朝建立之初，统治高句丽的国王高阳曾向隋称臣，但在589年，隋炀帝指责高句丽驱逼隋的藩属国，在边境造事，两国关系交恶。598年，新立的高句丽国王高元受隋策封后，多次发兵攻辽西，隋文帝曾起兵30万攻之，但中途作罢；后在隋炀帝时，以征服突厥为契机，想一举把高句丽收为隋地。他在突厥可汗启民之处见到高句丽使者时，令其回国后让高句丽国王高元来隋朝晋见。"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后以高元不亲自入朝为由，在611年决定亲征高句丽。[302]在全国修运河以运军饷粮械，又造大战船，征兵百万，在612年发水陆两军100多万，分成数路大举进攻高句丽。613年、614年，隋炀帝又两次发大兵攻之，但三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炀帝本打算再次起兵，但未等实行隋朝已亡。早在611年，当隋帝准备进攻高句丽时，在全国到处征兵，"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03]。时有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并发动了反战起义。隋炀帝不察民情，陷百姓于水火之中，终于导致身亡国灭。

和秦朝一样，隋朝在中国的统一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当这两个王朝还处于国力昌盛之时，竟由于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穷兵好战政策，对近邻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对外政策不当导致国内大乱，使强大的政权迅速灭亡。

（三）
唐朝地缘政治的得与失

在唐朝的近300年时间中，唐朝在地缘政治上既有得，也有失。

唐朝地缘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前期好于后期。大体上可把唐分为两个时期，618—756年是前期。

突厥问题是唐朝前期地缘政治的重点。在唐朝建国时期，李渊曾借突厥兵力助其称王。公元617年，李渊令“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并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以为边患。’刘文静到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宝玉缯帛归突厥’。”[304]突厥为唐朝夺取江山立了大功，以至于在619年始毕可汗死时，李渊下令“举哀于长乐门，废朝3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305]。唐朝还一度向势力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尤其是在颉利可汗(620—630年)时，突厥兵马强盛，忙于巩固政权的唐朝统治者对突厥采取妥协和让步政策。622年，由于突厥不断入侵唐朝，有大臣劝唐高祖迁都，认为“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朝寇自息矣”。李渊竟以为可，并派人去外地选可居之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宰相裴寂皆赞成，独李世民反对，并保证“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迁都之说才平息。[306]624年，突厥不断扰中原，尤其是在624年8月，分裂的突厥在颉利和突利两可汗的率领下，连营南下，侵扰唐之原、忻、并、绥等州，秦王李世民不得不与突利可汗在幽州结盟，达成妥协，并使人前往突厥，625年，唐还同意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请婚的要求。在与突厥结盟后，突厥仍不断侵扰汉地，仅仅在625年到626年的两年中，突厥几乎每月都侵扰唐，如625年8月，扰并、沁、韩等州，626年3月，又扰朔、原、泾等州，抢掠5000余人。尽管如此，唐仍与颉利和突利两可汗在渭水桥达成协议，和平相处。但到后来，突厥仍不停地对汉地进行骚扰，还阻挠唐与西突厥的和解。这样，唐才下决心解决东突厥问题。627年，东突厥统治下的回纥等部族背叛突厥，628年，东突厥内部分裂，突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的阵营也不和，唐太宗遂于629年派军队全线出击，在630年灭了东突厥汗国。

再往后，唐朝为了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又派兵向西进发，再次控制了西域，并设了安西都护府，使唐在西和西北的地缘安全有了保障。当682年东突厥人试图重建突厥时，唐再次对西北的地缘政治给予了高度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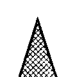
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唐朝巩固了对西北的控制。唐朝向西北派出了强大的军队，使唐朝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巴尔喀什湖一带。

但也正是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唐耗尽了自己的潜力。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的军队在怛逻斯被打败，从此唐在对外关系的主动权也消失了。在这一过程中，唐不得不把大量的军队驻在边境地区，使各蕃镇得以拥兵自重，终于造成了后来的安史之乱，高度繁荣的唐朝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安史之乱也是唐朝地缘政治的后期的开始。唐的国力在这一时期逐渐衰退，在地缘战略上也表现为不断收缩。到820年时，唐的北部有回鹘，东北部有渤海国，西部有强大的吐蕃国，南部有南诏国，唐所控制的有效范围与秦朝时相当。而这几个周边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唐朝曾经一度支持过的。

如659年西突厥汗国灭亡后，西突厥之中的突骑施强大起来，其首领在其初期曾得到过唐的策封和支持，后曾与唐联合对突厥军队作战。但后来突骑施成为唐中期在西域的主要敌人之一。如在734年，突骑施曾进犯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

几乎与唐朝同时的吐蕃国的兴起也曾得到过唐王朝的支持，使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实际上，唐与吐蕃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不好的，主要表现为两国在西域和中亚进行激烈的争夺，吐蕃成为唐维护西北地缘安全中的大敌。它曾与大食、突骑施一起谋取唐之安西四镇，至740年时，吐蕃一度控制了西北20多个小国，到安史之乱时，唐大批军队从西域调往内地平乱，使西北空虚，吐蕃遂于760年后逐步攻陷了河西和陇右，到790年时，吐蕃已完全将唐朝的军队赶出了西域。



唐朝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灵活运用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谋略。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唐朝为了战胜对手，多次对突厥的对手进行分化，实行制突厥的联合战略。如，唐朝曾与回纥部族，与黠戛斯、突骑施和中亚各部族联合进行对突厥的战争，后突厥的灭亡和回纥国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唐与这些国家和民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如回纥汗国(744—840年)与唐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后曾助唐平安史之乱，可见其对唐王朝的忠心。

在突骑施与唐交恶后，唐又曾与中亚的一些小国联合攻之，并在739年在石国、史国、拔汗那等国的支援下，击败了突骑施的军队。

在对中亚各国的关系上，唐朝的地缘政治在751年前也基本上是成功的。自618年起，唐朝先后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在平定突厥之后，中亚各国基本上都在唐朝统治之下，直到吐蕃统治时止。为了维护唐在西域的统治，唐把中亚各国当作唐的外围屏障。一方面，唐以策封形式保持着自己在中亚的政治影响，但另一方面，并不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这种藩属关系使中亚各国对唐朝持友好态度，并把唐作为自己的保护国。当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进入中亚时，中亚各国都曾向唐求援，唐也曾一度派突骑施出兵抗击大食，以保护中亚小国。后来在唐与突骑施关系交恶时，中亚的石国和史国都曾派兵协助唐军并将突骑施可汗捉起来送唐。在唐朝军队平定突骑施叛乱之后，唐朝在中亚各国的威信更高了，其中中亚的拔汗那国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与史国、西曹等国关系也很好。西曹国王曾上表要求将自己为唐朝的一部分。在安史之乱后，中亚的吐火罗、拔汗那和西域九国还曾发兵帮助唐平乱。

在东北方面，唐在处理地缘政治时，也注意运用地缘战略和策略。为了制服高句丽国，唐朝利用了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小国之间的矛盾，先打击高句丽的盟友百济这一力量较小的国家，于660年与新罗军队一起灭了百济，对高句丽形成了南北夹击

之势。668年,又利用高句丽内乱,出兵攻击,最后灭了高句丽。

为了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部族搞好关系,唐朝也运用了汉时的和亲政策。除将唐公主许给当时的主要敌人突厥之外,还先后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的松赞干布、缩赞成婚,另有金河公主远嫁突骑施可汗苏禄。

第三个特点是唐朝几乎与周边的国家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冲突,使唐的对外关系大大扩展。

在这些冲突中,第一类是唐朝为维护中国的藩属体系对别国进行侵略。如唐对高句丽的战争。唐朝建立的藩属体系的一个核心,就是承认唐朝对周边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策封权,即各国的统治者应征得唐的同意,并常去晋见朝廷,由此取得唐对它的保护权或不受侵犯权。唐与周边的许多国家的冲突都由此而生。周边的一些小国对唐既怕又不敢得罪,于是通常的手法是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权,但其册封者多用各种理由不去见唐朝皇帝。如果这些统治者是用非法方式上台的就更不敢去了。唐对朝鲜的几次战争都是如此。高句丽国王在唐初也是由唐策封的,但到642年,高句丽西部酋长泉盖苏文杀国王,并掌握大权,还联合百济攻新罗,也不听唐朝的劝阻,因此唐太宗认为泉杀其君已是无理,又伐邻国,且辽东本是中国之地,可以出师讨伐,就于644年,派500艘战船和6万大军赴辽东,又于645年亲率大军前往,结果失败而回。

第二类冲突是唐为维护自己的宗主权与另一大国展开的争夺战。如在751年,唐在中亚与大食发生冲突,最后发生战争。750年,与唐交好的中亚国家拔汗那与石国国王不和,请唐相助,安西都护高仙芝发兵攻石国并攻破石国,将国王送长安处死,石国国王之子联合中亚各国请大食发兵攻唐,攻安西四镇,后高仙芝军队与大食军队在中亚大战,结果在怛逻斯城大败。又如661年,唐与新罗联军灭百济时,倭国国王对朝鲜半岛也有觊觎之心,于是率数万军队前往助百济,准备立百济王子为新国王。从此日本倭国与唐在朝鲜展开了

争夺。663年，倭王派27000人进攻新罗，后唐与新罗联军在白江口战役中大败倭军，使日本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大大往后推移。

第三类冲突是唐为保卫西域与各国发生的冲突。如与突厥和吐蕃、突骑施等的冲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大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力量在西域和中亚的争夺和较量是最引人注目的。为了抗大唐、吐蕃和大食曾联合攻大唐控制的西域，唐与大食在争夺中亚和西域的斗争中多次发生严重的冲突，但大唐为了对付突骑施，也曾与大食联手，吐蕃与大食之间为争夺西域、帕米尔吐火罗等地也进行过大战，大唐也制定了北和回纥，南联南诏，西结大食以制吐蕃的地缘战略。这段大国地缘争夺的历史为理解当今的地缘角逐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307]

（四）
《贞观政要》与唐太宗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626—649年，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典型的。它既有与外部敌人强大的暂时的妥协，也有积极的对外反攻和收复国土的精心准备；既有对外的侵略扩张，也有反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和与邻边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友好睦邻的和亲地缘、和平地缘；既有中国封建王朝历来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天朝中心思想，也有与小国平等相处的思想。因此，作为中国历史中地缘政治的一个经典时期，必须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1)先礼后兵，以“义理”制人

626年唐发生玄武门之变，突厥二可汗以为有机可趁，遂以其众20万至渭水桥之北，并派其大将思力入长安探虚实。思力见到太宗，以武力威胁之。李世民初即位，执义理对突厥严厉驳斥，最后不战而退突厥大军。《贞观政要》中说：

“太宗(对思力)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

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大臣请太宗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我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议征伐第三十五》)[308]

(2)对缘边少数民族和邻国实行和亲政策和安抚政策,反对使用武力

626年,岭南各州奏报说高州酋帅冯盎恃兵反叛。唐太宗令将军蔺莫征调岭南的大军讨伐,但大臣魏徵对唐太宗劝说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表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要破掠山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后太宗对其他人说道:"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议征伐第三十五》)[309]

630年,有大臣进言,以林邑国蛮人奏章中的言辞不恭顺为由,要起兵讨伐。太宗引中国史训,告诫大臣穷兵者必亡。他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句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后终于

没有讨伐林邑国。(《议征伐第三十五》)[310]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大臣的汉族大国主义,竟以言辞不当起兵讨伐;另一方面也说明唐对过去的历史教训是有所借鉴的。

在唐太宗准备再征高句丽时,唐太宗的九嫔之一充容徐氏上疏谏曰:"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戎,去留怀死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有运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习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务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国,图利而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议征伐第三十五》)[311]

唐在可用战争解决也可用和平手段解决时,先选和平手段。

642年,唐太宗在与大臣们讨论如何解决北部的边患时,提出要为天下百姓着想来考虑问题,能不打仗就不打。唐太宗认为,北方外族世代入侵扰乱,现在延陀部强盛不顺服,必须趁早解决。因此,"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议征伐第三十五》)[312]

(3)不以扩张吞并为地缘政治的目标,主张维护小国之独立主权

631年,西域的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请求归附大唐。唐太宗不许,对大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人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得无劳于人?

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议征伐第三十五》)[313]

640年,唐军队攻下了西域之高昌国,唐太宗把它并为唐的州县,并设安西都护府,但这一作法也曾受到大臣的反对。魏徵谏曰:应立高昌国王的后代为王,只讨伐有罪的国王,而对其百姓就加宽慰,使威力和恩德都遍及边远的外邦,这才是治国的良策。如果在那里置州县,就必须有1000多人驻守,几年更换一次,而在交换时,死亡的会有十分之三,而最后唐并得不到高昌国的一谷一布来资助国家,这是分散有用的资财去治理无用的地方。黄门侍郎褚遂良也反对,认为最好还是使高昌国成为唐的友邦更好,唐应把力量放在巩固河西上。他说:"明王创制,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如果西域有事,高昌地不能有所帮助,还得从陇右发兵,"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靡费中华,以事无用?……宜择高昌可立者,徵给首领,遣还本国,负载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议安边第三十六》)[314]。可惜太宗不听,仍置西州于高昌,2年后,西突厥兵袭西州,唐太宗才觉大臣所说有理,对侍臣说:"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315]。

(4)地缘政治的目标在于追求国家利益,不必为它国利益而大动干戈

648年,太宗与大臣再议重讨高句丽。大臣房玄龄重病在身,仍冒死上谏,反对再次为他国利益而出兵。他对儿子说:现在天下和平安宁,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只有皇上想再次讨伐高句丽,正是国家

的大害。皇上含着怒意作出了决定,臣下没有一个敢冒威严劝阻,我知道它的害处而不说,可以说会含恨而死。在奏章中,房玄龄写道: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详观古今,为中国祸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在历数唐太宗的成就之后,房玄龄劝道:"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辖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句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伏愿陛下……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句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议征伐第三十五》)[316]虽然唐太宗不从,但在这段话中却表达了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为死去的高句丽王高建武雪怨而用兵,也不必为新罗与高句丽的冲突而动武。

(5)以平等之心对待周边各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都是卑视的,但在唐时,这一思想观念有很大变化。唐高祖在619年的诏中就曾说道:"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有隋季世,黩武穷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317]唐太宗时,继承了这一思想。唐太宗李世民在644年时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18]

第五章

宋、元、明、清等朝的地缘政治

宋元明清四大朝是中国封建时期的下半期,在地缘政治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近900年的历史中,北方的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在中国建立了几个大的以少数民族为主导的政权。这一时期宋朝的历史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先后两次亡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的形势之中。以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何以不能抵御北方兵力并不特别强大的辽与金,以及后来的蒙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地缘大扩张时期,它的灭亡也与这一特点有直接联系。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明朝时对海缘的重视超过以前的历朝。日本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开始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清朝在近代时处理地缘政治全无章法,但在其前期,清朝的地缘政治并不是一无是处。它在处理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上,还是表现出地缘政治的高明之处。

·第一节·
宋、西夏、辽—金时期的地缘政治

(一)
两个"三国"时代的地缘政治特点

908年,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北伐南下的辽军,因赵在抗辽时掌握军政大权,故成大势,兵至陈桥时发动兵变,建立宋王朝,并先后消灭各国,大体上统一了

中国内地。可以说,是当时的抗辽这一地缘政治形势给了赵匡胤夺权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宋的地缘政治形势比唐时更为复杂。

宋的统治区域从未达到过汉唐盛世时的版图,在它的统治最盛时期,统治区域也只不过比秦时稍大些。它东、南到海,北部边界在海河、霸县和山西雁门关一线,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和大理为界。后来的南宋时期,其北部边界收缩到淮河一线。它从未统治过西域地区。

与两宋并立的,有大约七八个国家和民族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即:

西夏。在宋的西北部,是党项羌族首领李元昊在1038年所建,最盛时其统治地区包括宁夏、陕北和青海及甘肃、内蒙一部,1227年和宋一起为蒙古所灭,长期与宋和辽、金对峙。

辽国。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改为辽国,其疆域东北到日本海和黑龙江口,西北到蒙古中部,南与北宋为界。辽宋关系是宋之主要的关系。因为在936年时,契丹出兵5万灭后唐,扶石敬瑭为后晋儿皇帝,石竟以中国之燕云16州与契丹作谢,另许岁贡帛30万匹。宋攻灭各国后,一直把收复北方16州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而且在与宋并立的各国中,也以辽国力量最大。

1125年,辽国为金国所灭。女真原是辽国统治下的民族,后在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金国,后强大起来,在原辽国的土地上不断扩张,其版图比辽国还大,在辽之后,成为与南宋对峙的一个北方政权,直到1234年为元朝所灭。

除此之外,还有西辽及蒙古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西夏和辽—金长期对峙,在200多年中重演着三国的故事:北宋时是宋—夏--辽三国,南宋时是宋—夏—金三国,地缘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

在宋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政治上,宋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及其属下的机构中,自宋起,不再有大臣和军阀篡权的事情;宋的科举制度也更加完备;宋的经济高度繁荣,超出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使宋的人口大增加,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宋朝失去了自己的西北和北部的边界,彻底丢失了西域地区,因此不得不把对外交往的重点放在海外联系上,使中国的海路交通比过去大发展了,这也可说是因祸得福。

但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宋比过去的秦汉唐都弱。它经常供养着 100 多万人的常备军。宋的人口也比辽、金和西夏加在一起还多,辽的总人口不过 400 万,其中契丹族不过 300 万左右,后来的金国的女真人甚至比辽国的契丹族人数还要少,而后来的蒙古族总人口也只有大约 300 万左右,其军队总数不过 20 万。和这些地缘政治的对手相比,宋在总体上有巨大的优势。但宋却在和周边的国家政权和民族的作战中,经常处在劣势地位。两宋政权在这方面犯有两大错误:

第一,宋的军事制度有重大缺陷。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陈桥兵变"重演,大大削弱了军队指挥官的兵权,全部军队都在皇帝和中央机构的控制之下,其行动受到严重节制。就综合国力而言,宋并不比汉唐差,但军队的战斗力却从未到达过汉唐时的水平。后人往往有宋朝无大将之说,但其实是制度问题。即使是像岳飞那样的杰出将领,也得不到充分发挥其才干的机会。宋军不仅与北方民族的骑兵不能打,而且在有优势的水上作战方面也往往大败。如 986 年宋太宗发大兵攻辽,想收复幽燕之地,但辽将耶律休格仅以 8000 之兵就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败宋军名将曹彬的 10 万大军。甚至 1122 年,宋与金联合攻辽,辽军主力已为金国所灭,宋出兵 10 万以收复燕地时,竟为辽军 3000 兵大败,因此宋军为金兵小视,遂有反约不与燕地付宋之意。

宋时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统治者沉溺于享受之中,

尽可能的苟且偷安，不思备战，一遇战斗就想往后撤，一遇强敌就想求和，甚至在有军事优势时也宁愿选择屈辱求和的方式，不愿将战争进行到底，使战争半途而废，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但人数庞大的军队又成为宋的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的军费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 80%左右。

第二，宋朝的统治者目光短浅，缺乏对地缘政治的深谋远虑，两次重犯联强攻弱的战略错误，导致自身的灭亡。

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宋比西夏、辽、金和后来的蒙古都要强大得多，但从军事角度看，宋则是较弱的一个，仅比西夏稍强，比后三者都弱。按地缘政治的规律和中国传统的做法，宋朝应联合较弱的来对抗较强者，否则强者在消灭另一个弱者之后，就会对自己构成强有力的威胁，正是所谓的"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宋朝的统治者却完全背其道而行之。它在联合周围的弱小国家和民族来抵御强敌的侵犯上是失败的，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例如，在辽、金对在后唐时已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的朝鲜进行侵略时，朝鲜的统治者曾多次请求与宋联合抵抗，但宋对此不重视，又如西夏应是宋联合抗辽和抗金的重要盟友，但实际上西夏与辽和金的关系比与宋的关系要密切。

最重要的是，当北边的金国兴起时，宋对这一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以为这是收复北部领土的大好时机，与金结盟，共同对付辽国，而当时的辽国已不构成对宋的重大的地缘威胁，而且在 1004 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虽然这一协议对宋不利，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此后的 100 多年中，宋辽之间基本上无大的战事，双方都信守和平协议，互不侵犯，这种局面对宋不是最坏的。但宋对金国有意于中原之野心缺乏了解，拒绝了辽提出的结盟抗金的建议。1105 年，燕人马植在童贯出使辽时，向童贯提出联金灭辽之计，后为宋徽宗所纳，并赐姓赵良嗣，当时就有人认为联金非宋之利，但宋徽宗不听。1120 年，宋与金达成协议，约定攻灭辽后，燕地归宋，但宋须与金 30 万。(《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319]后宋徽宗在致金

主的国书中又进一步明确地约定，“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所有兵马，彼此不得过关外，……绢银依与契丹数目岁交，……计议之后，契丹请和听命，各无允从。”（《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320]但当时金主对把一部分汉地归还宋未置可否，为后来金南侵打下了伏笔。1122 年，宋金两国在分割辽地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因此又有几位大臣极力反对实行联金灭辽的战略。如郑居中曰：宋不能不守两国盟约，虽宋岁交辽绢币 50 万，但这还是值得的，因为“汉世和戎之费，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又有安尧臣劝宋徽宗道：“今童贯深结蔡京，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以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新起之敌乘间以窥中国。”（《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321]后果然金国失约，不以燕地付宋，而金此后迅速挥师南下，几乎占领了宋的一半领土，皇帝也被掳到金国当了人质，作为一个国家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但宋不吸取教训，在逃到南边后，不思图强，反而苟且偷安，仍是一个积弱之朝，等到后来蒙古大军进攻金国时，南宋又把收复幽燕十六州的希望寄于蒙古。

早在 1214 年，当蒙古刚兴起之时，就已有宋朝起居舍人真德秀上书，请宋宁宗把地缘政治的战略基础放在宋自身的强大上，对蒙古应有警惕。他指出，“蒙古之图灭女真，犹猎师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猎必从之。既能越三关之阻以攻燕，岂不能绝黄河一带之水以趋汴？使蒙古……为邻国，固非我所之利也；……今当乘敌（金）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乘敌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也。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张；以苟安为志向，则国势日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322]另有淮西

转运使乔行简也认为，“金，昔我之雠也，今吾之蔽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323]1215年，真德秀再次警告说：“金自南迁，其势日蹙……臣谨案图史，女真叛辽在政和甲午，其灭辽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于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势，何以异政、宣之时！陛下亦宜以政、宣为戒。臣观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日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可惜，他反复极言，帝不能听。(《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324]1232年，宋与蒙古达成合攻金朝协议，蒙古应允一俟成攻，以河南地归宋。结果这一次不但仍然没有得到失去的领土，反而连整个宋朝都为蒙古所亡。

因此，宋的灭亡与秦、隋亡于地缘扩张相反，宋的灭亡在于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地缘战略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也是后人在制定自己的地缘战略时应引以为戒的。

与此相反，不懂得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金、蒙古，却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自觉地运用了地缘战略，把中国传统的地缘战略——远交近攻运用得出神入化，先后用此攻灭了辽国和金国，最后又灭亡了宋朝。甚至辽在地缘政治上也比宋朝更强一些。以其国力，并不比宋国强，但却能使宋北面称臣，除军队战斗力较强外，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比宋朝有远见。如在1035年，辽大臣萧罕嘉努就在其对辽皇分析地缘政治时指出，辽面对渤海、女真、高丽针对辽国的合纵连横，应加强军备，但对辽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西夏与宋。他说：“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戎，若能徙西戎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又说，辽对西部之各民族，也应有远见，不能一味扩张，反误了防西戎之大事，不能“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而且，“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它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猝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因此，“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戎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长，岁修

职责，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325]这里所体现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十分精彩的。

更有甚者，连西夏这样的小国也不但能在辽、宋两强之间求生存，而且能利用辽宋的矛盾，以辽抗宋，联辽抗宋，以至于西夏区区小国能在大国纷争的局势下得以支撑达 200 年之久，而且还能让强大的宋在 1044 年时对其俯首称臣，这应当是一个很值得人寻味的历史时期。

第三大失误在于，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多次匆忙起兵，结果都不但未能收复失地，反而使宋损兵折将，遭到更大的失败。

在这 200 多年中，宋也有过几次北伐，企图收复失去的北部领土。第一次是在 979 年，宋太宗率军北伐，在高梁河战役中大败；第二次在 980 年，宋太宗再次北伐，在瓦桥关之战中又败；第三次北伐在 986 年，宋太宗命宋军 10 万分多路攻辽，先取得了几次不大的胜利，但后来以失败告终。988 年起宋转为防御。

1004 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领兵 20 万大举南下，宋真宗曾起兵相迎，在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境内)与辽军对峙，后辽军统帅肖达揽为宋军所杀，辽军受挫，宋军本应就势攻击，但宋真宗却做出错误决策，命与辽国议和。宋真宗和辽国萧太后都厌战了，所以双方达成了“辽宋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对宋来说也是个不平等条约：“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阁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誓于天地神氏，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誓，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辽国当然是很乐意达成这个条约，因为宋几乎全部满足了辽的要求：“大契丹皇帝谨致大宋皇帝阁下：共议收兵，复谕通好，兼承惠顾，持示誓书，……敢遵此约，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明神是殛”(《续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五)[326]。

1207年，南宋匆忙北伐，出兵数路，数路皆败，又只好与金求和，而金人又趁机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二）
《续资治通鉴》与宋朝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在地缘政治方面犯有重大错误，但这不等于说宋朝200多年中没有产生过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思想。在《续资治通鉴》中对这一方面也有许多记载。

（1）重屯边，修边备，优抚将士，抵御入侵之敌；为此应养边，严边，防边，不启边事。

962年，赵匡胤初即位，天下未定，所以对北边的防备特别重视。他命赵赞屯延州，又在环州、原州、镇武等地屯兵以防西夏，在北边，屯兵于关，常山易州、棣州，以防契丹，对诸臣家在京者，抚之以厚，给以丰厚的资财，对其进行的贸易给以方便，并免征其租赋。"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募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每入边，必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取荆、湖、川、广、吴越之地。"（《续资治通鉴》卷第二）[327]

由于重边，因此宋军在初期也有过以少胜多的事例。如970年，辽6万攻宋定州，宋将田钦祚以兵三千击之，杀伤辽兵无数，迫使其退兵，赵匡胤知后很高兴，对其左右说，"契丹数入寇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续资治通鉴》卷第六）[328]。此后益修边备。

980年，宋朝开始议论攻取幽燕事，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书反对，认为应以安边防边戍边为主。他在其中说："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翟，亦多由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

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主张把防之重点放在强内上。(《续资治通鉴》卷第十)[329]

左拾遗直史馆田锡也认为，北部边事，多是“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起衅召戎，实由此始。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还所俘掠，许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续资治通鉴》卷第十)[330]。宋太宗由此下诏曰：“河南缘边吏民，不得阑出边关，侵扰略夺，违者论罪。有羊马牲口者还之。”(《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一)[331]1065年，司马光在其进言中也指出，“近闻契丹之民，有于界河捕鱼及于白沟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还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御，另选州将以代之。臣恐新将之至，必以中佑为戒，而妄杀彼民，则战斗之端，往来无穷矣。望陛下严戒北边将吏，如渔船，柳栽之类，止可以文牒整会，道理晓喻，使其官司自行禁约，不可以矢刀相加。若再三晓喻不听，则闻于朝廷，专遣使臣至其王庭，与之辩论曲直，亦无伤也。”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可动兵。(《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三)[332]

宋右正言直史馆王禹还向太宗提出了备边五策：“备边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内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请于缘边要害之地为三军以备之，……使互相救援，责以成功，立功者行赏，无功者明诛。二曰侦逻边事，罢用小臣。……诚用老臣大僚，往来宣抚，赐以温颜，使尽情无隐，则边事济矣。三曰行间谍以离之，……宜捐厚利，啖其部长，以离其心。四曰边人自相攻击，中国之利也。五曰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续资治通鉴》卷第十四)[333]

当然，在防边上宋朝也有人主张对辽和西夏分别对待，对辽以防为主，对夏则可先防后攻，在守卫好边界时，做好进攻准备，时机成熟就可长驱直入。999年时宋秘书丞何亮曾对宋真宗上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安边书，其中说：

"臣窃料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义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

臣以为灵武远隔塞外,有飞挽之劳,无毫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西戎,则以豺狼之心据广饶之地, 以梗中国,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为二,故地隘势弱,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戎人合而为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 ……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续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334]

在叙述了不能放弃灵武以使宋遭三患之后,何亮又为宋真宗指出了宋在西边不能奉行穷追的地缘战略,否则会有四不利:①穷追战略会使西夏退居沙漠,宋军无法深入,只能退兵;②如与西夏开战,则边郡之兵不能御之,此不利之二;③攻西夏可能会使西夏据旱海以阻灵武之要害,阻绝河西之粮道;④国家有事于西边,则疲民重困,会使天下大乱。

不仅放弃土地与西夏求和不行,出兵也不利,而且对西夏羁縻即妥协也不行,因为若示恩信,姑息之,则戎人贪得无厌,必为中国大患,另外,西夏有吞食中国之心,退让会助长其虎狼之心。

因此,宋的出路只有二条:一是在西夏与宋之交界地带进行备战,修建城池,积蓄粮草;二是在宋夏必争之地设伏,诱其来掠,然后从多个方向与西夏对峙,并使一军深入其境,断其退路,必能与西夏决战,破而擒之。(《续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335]应当说,何亮对当时的宋与西夏的地缘政治的形势的分析是很正确的,若宋朝据此行之,对后来与辽金的战事是会有所裨益的。

1039 年,当西北的党项羌刚起事称王时,宋驻守西北的大臣夏

竦曾进献防戎十策，主张加强西北边防，怀柔西北各族以对付西夏，同时根据西北的地势，建议宋各路兵马应互相应援，筑边防大寨以为抗戎之据点，也是很有见地的。(《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336]

(2)反对对辽金主动攻击，主张以防御为主

986年，赵光义准备征辽国，攻幽州。有参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馈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三)[337]但赵光义不听，攻辽国，先胜后败，无果而返。

户部郎中张洎也认为，宋军应在河朔之地，于缘边之处建三大镇，各统10万之众，"鼎据而守；仍环旧城，广创新塞，俾士马便于出入。、然后列烽火谨晨夕之候，选精骑为报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视掌内，敌之动静，我必先知，仍命亲王出临魏府，控河朔之要，为前军后屏。自余郡县，则选在城丁壮，授以戈甲，俾官军统摄而城守焉。三镇分峙，隐若长城，大军云屯，虎视燕、赵，臣知契丹虽精兵利甲，终不敢越三十万之众南侵贝、冀矣"(《续资治通鉴》卷第十四)[338]。

(3)宋应先与辽和好，不和再战，先和后战，以和为主，以和为重

张洎还认为，"今兵连祸结，当以权济用，请陛下且稍抑至尊，举通和之策，彼若归仁悔过，奉大国之欢盟，结好息民，以宁宇县，固邦家之望也。脱若敌人无厌，贪残是务，屈大邦之命而不从，曲实在彼，我又何咎！"[339]997年，王禹在其上书中说："谨防边，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指西夏)，戎兵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人，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兴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

己而为人也。"(《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九)[340]

在与辽达成和平协议后,宋朝基本上遵守了这一协议,每年将绢、银如期交割。在此后的100年间,宋与辽无大战事。在宋真宗死时,辽国还为其致哀三日。后辽圣宗1031年前还召集大臣,让其"无失南朝信誓","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隙"(《续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八)[341]。

1038—1044年间,宋与西夏兵战不已,辽国趁机向宋提出领土要求,于1042年要求宋将北部关南之地割与辽。辽主向宋仁宗致书说:辽宋问题很多,辽"虑难敦于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怀,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342],大有与西夏结盟攻宋之意。宋仁宗派右正言富弼与辽国交涉,富弼运用地缘政治的计谋,对辽主极陈两国利益之所在。他对辽主说,北朝(辽)与中国通好,对辽主和辽国有好处,而辽对宋用兵,未必对辽有利,因为过去中国内乱,故把北部土地割与辽, "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北朝用兵,能会保必胜乎?"当辽主说关南之地本为辽国祖宗故地时,富弼又说,过去燕国本为中国之地,宋兴已90多年,职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对北朝(辽)未必有利。富弼代宋提出,宋以年增进贡辽之岁币20万,以息辽宋之争。辽臣反对,坚持要宋割地,富弼又对辽大臣说: "南朝皇帝尝言: '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昔澶渊白刃相向,章圣尚不与关南,岂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不爱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邪?……今北朝先发兵端,过不在朕'。"富弼又对辽主说,如北朝一定要以得地为交好之条件,那么南必以失地为辱,一荣一辱,必致兵祸。最后,在宋的坚持和退让下,辽宋的和平友好盟约得以继续。宋与辽达成新的协商,宋岁增金帛20万,但辽不得与西夏一起攻宋,维持两国原有国界,不得开展,不得无

故增屯兵马,不得收留双方的逃亡人员。宋辽之好得以又持续了几十年。(《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343]

后来在南宋时,也有不少大臣提出了许多好的地缘政治战略。例如,1159年,南宋李宗闵在其上书中,对金宋对峙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金的地缘三策:"一曰严守御。方今天下根本在吴、蜀,其势若手足之相应,荆州据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阳扼荆州之冲,又足以为荆州重轻",主张在荆、襄一线驻重兵把守。"二曰募新军",主张在江淮一带广招军马,造战船,取海道,然后对金国展开进攻。"三曰通邻国",应联合所有受金国侵略和欺凌之国和民族,如西夏、乌珠、达勒等。(《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二)[344]

1164年,南宋兵部侍郎胡铨曾上书,力陈宋在与金的对抗中不能再议和,只能先抗战,提出了和议十害和抗战十利的观点。他说:"自靖康迄今, 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议和,则金之不可与和彰彰矣。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其一,真宗时,宰相王旦力主与辽讲和,后又后悔;其二,如与金和,则中原绝望;其三,如和,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进而江浙也不安宁;其四,秦桧时与金和,但金反复无常,卒有前年之变,如再和,则又会重蹈覆辙;其五,如和,金必提出要宋将过去从辽金逃到宋的数百人送回,如送,则宋必生变,如不送,则金必别起事端;其六,自秦桧当国20年间,竭民膏血以奉金人,使国库空虚, 如议和,则无法治宋之虫灾和水灾等;其七,如和,则宋除养兵外,又增岁币,还有私赂,每逢节日,还有正旦、生辰之使,生民疲于奔命;其八,如和,金将去大宋国号之"大"字,使宋在金前受辱;其九,如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衔璧,最后是亡国;其十,事至于此,求为匹夫,尚可得乎?

因此, "窃观今日之势,和决不成。傥陛下毅然独断,……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省数千亿之岁币,一也。专意武备,足食足兵,二也。无书名之耻,三

也。无去大之辱,四也。无再拜之屈,五也。无称臣之忿,六也。无请降之祸,七也。无纳土之悲,八也。无衔璧舆榇之酷,九也。无青衣行酒之惨,十也。”最后,胡铨还说:“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345]

在宋时,虽有一些地缘政治思想是很好的,但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许多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这些消极的地缘政治思想对宋的政治决策产生的影响大于上述的积极的因素。

这首先体现在,宋对周边的地缘对手一味退让,甚至不惜割让土地,出卖民族利益。

在汉唐时,汉唐政权为了保持边境和平,以较和平的手段,如和亲,给以金帛等方式,对边境的匈奴、突厥、鲜卑等政权实行安抚政策。但汉唐政权同时也是以加强军备为基础的,并非只把招女婿,送金帛作为与其和平相处的唯一手段。汉唐政权都曾大规模的出兵远击匈奴和突厥,对其给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到了宋时,和亲政策竟发展为对西夏、辽、金等政权的一味退让,变为为了和平的单方面的妥协和投降政策。

在宋时,有些和约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1004年的澶渊之盟,宋虽对辽太后称叔母,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毕竟还保持了近120年的和平,辽宋两国在这一时期中往来频繁,仅使者相互往来就有683次之多。1044年宋与夏达成协议,宋夏以兄弟相称,宋向夏岁送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也有近20年的和平。

但宋为了保持边境和平,除了每年对西夏和辽进贡数十万金帛外,还常在领土上作让步。如1075年,辽国与宋发生国界争议,宋神宗问于王安石,王竟答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以笔画其地图,将辽索要之地尽与之,使东西弃地700里,以致于监察御史黄廉叹曰:“分水画境,失中国险矣!”(《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346]司马

光是王安石之政治对手，但在这一问题上两人却是一致的。1086年，夏国派人至宋，求兰州、米脂等五地，而当时主政的司马光等不但不力争，反而还想并弃熙河等地，因王安寿与之争，才放弃了要把熙河给西夏的念头。

1105年，宋太常少卿冯澥上书，劝皇帝放弃宋之湟、鄯、西宁等三州，因为这些地方"本不毛之地，在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数路，耗内帑，竭生灵膏血取之，何尝得一金一缕入府库，一甲一马备行陈，而三州岁用以亿万计"（《续资通治鉴》卷第八十九）[347]。

在与金国的交往中，宋一开始就对金许以重金，先是在1120年即宣和二年答应在灭辽后，把过去给辽国的岁金如数再给金，在1123年，金又提出年金30万增至100万，作为金兵代宋攻下燕京的代价；1126年，金大兵南侵宋朝，宋危在旦夕，宋又许增岁币以300—500万两；1141年，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岁贡绢15万匹，银25万两，1164年，隆兴和议，宋虽不向金称臣，岁币和岁绢各减少5万，但南宋不得不把6州土地割让给金。在对金关系中过于软弱，这也体现了宋时对敌一味求和求安的心理，结果反招致恶果。

第二，在对辽、西夏等国的交往中有大国主义行为，对发展和巩固与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利，甚至成为引发事端的导火线。

1105年，蔡京主政时，因有遣童贯率军攻西夏之故，因此当辽国派人至宋请宋罢伐夏之兵时，蔡京派翰林学士林摅使辽，让林故意激怒辽，以使宋对夏之战能进行。林至辽国后，在辽行为不肆，与辽大臣发生争吵，出言不逊，引起辽致宋书责之。西夏在对宋的关系中，经常不守协议，本应受到谴责，并数百次的侵扰宋边，宋对其进行讨伐也是师出有名，但有时宋出使夏国时，或夏国使臣至宋时，都常发生宋朝的大国主义激怒夏国对宋进行进攻的事情，而且宋对夏的大国主义比对辽更严重。如1062年，宋遣使张宗道为夏主谅祚进生辰礼物，张竟以与夏主"比肩"的关系对待夏国接待他的人，对夏国大臣说："宗道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来，当为宾主。尔陪臣

也,安得为主人!”后当夏国迎者认为“二国之欢,有如鱼水”时,张宗道又无礼地说:“然。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348]。1064年,夏国派使者吴宗等至宋贺宋英宗登基,但宋陪伴者高宜不准其佩带其饰物进宫,后一天只准其在宾馆住一晚,并不供给其食品,还言“当一百万兵,遂入贺兰穴”。夏使强烈不满。当年秋,夏数出兵侵扰宋边,杀人无数。(《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349]

在最初与金国打交道时,宋一开始也摆架子,1119年,宋与金初约攻辽时,让宋使给金主送诏书,把金国当作宋的藩属国,不愿以国书与金国平等相待,后金主恼怒,把宋使扣了6个月,宋大臣至此时还不愿意,认为金国本为辽之臣属,不必过于尊崇,女真之猷不过为宋之节度使一级,用诏书就可以了,后来金国坚持,宋才改称为大金皇帝。

·第二节·
地缘大扩张与元朝的兴衰

在中国历史上,13世纪可以称为大扩张的世纪。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建大蒙古国。从此以后的大约60—70年中,蒙古的军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扩张。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先后征服了东亚和中亚西亚以及东欧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由四个大汗国组成的蒙古帝国。

1279年,以汉民族为主的政权,再次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经过蒙古军队60多年的征战,蒙古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的统一的王朝——元朝。它的版图不仅包括了昔日的汉唐盛世时的地区,而且还大大地扩展了,除越南和朝鲜半岛外,西藏、西域和蒙古大草原、东北、云南等地都被蒙古的军队所牢牢地控制。

从1279年蒙古灭南宋建元朝,到1368年元朝不到100年时间

就灭亡了。元朝的地缘政治形势似乎比过去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好。严格地来说,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在历来构成为中国地缘大患的北部地区,已经为元所统治,不再有一个像过去的匈奴和突厥那样长期对中国的王朝形成北部威胁。在西部地区,是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的另外三个汗国,即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虽然它们之间也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元朝作为控制着蒙古族发源的漠北之祖宗之地,又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因此始终保持着中央兀鲁思的地位,其地位是牢固的。那么,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王朝,其军事力量也是最强大的一个王朝,何以存在 90 年就会灭亡?

从内部原因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因素:第一,最重要的是元朝的统治者未能把其统治与在这一地区占主要影响的汉文化和汉民族结合,形成了占人口极少数的蒙古族统治者与最大多数汉人的对立。在当时的元朝中,蒙古人是第一等人,非汉人是第二等人,归化了的少数汉人是第三等人,而最广大的南方汉人则是最下层,并处在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之下,遭受最沉重的压迫。这必然会使蒙古统治者在汉人心中被当作异族人,为汉族文化所排斥,并很快激起广大汉人的反抗。第二,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内讧较多,大大削弱了其统治能力。在这 90 年中,元朝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除少数统治者外,大多数统治者较无能。元朝先后有 12 个皇帝,其中元世祖忽必烈最有能力,在位时间也长达 33 年,从 1279 年后起有 16 年,然后是元顺帝和元成宗执政共达 40 多年,其他的 9 位皇帝共在位的时间才 24 年,平均不到 3 年,其中还有元英宗在内讧中被杀。

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蒙古和元朝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是其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 1219 年至 1294 年,是蒙古和元朝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时期。1219 年,成吉思汗统帅 10 万大军西征中亚,占领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 1236 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蒙古大军再次西征,先后灭不

里阿耳国,征服钦察和南俄草原,占领了俄罗斯一大部分领土,一直打到多河边;第三次西征是在1251年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进行的,攻灭了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在这些蒙古军队统治的地区,先后建立了蒙古族的政权,即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等。蒙古大军进行的这些西征,使蒙古的统治包括了极为广阔的区域,分散了蒙古军队的主力,也进而大大削弱了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仍然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征战,尤其是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先后进行了几次大的对外征战:

(1)征服高丽。1218年,蒙古军队在与金国的战争中,首次进入高丽,以后就不断对高丽进行侵略,直到高丽成为蒙古帝国中的一个附属国。元朝建立后,又于1283年建立了征东行中书省,由高丽国王兼任行省丞相,蒙古军队驻高丽的指挥官拥有实权。但高丽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地位,元朝对高丽的内部事务一般也不干涉,高丽国王对高丽的事务拥有很大权力。但尽管如此,高丽国具有元朝殖民地的味道,特别是在元朝对日本发动进攻时,高丽作为元朝军队的前线,不得不为其提供大量的物资和人力,给高丽的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2)对日本的战争。蒙古大汗忽必烈曾多次让日本派人到蒙古表示归顺,但日本不予理睬。1274年,蒙古派大军与高丽军队联攻日本,但在壹岐岛为日军所败;此后,元朝继续准备谋攻日本,1279年,以宋军原将领范文虎为帅,出兵高丽,并迫高丽出兵3万,1281年,元军和高丽军队再次攻日,两国军队约14万人,战舰4400艘,声势浩大,但兵至日本之壹岐岛和屯鹰岛时,遇大风,元军损失惨重,大部兵力溺死于海中,范文虎等弃军而逃,后日军又乘势进击,大败元军,元军10万兵马只3人生还。遭此大败,元朝仍不死心,1282—1284年,元世祖还曾多次发令攻日本,1285年又立征东行省,直到1286年,才以日本孤远,重困民力,才下令罢征日本。

(3)对越南、占城和缅甸进行多次征伐

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曾令安南王进京晋见,但安南王不从,十余年间以各种借口不朝。1284年,元朝为控制云南等地和越南各国,以蒙古大将索多为帅,大举进入安南,并大败安南军。1285年,元军在安南兵败,大将索多也战死。1287年,元军在被迫撤出后,再次出兵安南, 后无果而还。1293年,忽必烈还想再征安南,但忽必烈未出兵就死了。此后,安南才不再受元朝侵略。

占城是过去越南南部的一个国家,为元朝的臣属国。1282年,元朝以占城扣留其使臣为名,派兵经海道攻占城。元军在索多率领下,大败占城军,后由于占城军队以游击战攻之,久战不胜,只好撤出。

1277年,元出使缅甸的使节因违反缅族习俗,被缅甸王处死。元朝遂起兵攻入缅甸,并大破缅军象队。1283年、1285年、1287年、1300年,元军又先后多次攻入缅国。

1300—1302年和1311年,元朝还曾两次派兵侵入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境内)等地。

(4)对爪哇等的侵略

1292年元世祖诏史弼将兵征爪哇,1292年12月史弼等率兵从泉州出发,经月后至爪哇,时正值爪哇国与邻国葛郎交战,爪哇军以其国土、户口和地图稗先诈降元军,使元军以其兵进攻葛郎,大败葛郎军队,然后爪哇军队趁元军不备,突然攻击,使元军被迫后撤300里,又行68日夜,才返抵泉州,死者达3000人之众。

在这几十年中,元朝的对外扩张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但这种扩张对元朝本身并无直接的好处,反而使元朝的元气大伤。

在元朝的对外扩张过程中,也曾有大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反对出兵攻日和南征。1285年,当忽必烈再议征日本时,吏部尚书刘宣上言曰: “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

地,死伤过半,连兵未解。且交趾与我接壤,蕞尔小邦,遣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索多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军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350]由于大臣的劝阻,元世祖才最后打消了再次伐日的念头。

1302年,也曾有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谏元成宗伐南方八百媳妇等国。他说:"八百媳妇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走,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管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刘深)罪,仍下明诏招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351]

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使国内百姓遭殃,大批粮食和物资用于对外征伐,以至于当遭遇连年自然灾害时,元朝无法救济,各地饥民蜂起,到处是揭竿而起的反元起义,严重动摇了元朝统治的基础,使元朝很快就在农民起义大军的攻击下灭亡了。

·第三节·
地缘大患东移与明朝的地缘政策

明朝是继秦汉隋唐和宋元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大王朝。在1368—1644年的276年中,明朝的疆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在初年,明朝在东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乌地河流域,后退到辽河流域,其西部疆界在河套西喇木伦河一线,后退至长城,在西北方向,明朝的疆界从今新疆哈密,退至嘉峪关, 在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

明朝的地缘又回到了宋之前历代中国王朝的老问题:在蒙古兵败退出中国内地后,明朝的北部重又面临着北部的东西蒙古部落的侵扰;但同时,明朝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在东南沿海,倭寇成为困扰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的主要问题。在北部和东南地患同时兴起之时,明朝把防御重点从防鞑靼转向防倭。在这一时期,明朝的地缘政治的主要问题是:

(一)
蒙古亡宋对明朝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明朝军队虽然在1368年将蒙古族赶出了内地,但蒙古亡宋的历史却给明朝以深刻的影响。明朝无论在军队的实力,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比过去的秦汉唐宋更加强大。它拥有1亿多人口,有250多万之众的庞大的军队(有490多个卫,每卫有约5600人),在270多年中,它的内部秩序基本是稳固和正常的。特别是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明朝却基本是一个地缘政治极为内向的国家。由于蒙古亡宋,明朝对外部力量,尤其是对北边的游牧民族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对整个外部世界都有一种不信任感。出于地缘的不安全感,明朝在整个存在期间都是以防御

为主，在地缘政治战略上采取保守主义和防御主义。尽管它的海上力量无可比拟，但它却从未倚靠它去从事对外殖民和侵略掠夺，反而采取了对外封闭的政策，禁止中国商民出海。尽管蒙古部落在明军的打击下逃至了大漠以北，且在长时间内力量远不如中国，但明朝却未想过要出兵去征服它。在日本处于分裂，但东南沿海又长年不断地遭受到倭寇骚扰的时候，明朝也没有想过要像蒙古那样，派其强大的海军去占领它。这一时期的明朝，可以说是专心致志地防守，它忙于修长城，忙于在沿海修防倭工事。但最后，它还是未能防住女真大军的入侵。

（二）
明朝的和平睦邻地缘和进贡—怀柔体制

除对北边的蒙古和短期内对安南用兵外，明朝在 270 多年中奉行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方针是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过去元朝兴兵伤国的教训，为明朝定下了和平地缘的基调。他在统一中国后，就向外派遣友好使者去周围国家，表达明朝的和平愿望。他早申谕臣下和子孙不可轻易对外用兵，以祖训形式，将周边的 15 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这些国家是：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白花、三佛齐、湓亨、浡泥等。他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 · 箴戒篇》）[352]当然，做为一个封建皇帝，朱元璋是从中国中心主义来认识这一问题的。他认为中国不需要与外部交往就能满足中国的一切。而"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353]，也就是说，外国对中国其实并无实际好处。

为了维系这种和平关系，明朝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种东亚的国际体系—明朝与周边国家的进贡—怀柔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1）中国从自己的实力出发，要求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中心地

位，其方式是其统治者应受中国策封，并由中国赐与其权力；(2)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国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其统治者拥有完全的处理国内问题的权力；(3)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负有一定的责任，如周边国家遭受它国的侵略，则中国有义务保护它。如后来朝鲜受日本侵略时，明朝曾两次出兵抗日，并将日本兵赶出朝鲜；另外，当周边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作为大国，负有维护秩序和主持正义的义务。如安南和占城这两个国家之间，占城经常向明朝控告安南进犯它，而明朝则多次劝告安南收敛。如 1369 年，占城使臣“言安南以兵侵犯”，朱元璋“遣使往观其事，谕以畏天守分之道。……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诏至，两国皆听命罢兵”(《明太祖实录》卷第四十七)[354]。后在安南多次不听劝告时，明朝才出兵伐之。有时候，明朝还要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主要是调解其内部冲突。如 15 世纪初，帖木儿死后，帖木儿帝国内部发生了争权斗争，为争夺汗位自相残杀。后明成祖进行劝告，说“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明史·西域传》四《哈烈传》)[355](4)表面上臣属国应当向明王朝进贡，但实际上明王朝为了维系这一体制，给予周边国家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其所给。由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对其物产并非真正的需要。相反，进贡国入朝时，明王朝除了给进贡国的国君以丰厚的回赠以外，还要给进贡使以大量的礼品。因此，各进贡国都愿意来中国献贡。这种“不平等”的往来使明朝负担很重，往往不得不限制其进贡的次数和进贡人员的人数。同时，还在相互贸易上给以对方以优惠。如明朝与安南的关系就是如此，明王朝要求安南三年一贡，使者人数 3—5 人即可，贡物也不要求太多。明王朝重的是这种形式，而并不在乎物品是否丰富。但安南因从明王朝的赏赐中所获甚丰，于是经常派人提前进贡，且次数很频繁，明皇帝不得不多次让其贡物无多，来朝勿频。

在这种进贡一怀柔体制中，尤以明与安南和朝鲜的关系为典型。安南在秦至唐的很长时间中曾被作为中国的内地，但在唐末时安南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后除在1407—1427年间外，安南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一怀柔体制中的一个成员。当安南的行为举止在明王朝看来有所越轨时，明王朝就要行使其中心国家的权力加以干涉。1406年，安南国相国黎氏杀国王陈氏自立为王，并请明朝为其赐封，要明朝承认。明成祖要其迎前国王之弟回国为王，并于1406年派5000兵马送陈天平回国，后为黎氏所伏杀，且明军也死伤大半。再加上安南兵又多次犯境，对占城等邻国也多有横暴，这些严重损害了中国这一中心国的地位和权威，因此明成祖在1406年对安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1407年，明朝大军攻占安南，本来要让陈氏复国，但求陈氏后人不得，于是改安南为交趾，下设府、州、县，由明朝直接管辖。到1427年，安南黎利发动反明独立战争，迫使明王朝撤兵。后又让黎利即位为王，重新恢复了进贡一怀柔体制，安南向明朝进贡，明对安南赐封并承认黎氏对安南的统治。此后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明灭亡。

所以明朝实行的进贡体制，当然是一种大国主义，有中国对周边一些国家的干涉，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并不能从表面字义上理解为是对周边国家的一种剥削和压迫、侵略和扩张，和西方后来的殖民主义也完全是两样。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中国统治者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这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之这是文化主义防卫性的表现：外国统治者假如要与中国交往就必须接受其条件，承认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356]

（三）

明朝地缘战略前期以北线地缘为重点的目的

在明初，元朝被推翻后，其蒙古族大部逃到了北方，但很快分裂

为几个部分，对明朝形成威胁的是在西部重新崛起的帖木儿帝国。13世纪形成的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一度分裂为东西二部，并且互相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但就在明朝创立时，1370年，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的西察合台的君主帖木儿渐渐征服并统一了中亚一带，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波斯和花剌子模等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一开始，帖木儿对明朝称臣纳贡，但在其力量强大起来后，就有了问鼎中原的野心，试图重建昔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帝国。1404年，帖木儿率领20万大军东征，但病死途中，一场大战争才得以避免。帖木儿死后，他的子孙改变了方针，奉行对明友好相处的政策，明成祖也把它纳入了明朝的进贡—怀柔体制之中，对帖木儿帝国给以优厚的赐与，特别是明吏部员外郎陈诚曾三次出访西北各地，使明朝后期与该地区保持了和平睦邻关系。

在15世纪，明朝的主要敌人是北部的蒙古部落。当时在中国的北方，其西部是蒙古族的瓦剌部落和东部的鞑靼部落。这两个部落经常南侵，在汉地进行抢掠，对中国的北部形成重大威胁。在明成祖时，明对它们采取了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和汉武帝与唐太宗一样，明成祖也多次派兵远击蒙古部落。比较大规模的远征有五次：1403年、1410年、1414年、1423年、1424年的远征。和历史上汉军攻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情况一样，当明朝大军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往后撤，使明军大军难以追歼；待明大军被迫收兵，他们又卷土重来，一切又都恢复如旧。明军最大规模时曾动用23万兵力，超过了过去的汉唐时的军力。

由于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整个明朝时期都存在蒙古族的侵扰。为了对付这种局面，明王朝再度实行秦汉时的保守防御政策：即在北线大规模的重修长城，构固军事防御线。在明成祖后，明军很少大规模的出兵追击敌人。这使蒙古部落有机会积累兵力。到1449年，瓦剌部在也先领导时一度强大起来，并不断东进，对明朝形成了重大威胁。明英宗曾率军队亲自到大同迎战，但被也先兵击败，明英

宗在怀来土木堡兵败被俘，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为北方游牧民族军队打败被俘的皇帝。直到明朝灭亡，也未能解决鞑靼问题。明未能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四）
明朝后期地缘政治的重点及其面临的局势

在明朝，中国地缘政治的一大变化就是，在整个地缘政治的格局中，海缘即中国与沿海国家的关系有很大发展和变化。由于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有可能扩大与沿海国家的交往；其次，中国在当时是经济比较发展的国家，在沿海国家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利用海上运输与中国发展贸易成为许多沿海国家的一种需要。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明朝的地缘政治也高度重视沿海地缘。这表现为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一是发展与沿海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巩固明政权的权力服务。在明成祖初即位时，地位不稳，希图利用扩展与沿海国家的关系来显示自己的威名，并把沿海国家囊括进进贡—怀柔体制之中。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发展中国与沿海国家的经济贸易，而在于有更多的国家来中国进贡，形成“万邦臣服”之势。因此，郑和每到一处，首先是向当地的国王赏赐明朝的物品，然后向其宣读大明皇帝的诏谕，要求其承认大明皇帝的权威，并要求其“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赐皆赏”[357]。最后邀请他们到中国来进贡，以获取更多的赏赐。这就是所谓的宣德化而柔远人。它的最终目标是扩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使各国能和平相处。

郑和七下西洋，其实主要是以扩大与中国与周边沿海国家的关系为主。他的活动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他每一次出访，都会使中国沿海国家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增加。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来华的国王都是中国周边沿海国家的国王。1411 年，满剌加（今马来西

亚境内)国王曾率妻子陪臣540多人入朝晋见,1419、1424、1433年满剌加王又曾3次到明朝;1417年,苏禄东王、西王、峒王曾同时到明进贡,后东王病逝于德州;1408年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国王来华,后病死于京,1412年,其新国王来中国进贡。还有麻剌朗国(今属菲律宾)的国王也于1420年进贡于明,1421年也是病死于福建。可见,明王朝的海上活动重点加强的是与中国沿海国家的关系。从经济上说,郑和下西洋是不合算的,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无意中也对明全力对付北部的蒙古和东边的日本,有较大的地缘政治的利益。

明朝的海缘政策的另一倾向是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对付越来越严重的海患。这其中的重点又在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海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相处的,元朝对日本的大举进攻,开始了两国长期冲突、战争、敌对的历史。

在明朝时,有三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两国冲突的局势。一是在元朝时就已产生的日本海盗到中国沿海抢劫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明因此加强了对日本的防范。其二是1380年,明丞相胡惟庸谋反被诛,朱元璋知道胡曾与日本勾结后,与日本关系一度中断。三是明在确定明与周边国家的进贡体制时,因日本人利用来华进贡之机做买卖且大有可图,因此, 日本人在来华进贡的人员、次数、携带的物品数量等方面,不肯遵守明对日的限制,为此两国也有不少磨擦。这也可说是较早发生的贸易矛盾。这三个问题后来不断发展,使中日两国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到后来,明与日本的这种冲突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矛盾,而演进成为日本对明朝的地缘安全形成两大威胁:

第一个威胁是日本海盗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到明朝中后期,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的日本海寇即倭寇,对中国北起辽东,南至浙江、福建的漫长的海疆形成了重大威胁。特别是在明嘉靖时,倭寇与中国沿海的盗匪,不法商人勾结,力量大增,甚至使明

朝的军队也多次为其所灭。这表明这一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边防问题,而是可以动摇明朝统治的重大问题。明朝对此采取的政策,一是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事,派官员督修城堡,二是在沿海倭寇经常袭扰的地区派驻重兵和精锐部队。也可以说,为了平息倭寇,明朝几乎动用了全国的人财物力,数十万人战死于与倭寇的战斗中。后在抗倭寇名将戚继光等的打击下,倭寇的威胁才稍为减弱。

第二个威胁是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一怀柔体制提出挑战,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 16 世纪末,日本的国力在统一后,有很大的增长,开始具有对外扩张性质。尤其是在丰臣秀吉当政时期,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的野心更加明显。1592 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第一次战争,攻占了朝鲜的大部分领土,其国王也逃到了中国,并向明王朝求援。明朝从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居这一理念出发,认为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遂派大军前往支援。在明大军的攻击下,日本军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求和。但 1597 年,日本军队在丰臣秀吉率领下,14 万兵马再次入朝,中国再次派兵入朝与朝军联合抗日。1598 年,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几乎全部被歼。这样日本的野心才得到遏制。

在北抗鞑靼,南防倭寇的征战中,明朝的国力大为下降。如仅用于第一次援朝战争的费用就达 1000 多万白银,第二次援朝战争又用了相当的财力,再加上修长城,修筑沿海防御工事,明朝的国库几乎一空。所以,明虽亡于李自成的起义,但与明朝地缘政治的这种形势也有一定联系。尤其是后来的李自成政权,在清兵的进攻面前,竟迅速土崩瓦解,以汉人为主导的政权再一次亡于北方的游牧民族。

·第四节·
1840 年前的清朝地缘政治

16 世纪末期,正当明朝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方的鞑靼和东方的倭

寇时,在中国东北部兴起了又一个女真部落的政权,也是第二个女真族的政权,号称后金。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各女真部落,并按照军政合一的制度建立了八旗制。努尔哈赤用它征服了东北地区,把这一地区的汉人置于八旗之中。

若论实力,后金是无法与当时的明朝相比的。李自成的起义军力量也比满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1644 年,清军入关之前,清兵的总兵力不过 16 万多人,在满清统治下的汉人和满人也不过才 300 多万,而当时的汉族政权统治下的人口约有 1 亿多,军队人数在 100 万左右。何以满清能以这样少的兵力入主中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统治中国全国和北方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呢?

除了明朝军队在与北方的鞑靼和东方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大量消耗之外,除了李自成的军队在推翻明朝之后迅速腐化并丧失其作战能力外,努尔哈赤等人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较好的地缘战略的运用。如,在入关之前,满清先出兵征服了东南的朝鲜,然后又与西部的蒙古部族建立了联盟关系,再后来是对东北地区的汉人实行吸收和利用政策。在满人的政权中有相当多的汉人在为满人出谋划策,尤其是后来吴三桂的军队与满清军队一起进攻李自成的部队,并为满清征服中国起了很大作用。

和元朝不同,满清政权建立后,重视对汉人实行攻心政策,广泛地利用汉人,吸收汉人参政,使满清与汉人的对立和元朝时相比大大减弱了。这使满人不仅能征服中国,而且对中国实行了将近 280 年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清朝先后恢复了中国对蒙古和西北地区的管辖权,对西藏的统治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巩固。它的版图在其最盛的 1820 年时西到今天的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今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到海,包括台湾和南海,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广西等,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第二大版图。

在地缘政治方面，清朝在1840年前的主要特点是：

（一）
清朝地缘政治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中俄关系

俄国本与中国和东亚毫不相干，但从16世纪起，俄罗斯开始了它的长达300多年的对外大扩张的进程。到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邻居，与中国在西伯利亚接壤。到17世纪初，俄罗斯开始与中国发生接触和冲突。俄罗斯在地域性蚕食地缘战略的指导下，向东一步步的推进，终于在黑龙江流域与清朝迎头相撞。1643年，俄波雅科夫率一批俄军侵入黑龙江，被当地中国居民歼灭。此后，俄军又多次进入这一区域，引起了清朝的重视。但在俄罗斯派人对中国刺探情况时，中国的清政府却无动于衷，对正在形成的对中国的又一北部的地缘政治的重要对手一无所知。1668—1676年，中俄两国曾多次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进行会谈，但一无所获，终于在1685年发生了雅克萨之战。清军出动精锐部队近万人，对驻在雅克萨的俄军进行包围，一度摧毁了俄军的这一重要据点。1689年，中俄两国在尼布楚达成协议。《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额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界。1727年，中俄两国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对遏制俄国向东扩张的速度有一定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对清朝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这两个条约使中俄两国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由于中俄两国的边界大体确定，中俄两国的利益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但俄罗斯在这个外交斗争中得到的利益更大，因此后来刺激了俄罗斯进一步向东扩张的胃口。1727年的条约使俄国轻易得到了原为中国的一大片领土。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朝解决西北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意义。在这一时间内，清朝的北部地缘政策的重点在经略西北，对其中的一些部落与俄勾结较为警惕，与俄罗斯签

订两个条约,对制止俄罗斯进一步卷入这一地区有一定的作用。如1688年,准噶尔部蒙古族叛乱,清派大军进击才将其平息。1715—1716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廷不得不再次进兵。如果此时清朝在西北和北方两地同时处在紧张状态,对清是不利的。

总的来说,1840年前清朝在处理中国的新的邻居,一个心怀叵测的地缘对手的关系方面,基本是得体的,做到了不亢不卑,有理有节。这主要是由于清当时的实力还处在强盛状态,而俄罗斯方面受俄土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还未能全力以赴的东进。虽然俄罗斯在贸易、边界方面占了一些便宜,但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中国在一些问题上还能持较强硬的立场。如1718—1725年,清在获悉俄不断开启边事,并违反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关贸易的规定后,于1718年暂停了中俄贸易,又于1722年将俄来华的贸易谈判代表驱逐回国。1771年1—6月,西迁俄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因不堪俄压迫,举部17万人东归祖国。俄政府曾派员与清廷交涉,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清将土尔扈特人交回。但清朝回复说:"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清高宗实录》卷第九百一十四)[358]俄后只好作罢。

但这一时期清在对俄关系上也有一些较大的失误。如,在俄国从西向东大扩张的进程中,俄曾多次派人来华了解中国的情况,先后在1618、1654、1660、1668、1670、1675、1692、1720、1725年等多次有使团到中国,其中1725年俄来华的人数达1600人之多。俄对华的了解要大大多于清对俄的了解,因此在边界和贸易谈判中,俄代表较熟悉和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及中俄边界的情况;而中方对俄知之不多,只在1731年才有第一个中方使团到俄,此后也很少有人去俄。由于中方对俄的情况和中俄边界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在谈判中往往对俄的要求轻易让步,使俄方获得意外收获。如在恰克图边界谈判时,由于中方熟悉情况的人中途被召回,中方只好完全按俄方提出的边界方案为基础进行,结果使中国让出了一大片领土。在

中国尚有实力时，这种缺陷带来的危害还不明显，到后来俄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的最危险的敌人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吃了大亏。

清朝在处理地缘政治方面缺乏贸易的动力，因而不能正确处理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俄向东的扩张，除占领更多的领土外，其中的一个最有力的动机就是要对华进行贸易。俄向中国出售毛皮可获大量收入，而中国的丰富的物产也可使俄商有利可图。如1658年沙皇使臣阿布林来华所带毛皮获利一倍以上，1672年，阿再次来华，所带毛皮获利三倍以上。因此，俄急于进入中国进行贸易，每次来华谈判都要提出贸易问题，而且在达成贸易协定之后，俄又往往超过所规定的贸易的人数和所带货物的数量。俄可说是第一个获取在华贸易特权的国家。但中国对俄没有贸易动力，没有这种意识，也不知道可利用这种机会发展中国的贸易，更不善于利用这种机会来争取对华更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清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清朝在这一时期处理对俄关系的第三个错误是，对俄在地缘政治方面到底对中国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不清楚，以为签订几个条约，就万事大吉，对俄缺少地缘战略意识。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中俄力量大体相当，但清没有长期的对俄战略。本来清可以在尼布楚一线构筑防御工事，作长期打算，但清却仅仅将俄军在雅克萨的工事拆毁了事，结果俄军在1665年、1685年二次被赶出雅克萨之后，很容易地在之后又重新返回。1686年清军试图再次攻打雅克萨时，俄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国此后进入半殖民地的过程不可逆转，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也无法抵挡，当然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力大大不如西方，尤其是在军事力量上更落后于西方。但如果当时有地缘战略意识，那么俄罗斯的东进可能还会延缓。

（二）

进贡—怀柔体制出现危机，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关系趋于紧张

这一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最重大的变化是，西方列强一步步

逼近中国,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一个个为西方国家所控制,从而使中国再次面临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中国在东亚、中亚、东南亚都失去了过去的中心地位。但一方面中国自身尚未认识到这种大趋势,极力维护正在崩溃中的旧体制;另一方面,西方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与中国进行争夺。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是,中国不仅对原来的进贡体制中的国家进行频繁的干预,而且又把这一种过时的旧体制扩大到正在东进的西方国家身上,把西方国家看成是到东方向中国进贡来的藩属国,要求它们的使节向中国的皇帝行朝贡礼仪,不仅要在国书中对清朝表示谦恭,而且要向中国皇帝进献贡品,中国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施以恩惠,对其进行怀柔。如果说一开始有些西方国家是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话,如果说中国在开始还存在与一些西方国家保持比较友好关系的话,那么中国试图把西方国家套进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怀柔体制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和其他愚昧的对西方政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西方国家,促使它们一致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此,中国后来的地缘政治的总危机的祸根是在这一时期种下的。

西方国家的东进,不仅直接对中国形成了威胁,而且也影响到了中国与周边邻居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清朝继承了过去中国传统的进贡体系,继续按过去的进贡体系的老规矩办事。

对那些遵守进贡体制规矩的国家,清朝继续给以优惠和援助。在所有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朝鲜是始终对中国比较友好且对中国的中心王朝表示恭顺的国家,因而也是清朝对其给以许多优惠的国家。在后金政权和清朝立国之初,朝曾不予承认,多次与明军一起对其进行军事进攻,清曾在 1627 年和 1636 年两次发大兵进攻朝鲜,迫使朝鲜中断与明朝的联系,奉清朝为新的宗主,而清朝对此也免予追究。从 1644 年到 1840 年,近两百年中朝鲜对清之间未发生过任何大的冲突, 双方友好往来,使臣不断。清朝对朝鲜的特别优惠在于,朝鲜使臣进贡的时间限制较别国为宽, “顺治初年定,凡外国贡使

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十)[359]。清朝还特许朝鲜和中国在边境开设边境贸易，并曾多次调粮运入朝鲜，援助朝鲜渡过国内的粮荒。如 1698 年就有三万石粮运往朝鲜。在这时与清有特殊友好的国家还有琉球。

清与当时的暹罗(今泰国)关系也一直不错。暹罗国王多次到中国进贡并求策封。两国贸易也往来不断。清对暹罗与中国的贸易也持优惠政策，“贡使所带货物，听随便贸易，免其征税”(《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七)[360]。

在这一时期，清与苏禄国(菲律宾)的关系也是在进贡体制中进行的。清只对苏禄国来华进贡的使臣给予优厚的赏赐，对可能超越这一体制的事情，也是加以拒绝的。如 1744 年，清乾隆在苏禄请求其裁决与吕宋商人之间的纠纷时，乾隆表示不卷入，认为“只可听其自行办理，未便有所袒护，以后如遇如此事情，惟有晓以大义，俾知中国体制，不敢分外干求”(《清高宗实录》卷二百)[361]。1754 年，当苏禄国王请以苏禄国土地和人口入中国版籍时，乾隆帝也以中国不扩张疆土为由加以谢绝。

但清与越南的关系却不一样。越南在 1771 年发生归仁三阮西山军起义，并先后消灭了南方的阮氏集团和北方的黎氏集团，安南国王黎维祁逃到中国，请求清朝援助。清朝把不经清同意的政权更替均视为非法，为进贡体制所不容，遂于 1771 年进兵越南，攻占今河内，扶黎氏为安南王。但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的清军在 1789 年为西山军所败，清兵死伤大半，只好逃回国内，阮光平领导的西山军虽然在此后向清表示认罪，清也策封阮为安南王。自此清越关系明和暗斗。逃到海上的原南方的阮氏集团，后在法国支持下，从国外借来救兵，于 1802 年击败西山政权，建立了统一的越南国。虽然越南对清朝进贡如旧，但由于法国与阮福映集团关系密切，后又出兵侵占了越南，中国在南部的地缘安全受到了新的威胁。

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出现麻烦。1763—1790年,清与缅甸贡榜王朝曾多次交战;1790—1793年,廓尔喀王国(今尼泊尔)曾与清发生多次战争;19世纪初,中国的中亚藩属国浩罕多次兴兵侵扰中国新疆,而清朝此时已对其毫无办法。阿富汗也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在19世纪20—30年代已成为英俄角逐之地,清逐渐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到19世纪中叶,清朝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进贡体制,但实际上这一体制已经危机四伏了。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发生摧毁这一体制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第五节·

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实践和理论的总结

(一)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基本总结

(1)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史大体可分四个时期

大致上可把公元前1098年前后西周兴起作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发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讨伐殷纣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地缘政治的一些基本现象,即地缘上接近的一些地方小国联合起来进攻共同敌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吕尚—姜太公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杰出人物。从公元前约1098年前后至1840年,可把这约3000千年的地缘政治史大体上分成四个时期:

①西周时期。这是地缘政治的初期阶段。主要特点是不自觉地运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基本原则,在西周政权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何对付未纳入西周政权体制之内的周边的戎狄蛮夷。

②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形成了比较成型的国家形式,因此地缘政治更经常和大量

体现在各个国家政权的关系上。若干个小国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合并成10多个国家,再进一步演化7个较大的国家。这一变化为地缘政治的实施和展开提供了特别理想的时机和机会。

③秦汉至宋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时期,也是各民族空前大融合的时期。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北方民族不断进入较发展的南方,引起了中国政治地缘的不断的变化和演进。在这时期,即有统一的王朝在对付周边的游牧民族上制定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和策略,也有分裂时期多国互相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三国时期,南北朝对立时期和宋、辽一金、西夏三权对立时期,地缘政治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个政权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本身实力的强弱,而且也取决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运用。

④元明清时期。这是三个统一的大王朝在国内政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在处理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运用地缘政治的谋略的时期,主要体现在建立和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怀柔体制上,体现在中国这一中心国家与周边的藩属国家的关系上。

(2)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中国的地缘政治史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变化,如历史发展阶段的演进,王朝的兴亡,政权的更迭,都是与地缘政治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有六大历史的变化是与地缘政治极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①西周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申侯引西戎,犬戎攻周并杀周幽王于骊山下,由此中国进入东周列国时期。

②中国的统一和秦之兴亡。在东周列国中,为何独秦得以统一中国?它并不是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也并不是各国中唯一的强国。秦的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善于运用地缘政治的战略,其中以横破纵,各个击破和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而秦之迅速灭亡,也在于急于对外用兵,对北方的匈奴连年

征战。

③三国鼎立。没有刘备和诸葛亮的进蜀立国，联吴抗曹的地缘战略，也就不会有三国时代。

④隋朝的灭亡。隋朝统一中国时国力是比较强盛的，但连年对外用兵，尤其是三次大规模地征辽东，大大加速了隋的灭亡。

⑤北宋和南宋的灭亡。两宋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几乎是一样的，由于同样的地缘战略的错误，两宋都一样亡于北方民族的南进。

⑥元朝的灭亡与地缘扩张有较密切的联系。蒙古倾全力向外扩张，使其对本部和中国的控制大大削弱。如果蒙古大军把其兵力集中于东亚，元朝可能会延续更长时间，而不至于在短短的 100 年内就灭亡。

(3)中国历朝地缘政治的重心始终是在北方

除明朝一度把重心转到防范日本，对东南海防极为重视外，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毫无例外地高度重视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防范。在历史上，中国的北方先后出现过强大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鞑靼等，它们先后给统治中国的汉人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南进并统治北方甚至统治全中国：

①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南进并在北方建立了一系列政权；

②两宋时在北方的辽金夏等国的出现；

③蒙古族入主中原及元朝的建立；

④清朝对中国的 280 年的统治。

这些民族政权的共同特点是游牧民族，人数不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水平均较汉族的农耕文明低，在其综合力量方面比汉族地区要弱得多。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大工业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未出现之前，游牧民族的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全族皆战的军事和准军事化的组织制度，骁勇而灵活的作战方式，在冷兵器时代拥有较大

的优势。这是它们得以击败比它们强大得多的汉族政权的主要因素。他们南进的目标也较明确,即夺取富裕的南方。

而汉人为主的政权和国家,虽然在一些时间内也曾在军事上取得过很大的胜利,但在不断进攻的北方民族面前,基本上是处在守势。这可能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第一,是地理和气候因素。汉人不习惯北方的寒冷的自然条件,不愿久居驻守在寒冷地带,因此即使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多半是以主动撤离为结束,很少在北方长期驻守下去。第二,是经济因素。汉人在远离农业区的情况下,由于距离遥远,又受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不能保障供给,而且在军队中的汉人在条件更为艰苦的北方也会因生活不如在相对富裕的南方地区而滋生思乡情绪,作战的意志容易低落。第三,是文化因素。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反战意识,和平意识,乡土意识,作战士气不高。第四,是军事因素。在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汉兵缺乏善于作战的战马,军队多以步兵为主,因此虽然在综合国力上较北方的游牧民族为强,但作战能力不如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往往在军事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也不能在战斗中取胜。

中国的地缘政治的这种特点,同时也说明,在地缘政治中,一个国家的大小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大国和强国并不总是对其邻国构成威胁。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邻国形成地缘威胁,主要应当看其发展的趋势,看其军队的作战能力,看其掌权集团的政策。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史中,固然中国始终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大国,在相当长时期中也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也有过中国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时期,如对朝鲜和越南曾有多次征战,但总的来说,不是中国对其邻国构成了威胁,而是自身不断受到北方的看起来不大,但却具好战性的游牧民族国家的攻击。

(4)中国的进贡体制具有大国主义倾向,但它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大国主义,在地缘政治中体现为对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给以优惠,不以扩张土地为目的。

和周边国家相比，中国长期是一个大国，这无疑要对其他邻国产生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包括众多的周边国家在内的进贡—怀柔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至尊的地位，充当着这些封建国家的总君主的角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的合法性要由中国的封建皇帝来认可，王位的更迭、新政权的产生要由中国来策封和承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国主义。中国在较长时期中充当着这一地区的政治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它是这一地区政治稳定的核心，但在许多时候也是这一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国主义，但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中，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大国主义，一种是带有扩张色彩的大国主义，以直接统治邻国，吞并其土地掠夺其财富为目的。这可以元朝为代表。但这种倾向在中国的历史中只是偶然出现的。在汉人主政的几千年时间中，只有秦汉对越南的征服和统治，隋唐对朝鲜的征伐，明清对越南的征战等带有这种特点，它只占极少数时间，而且只出现在对越南和朝鲜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上。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中占主流的大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大国主义：它主要体现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认为中国文化高于其他民族，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优于其他民族，而周边国家在各个方面都不如中国，因此中国自然应处于至高无上和至尊的地位，应当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它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体现为对其他国家的一种轻视，常以高于它国统治者的"万国天子"自居，并强烈的要求周边国家承认这种地位，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武力。反之，只要这些国家对中国恭敬从命，承认中国封建王朝的权威，在形式上常向中国的统治者进呈贡物，不管这些贡物价值如何，都会使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对这些国家也会报以优厚的赏赐。总起来说，这种文化大国主义与军事政治扩张性的大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以追求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权威和威信为主，如须用中国的朝代的年号，对中国皇帝须用尊称，而不以扩张领土为

目的,不对其他国家进行直接统治,一般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第二,以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为主要形式,进贡应定期进行,最好由统治者每隔一定时限来华晋见;第三,作为回报和交换,中国的统治者对其给以“父爱”,这种父爱的形式:①在政治上,对其进行策封,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给以封号,玉玺等;②在军事上,帮助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必要时出兵给以军事援助;③在对外关系上,调解其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冲突和纠纷,如受外敌侵略,中国可向其提供军事帮助,甚至联合与入侵者作战;④在经济上,对进贡国给以数倍于进贡品的物资,对其贸易给以特别的优惠。这些形式较多的是体现中国以大对小,以上对下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⑤在地缘上,中国的文化大国主义不追求对土地的扩张,大部分的统治者对中国领土的扩张没有很大的兴趣,许多统治者还把土地的扩大看成一种负担,认为它并不能给王朝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要使王朝付出重大代价。汉、唐、清等朝皇帝都曾经拒绝一些小国以土地和人口来归附的请求。

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大国主义不是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也不追求特殊的利益,甚至是在对自己不利和不实的情况下实现这种大国主义的。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慷慨赠与的、贪图虚名的大国主义。这和后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完全是不同的。

即使是对外进行征战的扩张主义,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史上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进攻性的扩张主义,以元朝为代表;一种是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增加其防御的空间,例如汉、唐时对北方的匈奴、突厥的多次进攻和讨伐。

(二)
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基本总结

在中国几千年的地缘政治实践中,中国产生和涌现了许多杰出

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和地缘战略家、地缘军事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地缘接近的国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力图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知识。在这些人中间,有纯粹的学者,如老子等,但更多的是当时的重要人物:军事指挥家、政治家、谋略家、外交家,还有许多皇帝——最高的统治者。他们在实践中提出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或独自进行理论探索。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地缘政治学说,使之在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世所公认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学说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完全可以说,地缘政治的科学概念虽然产生在西方,但起源却是在中国。不论从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所涉及的范围的广泛性,还是从它的内容的深刻性上看,它都远远超出被誉为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开创和奠基者的拉采尔、豪斯浩弗、克里斯托弗等人提出的地缘政治学的思想。中国的管子、孙子、诸葛亮等,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甚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地缘政治,都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十分庞大的体系,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八大理论:

(1)地缘政治格局论或地缘政治体系论

在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建立一种地区政治秩序,以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能在一个相对有序稳定、和平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家们构筑了三种体系或格局:

第一种是霸国体系。即在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中,有二个和二个以上的较强大的国家,那么就可建立以一个主要大国主导的,以多个强国合作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体系。当然,这个霸国体系不是一个单极体系,而是多极体系,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霸国是处在经常变动的状态之下。霸国体系的基础是公认的“仁义”即公正,利益共享,互助互利,各国共同遵守达成的协议和遵守体系的秩序,如不对邻国进

行不义之战，不容许随意变更它国的统治者等。但是，如果一国的行为违反公认的一些行为准则，如对共同的国家元首(周天子)不敬，对本国的百姓统治过于残暴，一国的君主的更替违反规矩等，那么其他国家也可在霸国的主导下，主持公道，进行讨伐。这一体系以春秋时的齐国称霸为典型。战国时的七国争霸也类似于这一体系。它的多极性更强，其中的几个国家的实力更加接近，因而斗争更激烈，体系也较前更不稳定。

第二种是进贡—怀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公认的中心国家。在汉、唐、元、明、清时，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怀柔体系。这是一个单极体系，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而且在一组地缘国家中没有争议的强国和大国，这就是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由于没有实力相当的国家来争夺霸权，因此地缘政治秩序相对稳定。

第三种是“羁縻体系”。它是中国的封建王朝用来处理与周边外围地区的民族的一种形式。这些周边民族，由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组织还不定型，因此不稳定，时而游移于体系之外，时而又进入这一体系。对它们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也不可能直接统治，于是使用了不同于对待周边国家的地缘政策。这是一种和平的方法，在周边民族中间设置一些与中央王朝有关系但又不同于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单位，由少数民族自己进行管理，用这种方法来束缚、牵制和笼络之，使其能在边境地区保持安宁和稳定。

(2)地缘政治基础论

中国历代的地缘政治家都把富国强兵视为地缘政治的第一基础，认为无论外交手段多么高明，地缘战略多么正确，如果一个国家不富不强，也不能在地缘政治中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一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的斗争中立足的主要内容。正如孙子所说，兵者，国家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故整军备战为第一要义。但它又不是唯一的基础，经济发展，国民智育的增进，国家内部

的团结，统治者与老百姓的齐心协力，统治者的贤明和能力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和平地缘论

在众多的地缘政治的论述中，关于保持与邻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反对战争的论述，是很多的。它具体体现在：小国寡民论。这是老子的一种消极的和平观。各国不发生往来，就可以避免发生战争；墨子的非攻兼爱论，反对各国间进行的各种战争，主张各国互助互利；和亲论主张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和民族结为亲戚，这并不完全是一种临时的策略；怀柔论和安抚论都主张对周边国家实行优惠的经济政策，给以大量的赠与，使其与中国保持友好和平关系。在中国历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军备不可无，战不可不打，兵不可不养，但都认为兵者乃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认为乐战者亡，好战者亡，穷兵者亡，许多人既重战、备战，也主张慎战、少战。

(4)地缘战略和策略论

中国的地缘政治家们提出了多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是孙子等提出的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甲兵无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这是最高的地缘战略。除此而外，他们还提出了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运用不同的地缘战略。这些战略是：

①近亲远礼，对远近国家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都一样亲近；

②全近攻远，稳定近邻国家，攻击距本国较远的国家；

③服近强远，即实行威慑战略，使邻近国家不敢轻易对本国怀不轨之心，使远方的国家也慑于本国的力量强大而不敢进犯；

④合小攻大，合弱攻强，合弱攻弱，连横合纵；

⑤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⑥不结盟和独立自主战略。

这些地缘战略的核心，在于根据国家的对外形势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战略盟友，全力以赴地对付主要的敌人。

在地缘政治的策略方面，中国的古代地缘政治学说重视利用地

缘接近这一特点，提出用边民刺探对方情报，经常进行外交往来以了解对方的动向，善于使用间谍，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等。

(5)地理地缘论

主张对自然地理地势地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理论。以孙子、吴子等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家着重探讨了军事地缘学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的科学见解。这些思想已成为世界军事地缘学的宝贵财富，为世人所称道；而以管子、苏秦、张仪、诸葛亮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则着重发展了政治地理学或政治地缘学，对地形地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及其外交战略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在实践中提出了精彩的地缘战略理论。尤其是管子，在这一方面有极为深刻的阐述。

(6)比较地缘论

这一理论认为，在一组地理接近的有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比较的态势，一个国家在这组国家群中是否安全，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要看与其接近的邻居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基本态势。如果天下皆治己独乱，天下皆合己独孤，天下皆险己独易，那么这个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7)邻国邻边论

这一理论主要从两国接壤的事实出发，对如何处理两国间的日常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思想主要有：对邻国要亲善，要善待邻国，不以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解决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宋朝时还特别强调屯边、养边、防边、治边，旨在保证边界安宁；正确处理好诸如边民越界，边民因一些经济来往发生的纠纷等问题。管子尤其提出了相邻的两国要进行经济开放的思想，重视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认为经济互利或经济制裁在调节两国关系中可起较大作用。

(8)国家地缘关系论

这一理论从地理接近的多个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它把

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分为不同类型,主张建立大国一小国,强国一弱国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的是小国弱国应尊重和信任大国强国,大国强国应照顾小国弱国利益,尤其应从经济和军事上帮助小国,承担大国和强国对小国和弱国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应从变动的角度来看待相互关系,大国强国如果一味骄傲,可能会转变为弱国,而小国在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并非永远受大国强国的摆布,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大国强国和弱国小国都有自己的地位。

上述思想有许多内容直到今天还有其借鉴意义,可以为今天所用。

第六章

近现代中国地缘政治危机与统治者的丧权辱国

近现代中国地缘政治危机发生于1840—1949年约109年的时间里。当时古老、落后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危机。

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朝贡）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造成了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使中国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第一节·
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了由独立自主国家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地缘政治危机的序幕。从1840—1911年，中国的地缘危机先后出现了3次高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为全线危机。第一次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

片战争，用炮舰初步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的地缘形势每况愈下，中国地缘外交被迫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总背景下进行。第二次地缘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周边和边疆频频告急：日美侵略台湾；日本并吞琉球；英国入侵缅甸，在云南制造了“马嘉理事件”；还有俄英窥视新疆。中国的地缘危机在加深。第三次地缘危机高峰发生在19世纪80—9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点。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3次大的侵华战争，即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通过这些战争，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地缘危机发展为全线危机。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周边宗藩（朝贡）体系的瓦解

自秦汉2000多年来，中华帝国都是一个拥有宗藩结构的国家体系。历朝都有不少的属国和藩邦，它们与中国形成藩属关系。但这种藩属关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关系以及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有根本区别。这种藩属关系尽管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并不存在国际监护问题或实际的统治；同时中国政府对属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例如，1392年，高丽大将军李成桂自立为王，明太祖朱元璋未加干涉。中国对属国的政策主要体现为册封和朝贡制度。册封就是对周边国家的首长赐给封号。如汉朝皇帝曾封倭国一部为“汉委奴王”，封高句丽统治者为“侯”等等。与此相联系还有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就是要求属国定期向中国贡献礼物。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属国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在政治上宣德于外，远近归心；同时中国皇帝对朝贡者也给予巨额的回赐，通过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以达到怀柔和羁縻的目的。

1644年取代明朝的满清王朝，继承了先前王朝遗留的传统宗藩

体系,先后与周围的大部分邻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当时清朝的属国主要有:朝鲜、越南、琉球、缅甸、浩罕汗国、老挝、不丹等。清政府认为中国是地处“中央”的天朝上国,各国与它的官方往来都是万方来朝。清朝对属国的政策,仍然是“册封”与“朝贡”。如遇属国国君即位,中国朝廷要派遣使臣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属国则被要求定期派使臣到中国都城向皇帝进贡,如朝鲜一年一贡,琉球、越南两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同时中国作为宗主国,对前来朝贡的使臣也要设宴款待,优厚赏赐。清朝与周围邻国的宗藩关系,除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以外,也有地缘外交上的意义。清朝实行“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坚持《诗经》中所谓的“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松散的政治联盟,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所谓“天子守在四夷”的地缘防御体系。[362]因此,周边藩属的生存和安全,与中国关系极大,可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19世纪60—70年代,西方列强在初步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开始侵略和吞并中国周边国家。“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外国列强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吞食。”[363]1824—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略战争逐步占领缅甸,并将其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1883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95年日本迫使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在1910年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903年,沙俄灭亡浩罕汗国。1913—1915年,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到19世纪末,清朝的藩属已基本丧失,清政府“抚有四夷”的局面已经解体。中国周围的弱小邻国已几乎全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东亚社会存在近2000年的宗藩体系终于瓦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完全的改变。这就是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危机的第一个特征。

（二）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周边宗藩体系的瓦解，使中国丧失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那么，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则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被动。中国不仅未能在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中取得作为平等成员的资格，相反沦为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

据统计，从1689—1949年，中国共与外国签定了约1182件书面形式的外交文件。[364]从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定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其中英国占163个，日本占153个，沙俄占104个，法国占73个，德国占47个，美国占41个，比利时占26个，葡萄牙占13个，意大利占7个，荷兰占5个，奥地利占5个，西班牙占4个，其他国家占68个。[365]

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内容却只有一个，就是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反映出当时中国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其中除正式的条约、和约、界约和协定外，还有所谓的：一、“专条”。如中日关于台湾“生番”的北京专条。二、“合同”。大多数是为解决铁路借款、合办铁路及其他经济事务的，如1898年中美订立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等。三、“章程”。如1843年中英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四、附约。如中日1905年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等。五、证明书。如中国秘鲁废除苛例证明书等。六、“租约”。如1898年的《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等。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和利益。这些特权和利益包括：

驻军权。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第9款的规定：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享有驻兵的特权。该条款称：“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

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366]

内河航行权。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只不仅可以在中国领海任意往来，而且可以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如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10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具可通商”，并“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通商之区”[367]。

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指一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对居住在驻在国领土上的本国公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这种制度是西方列强侵犯弱小国家主权、掠夺弱小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是受领事裁判制度危害最深、时间最长的国家。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在华享受领事裁判权。“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照办。”[368]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了罪，中国官员不能根据中国法律来惩罚他，只能交给英国领事按英律治办。此后约有20多个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这种特权。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才被迫放弃此种权利。

自由传教权。1844年，中法签定《黄浦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取得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医院、学堂的权利。同时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369]实际上要求清政府保护法人在华自由传教。1846年在法国的威胁下，清政府正式取消对天主教的限制，并发还过去没收的天主教堂。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取得了在华传教的自由。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许多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在华的谋士和间谍。

海关管理权。1853年，英、美、法三国，以上海小刀会起义使“海关行政陷于停顿”为借口，迫使上海道台在次年6月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并于同年公布英、美、法“三国领事通

告”，攫取了上海海关管理大权。从此，帝国主义控制了上海海关，并通过委任外国人担任各地海关的税务司，控制了全中国的海关。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把持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关税收支权也统统丧失。海关长期成为西方列强侵掠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设立租界权。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永久居住。[370]这一规定后来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各口岸建立“租界”的根据。1853年，英国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不久，美国和法国也在上海建立了租界。1849年，英、美在上海的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最大时面积达到8万亩以上。1854年，公共租界设立“工部局”。最多时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多达几十处，分布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福州、厦门、汉口、九江、长沙、沙市和烟台等城市。在“租界”内，帝国主义侵夺中国主权，形成国中之国，并使租界逐步发展成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桥头堡。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特别规定：英国对中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该条约称：“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371]后来其他列强也群起效法，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

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一次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定了无数的不平等条约，也勒索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据统计，全部赔款约在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372]

割占和蚕食中国领土。1843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第3款规定：清政府“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373]。《南京条约》的签定和香港割让英国，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以后其他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大片河山沦入帝国主义之手。仅俄国一国就侵占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外国列强享有的特权和利益,正是中国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中国地缘政治发生全线危机,使中国逐步丧失独立自主,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就是近代中国地缘政治全线危机的第二个特征。

(三)
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地缘格局

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危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地缘的主要威胁通常来自北方,而且是来自于北方大陆的草原地带。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海防大门被打开,敌人来自四面八方。而且敌人之强大,敌人之多,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1858年和1860年,北面的沙俄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分别打开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防的大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定和1883年《中法和约》的签署,英法打开了中国西南边防的大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日本占据台湾和朝鲜,中国的东北和东南从此失去重要屏障。《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列强以日本为榜样,纷纷在华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在其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法国割去云南省一部,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英国割去野人山之一部分,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强租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的各岛屿;德国强租胶州湾为军港;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从夺取的侵略基地出发,西方帝国主义还互相承认"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及云南、两广的一部分属英国;云南、两广的另一部分属法国;山东属德国;福建属日本;长城以北属沙俄。当时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在华夺取"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获得了其他列强的同意。美国要求实行利益均占,共同分享诸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

切侵略特权和利益。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对于当时中国地缘的全线危机和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康有为曾有过忧心如焚的描述。他写到:“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而且由于政府的腐败,“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长期以往,“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374]。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英勇斗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才被迫放弃联合瓜分中国的罪恶计划。

1911年,中国发生推翻满清统治的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中国近代的地缘政治危机才暂告一段落。

·第二节·

近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沙俄和日本

(一)

沙俄:中国地缘政治的北部大敌

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但从中国地缘政治危机中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和日本。正如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

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375]

沙俄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从历史上看,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原来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并不接壤。1552年沙俄侵占了喀山汗国,打开了入侵亚洲的大门,开始向东扩张。1581年,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推进到西伯利亚。1598年,征服了西伯利亚的古楚汗王朝。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沙俄以风卷残云之势,鲸吞了西伯利亚的大半,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17世纪中叶,沙俄开始成为中国的陆上邻国,并对我东北边疆进行侵略。1643年,沙俄进一步侵入黑龙江流域,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尼布楚和雅克萨等边境城镇。当时国势比较强盛的清朝政府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奋起自卫还击,大败俄军,收复失地,制止了沙俄势力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势头。1689年9月8日,中俄双方签定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376]1727年,中俄又签定了《布连斯奇界约》,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于中国的西部边界,当时位于巴尔喀什湖,离俄国的疆界还很遥远。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衰落,竟至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沙俄乘机对我国东北和西北进行大量侵略活动。1850年8月,强占我黑龙江口的庙街,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4月,沙俄侵占中国的库页岛。次年,俄国军队多次侵入黑龙江下游地区,并建立居民点。1856年底,沙俄公然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立滨海省,以庙街为首府,把大片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与此同时,沙俄也扩张到中国西部地区。1846年,俄军侵入我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很快又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1851年8月6日,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俄《伊宁条约》。该条约同意开

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允许俄商在彼居住,修建房屋及免税贸易,并给予俄人领事裁判权。[377]1853年,沙俄完成了对哈萨克草原地区的占领,开始进兵中亚细亚南部的浩罕、布哈拉和西瓦三个汗国。到1884年,它已把全部中亚细亚约3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征服中亚细亚之后,沙俄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沙俄是攫取中国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沙俄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它攫取领土的野心更是贪得无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仅45年的时间里,沙俄利用陆上地缘之便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单独和伙同其他列强,多次侵略中国,强迫清王朝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占和攫取了中国共计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面积之大,约等于3个法国,12个捷克和斯洛伐克。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趁火打劫,出兵东北,强迫清朝政府地方官员与其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该条约完全毁弃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重新规定中俄东段边界:“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右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378]通过《瑷珲条约》,沙俄一次就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两国共管之地,以便将来沙俄兼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沙俄又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承认《瑷珲条约》中关于割让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条款,而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所谓“中俄共管”的领土划归俄国。《北京条约》还同意了沙俄关于中俄西部重新划界的要求。

1864年,沙俄借重新划分中俄西部边界为名,采用武力和外交

相结合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总面积达到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沙俄再次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了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约1.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2—1884年,沙俄还根据《伊犁条约》关于勘界的条款,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边界议定书,吞并了我国西部领土约7万多平方公里。

1895年3月,沙俄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际,背着中国,与英国狼狈为奸,达成了瓜分中国萨雷阔以西帕米尔领土的协议:从萨雷库里湖东端一点,顺湖南的山梁到宾杰尔斯基山口,再到乌尔他别尔山口,向东到萨雷阔勒岭,划一分界线。线南属英国,线北属俄国。这样俄国强占了中国萨阔岭以西约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对于英俄瓜分帕米尔的协议,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承认。

1911年,沙俄乘清政府统治即将完结之机,迫使其代表签定了《满洲里界约》。尽管这个界约因为武昌起义爆发而清政府没有来得及批准,但沙俄仍侵占了中国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

1914年6月,沙俄又利用中国新政府立足未稳的机会,用武力非法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沙俄的强盗行径,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提出抗议,亦未予承认。

沙俄最早向中国伸出了瓜分的魔爪。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发展到顶点。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运动中,沙俄扮演了可耻的急先锋的角色。

早在1893年2月,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巴德马耶夫,就曾给沙皇递交了一份关于俄国“远东历史使命”的备忘录,即所谓的巴德马耶夫计划。该计划企图修建一条从贝加尔到中国兰州的铁路,

并诱使铁路沿线的中国少数民族暴动,然后将中国东北地区并入俄罗斯。[379]

1894年,沙俄修筑的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至外贝尔加地区,并准备取道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定。《马关条约》中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引起了沙俄的不满，因为俄国一向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于是沙俄联合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结果日本迫于三国压力,同意退还辽东半岛,但要清朝政府加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俄国倡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实质上是沙俄独霸东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端。

1896年6月,沙俄再以干涉还辽有功及共同防日为诱饵,诱使清朝要人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之签定了秘密条约。这个条约曾保密28年之久,后为苏联政府在1924年公布。秘密条约的全称是《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该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一)日本如侵略俄国、中国,两国海陆军互相支援;(二)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对俄国军舰开放;(三)中国政府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造一条穿过中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从赤塔以东直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路或东清铁路。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有权使用这条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中俄密约》表面上看是一个共同防日的军事同盟,实际上俄国只是以此为诱饵,以达到使清政府同意其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的目的。因此,《中俄密约》第6款特别规定:"此约由铁路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380]。《中俄密约》签定后,沙俄很快迫使清政府签署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这个条约规定:设立由沙俄政府控制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凡公司所需之地如系官地,由清政府给予;如系民地,由公司购买。公司所有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公司一手经理。沙俄还享有在铁路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这些标

志着东北事实上已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2月,沙俄又以“保护中国”为名,蛮横地把军舰开入我国的旅顺口,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租给俄国。1898年,沙俄还把租借地从旅大扩大到整个辽东半岛,并擅自把辽东半岛改为“关东省”,实行殖民统治。

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不顾同盟道义,参加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至此沙俄的豺狼嘴脸暴露无遗。当时沙俄统治者还认为并吞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开提出了要在东北建立“黄俄罗斯”联邦的计划,并以保护“中东路”为名,派遣10万大军分5路入侵东北,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64屯惨案”,杀害中国和平居民近20万。同年10月31日,俄国政府制定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作为侵略东北的政策依据。11月8日,俄国拟定《奉天交址暂且章程》,规定俄军留驻奉天,中国撤除在该地一切防务,企图建立俄国旅大总督操纵下的东北傀儡政权。但是,由于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列强间的矛盾,俄国的计划遭到了挫折。1901年初,中俄双方开始谈判。1902年4月8日,双方签定《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交还东三省;俄军分期撤出;中国赔偿俄国损失等。后来,俄国又自食其言,拒绝撤兵。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退守长春以北,日本插足南满。

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暂时调整了侵略方针,收缩了其在东北的阵地,主要经营北满,并伺机侵略我国新疆、西藏和外蒙古。正如列宁指出:日俄战争以后,俄国“暂时放弃了朝鲜和满洲的一部分,但是同日本人亲近了,以便可靠地把蒙古和北满并入帝国的版图。……在日本的同意下,显然会达到它的目的”。列宁还说:俄国的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万里长城脚下的一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381]。1907—1912年,俄国先后同日本订立3次密约,共同侵略中国的东北和蒙古。

(二)
日本：近代中国海缘的大敌

从历史上说,日本原是中国的藩属,汉朝时就受过中国的册封。汉朝皇帝曾封倭国一部为“汉委奴王”。但日本与中国别的藩属不同,它孤悬海外,属于海洋国。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海洋成为日本的一道天然屏障,中国不能对其进行统治。事实上,在1945年以前,从未有国家成功地征服过日本。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曾有过几次远征日本的尝试。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朝军队两次侵袭日本,均遇飓风,全军覆灭。相反,日本却凭借其地缘优势,以及接近大陆的便利,经常渡海侵略和骚扰陆上邻国朝鲜以及与之一衣带水的中国。早在公元3世纪后期,日本的大和国就曾侵略朝鲜半岛,并占领了半岛南部的任那。直到公元6世纪,新罗强大,朝鲜才把大和侵略者赶走。明朝建立初期,日本正处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1336—1396年)。封建领主手下的失意武士经常到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历史上称之“倭寇”。1467—1573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由于战乱,倭寇到中国沿海骚扰和武装抢劫的情况更加严重。至明朝中期,由于朝政腐败,倭寇演变为“倭患”,对中国沿海地区构成莫大威胁。嘉靖40年以后,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领导下,历经10年,中国才终于平定倭患。16世纪末,日本新军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此人有着狂妄的侵略野心,梦想征服朝鲜和中国,先后于1592和1596年两次入侵朝鲜,曾攻陷朝鲜都城汉城等城市。朝鲜向中国求救,明朝派兵抗倭援朝。在中朝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日本侵略者遭到惨重失败。1598年8月,丰臣秀吉也抑郁而死。此后,日本在很长时间里,不敢再犯朝鲜和中国。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明治维新的外部动因是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ly),率4艘军舰闯入日本的浦贺湾,强迫日本开放港口。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定《日美亲善条约》。1856年,又逼迫日本签定了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接着,荷、俄、英、法等也援例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条约。西方列强的侵略,刺激了日本的统治阶级,于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尊王攘夷"的运动。这个运动迫使幕府将军还政于天皇,从而实现了明治维新。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在封建阶级和下级武士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带有极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就把对外侵略扩张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曾公开宣称:"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决心"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建立一个"八纮一宇"的大帝国。[382]明治初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主要是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占领全中国;第五步称霸世界。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按照这5步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383]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由来以久的,且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一惯性的特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主张:"鲁(俄)墨(美)讲和一定,断不可毁约以失信夷狄;但严章程,厚信义,以其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以交换所失于鲁国者,并以鲜、满之土地以为偿"[38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征韩论"盛嚣尘上。日本重臣柳原前光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385]1890年12月,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其施政演说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主权线"和"利益线"划分的理论,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寻找借口。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守护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国家的疆域,利益线则系与主权线具有密切关系之区域。凡国家能保全其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

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守御主权线欠充分，必须同时保护利益线。”[386]

为了实现大陆政策，日本采取了外交讹诈和武力威胁的两手政策。在1894年以前，限于国力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日本对华侵略主要以外交讹诈为主，同时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准备对中国用兵。1894年以后，则以武力威胁为主。由于清政府的颟顸无能，日本得以吞并琉球、割占台湾、征服并灭亡朝鲜，占据南满和内蒙，顺利实现“大陆政策”的前两个阶段的目标，并为后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

1870年和1872年，日本政府两次派员来华，诱使清政府签定类似中国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企图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71年，两国在天津签定《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这两个条约总的说是平等的。因此，日本政府非常不满，曾要求修改，清政府没有同意。后来，日本只好批准条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873年，日本以两年前一艘琉球船只遇风暴漂至台湾东部，船上的琉球人为台湾高山族所杀的事件作借口，向清政府提起外交交涉。清政府官员驳斥了日本的干涉，但又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387]。日本立即抓住了中国官员的这句话，加以歪曲，于1874年4月发动了所谓讨伐台湾“生番”的侵略战争。日本的侵略遭到了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清政府决意妥协。同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签定《北京专条》，条约共3款，另附“会议凭单”一件。主要内容是：规定日本从台湾退兵，中国向日本赔银50万两。条约还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实际上默认了琉球为日本属国。[388]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第二年，在琉球设立日本警察和司法机构，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1877年，琉球王派密使请求中国帮助。但清政府不敢得罪日本，放弃宗主国责任，听任琉球亡国。1879年，日本废琉球王，

改琉球为冲绳县，终于并吞琉球，从此中国东南失一屏障。

并吞琉球初战告捷，日本随后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另一属国朝鲜，以实现"大陆政策"的征韩目标。朝鲜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北部同中、俄接壤，东部与日本毗邻，且隔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东北相望，扼直隶湾之门户，既是东北内陆的前哨，又在日本海入口处形成一个锁钥阵地。对我国安全的关系极大。自明朝以来，朝鲜就是中国的属国。清朝继续维持了两国的宗藩关系。由于清朝的发祥地东北与朝鲜唇齿相依，清政府在所有的藩属中，对朝鲜最为重视。朝鲜的生存与清统治者关系很大。因此，日本欲侵略中国，必然首先要向朝鲜开刀。

1868年和1870年，日本曾两次谴使朝鲜，试图打开朝鲜大门，但均遭朝鲜拒绝。1875年9月20日，日本公然派遣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汉江江华岛附近的海域，并占领永宗岛。1876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由，胁迫朝鲜与之签定不平等条约。事前日本顾虑清廷的态度，曾派人来华试探。未料清廷对日本丧失警惕，竟推说：中国向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让朝日自行解决。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取得了在朝通商、测量海岸、设使馆和享受领事裁判等特权，并否认中国宗主地位。1880年，日本在汉城正式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排斥清朝势力。1884年10月，日本又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后因清朝出兵平定，政变流产。但日本却向中国提出交涉。1885年，中日双方签定《中日天津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与中国一样的出兵朝鲜的权利。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这正好给了日本出兵朝鲜的借口。镇压起义之后，日本乘机扩大事态，于同年7月25日对我驻朝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清廷腐败和清军装备陈旧，日军很快取得陆上和海上的胜利。1895年4月17日，日本强迫中国政府签署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该条约共11款，主

要内容是：（一）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二）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辽东半岛；（三）赔偿军费白银 2 万万两；（四）允许日人在华投资设厂，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389] 《马关条约》是自《南京条约》之后划时代的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台湾及附属岛屿，并使中国背上沉重的赔款包袱。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遭到极其严重的侵犯，它直接加剧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民族的危机，急剧地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是中国地缘发生全线危机的重要标志。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赔款、领土和特权，而且实现了“大陆政策”中的征韩目标。1894 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日朝暂定合同条款》，取得铁路修筑等特权。1910 年，又迫使朝鲜签定《日韩合并条约》，从而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但日本夺取满洲门户—辽东半岛的计划，因触犯俄国利益，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还辽，日本被迫让步，最后中国拿出 3000 万两“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

对于此次因三国干涉还辽而产生的挫折，日本是不甘心的。它继续积蓄力量，伺机对俄报复，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三阶段目标：即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东北，“征服满蒙”，进而控制全中国。1902 年 1 月 30 日，日本和英国订立《英日同盟条约》，在外交上孤立了俄国。1904 年，日本悍然发动与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并在战争中击败俄国。同年 9 月，日俄签定《朴次茅斯和约》，双方根据战争胜负调整了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日本取得独占朝鲜以及插足南满的权利。日俄战争后，日本又利用《朴次茅斯和约》有关中国的条款，胁迫清政府在 1905 年 12 月签定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给予日本在东北许多新的侵略特权。1906 年，日本在东北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

旅大租借地设关东都督府,对南满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从此,日本的铁蹄踏上了中国东北的土地。

总之,沙俄和日本,一个是中国的陆上邻国,一个是中国的海上近邻,它们凭借其地理位置及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肆无忌惮地侵略和欺凌中国,遂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中国地缘的最大敌人。

·第三节·
清朝的地缘政策及其丧权辱国

(一)
传统“驭夷之道”的破产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中国地缘的全线危机,清朝最初的反映纯粹是传统式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交替运用了“恩威并济”、“先剿后抚”的传统“驭夷之道”,与凭借“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较量。

但是,西方列强已非历史上的夷狄可比,它们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拥有发达的工业、农业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当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产值中占39%,在世界贸易中占21%,有所谓“世界工场”之称。相比之下,曾以天朝自居,承平近200年的满清王朝却江河日下、国势衰败,根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因此,曾在1842年参观过英国军舰“康华利”号的清政府官员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朱批:可恨!)[390]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第一次战争,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同意割让香港、赔偿巨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和给予侵略者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定中英、中

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除割地赔款外，又增加了外国使节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人到内地游历、削减关税等条款。

（二）
“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努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传统“驭夷之道”失灵。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无可奈何，继而提出了“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1860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说：“此次该夷称兵犯顺，扰及京师，虽经互换和约，其条约所载，多有窒碍难行之处。朕恐荼毒生灵，不得不保全大局，俯从所请，既经通行各省，势难再有变更。全在各省封疆大吏，设法羁縻，于条约外，不得另生枝节。如该酋等在各省请议详细章程，仍可于权宜之中，寓限制之意，总期不致贻患无穷，庶可相安永久。”[391]翌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在关于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中再次明确提出：“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392]。

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这与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认识有关。还是恭亲王在1861年的同一份奏折中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英法）推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接着，他又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太平军和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主，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393]奕䜣的话，表明清朝统治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对洋人抱有戒心、保持一定距离，转为积极投靠，并同他们相互勾结在一起。1861年11月，叶赫拉那氏发动“辛酉政变”，夺

取清朝最高权力以后，对外更奉行投降卖国的政策。1862年2月8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决定“借师助剿”，即借洋人之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在1864年失败。

“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其重点是外敦信睦，就是对洋人采取“守定和约，绝无更改”，避免“决裂”，一切“迁就”的方针，[394]不惜以国家主权和利益讨好侵略者，以换取大清社稷之安。而“隐示羁縻”则是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的借口。羁縻本是中国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一项传统政策，意指与吓不退的强大敌人妥协和利用它们的政策。[395]但是，清朝统治者提出的羁縻政策与过去的王朝有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老老实实、推诚相见”。[396]与清朝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相适应，西方列强在60年代也提出了所谓“合作”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思想是：西方列强在侵华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彼此协商合作；不用武力而用联合的外交手段来实现其侵略目的；支持清政府维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及镇压国内人民；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和割让。[397]这种“合作”政策，最初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英、法、俄的全力支持。“合作”政策的实质在于，加强与清政府的合作，共同镇压中国人民，以及共同维护“条约”的权利。对此，清朝统治者是心领神会的。李鸿章曾言道：各国的对华政策是“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398]。在中外统治阶级的相互勾结下，从1860—1883年，清政府与侵略者保持了近20年的“中外和局”。但是，这个和局是有代价的，即以丧权辱国为代价。例如1876年9月，英国政府以云南“马嘉理事件”为借口，逼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1881年，清政府又在俄国的压迫下，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事实证明，与清朝统治者的一相情愿不同，外国侵略者并不想“守定和约”，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在清政府“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下，帝国主

义在华特权和利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已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掌握海关、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设立租界、干预财政金融、包庇不法传教士到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和地缘危机的程度都进一步加深了。

对外投降妥协是清政府在19世纪60—80年代地缘政策的主导方面。但是，面对内忧外患和国家危亡的形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墨守成规，鄙视西方的奇技淫巧，反对向洋人学习任何东西。这些人以西太后为靠山，包括大学士倭仁、李鸿藻等。另一部分人则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变革图存、师夷长技、向洋人学习，实现自强、自立和富国强兵。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䜣、文祥等；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所谓"中兴名臣"。1861年，奕䜣在一篇奏折中就已提出了自强的主张。他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6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已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备，以期经久无患。"[399]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写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此，"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穷则变，变则通，否"则战守者不足持，而和亦不可久"。希望"朝廷力开风气，破除故习，要讲求制胜的实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仅可忧，抑制可耻"[400]。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从60年代起，开始了富国强兵的

运动，亦称“洋务运动”。60年代，主要以求强为主，包括训练新式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的第一个军事企业。随后，李鸿章、左宗棠等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企业。70年代以后，转为求富为主，包括建立民办企业、开电报总局及开平矿务局、建造铁路和创建新式海军等。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语)[401]。1875年创建的北洋海军曾于1886年和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给日人留下了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技术熟练等印象。因此当朝鲜在1892年颁布《防谷令》，禁止粮食出口，日本政府对朝鲜施加压力时，李鸿章警告日本“不能漠视日本（对朝鲜）的强压”。最后日本因顾忌北洋海军的威力，被迫做了妥协。[402]但是，洋务派办洋务的指导思想，除了“自强自立”、“抵御外侮”外，还有镇压人民和谋取私利的动机；师夷长技亦仅限于“船坚炮利”，而不涉及精神文明；加上外国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国内顽固派的阻挠，因此，中国的“富国强兵”运动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不仅未能使中国富强自立，反而被后来居上的日本所击败。日本的明治维新差不多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展开，取得的结果却迥然不同，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
“海防”和“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公然用武力侵略我国领土台湾；英、俄特别是俄国则利用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1871年，俄国还以“安定边界秩序”为名，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我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发生了危机。面对当时“海笈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的严重形势，[403]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续争

论。

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鉴于筹办海军需要大量军费而清政府“财用极绌”,因此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他说:“海防西征力难兼顾”,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守,则心腹之大患愈棘。”[404]

另一派以湖南巡抚王文韶和山东巡抚丁宝祯为代表,认为俄国与中国东北和西北接壤,今又占据伊犁不归,是我国的最大威胁。因此现在应全力注重西北塞防,神速进军西北,及早收复新疆。

第三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坚持出兵新疆,收复失地。他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还指出了放弃新疆的危害:“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405]

最后,清朝政府权衡利害,决定采纳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任命左氏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沈葆祯为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海防。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攻克乌鲁木齐,收复新疆北部。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第二年,清军恢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国及沙俄利用阿古柏匪帮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1884年11月16日,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立行省。事实证明,李鸿章关于放弃新疆,专注海防的看法显然是误国之论。

(四)
“保藩固圉”政策的失败

19世纪80—90年代,清帝国尽管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不平等

条约体系中的半殖民地国家，并丧失了琉球等藩属，但仍保有越南、朝鲜等重要的属国。对于这种形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长期坐视的。当时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正处于形成的重要时期，夺取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成为西方列强国际斗争的基本内容。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扩张计划，如沙俄的“黄色俄罗斯”计划，英国的“斯普莱”计划，法国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等，目的在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1883年和1894年，法国和日本先后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目的就是要夺取越南和朝鲜。为了维护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国家的安全，清政府提出了“保藩固圉”的政策，即把藩属的安全与自身的安全联系起来考虑，把援助藩属抵抗侵略视为保卫本国周边安全的重要措施，[406]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援朝抗日的地缘决策。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投降派把持朝政，“保藩固圉”政策未能贯彻到底，相反弃藩求和的主张始终占上风。结果1883年的中法战争虽胜犹败，1894的中日战争更是遭到惨败。“保藩固圉”变成了代藩守土、代藩受兵，并以中国失藩溃圉而告终。下面仅以中法战争为例，说明一下清政府“保藩固圉”政策的失败过程。

远在19世纪50—60年代，法国就对中国的藩属—越南垂涎三尺，并企图以越南为据点，侵略中国腹地。1874年3月15日，法国强迫越南签定了《西贡条约》，准备将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但中国政府对此未予承认。1881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若任法国占领越南全境，则“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407]。1882年4月，法国出兵攻占河内。次年，又占领越南首都—顺化，逼迫越南签定《顺化条约》，承认法国的保护权。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清朝政府也提出了强硬的交涉。以曾纪泽、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援越抗法，保藩固圉。而以奕䜣、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则畏惧法国实力，主张妥协求和。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却举棋不定。同年12月，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

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历时约两年,曾在海陆两方面进行。清军在海战中失败,陆战互有胜负。1885年3月,在越北战场,清军重挫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可是,同年4月7日,清政府却下令停战,与法国议和。实际上,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以奕䜣和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法国求和的活动。如1884年3月,李鸿章曾奉慈禧太后之命与法人秘密会谈。1884年5月5日,又与法国海军舰队司令签定了中法《简明条约》。1885年3月,清军取得越北军事胜利之后,李鸿章不仅不主张乘胜进军,相反认为议和的机会到了,主张"乘胜即收",缔结和约。结果中国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与法国签定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该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政府放弃对越宗主地位;同时给予法国在广西和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以及在两地投资和铁路修筑的特权。[408]此后,中越宗藩关系断绝,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法国势力深入到中国的腹地。法国在谈判桌上取得了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所要求的全部东西。

(五)
"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及得失

"以夷制夷"是晚清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地缘政策,它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和他们固有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来达到避免一国独霸中国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这种策略既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实践,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但是,"以夷制夷"政策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美国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打法国牌,日本曾在同沙俄斗争时打

英国牌，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一定的国力是成功地实施“以夷制夷”的前提。从世界外交史上看，很多国家包括某些强国亦实行过这一策略。如英国就是运用此道的高手。然而，像清朝政府这样不思自强自立，一味依靠外国，并长期奉行打外国牌的政策，却是罕见的。其结果常常是想玩外国牌的人终究被外国玩了。

“以夷制夷”原是春秋时代中国统治者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来为历朝君主所继承，成为对付周边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传统手法。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面对强敌，束手无策，曾被迫提出了“羁縻”之计，其中亦包含了“以夷制夷”的想法。1858年4月8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曾认为：“如先解散俄、咪（美）酋，不至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409]。但是，清政府初次联俄，就被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去中国北方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大致孕育于19世纪的70—80年代，在90年代正式形成，并成为清政府后期最基本的地缘政策。

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华搞外交讹诈。李鸿章提出联日，“以东制西”。他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410]因此，在1871年，李鸿章力排众议，主张与日本订立通商条约。及至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李鸿章发觉上当，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411]。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日本又乘机吞并琉球，敲诈勒索。李鸿章更认为日本不可靠，转而主张联俄拒日。他说：“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412]

1879年，鉴于日本在朝鲜的野心，总理衙门大臣丁汝昌建议，朝

鲜应与各国订约，以牵制日本。丁氏建议为清廷所采纳。同年 8 月李鸿章遂致书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建议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以牵制日本。他写到：“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否则，“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413]。李鸿章的这封信，表明“以夷制夷”已正式成为清朝政府的官方政策，并被介绍给中国的藩属——朝鲜。1883 年，在清廷的帮助下，朝鲜与美国签定了《朝美通商条约》。不久，英、德、意、俄、法等也援例，与朝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从此朝鲜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1885 年，针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征韩”攻势，李鸿章再次提出联俄制日的地缘政策。他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本必缩手”[414]。从此，清政府就用此计对付日本。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仍不思备战，而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但列强因得到日本对其侵华利益的保证，纷纷表示中立。在战争中，清政府军事上很快遭到失败，于是又吁请列强调停。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各国不愿开罪日本，调停不了了之。及至战争之后，清政府继续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李鸿章在京城里跑遍了各国使馆，乞求列强干预，但列强不为所动。为了诱使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甚至准备出卖大量中国主权。他提议中英签定密约，清政府答应“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415]。李鸿章这个建议如果实现，则中国将变成印度第二，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可是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考虑到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英国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好意”。李鸿章企求俄国干涉的努力，亦因

俄人拒绝而告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得不到列强调停的情况下，被迫与日本签定了空前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引起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中国几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忧。清政府此时经历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已经如惊弓之鸟，既无民族自信心，更无军事实力。因此更加依靠"以夷制夷"的政策。1896年6月3日，中俄签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联俄制日。但沙俄的真正用意决非共同御日，而在借地修路，扩大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久，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表明联俄是靠不住的。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嗣后俄军又赖在东北不走，说明沙俄根本不顾同盟道义，《中俄密约》对中国如同废纸。

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给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以最后一击。腐败、孱弱的满清王朝终于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外国侵略者的怀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代理人，成为洋人的朝廷。在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竟然提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要把中国的所有财富收刮起来，去讨外国侵略者之欢心。此后，清朝统治者就完全走上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甘心情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可耻道路。当然，在对外交涉中，清政府有时仍运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如在交涉使沙俄从东北撤军的过程中，曾利用过英俄矛盾，以及联日制俄等。清朝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后来也曾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所继承，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地缘外交方针。

"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政府上下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结盟的对象和要打击的国家，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各有其主张。如李鸿章先主联日，后主联俄御日，但大部分时间主张联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要主张联合英美；1900年沙俄侵略面目暴露之后，那桐和奕劻等主张联日制俄；袁世凯和唐绍仪后来曾积极主

张联美。显然,结盟对象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威胁中国地缘主要敌人的不同看法。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要大于日本。早在1850年,林则徐就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416]1861年1月,奕䜣等在关于建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也认为:“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417]。后来,及至俄国入侵伊犁,一些封疆大吏提出当务之急在于防俄。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割占中国的台湾,并索取巨额赔款,引起中国朝野的强烈仇日情绪。相反,俄国在甲午战争后倡导三国干涉还辽,并以低利借款给中国偿付日本赔款。沙俄的行动使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时主张联俄的人占了上风。不仅亲俄派李鸿章主张联俄,而且一些亲英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赞成“与俄结欢以制东、西两洋”[418]。在郑观应的文章中有时也流露出“联俄制夷”的思想。[419]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出现了明显地一边倒向俄国的倾向。这种政策倾向一直持续到1900年。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从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对外方针。这一方针的得失成败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清朝统治者在关于中国地缘主要威胁的判断上,应该说是有错误的。日本尽管是中国地缘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只能来自于海上(日俄战争之前)。相反沙俄与我国东北和西北接壤,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其威胁要大于日本。从地缘矛盾讲,沙俄是中国地缘的最大敌人,日本次之。因此联日或联俄都无异于引狼入室。

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问题上尽管存在矛盾,但因有“一体均占”的条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勾结在一起,使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很难施行。例如在1880年和1894年,清政府曾提议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和日本,结果均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后

来,为了对付俄国,在日本对英国侵华利益表示尊重之后,英国就积极地支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成了同盟。

第三,“以夷制夷”的政策在短期内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总的说来是失大于得的,是不成功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例子有:

1875年中英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国为了防止他国干预,曾把谈判地点设在烟台。李鸿章洞悉英国的图谋,有意通知各国使节到烟台休假,迫使英国放弃了某些苛刻的要求。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强行割占辽东半岛,损害了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当然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对中国威胁巨大,它意味着把日本的国界推至与京畿近在咫尺的辽河。于是清政府邀请俄国等干预,最后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对此不应评价太高。因为这种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积弱,在于国家无力在国际上自立,而不得不饮鸩止渴,谋求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或倾斜甚至于依附某一或某些外国,甚至牺牲某些主权,以反对另一外国的侵略。例如,1896年,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曾对德国驻俄大使建议:“如果不使用一点武力,割让一个岛屿的问题是难以获得解决的”[420]。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政策简单地斥之为卖国投降,但也不能视之为救国良方。总的说来,它只能延缓清朝统治的危机,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实践中,因盲目相信外国侵略者,一味依靠外力,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6年李鸿章联俄制日,结果却被俄国人耍了。这一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与沙俄签定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沙俄外交官把他当小孩子耍。结果李鸿章在签约时就中了俄国的“掉包计”,俄人利用用餐的时

机篡改了原先的条约文本，即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改为“日本国”。这样重大的改动，李鸿章全然不知，用餐后照样画押。

《中俄密约》签定后，李鸿章颇为得意。他回国后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实际上，这个条约是沙俄精心策划的新侵略阴谋。它使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后来黄遵宪写诗嘲讽李鸿章说：“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421]。

·第四节·

1911—1949 年间的中国地缘政治和外交

（一）

1911—1949 年间中国地缘形势概述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武昌起义成功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 2000 年的封建专制，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封建军阀袁世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很快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表明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袁世凯上台以后，对内破坏民主制度，着手镇压革命党人，为其独裁专制，并最终复辟帝制铺平道路；对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大举外债，以换取帝国主义对其政府的承认和对其复辟帝制的支

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亦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及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对袁氏政府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1912—1916年,以英、俄窥视西藏、蒙古, 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标志,民国时期的中国地缘形成了第一次严重危机。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相互混战,中国四分五裂。不同派系的军阀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皖系和奉系均依附日本,直系依附英、美等,中国的地缘危机在继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覆亡。

取代北洋军阀之后统治中国的是在1927年4月成立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该政府继承了晚清和北洋军阀的内外政策,把外国侵略看成是"疥癣之疾",而把革命人民看成心腹大患, 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总方针,对于日本的侵华行动步步退让,结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新的地缘危机,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8年抗日战争。

1911—1949年,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地缘形势的局部改善。1911—194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全球性的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大大削弱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从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我国地缘形势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推翻了沙俄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统治,结束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使来自北方的对中国陆上地缘的威胁之一得以基本消除。

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沙俄盘踞北满，并与日本相勾结，侵略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是引起中国地缘危机的外部根源之一。其次，苏俄政府于 1919 年 7 月和 1920 年 9 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废弃一切特权，从而动摇了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罗织的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侵略秩序。苏俄政府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称：苏俄“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所有俄国以前政府与中国缔结的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废弃一切特权”，俄国公民在中国居住不得享有治外法权，一概服从中国境内的一切法律和规定。并建议两国“缔结友好之条约”[422]。第三，苏俄的国际主义政策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民，鼓舞了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 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影响中国地缘走势的重要内部因素。

国际环境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 20 世纪 40 年代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国家奉行野蛮的侵略和战争政策。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的东北，继而于 1937 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 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1 年 6 月，德国闪击苏联；同年 12 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法西斯国家的这些侵略行动，使得受到他们侵略的国家不得不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我国地缘形势的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遭到法西斯侵略和最早抵抗法西斯的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同情和尊敬。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德、意、日作战。翌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国在《联合

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上签字,中国首次以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出现在该《宣言》中。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利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推动下,1942年英美被迫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0月,在美国支持下,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普遍安全宣言》上签字,中国跻身世界四强行列。同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还签署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规定战后使朝鲜自由独立。[423] 《开罗宣言》是二战后处置日本的重要法律根据,它使中国在战后得以收回被日本攫取的广大土地,加强了中国在远东的地位。1945年,中国还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并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国际环境的变化确实促成了中国地缘形势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局部的。因为日本法西斯仍然是中国地缘的主要威胁,在1937年后更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仇敌;英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不愿放弃殖民利益和侵略特权,如英国不愿放弃香港;同时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尽管从制度上消除了对中国的侵略危险,但苏联领导人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有时搞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中国民族利益,如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1935年苏联和满洲国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以及1945年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损害等;此外中国政府腐败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地缘危机的内部根源并未消除。

2. 日本取代沙俄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最大敌人。1894年甲午战争,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铁蹄踏上了大陆,开始与沙俄一起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敌人。1905年11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属条约,取得了沙俄原在南满的一切特权。中日关于东三省条约的签定,是日本企图霸占东北

的前奏，也是其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进展。1906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的殖民机构，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关东都督府”是一个侵略东北的政治、军事指挥机构；而“满铁”则是一个在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满铁在1907—1909年间，先后从清政府手里夺取了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筑路权，并侵夺了安奉铁路为己有，日本还公开阻扰中国在东北自建铁路。为了巩固在东北既得的阵地，防止其他列强如美国进入东北，日本还与俄国相勾结，于1907年、1910年和1912年签定了3次日俄密约，划分两国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势力范围。如1907年的日俄密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和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北满和外蒙是沙俄“势力范围”，并且划分了南北满的分界线。[424]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之后，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又转向力图独霸满洲进而及于蒙古并在全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日本曾有直接出兵干涉的计划，后来又阴谋分裂中国，策划满蒙独立，只是因为辛亥革命发展较快，加上列强疑虑，才没有实行。1912年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更主动向西方列强提议，利用承认问题对袁世凯北京政府进行讹诈。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袁世凯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13年1月，被迫同意与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5月，又同沙俄就外蒙古问题达成协议；5月29日，再与日本签定《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使日货出入东北减税1/3。10月，又与日本签定《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扩大了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1913年10月7日，西方13国相继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至此，由日、俄导演的承认危机才告一段落。

1914年8月，以重新瓜分世界为特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列强相继卷入战事，它们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提供了天赐良机。1914年8月23日，日本以“承担英日同盟的

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旗号，宣布对德作战，进攻被德国强租去的中国青岛。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日本故意从远离青岛240公里的龙口登岸，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潍县车站，并沿胶济铁路西进，强占青州、济南车站。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攫取胶济铁路全线和附近的矿产，并准备长期霸占山东。袁世凯北京政府迫于中国民意，对日提出交涉，日本置之不理。

在霸占了山东以后，日本把侵略矛头对准了全中国。这时日本的野心已由“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扩大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即谋求在华霸权。日本军阀声称：“胶州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425]。正好这时袁世凯正做着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日本利用袁世凯的这个心理，为独霸中国，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讹诈。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约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向他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要中国完全接受，尽快答复。当时日使还让袁氏看了日本备忘录的纸张上印着的无畏舰和机关枪的透明水纹，表明要使用武力。同时日置益又狡诈地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暗示要支持袁世凯做皇帝。那么，《二十一条》是一个怎样的外交文件呢？

《二十一条》共有5号，21项条款，主要内容是：[426]

（1）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2）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独占权；

（3）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

（4）中国沿海的任何港口、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

（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

显然，这是一个旨在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狂妄计划。对于这个灭亡中国的条约，袁世凯表示除第5号外，其余均可以讨论。5月7日，日本向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5月9日下

午6时前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为了获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放手卖国，完全屈服。同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仅第五号容日后再议。5月25日，中日在北京签定了两个条约，互换了13件照会，总称"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就其内容看，除二十一条第五号外，几乎包括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从此，日本对山东、南满、福建、内蒙东部和长江流域等扩大侵略有了条约根据；南满更加殖民化，山东和内蒙东部也成为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二十一条的签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对。但袁世凯却一意孤行，于1915年12月13日黄袍加身，并在次年1月1日登基做了皇帝。可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被中国人民拉下了马。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万民唾骂声中郁郁而终。

袁世凯死后，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策划了"郑家屯事件"和"西原借款"，其亡华之心不死。但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加上中国人民坚决斗争，日本霸占山东的要求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为列强所承认，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开创了中国近代独立自主地缘外交的先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也结束了沙俄作为中国陆上地缘最大敌人的历史。日本于是取代沙俄成为中国陆上地缘的主要敌人。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又陆续回到了中国，日本在战争期间享有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1921年11月—1922年2月，美国为了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者有中、美、英、法、意、比、荷、葡、日9国。会议根据美国提出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并迫使日本把山东退还中国。华盛顿会议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图谋是一个打击，但却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规模扩张创造

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被迫改变了侵略中国的手法。1924年上台的币原外相提出了“不干涉内政”和“经济合作”等对华外交新原则。在“不干涉主义”的旗帜下,日本一方面对华进行肆无忌惮的经济侵略;另一方面,则扶助皖系特别是奉系军阀,与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相互混战,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并通过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全面加强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但是,币原的“和平外交”是短命的。日本军阀要求积极推行“大陆政策”。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组阁,提出要对华实行以“强硬外交”为核心的“积极政策”。同年5月,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悍然阻止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的努力。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加速制定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会后,田中向日皇呈递了一份题为《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奏折指出:“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就是“并吞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整个东方及亚洲畏服于我”;因此,“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此要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分离。[427]1928年4月和5月,日本两次出兵山东,5月3日制造济南惨案,企图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同年6月,日本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已不听指挥的张作霖。在日本的威逼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满含国仇家恨,毅然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至此,日本肢解东北的阴谋暂时破产了。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29年。这一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日本也深陷其中。为了转嫁危机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政府决心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日本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东北沈阳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诬称是中国军

队所为，然后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不久又向东北全境发动攻击。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全部领土。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国际对其侵略东北的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用武力实现了使东北与中国本土分离的目标。次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为满洲皇帝。占据东北以后，日本很快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的华北。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同年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5月，日军已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策动华北5省实行自治。1936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处理华北纲要》，正式把分离华北作为日本国策。该纲要提出：“处理中国的主要目标，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使其安居乐业，并调整日满两国关系，增进相互的福利。”[428] 1936年8月和1937年2月，日本政府又制定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4大臣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的方针》，其要旨是使华北“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由此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429]，从而达到占领华北的实际目的。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策划的灭亡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终于爆发。从此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敌。中国人民则不得不进行了长达8年抗日战争，并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二）
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地缘外交及得失

1911—1949年间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是中国近现代地缘外交史的一部分，是晚清中国地缘政治和外交的继续和发展。从总体上讲，

1911—1949 年间即中华民国期间的中国地缘形势和外交其基本特征与晚清时期无异，中国地缘危机继续存在，统治阶级继续奉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压力，统治阶级亦不得不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有限的外交交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地缘外交及得失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依附性外交的政治后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 年），中国地缘外交的基本特点是依附性外交。袁世凯在世时，他依附于西方各帝国主义，但又以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主。1913 年 10 月 10 日，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他曾向帝国主义各国保证：“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国政府所定条约、协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所定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照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430]。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暂时局面，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惜拿国家主权与日本做交易，签定了《民四条约》，为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许多派系，其中又以皖系、直系和奉系 3 大派别为主。直系军阀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皖系和奉系则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下，相互混战，使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他们为了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例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在 1925 年 11 月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镇压内部郭松龄叛乱，曾同意日本把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到 99 年，并使日本在满蒙享有其他种种特权。当张氏答应了这些卖国条件后，日本就公开帮助张作霖攻打郭松龄，稳住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同时也加强了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再如皖系军阀为了取得日本支持压制其他派系

的军阀,在1918年与日本签定了《中日军事协定》,侵略苏俄远东地区。皖系军阀此举,完全是引狼入室。日本派赴西伯利亚的军队大部分都经由北满和外蒙出发,尔后给这些地区留下了无穷的祸害。

(2)"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时,正是日本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关头。蒋政府推行亲美日、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对于日本的侵略熟视无睹。蒋介石有一个口号叫做"攘外必先安内"[431]。所谓"攘外"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安内"才是他的实际目的,安内的基本目标就是消灭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势力。因此,南京政府成立伊始,在对外政策上就打上了丧权辱国的标记。1927年5月,当日本3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并阻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竟然不许中国军队还手,要中国军队绕道进行所谓"北伐"。蒋政权建立后,从1927—1937年间,为了消除异己、铲除中共,蒋介石多次发动内战,先是两广战争、蒋冯阎战争,后有反共反人民的5次围剿战争。蒋介石一心打内战,这就给了日本以扩大侵略中国的机会。1931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旨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许抵抗,结果10多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1932年2月,日军占领东北全境。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频频向关内进攻,中国政府则步步退让。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1932年5月,蒋政府与日本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留驻上海;1933年,又与日本签定《中日塘沽协定》,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以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国还丧失了对冀东22县的完全统治权,从此华北门户洞开,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塘沽协定》之后,日本继续扩大事端,企图控制整个华北。1935年,蒋政府屈从日

本军事压力,再次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拱手把河北交给了日本。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丧权辱国的外交,使中华民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边缘。1937年,日本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由此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是"南联英美,北结苏联",并在军事上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但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日妥协投降的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例如,在1937年11月,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斡旋下,日本曾与南京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后因日本要求过于苛刻和蒋介石畏于人民压力,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加紧了对蒋政府的诱降工作。同年11月3日,日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要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这使蒋政府发生了很大动摇。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并于1940年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这时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更不坚定了。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5届5中全会。会议除涉及抗战问题并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英美以外,还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针。这是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动摇和准备投降日本的重要征兆。5届5中会议后,蒋介石即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1943年,蒋介石共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最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事件。蒋介石在加紧反共摩擦的同时,在1939—1940年也加强了与日本妥协投降的活动。其中的渠道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和"司徒雷登(Stuart)工作"等。但因国际国内的反对,双方未能谈妥。直到1941年4月,鉴于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可能好转,蒋介石才改变了态度。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日本不能

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中国。[432]

（3）对苏外交的得失。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对于苏俄的行动，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在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向俄国派出了使团。1924年5月，中俄双方在排除了种种干扰后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及其附件宣布恢复两国邦交；废除沙俄在华特权和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关于外蒙古问题，苏俄承认其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的中国主权；关于中东路，苏俄完全承认中国对该路的主权，但要保留部分产业权；同时双方允诺在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关系。《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定，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从法律上完全废除了沙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而且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巨大压力，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上打开了缺口。尤其是苏俄主动提议将两国原来的公使级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这在苏俄方面是对中国的尊重。当然，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是不彻底的。这反映了苏俄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上的脱节。

西方列强对于中俄协定是很不满意的，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该协定的实施。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对帝国主义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在发展中苏关系上不能独立自主。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后，直、奉两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它们奉行反苏政策，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27年5月，北京政府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拘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5人，并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30多名，劫走大批文件。此后，中苏关系实际处于断绝状态。

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而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军阀垮台后，继续推行反苏方针。1927年12月，国民党2届5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南京政府发布了不承认苏联领事

的命令。1929年,蒋介石又唆使张学良对苏挑衅,引发中东路战争,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同年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才发生改变。1932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联恢复邦交,并愿签定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中苏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中国又和苏联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方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定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433]中苏条约的签定对日本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声援。此后,从1937—1939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3次易货贷款,总数达2.5亿美元。另外,从1937—1941年,苏方共向中国提供飞机92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00颗、炮弹约200万发及其他军事物资。苏联空军志愿军还直接参加了对日空中作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事实说明,反苏对中国决没有任何好处,联苏才是当时我国地缘政策的正确的抉择。

但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并非是无条件的、完全无私的。苏联援华有其战略目的。斯大林曾明白地对孙科讲:"中国既是为自己而战,也是为苏联而战"。"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占领远至贝加尔湖的整个西伯利亚。"[434]显然,苏联援华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脱身,以保障其东部边界安全。因此,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苏联的对华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1941年,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包含有承认日本侵略东北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内容。到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时,苏联进一步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在 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为由,背着中国,与英美签定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了苏联出兵的条件:①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②1904 年日俄战争以前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包括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交还苏联,苏联租借旅顺、大连,以及中苏共同经营中东和南满铁路等;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435]由于美国的压力和出于对付中共的需要,蒋介石政府答应了苏联的要求。1945 年,中苏签定了《友好同盟条约》。同年 10 月 20 日,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宣布独立。从此,外蒙古被从中国正式分离出去,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4）对英美外交的成败。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南联英美,北结苏联"的外交政策。抗战初期,北结苏联确实取得了成效,苏联的援助解了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相反,当时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英美多次密谋牺牲中国,换取与日本妥协,以达到反苏反共的目的。它们的这种做法当时被称之为"东方慕尼黑"阴谋。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美才大规模援助中国。1938 年 12 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商业贷款,总数约 2500 万美元。同年,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 50 万英镑购买卡车,用于新开通的滇缅公路的运输。此年 3 月,英国又向中国提供了 500 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1940 年 3 月,美国再决定给中国 2000 万美元的借款,中国则以纯锡 4 万吨作为担保。从 1941—1946 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 16 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对英美外交的成败试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英美外交的成功方面表现为:一是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推动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1942 年 10 月,英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布立时放弃在华特权。同年

12月和次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定了平等合作的新条约。在英美影响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定新的平等互惠的条约。至此,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二是审时度势,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鉴于美国有意“使中国成为大国”,国民党政府积极予以配合。1943年,美国力主中、英、美、苏4国签定《普遍安全宣言》即4强宣言。但苏、英反对。在美国的坚持下,苏英被迫同意。同年10月,中、英、苏、美4国正式签署《普遍安全宣言》,跻身世界4强行列。1943年11月,中国政府首脑还在开罗与英美首脑举行了高级会晤,显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对于战后处置日本及维护远东和平达成了一致。二战后期,中国还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筹备工作,并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由此,中华民国的外交达到了顶峰。

对英美外交的不成功方面主要表现为:英美不肯完全放弃在华特权和殖民利益,特别是英国不愿放弃香港、九龙以及在华的优越地位。美国的态度与英略有差别,但美国在二战以后通过扶蒋反共和与蒋政府签定新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使中国成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外交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最后终于导致了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灭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地缘外交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七章

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开创了独立自主地缘外交的新局面。

建国初期，根据国际环境的特点和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大阵营”和“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理论，奉行了“一边倒”的地缘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做出了贡献。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美苏竞相与我为敌，中国领导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地缘主张，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70年代国际局势激烈动荡，出现了大分化和大改组，美苏争霸也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中国领导人及时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地缘战略理论，并制定了“一条线”的地缘外交政策，恢复和发展了中美关系，抵御了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出现了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新迹象，美苏关系也开始缓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理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过去的“一条线”的地缘外交政策，充实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全面开创了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新局面，把我国地缘外交推上了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

(一)
毛泽东的地缘外交思想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是兼革命家和战略家于一身的巨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地缘危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15年和1916年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日人诚我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436]这种强烈的地缘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的信念,是促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参加革命之后,他更加关心国家的危亡,立志救国救民。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当国人对抗战缺乏信心的时候,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的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交战的中日双方的基本国力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437]他认为,由于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日本是小国,中国则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得道多助的。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发展趋势。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但日本不可能长期横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438]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驳斥了当时流行的

"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主张，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苏为主宰的雅尔塔两极国际格局开始形成。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思潮，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和"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理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又不断地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国内工作的需要，提出和调整地缘战略理论以及地缘政策，为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发展建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地缘战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两大阵营"和"一边倒"理论。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对国际局势的两分法即阶级分析的观点。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439]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坚持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写道："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440]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尽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甚至主张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平衡制约的外交，但由于美国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以及内战的爆发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的政策，他放弃了与美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实行了"一边倒"的地缘外交总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

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去找。""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41]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442]"两大阵营"的地缘战略理论作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一直到50年代末期都是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指导思想。

(2) "中间地带"理论。40年代末期，毛泽东几乎在提出"两大阵营"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1946年8月6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L.Strong)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443]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揭穿了美国进行反苏反共战争叫嚣的实质，其直接目的是要"疯狂地进攻美国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同时这个理论看到了相对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一股中间力量的存在。十年之后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英法和美国的矛盾，毛泽东及时更新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说："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

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444]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经济发达与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与美苏有矛盾,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日益成为一枝独立于美苏的力量。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实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提供了基础。

(3)“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D.Kaunda)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445]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上,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正式公诸与世,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上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446]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其“中间地带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和发展。这一理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和单纯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更符合当时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特别是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中国现实主义务实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后来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

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47]

(4)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统一战线是中共在国内革命斗争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与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同盟的政策，也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需要遵循的策略路线。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意蕴深刻的完整体系。无论是“一边倒”、“中间地带”，还是“三个世界”的地缘战略理论，都源于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理论。从对敌斗争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集中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存在明显的敌国，我们大部分时间明确地在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对于打击和联合的对象有所调整。在建国初期和 50 年代，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因此“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于处于孤立地位”。“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448]60 年代，中苏交恶，美苏既争夺又勾结，毛泽东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但侧重点在反帝，以美国为主，苏联为次。70 年代以后，美苏争霸态势发生变化，苏攻美守，苏联还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于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

略，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遏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毛泽东指出："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1972年，毛泽东还对基辛格讲："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449]80年代初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邓小平调整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奉行不与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要国际上还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就没有过时。

毛泽东的地缘战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在国际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他的这些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和我国外交斗争需要的，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拓展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发展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合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在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亲自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改善了我国的地缘处境，为后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做了准备。

(二)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

周恩来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外交工作的26年中（兼外交部长8年），他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在战略上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在战术上则有独立的创造和发挥，实际构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他的地缘外

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交须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基本立场的思想。当周恩来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响亮地发出了“为了中华之崛起”的时代强音。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但外交仍须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据说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曾问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450]建国初期，他多次讲：“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451]

(2)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思想。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一个经济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还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有无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呢？周恩来认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朝鲜战争的结束，表明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可能被制止。1957年3月，他还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452]尽管人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威胁的存在，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而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却日益壮大和巩固，因此我国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

(3)睦邻外交思想。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睦邻外交思想。1953年，在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

题”，但只要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印度方面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诞生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个声明中，中印和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体内容与前略有变动）。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周恩来又进一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周恩来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准则，即“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453]“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保证了万隆会议的顺利举行，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对于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中国和周围邻国间的遗留的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周恩来主张采取“和平协商、公平合理”方针加以解决。他指出：谋求解决同邻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目的是安定四邻，缓和紧张，便于建设，因此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诉诸武力是违背我们的和平政策的。[454]本着这种方针，中国和缅甸在1960年签署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先后又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签定了边界条约，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存提供了范例。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此，周恩来提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的国籍。根据这个精神，中

国在 1955 年 4 月与印度尼西亚签定了一个《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作出了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在两国国籍中选择一个国籍的规定，从而显示了中国与周围国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发展睦邻关系的诚意和决心。除了用实际行动推进睦邻友好关系以外，周恩来还针对不少国家担心“中国威胁”，耐心地向亚洲国家领导人作解释说：“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是容许他怀疑的。……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周恩来还强调：“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中国强大了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455]

(4)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的思想。1950 年 3 月 18 日，周恩来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的一篇关于亚洲的演说时，提出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的思想。近代以来，亚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征服和欺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及其内部的不团结，使得西方殖民主义者得以实施“分而治之”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二战以后，美国以反共为名，在亚洲组织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企图重施老殖民主义的故技，分裂亚洲。周恩来认为，亚洲国家应当克服他们的分歧和争端，因为这些分歧和争端都

是或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在长时期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的，或者也是他们的这种政策所扩大化了的”，亚洲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周恩来提出“亚洲人民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对外来干涉，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他说：我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其人民告诉美国，“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来加以干涉”[456]。周恩来的这个思想预示了古老亚洲的觉醒，以及亚洲地区主义的先声。

(5)人民外交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他认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457]新中国外交的实质是人民外交，为了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及合作，特别是与未建交国家的关系，周恩来在建国初就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方针。70年代，他又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方针，开创了新中国人民外交的新局面。周恩来的人民外交思想在我国地缘外交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首先被运用于对日关系，后来又用于对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例如，对于如何开展中日关系？周恩来认为，应采取积累和渐进的方式推进中日邦交。“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458]后来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大体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经历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民间来往、官方挂

钩”等几个阶段，在1972年终于顺利实现。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和立场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的许多杰出思想不但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正如钱其琛同志指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指导了当时我国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也为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459]

(三)
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在第一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点的地缘外交理论，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调整和外交新局面的全面开创提供了巨大的指导。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和平与发展的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和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全面研究，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1984年5月在会见南美贵宾时，他说：“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460]翌年，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观点，而且用地理概念对此做了概括。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61]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他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

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就为把全国工作重点（包括外交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客观科学的根据。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62]。其次,这个理论为确定我国外交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石。邓小平指出,中国外交总目标和总任务就是谋求和平与发展。"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外交工作必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463]

(2)独立自主理论。独立自主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独立自主的理论原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后来被我党应用于处理与外国党的关系以及与外国的关系中。在新中国47年的外交实践中,我们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80年代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并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有他的新意。这就是改变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正如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

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64]

(3)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在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时,他还主张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465]对外开放除了在地缘上的全方位,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66]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能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4)“一国两制”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存在地理矛盾或历史遗留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等等。如何解决?邓小平从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1978年底,他在考虑台湾问题时讲到:“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后来他又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

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467]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于 1982 年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问题,并于 1984 年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从 1997 年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后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问题也达成了协议,规定自 1999 年起澳门主权归还中国。中国保证香港、澳门两个地区的社会制度 50 年不变。

(5)睦邻友好理论。睦邻友好的主张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的,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但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没有得到很好地实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周的睦邻外交思想,提出了睦邻友好的理论。邓小平睦邻友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与毛泽东团结反帝的睦邻外交思想是不同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468]为了促进中国与周围邻国的友好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我国与邻国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问题的新思路。对于边界问题,他主张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例如,在 1979 年 2 月,他曾对印度客人讲:“我们两国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后来又说:“对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主张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解决。”[469]对于领土主权的争议问题,邓小平则主张可以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办法。1984 年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70]例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都可以避开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

来的问题……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471]

邓小平的地缘外交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第二节·
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及其得失

（一）
新中国地缘政治形势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的 40 多年，特别是前 30 年，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仍然是十分严峻的。50—60 年代，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表现为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当时美国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面包围中国；拼凑起“新月形”包围圈，甚至在东北面和南面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1950 年 6 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后来美国又卷入了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生存和安全。60 年代，美国对我国的威胁依然存在，1965 年，美国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把对越战争从“特种战争”升级到“局部战争”，并对我国进行威胁。苏联则与美国相勾结，在核武器等许多问题上卡中国，并怂恿印度等亚洲国家挑起边界冲突，一时形成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的可能入侵，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中国都做了准备。1965 年 9 月 29 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的决定。"[472]这一宣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它不仅在我边境陈兵百万，挑起流血冲突，并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中国。1969 年，苏联当局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1978 年，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华排华，并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 年，苏联又亲自出兵阿富汗，妄图拼凑南北夹击态势的"钳形"包围圈。1969 年，苏联甚至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据美国人回忆，苏联在 1969—1970 年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曾向美国建议：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后为美国婉拒。[473]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 1969 年 10 月 7 日采取了严正立场，声明表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474]在这种严酷的地缘形势下，中国人民被迫生活在受包围的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因此就不得不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直到 80 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中国的地缘形势才有了根本的改善。1972 年中国与美国恢复和发展了正常的关系。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举行最高级会晤，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1991 年，苏联解体，对中国最大的来自北方的威胁消失了。现在我国的周边安定，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二)
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总评价

新中国前30年的地缘形势和后10多年的地缘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况从客观上看是国际格局变动所造成的,从主观上看就不能不与新中国地缘外交的得失有关了。韩念龙同志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外交得失时曾写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亲自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实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他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日益密切、日益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他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对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加速经济建设,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几年间,世界局势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很难对每一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及时地作出正确判断,加之国内出现的"左"的错误对外交工作的干扰,新中国的外交难免有过一些失误,值得引以为鉴。[475]但同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显然是次要的。但是从地缘外交的角度如何评价新中国47年的外交得失呢?也基本上可以用《当代中国外交》一书的归纳为依据,其主要成就在于:

(1)它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外交的新局面。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尽管在形式上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但在实际上他依附于帝国主义,谈不上独立;他同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屈从于外国,也谈不上自主。因此,从前清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是跪在地

上办外交的。解放后，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新中国不仅废除了近百年来旧政府与外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另起炉灶”，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且在与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中，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例如，在50年代末期，当苏联提出要与中国搞联合舰队和建立长波电台并企图控制中国时，中国领导人断然加以拒绝。毛泽东讲：“他（赫鲁晓夫）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毛泽东还对苏联驻华大使强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476]。

独立自主的原则反映在新中国地缘外交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建国初期，我们奉行“一边倒”政策，联苏反美；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但以反美为主；70年代，我们联美反苏，恢复和发展了同美国的关系；80年代，我们又提出不与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从而全面地开创了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局面。

（2）它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了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危机，争取到了越来越有利的和平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同时开始了中国近一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危机。这种地缘危机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而不断加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国际环境仍很残酷，但中国人民重新取得了独立和自主，中国的地缘危机形成的内部原因消失了，地缘危机从根本上缓解了。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了外交战略，抵御主要敌人的威胁，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991年，苏联解体，来自北方的对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最大威胁得以消弭。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执行“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地缘战略，并遵循睦邻友好

的既定方针,积极发展了与亚洲国家特别是邻国的关系,创造了和平良好的周边环境。目前我国与亚洲所有国家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同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缅甸、蒙古等友好邻邦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老挝、俄罗斯、独联体诸邻国签定了边界协定,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我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 23 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崭新阶段。1992 年我国还同韩国结束了持续 40 年的隔绝状态,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今天环顾四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我国的毗邻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形成,我国同所有邻国都建立了全面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就可以走向世界,争取更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在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政府在苏东剧变以后,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等方针,采取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对策,外交战线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3)改变了旧中国的“弱国”形象,塑造了独立自主的光辉形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弱国的形象,被外国人看不起。解放后,中国恢复了独立和统一,外国人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不敢再欺负我们了。50—70 年代,中国在国际上塑造了一个“弱国不弱”的形象。尽管事实上我国的国力仍然落后,但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力和战略眼光以及外交技巧,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中国获得了远远超出其物质力量水平所能提供的国际地位及影响。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写到:“中国取得了很

大的成功：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敢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不严肃地考虑与中国对抗的后果……就连超级大国也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投去不怀好意但却是真实的尊敬。”[477]这种情形的发生，固然由于中国是有一些力量的，但更多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卓越领导能力。中国“弱国”形象的改变，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重大胜利。对此，邓小平曾明确表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478]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出现的中美苏大三角的特殊格局中，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在大三角中，中国这一角的力量还很单薄，我们算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个小国。[479]但是，中国毕竟块头大，领导人又不信邪，就是能坚持独立自主。在大三角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但中国有重要的战略平衡作用，使中国占据了有利的主动的地位。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1995年比1988年又翻了一番。1979—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88—1995年为12%。这种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超过了改革前26年年均的增长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6位。中国的崛起已是当今世界无法否认的现实。当然，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威胁其他国家，因为中国是和平的力量，“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480]

在充分肯定新中国地缘外交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

新中国的地缘外交特别是前30年的地缘外交，由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原因，曾经发生了一些失误。总起来说，可能有3个方面：

(1)某些时候未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利益决定着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向，通常指一国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国家利益包括生存和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但是在不同时期，各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在50—70年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是生存和安全利益，其次是经济利益，再次是意识形态利益。因为当时存在威胁我国安全的明显敌国，先是美国，后是苏联，所以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国家利益看，经济利益即使国家现代化，从而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遗憾的是在50—60年代，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度占了上风。虽然党内也有一些领导同志主张调整对外关系，但这些意见未能发挥作用。[481]同时，在过去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时，也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问题，一度影响了中国与对美或对苏关系较好的国家的关系。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

(2)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曾出现了判断的偏差，给我国的地缘外交造成了损害。在60年代，我国对战争的危险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尤其是在70年代初，由于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而苏联又在我国北部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使我们一度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基于这样的判断，[482]我国军队和各方面都要作好准备，始终处于一种备战状态，并由此安排了一、二、三线建设的布局，制定了“山、散、洞”的方针，使我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我们还一度认为战争

必将造成新的革命形势，[483]会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484]把革命作为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和主要倾向，[485]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在“文革”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一些驻外使馆和涉外人员，在当地滥发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引起驻在国的疑虑和不安。[486]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中国就与同我建交和半建交的 40 多国中的 30 多国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中方处置不当引起的。1967 年还发生了“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违反外交公法的事件。这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了损害。幸好从 1968 年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到 60 年代末，中国的外交又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3)对外援助的个别方面存在着不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失误。对外援助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地缘外交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中国 50—60 年代对朝鲜和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曾起了巩固周边国家，保卫我国安全，抵御美国霸权主义的作用。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起了团结第三世界联合反霸，以及扩大我国国际影响、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争取国际人心，配合我外交斗争，推动我国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作用。例如我国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曾得到非洲 26 国的支持。因此毛泽东讲：“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487]但是在对外援助的个别问题上也存在片面强调尽国际主义义务，不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错误。60 年代搞得比较大。1967—1970 年，年均外援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1967 年为 19.94 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4.5%。1968 年增加为 22.4 亿元人民币。1969 年为 20.1 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3.8%。1970 年，外援额猛增到 53.68 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为 23.34 亿人民币，占 45%强。1971 年，在毛泽东发表增加对巴基斯坦援助的讲话后，外援额加码，对外承

担援助额达到69.77亿元人民币,为建国后最高峰,占我国财政支出的6%。1970—1974年,我国对非洲的援助为美国对非援助的49%。从1950—1978年,中国援越总数超过200亿人民币,占我国外援总额的41%。这样大的外援规模,是超出我国的国力水平的。从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调整外援政策。1975年,外援额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2.5%,1979年更降至0.82%。[48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除继续给一些国家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外,发展了互利合作的关系,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促进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三)
新中国地缘外交的若干重大举措及其得失

在对新中国地缘外交的得失作出总体评价的基础上,笔者拟对我国地缘外交的一些重大举措及其得失提出看法。这些地缘外交的重大举措是:

(1)“一边倒”战略。“一边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地缘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个政策的提出有几个原因。首先,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国际上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峙和冷战斗争。中国要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路线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毛泽东1956年讲:“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在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489]其次,美国和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不仅拒绝承认我国,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相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国并与我互派大使的国家,苏共与中共存在共同

的意识形态。所以毛讲："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490]第三，苏联的压力也是一个原因。当时斯大林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Tito)式的胜利，1949年和195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毛泽东语）。[491]与苏联搞不好关系，不仅影响到中共能否被国际共运接纳，还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492]"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起了好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通过获得来自苏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正如毛泽东指出："苏联给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而且要到大陆来"[493]。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行，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首先与苏结盟，当时即付出了一定代价，也做出了一些妥协。[494]这些与原来毛泽东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些最初的设想也是有不同的。[495]

（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重大地缘决策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外用兵。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次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战争的16个国家的军队。同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形势出现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对此，中国通过公开和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警告，强调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

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0 月 4 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10 月 1 日，北朝鲜领导人致电毛泽东，恳请中国出兵支援。是否出兵，中共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但毛泽东一锤定音，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496]。10 月 13 日，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援朝。他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而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497]。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从 1950 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共打了 5 次战役，歼敌近 23 万人，把美军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最后迫使美军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占整个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中两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同时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原国民党人张治中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做一个中国人有了自豪感，在蒋政府执政时期，出兵抗美援朝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依靠美帝而生存的。[498]抗美援朝无疑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作出的一个英明决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也是正确的。[499]

(3)抗美援越。从 60 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越南战争。1964 年，美国制造了“东京湾”事件，随后对北越进行了“报复性轰炸”。次年 3 月，美国正式派遣 350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迈出了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卷入越战的第一步。7 月，美国军队参加地面作战，越南战争迅速“美国化”。到 1967 年，侵越美军已达到 48 万多人。对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作为邻国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还在 1965 年 2 月 9 日，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

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作了准备的。”中国给予了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持,这些支持除了物质的援助外,还包括总数约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军事力量的援助。中国军队驻在北方,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而越南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无疑是巩固中国安全的重大地缘举措,是义不容辞的。正如陈毅同志指出:“乡邻有火,要披发撄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主义呢?”[500]但是,中国支持越南抗美,当时是冒着美国入侵的危险的。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宣称:今天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此后中美的小规模海、空军冲突不断发生。美国还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于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1965年,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去四句话:“1.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 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 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同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美国提出公开警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501]陈毅1965年9月29日曾对外国记者讲:美国的和谈是一个骗局,“它的目的是分割越南,永远保持美国对越南南方的占领,使南越成为美国的傀儡国家”[502]。

(4)睦邻外交。睦邻外交是中国地缘外交的基本组成部分。毛

泽东、周恩来等都多次强调睦邻友好的重要性。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谈话，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表示同意。[503]50年代，中国的睦邻外交是很成功的。但在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受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以及极左路线的干扰，中国几乎与所有邻国的外交关系都出了程度不同的问题，只有越南好一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表示中共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只是道义上的支持。1982年9月，中共12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504]。

第三部分

当代中国的周边地缘外交



第八章

北—西北线地缘：变地缘大患为和平地缘

中国北临俄罗斯、蒙古,西北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漫长的北—西北边界曾是中国的地缘大患。俄罗斯作为北方大邻国,永远是中国国家安全必须考虑的第一要素。远在沙皇统治时期,俄罗斯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导演了外蒙独立。十月革命以后,中苏边界争议也一直未绝。蒙古作为苏联的亲密盟国, 在政治、外交和防务上完全追随和仰靠苏联。中苏关系破裂后,整个北—西北线地缘形成了两国直接对抗的局面。苏联解体后,俄蒙长期的盟友关系为新的伙伴关系所代替,拥有 156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蒙古成为中俄的一个重要缓冲地带。中亚三国的独立, 使该地区成了继蒙古之后的又一个战略中间地带。这对于中国北—西北部的安全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和平因素。

·第一节·
北—西北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北—西北线地缘主要是指中国与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相邻的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等五国相邻的地区。1994 年时这一地区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国　家	人口(万)	面积(万平方公里)	与中国边界线(公里)	军队人数(万)	GNP(亿卢布)	外贸总额(亿美元)	对华贸易(亿美元)
俄罗斯	14820	1707.54	4300	250	6300000	762	50.8
蒙　古	228	156.65	4670	1.4	4.0 亿(美元)	5.46	1.19
哈萨克	1687	271.73	1700		86 亿(美元)	16.09	3.35
吉尔吉斯	446.95	19.85	1100	1.2	10 亿(美元)	1.46	1.053
塔吉克	530	14.31	400	1.0	17179	5.81	0.031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年鉴》(1995/9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北—西北线地缘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与前苏联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俄罗斯和哈萨克、吉尔吉斯以及塔吉克都是原苏联的成员国，苏联解体后，它们分别成为独立国家，而蒙古则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互助会成员国，苏联曾在蒙古驻扎过数十万军队，蒙古在各方面对苏联均有很强的依赖性。1991 年之后，中亚三国与俄罗斯仍是在原苏联基础上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俄罗斯对三国仍有很大的影响。而蒙古则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开始与中国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

中国的北—西北线地缘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一广阔的地带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地区。从春秋战国时起，甚至从西周时起，这一地区就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极为关注的地缘政治的重点。在这一地带发生的事情，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这一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内地的南进和侵扰，使中国多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变化。但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把这里的边界通过官方协定使之确定下来，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

·第二节·
俄罗斯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中俄关系

(一)
俄罗斯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亚洲,乃至世界的两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有着一段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这种地缘关系不仅影响着中国、俄罗斯,甚至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演变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单就中国而言,俄罗斯在其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1)俄罗斯在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

中美苏"战略性三角关系"始于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得以缓和。到80年代局势发生了战略性转变,中国通过运用巧妙的策略和利用戈尔巴乔夫的缓和倡议,得以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有利。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旧的"战略性三角"也随之消散。但老三角关系目前却显出了新轮廓,在亚太地区逐渐崛起的中国,越来越为美国所瞩目。

近几年来,美中关系不断降温。1995年5月下旬,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出现美台关系实际升格的情况,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降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困难的局面,其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打"台湾牌",搞"两个中国"的活动。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东西方冲突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使中美两国70年代初结成的对付莫斯科的"非正式战略关系"消失了。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使美对此深感不安,其对华政策在"遏制"与"接触"政策之间摇摆。美国把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复关"和"军

售”问题上大做文章；支持个别参议员和众议员要求提高香港国际地位的主张；一些人鼓吹承认西藏独立和向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派遣大使；尤其是向台湾提供军备物资和取消对台政治家的入境禁令。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奉行和平共处的合作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缘于经济观点。美国属于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取消最惠国待遇虽然不会导致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崩溃,但可能给中国的现代化政策造成严重的后果。从美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中国作为亚洲的地区性大国的影响不断增加,再加上美国经济界希望进入迅速增长的中国通道的畅通无阻,所以美国也不希望中美关系处于对峙状态。故此迄今为止，中美双方都不愿使两国关系严重破裂。

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成为中国处理美中关系的一个有利因素。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需要一个在国际上有行动能力的俄罗斯作为抵制美国的霸权政治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正是美国使中俄两国关系密切起来。在东面,美国炫耀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西面、北约东扩正在向俄罗斯靠近。于是中俄协调关系，对形成以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予以警惕,并决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但是俄罗斯无意与美国对峙，其真正意图是，一面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牵制克林顿政权，一面扮演重要的调解人的角色，开展既“帮助”美国，也“帮助”中国的“大国外交”。中国也不再希望重新建立中苏的那种坚如磐石的关系，其对俄的基本政策是“既不与俄国结盟，也不与俄国对抗”。中美俄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三角关系。

(2)稳定北—西北边界防止腹背受敌

中俄边界问题由来以久，从北到南，从岛屿到陆界，争议颇多。边界问题往往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砝码，解决稍有偏颇，很容易引起内忧外患。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北部地缘安全的大敌。沙俄原是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国家,与中国相隔甚

远。1581年起，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侵占了西伯利亚境内的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三大流域的广阔地区。到17世纪40年代，沙俄以俄在勒拿河中游建立的雅库次克为据点，大力向东扩张，把其爪牙伸到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是最早侵略中国的欧洲国家之一。

从第一个中俄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开始，沙俄一共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沙俄策动下，历来是中国组成部分的外蒙古，在1911年开始脱离中国；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在我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俄关系得到迅速改善，北部地缘变得相对比较安宁，但中国沿海海缘的问题却日益突出。

当前，南沙问题是东南亚的首要热点问题。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南沙地理位置优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通道，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澳大利亚和欧洲、非洲的重要航道。南中国海的资源极为丰富，特别是油气资源世界罕见，被称为第二个“中东”。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一些周边国家垂涎于南中国海的重要战略位置和丰富资源，先后派出军队侵占我南沙群岛。而且最近几年冲突各方加紧勘探开发和利用南沙自然资源，使主权问题的冲突复杂化。

中国在东南海域的另一大不安定因素来自台湾。90年代以来，台湾在推进“宪政改革”的过程中，为配合其对外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增强在两岸关系上与大陆抗争的实力，全面扩充军事力量，人为加剧海峡两岸的敌对状态。1991年以来，台湾每年的“国防预算”都维持在2500亿新台币左右，占台湾总预算20%以上；并且军队每年都围绕“制空、制海、反登陆”进行多次针对大陆的三军综合性联合演习。现阶段，台湾当局完全没有与大陆结束敌对状态的打

算。其扩充军备的主要趋势，一是着手实施吓阻战略，在强调守势防卫中对大陆采取某种遏制；二是落实未来十年的建军计划，把重点放在东岸，以提升军队整体战斗力；三是继续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扩大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以达到牵制大陆的目的；四是继续全力推动“军队国家化”和“本土化”的进程，大力扶植提拔台籍将军，扼制大陆籍将领，使“党军”逐步转化为“国军”。与此同时，“台独”的力量也有很大发展，并有与台湾官方当局合流之势；台湾当局推动的“务实外交”也具有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的性质。

故此，中国首先稳定北—西北线地缘犹为重要，可防止腹背受敌。同时，苏联解体后，鉴于俄罗斯的西部受到北约东扩的威胁，而高加索地区又烽火不断，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使自己的一翼保持平静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两国基于共同目的，使边界谈判在短期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中俄领土争端是沙俄帝国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和前苏联领导人采取大国主义方针造成的后果。中方的基本立场是始终一贯的，那就是：认为同原中苏边界有关的界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愿意照顾现实状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 19 个不平等条约而割去的 150 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但此后沙俄和苏联又违约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占领或在地图上划归已有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经过多次谈判，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总的来说无重大进展。80 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边境的军事紧张局面不复存在，双方的经济往来，特别是边境及地方贸易获得很大发展。这给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个十分良好的条件。

1991 年 5 月 16 日，江泽民同志访苏，两国签订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式予以确认。按照这一协定，

我国收回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各类船只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流域的自由航行权以及我船只经图们江下游进出海洋的权利。该协定划定了东段97%的边界，只留下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个地区的问题没有解决。1994年9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第二次首脑会晤又签署了《中俄西段边界协议》这一文件把长达55公里的国界西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是对已生效的东段协定的补充。至此中俄300年来的边界争端划上了较圆满的句号。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中国上海签署了一项关于使近7600多公里长的前中苏边界非军事化的历史协定。这项协定中规定了防止边境地区突发军事冲突的有关措施，是一项旨在缓和边界紧张局势的协定。它被认为是亚洲第一份关于多国间安全保障体制的文件。

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北—西北边境基本趋于稳定，于是中国可以投入到解决东南疆域的争端中去。

(3)俄罗斯是影响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北部的蒙古曾是苏联最亲密的盟国。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虽然进入了新阶段，但仍保持着密切的伙伴关系。由于蒙古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对俄罗斯仍有一定的依靠，作为蒙古最大的近邻，在蒙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中，俄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蒙古外交部确认“俄罗斯仍是蒙古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伙伴”。

中亚三国由于多年来形成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对俄罗斯的依附性极大，再加上对独立缺乏必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使这些国家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仍然漫长。三国的边防都有赖于俄罗斯。1995年，俄罗斯又提议建立关税联盟，加快包括中亚三国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使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将进一步密切。

由此可见，中国发展同蒙古及中亚三国的关系，必须要考虑到俄罗斯因素。

（二）
地缘政治中的中俄关系的发展

中俄关系是在苏联解体和国际环境大变化的形势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 年底—1992 年底）迅速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保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1991 年 12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随着苏联解体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12 月 27 日，中国政府派对外经贸部长李岚清率政府代表团访俄，中俄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方宣布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接替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1992 年 1 月底，李鹏总理在联合国会见叶利钦总统，这是中俄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双方都表示要恪守 1989 年和 1991 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1992 年 3 月俄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访华，两国签署政府间经贸协定，规定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随后，俄外长科济列夫访华，中俄互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批准书，划定了东段 97% 的边界。1992 年 9 月，中国国防部长秦基伟首次访俄，建立了两国军方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阶段(1992 年底—1994 年 9 月）以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为标志，两国关系开始由一般正常化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关系。

1992 年 12 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叶利钦称这次访华“开辟了俄中关系的新纪元”。之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Rubkin)等相继访华。两国副总理和部长级的往来亦十分活跃。

第三阶段(1994 年 9 月—1996 年 3 月）江泽民主席对莫斯科的

成功访问，进一步把两国关系推进到了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1994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和《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声明，确立了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国家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边界争议，从而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主席于 1995 年 5 月 9 日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庆典，并再次会见叶利钦总统。叶强调“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6 月李鹏总理首次访俄，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公报》和一系列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的实质性合作关系。此外，俄外长科济列夫、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访华，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访问了俄罗斯。

第四阶段（1996 年 4 月—至今）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两国关系进入“互相谅解、信任和合作的崭新阶段”。中俄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发展各领域合作。

1996 年 4 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问中国，把两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双方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双边关系上，“双方重申恪守 1992 年 12 月 18 日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 1994 年 9 月 3 日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所阐述的各项原则。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最高级接触和协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决定为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联系”；关于亚太安全与经济合作，“双方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在未来世纪将起重要作用”；“双方愿相互促进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中国方面重申支持俄罗斯申请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俄双方还同意继续致力

于加强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合作，并愿为此目的相互间与所有有关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贸易上，双方将采取有力措施，利用两国地缘相近和经济互补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军事上，双方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军队之间在各个级别上的友好交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考虑两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进一步加强军技合作，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一条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边界。[505]

目前，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看好。究其原因主要是双方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利益的需要。首先，中俄毗邻而居，互为最大邻国，两国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有助于双方改善地缘政治环境，保证周边安全，这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中俄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两国目前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这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俄积极发展互利互惠的经贸和科技合作有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最后，双方发展双边关系，互相减轻对方来自美国的压力，彼此增强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将继续保持健康、积极和稳定的发展势头。政治上继续深入全面地发展两国关系，保持“持久密切”的友好合作；加强“建设性”高层对话；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密切磋商；经济上将开创形式多样的务实合作新局面，进一步改善两国经贸合作的环境与条件，使双边贸易额逐步上升；经济科技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军事上争取建立长期稳定安全信任的边境带。

（三）
地缘伙伴的相吸与相斥

（1）中俄关系长期稳步发展是两大国利益的共同需要

促使中俄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国际背景是俄罗斯对美幻想的破灭和中美关系的倒退。苏联解体以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当权派标榜同西方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奉行对外政策向西方一边倒的

方针，同美国结成了“战略性伙伴关系”。然而，俄罗斯的这种亲西方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像它原来所期望的那样。相反，美国在涉及俄罗斯“最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如：俄罗斯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北约东扩，处理前南地区冲突，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等问题上同俄罗斯意见相左，矛盾相当尖锐；西方对俄罗斯许诺的经济援助也大多未能兑现。事实上，冷战后美俄间双方所期待构筑的“战略伙伴关系”已被“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所替代。俄罗斯要在这些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取得与美国较为平等的地位，要美国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无疑是有利的。

中俄两国的地缘优势对经贸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俄罗斯重工业、军工业相对发达，中国轻纺和食品工业发展较快。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由此产生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互补性都很强，这使两国的边境经贸合作具有长期性、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这可从以下几个有利因素来加以分析：首先，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块资源极为丰富，但都尚未充分开发的世界宝地，已引起中、俄、美、日、韩等国的关注，是国际合作开发的新热点地区。俄国纳霍德卡港、海参崴和中国的珲春地区被联合国称为未来的新的“金三角”地带；其次，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几千万人口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两国经济条件与发展的差异使互补互换的贸易具有较长的生命力；再次，欧亚大陆桥向水陆空大通道全面发展为沿线地区带来了经贸发展的有利条件。所以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十分可观。

俄中关系的加深可以减轻美日军事同盟对各自的压力。俄罗斯在东北亚拥有军事和经济利益，他把远东地区的发展看作是通向太平洋地区的门户。从这一角度看，俄罗斯同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从军事角度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仍值得警惕。加上俄日尚未解决的“北方四岛”问题，两国关

系在短期内很难会有突破性的进展。美国是俄罗斯来自太平洋海上的威胁，由于美国把日本当作前进的基地，俄罗斯的忧虑就更为强烈。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因此中俄之间的战略安全保障关系对美日的战略性结合将会起到很大的牵制作用。

(2)背靠背稳定一翼

中俄边境安全系数增大，对中国来说缘自东南部的不安定因素，对俄罗斯来说则主要缘于北约的东扩。于是两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归纳起来就是“背靠背，稳定一翼”。

北约于 1994 年 12 月 1 日正式作出了向东扩展，接纳中东欧和部分新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为其新成员的决定。北约东扩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向中东欧地区扩大其影响和向原苏联地区渗透的既定战略。西方国家计划以北约为基础，将原华约国家纳入其新的欧洲框架之内，将俄的军事威胁力量限制在最低水平。北约的东扩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俄朝野上下的反对。俄国认为，北约东扩将完全改变冷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形势，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如听任其东扩，首先俄将失去其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其次，北约的核保护伞也将东扩。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但尽管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的趋势并未被阻遏。这主要是因为，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尽快加入北约。它们的出发点是，在安全真空的情况下，处于西方军事阵营和另一个军事大国俄国之间的地带，自己的生存安全毫无保证。由于缺少国际安全机制和军事平衡紊乱，它们都感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俄罗斯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它一方面对北约的东扩计划坚决反对；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加强独联体的军事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俄罗斯表示，如北约东扩，将在独联体国家内组建新的军事联盟与之抗衡。俄罗斯与北约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争执仍将继续下去。

故此，稳定中俄边境对俄罗斯集中全部精力对付北约东扩是十

分有利的。

近年来，中国在俄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俄罗斯开始重视东方政策，要以东方来牵制西方。俄罗斯立国之初，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一度实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对美亦步亦趋，忽视了东方外交，把对华关系亦作为一般关系来处理。但亲西方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西方并没有给俄国多少实惠（西方虽承诺援俄国 670 亿美元，但实际给的很少）。加之近年来俄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强烈不满，叶利钦等对西方也深感失望。俄国政府因而不得不下决心调整外交政策，实行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外交。不断加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发展中俄双边关系已成为俄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其次，中国是俄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从地缘政治来说，苏联解体使俄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俄国认为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符合它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中国是俄国最大的邻国，发展同中国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有助于俄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目前，俄国各派政治力量虽然在内外政策上有尖锐分歧，但在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

最后，俄认识到要进入亚太经济圈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俄国认为未来的“21 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为此想抓住机遇，尽快打入亚太经济圈，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以吸引亚太地区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与亚太地区经济接轨，提高自己在亚太乃至世界经济总进程中的影响。鉴于中国是亚太地区五大力量之一，在本地区的地位、影响日益增大，俄国在这一地区需要并重视同中国合作。近年来俄不只一次要求中国在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给予支持。

因此，正如一些俄罗斯学者所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占有的位置向来十分重要，就像俄罗斯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位置

一样。……对于俄罗斯来说，同中国友好是对西方关系中可靠后方的保障；对中国来说，与俄罗斯友好，也是可靠的后方保障。”[506]

(3) “中国扩张论”及“俄罗斯民族主义”

1991年俄罗斯独立以来，俄中关系发展很快。但俄中是两个相邻的地缘政治大国，也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这本是正常的。但俄罗斯国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却夸大这种矛盾和摩擦，鼓吹“中国扩张论”。这也是两国关系中值得警惕的迹象。

俄罗斯的“中国扩张论”主要是指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扩张。自1992年中开始，这类文章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中：“‘伟大的兄弟’正在把手伸向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报》;“中国在远东:客人还是主人？”—《消息报》;“中国人没有武器,但很危险”—《新闻报》;“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否会成为哈尔滨的郊区”—《共青团真理报》……

“中国扩张论”缘于沙俄时期的“黄祸论”。所谓“黄祸”,就是指来自黄皮肤的中国人的灾祸，最早可以在19世纪俄罗斯远东档案中找到记载。“黄祸论”产生的第一个借口是1868年的所谓“蛮人的战争”,即俄罗斯金矿开采者与自由的手工淘金者在阿斯科尔德岛上的时间不长的冲突。于是“黄种人”邻居对俄罗斯远东领地造成威胁的思想在俄罗斯的乌苏里边区中诞生了。最初还只是包括经济内容，即在矿山开采业、建筑业和工业领域中中国廉价、要求不高、顺从的劳动力的涌入，以及中国在零售商中的统治地位，使俄罗斯人感到了自然竞争的压力。由于一战的爆发，远东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关于“黄祸”的议论也就很快平息了。

时隔一个世纪之后，俄罗斯国内有人再次鼓吹“黄祸论”。1992年初，中俄互免签证协定签署后,双方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从1993年秋开始，俄罗斯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关于中国扩张的公开报道。《消息报》称“中国人要对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进行大规模开发”。如果说，第一次“黄祸论”仅是就来自中国工人的竞争和资金外流

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言的，那么这一次则已经形成了“中国扩张”的说法，经济因素不再是主要的了，取而代之的是军事战略和政治因素。

首先，“中国扩张论”缘自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它的宣传对俄罗斯政府和议会机构中相当强大的“西方派”有好处。“西方派”把俄罗斯的政策主要放在同西欧和美国发展关系上。根据他们的意见，“中国可能在更为遥远的未来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外来威胁(也就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这种危险是与可能来自日本的一切危险所无法比拟的”[507]。

其次，“中国扩张论”缘自远东地区对处在文化价值观体系与俄罗斯迥然不同的非欧洲人的包围中的恐惧感。斯拉夫文明和中国文明彼此间隔隔不入，相互不能同化，也不可能混杂在一起。

再次，“中国扩张论”的关键因素是原本就不多的斯拉夫居民从 90 年代初开始不断减少，使得俄罗斯非常担心经济、军事实力都变得非常强大的中国把俄罗斯远东已经形成的缓和空间视为解决本国庞大人口问题的理想地域。

最后，“中国扩张论”在很大程度上缘自俄罗斯内部地区与中央争夺经济独立的斗争。远东地区对俄罗斯政府把其仅仅视为中央的原料附属表示不满，远东地方政权可以借口对付中国威胁提高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政权中的地位。

应当指出，俄罗斯国内的“中国扩张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但在两国关系中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俄罗斯和中国虽然一致同意继承原来中苏之间的关系，但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再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两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容易引起矛盾和摩擦。因此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使两国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是

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前提。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目前俄罗斯经济不是十分景气，急于得到外部的经济援助，这无疑是给台湾的所谓“银弹外交”以可趁之机。1992年以来，俄罗斯一些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与台湾关系较密切，从中捞取经济实惠。

第三，中俄贸易还存在一些问题。苏联解体之初，中俄贸易发展迅速、红火，1993年贸易额达70多亿美元，但1994年只达到50多亿美元，开始滑坡走入低谷。其原因主要是：易货贸易是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主要形式，容易产生种种弊端；同时，由于两国间的运输条件的限制，使得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后劲不足；中俄之间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进行现汇贸易的机制，贸易伙伴之间对现汇贸易的做法不熟悉，这就使得中俄现汇贸易步履艰难，现汇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大。再加上在中俄贸易实践中，缺乏详尽而配套的法律、法规及权威性的仲裁机构，签约的随意性和违约一方不受任何追究处罚，造成贸易行为的不严肃性，这也是中俄贸易滑坡的重要原因。因此，中俄要想使经贸合作走出低谷，就必须要花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尽快完善现汇贸易机制，积极发展和扩大中俄全面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完善中俄贸易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权威性仲裁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使中俄经贸合作走上法制的轨道，朝着更健康、对双方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走出低谷，并不断跃上新台阶。

对这些问题，中俄双方都应认真对待，既不要掉以轻心，但也不要过于夸大，而应采取认真务实的立场，在双方已达成的原则协议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四）
中国对俄罗斯的地缘政策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阐述了中俄友

好的四点基础：第一，中俄毗邻而居，互为最大的邻国，增进信任、保持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第二，中俄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两国目前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这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三，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助于世界更加繁荣和稳定；第四，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彼此都希望成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这都是决定中俄关系走向的主导因素"[508]。

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地缘政策以睦邻友好互利协作为基础。

关于中俄边界争端问题基本告一段落，关于东段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处有争议地区的归属问题，中国原则是"和平磋商，尽快解决"。

近两年来，随着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对它的意义和作用明显上升，俄罗斯希望在亚太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此，中国在1996年4月的《中俄联合声明》中重申支持俄罗斯申请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共同致力于加强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合作。

就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问题，中国原则上采取不干涉态度。既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也不干涉东欧各国的自我抉择。

从地缘角度讲，中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国正在逐步加大东北三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共同开发中俄"金三角"地带。

就安全角度看，俄罗斯永远要受到中国的重视。俄罗斯始终是军事强国，要想同其平等和睦地毗邻而居，就只有用同样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互相牵制，所以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国防建设，并努力发展经济。

俄罗斯的强大是迟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基于睦邻友好的前提，在竞争中求生存，努力发展自身实力，提高综合国

力，以求势力均衡，以此保持稳定。

·第三节·
蒙古问题与中俄关系

北方草原之国蒙古，是与我国有最长边界线（4670公里）的近邻，其东南西三面与我国为邻，北界俄罗斯。蒙古在历史上隶属中国，一直归囿于中国版图。尽管它于1921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并宣布独立，但中国国民党政府很长时间未予以承认。直到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苏联的压力下，在《中苏友好条约》中写入如下条款："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之边界为边界。"这种外交上的承诺，事实上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业已承认外蒙古独立，所谓"公民投票"只是一个形式。1945年10月，外蒙古公民投票，面对"全数赞成独立，无一人反对"，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5日正式公告外蒙古独立。同年2月，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蒙古建立两国邦交，并互换了使节，堪定了中蒙详细的边界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处在中俄包围之中，作为两大国历史关系的产物，蒙古在地缘上的特殊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中俄双方在构筑关系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
蒙古外交新战略

苏联解体以前，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追随苏联，党的总书记几乎每年都要赴苏联访问和磋商，以决定本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根据1966年1月蒙苏签定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批苏军进驻蒙古，最多时达15万人，直至1987年才

陆续撤走。冷战结束后，蒙古国的外交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动，由昔日的一边倒向苏联，变为独立自主的全方位交好。1994年由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蒙古国外交构想》，正式确认“同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文件同时提出发展同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和提高蒙古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以及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等新内容，从而用法律形式把蒙古的新外交战略固定下来，这是蒙古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1)蒙古的外交总方针可概括如下：

发展同中俄的睦邻友好关系是蒙古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作为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保持互利和睦邻的关系是蒙古得以存在和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因此，蒙古强调始终要彻底避开中国同俄罗斯的敌对关系，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等距离。其次是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大小国家的关系，以求得外援和投资，并保持在俄中之间、东西方之间的平衡。最后是积极发展同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双边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以此来改变蒙古传统闭塞、孤立的外交局面。以发展同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为根本，立足亚太，面向世界，这就是冷战后蒙古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战略。

(2)蒙俄的地缘伙伴关系

苏联解体以后，蒙俄的长期亲密盟友关系亦告一段落，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政治上，俄蒙间的互访频率降低，蒙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对美、日、中等国的访问增多；经济上，已由苏联单向地向蒙古提供援助，演变为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双边关系，蒙古的畜产品和矿产品也是基本上按国际市场价格向俄罗斯出售；军事上，蒙俄两军各自独立，不再实行两国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联合演习，部队也不再由俄罗斯军官统辖，蒙古边境加强巡逻，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局面。

但是，蒙俄关系仍然密切，俄罗斯仍是蒙古对外关系中的主要

伙伴。1993年，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正式访问俄罗斯，双方重订《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认为“两国是睦邻与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当任何一方认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出现酿成国际性后果的情况下，双方将互通情报，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任何一方认为其安全利益将会受到威胁时，双方应尽快进行协商”。1994年4月7日，蒙古总理扎斯莱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两国在文化、科技、邮电通信、高等教育、医疗卫生、水文气象、环境监控以及林业和两国公民签证制度方面的合作协定。由此可见，蒙俄关系仍然比一般国家的友好关系要密切得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蒙古在经济、政治上对俄罗斯仍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在俄罗斯整体对外战略中，蒙古也仍具有一定的地位。

从蒙古方面看：蒙古的国民经济体系中，苏联援建工厂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60%以上；对苏贸易曾占蒙古贸易总额的80%左右，90年代以来仍占40%左右；蒙古国民经济的血液——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蒙古军队的武器装备，原来是清一色的苏式装备，没有俄方的维护、检修和燃料、零配件供应，这些武器就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因此，蒙古的军事力量虽然已经独立自主了，但军事机器的运转仍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从地缘和苏蒙长期特殊关系来看，在蒙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中，俄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俄蒙关系，有利于平衡蒙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蒙对俄外交战略已从紧密结盟关系变为特殊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俄罗斯方面看：蒙古的战略位置对其十重要。它是中俄两大国间的一大片缓冲地带。而且过去70多年间，在蒙古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苏联曾向蒙古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贷款，年平均达

10 亿卢布。至今，俄罗斯对蒙古仍有约百亿卢布的债权，俄罗斯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它的债权。况且，蒙古的畜产品对缓解俄罗斯的肉食供应，蒙古的铜、钼等稀有金属对它的军工生产，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俄罗斯对蒙的新政策是在充分考虑到亚太整体利益和中俄关系新格局的基础上制定的。俄谋求与其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的蒙古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助于俄达到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目标，有利于调整同地区大国和各个力量中心的关系，以便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的解决。并且加强同蒙古的经济联系对开发西伯利亚地区也具有一定意义。

(3)中蒙间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

1949 年 10 月 16 日中蒙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其后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50 年代，两国亲密友好，相处融洽，可称为蜜月时期。60—70 年代，随着中苏交恶，中蒙关系也直转急下，处于冰冷阶段。80 年代中期以来，关系又逐渐转向恢复和发展。

自1985 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1987 年驻蒙苏军撤退后，蒙古官方和民间要求恢复中蒙正常关系的呼声渐高，双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1989 年，中蒙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两国首脑互访频繁，推动两国关系全面而深入地发展。1990 年 5 月蒙古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访问中国，这是自 1962 年以来访华的第一位蒙古国家元首；1991 年 1 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访中，这是 60 年代以来访华的第一位蒙党最高领导人；同年 8 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蒙古，这是中蒙建交 40 多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蒙。1994 年 4 月末，中国国务院李鹏总理应邀访蒙，双方签署了《蒙中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对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蒙古自苏联解体后，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保护伞，与之三面相依的中国邻居便成了蒙古今后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俄罗斯经济几年来一直未能走出困境，根本无力给予蒙古经济上的帮助，所以蒙古认识到良好的中蒙关系是蒙古重建经济的关键。自1991年以来，蒙古实际是采取政治上对中俄保持等距离，而在经济上则更靠近中国。

从中国的角度看，随着中俄关系新格局的确立和发展，原有的中苏对抗的紧张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也不再将蒙古视为苏联在远东制衡中国的工具。并且蒙古作为中国北方邻国，同中国有着467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再加上蒙古族人跨界分居在两国境内，所以增进和发展同蒙古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持边界的安定，促进民族地区的团结与发展，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1991年来，中蒙两国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到1993年，中蒙贸易总额已达到1.72亿美元，中国成了继俄罗斯之后蒙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中蒙通过边境的8个口岸进行易货贸易。中蒙两国的工厂、企业、公司及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合作，一年比一年扩大和发展。截止1993年， 在蒙古建立了218个合资企业，其中38个，即17.44%有中国资本。

展望中蒙两国关系，前景看好。双方不仅利用毗邻的优势，通过共同参与国际多边经济合作项目，发展经贸合作，而且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不断扩大交流。双方频繁地交换艺术团体、体育代表队、留学生、进修教师和专家，两国的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了直接联系。总之，中蒙已经确立了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

(二)

蒙古在中俄关系新格局中的地位

(1)蒙古是横在中俄间的缓冲地带

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大而强的国家，其政治地理区域都由以下

几个部分组成，即核心地带，边缘地带，缓冲地带，战略疆域。横在中俄之间的蒙古，作为两国的接合部，缩短了两国接壤的边界；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减小了两国直接对抗的危险性。所以这一大片土地，对于中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蒙古作为缓冲地带，对中国更为重要。因为即使在蒙古是中国组成部分时，中国对俄罗斯也从未构成重大的威胁。它远离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但蒙古距中国首都北京的最近距离只有600公里，且其间没有任何可以据守的天然屏障。因此，70—80年代苏联在蒙古驻扎10多万大军，自然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一大军事威胁。中国理所当然地把苏军从蒙古撤军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政治前提之一。1991年后，蒙古脱离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控制，成为对中俄同时友好的国家，成为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是有利的。

(2)蒙古借助“第三国”平衡与中俄的关系

目前，蒙古对中俄两大邻国奉行等距离的友好政策。但是从安全方面来考虑，蒙古对这两大邻国又都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戒心。蒙古军队报《独立报》在1995年11月10日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设想本国有遭受外国入侵的8种可能性，其中6—7种皆来自中国或俄国。在这种背景下，蒙古国内有所谓寻求“第三国”的外交思想出现。“第三国”就是美、日等西方国家。蒙古力图借助他们，牵制对本国有“威胁”的两大邻国，靠西方国家平衡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以使本国的独立、安全得到更有力的保证。

美国之所以对蒙古产生浓厚兴趣并重视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是有其战略考虑的。蒙古与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地域接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距北京直线距离仅600多公里；蒙古又是俄罗斯乌拉尔重工业基地和命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南方屏障。到中俄之间的这个国家去立足，“插到熊掌和龙爪之间去”，美国人就获得了观察、探测中俄两大战略对手的极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也可以在一定

时候从这里对两国施加影响。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1995年7月说,在战略上,从多方面都可以说蒙古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邻国对蒙古的独立有任何程度的限制,美国都会发出支持的声音。

蒙日关系也迅速发展。1990年2月蒙政府首脑首次访日,访问期间日本答应给蒙古最惠国待遇和1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1991—1993年,日本三次发起召开了世界援蒙国家会议,日本的援助额相当于援蒙总金额的1/3,日本成了最大的施主。而且日本还十分注意在对蒙古的援助中笼络人心,赢得了蒙古人的极大好感。目前日本已成为在蒙古很受欢迎的国家,日语成了蒙古人最喜欢的外语。蒙日关系显著发展,从日本方面看,除也想在夹于俄中两大国的蒙古取得一个观察哨和施加影响的据点外,还试图占领蒙古市场,获取蒙古这个地广人稀国家的丰富资源。当然从蒙古的角度讲,除牵制中俄两国外,还有颇为重要的原因,即争取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财政经济援助。

(3) "泛蒙古主义"对中俄两国的影响

蒙古族目前在全世界大约有1000万人口,分别居住在12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和俄国境内分别居住着480万和150万蒙古人。近年来,恢复民族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成为目前蒙古时尚的主流。恢复使用传统文字旧蒙文,对成吉思汗的重新评价和赞扬,都标志着蒙古民族主义的复兴,进而也出现了"泛蒙古主义"的萌芽。

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毗邻,历史上渊源较深。对于蒙古民族问题以及新兴起的"泛蒙古主义",中国不可能不予以关注。因此如何加强内蒙古地区的建设,搞好该地区的民族团结,防备外部势力的滋扰,甚至分裂破坏,仍是中国安全一个随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于俄罗斯来说,接近蒙古的贝加尔湖地区(指布里亚特蒙古

共和国）是十分危险的地区，因为该地区强烈地致力于独立。

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使中俄双方都希望蒙古国政局稳定，希望边界安全稳定，以便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四节·
中国与中亚三国关系及其俄罗斯因素

（一）
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形势

苏联解体，中国周边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又有三个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中国的邻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成了继蒙古之后的中俄之间的又一片缓冲地带。

这个地区刚刚独立之初，就立刻成为世界外交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各方势力纷纷向该地区渗透，以争得有利地位。其原因如下：中亚地区地处欧亚连接点和战略接合部上，自古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横贯欧亚大陆的第二条大铁路的贯通，使中亚成为连接东西交通的走廊；中亚地区又是各种文化、宗教相互作用的融汇点，穆斯林文化、斯拉夫文化、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互相渗透，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儒教等彼此影响，因此使该地区成了各种思潮撞击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中亚还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分布着 100 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斗争，导演了一场又一场民族融合和争战的悲喜剧；并且中亚战略资源十分丰富，盛产石油、黄金、天然气、生产核武器必须的铀，以及优质的棉花等，使该地区成了极具经济战略地位的要地。

(1)中亚国家间的合作与矛盾

独立后的中亚在争取和巩固国家政治经济独立之上有共同利

益，采取了一些共同措施来加强一体化；但由于相互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又使一体化进程雷声大、雨点小。

中亚各国加强联系是有一定基础的。它们在历史上有共同的命运；在苏联时期经济水平接近；同属于伊斯兰教文化民族地区；各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杂居，来往密切，彼此互为近邻；独立后政权结构、经济状况也大体相同。基于以上因素，中亚五国相互签定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经济科技文化协定；1991年底成立了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委员会；1992年底中亚四国军队联合干预，使塔吉克内战免于升级；中亚五国领导人还经常举行会晤，商讨加强五国联系的问题。这些无疑有助于中亚五国一体化进程并逐渐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但是，中亚各国间也存在着相互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冲突，从而使中亚一体化进程受阻。首先，中亚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杂居问题，历史上几个主要民族发生过矛盾和冲突。独立后，各国家的主体民族中民族主义急剧膨胀，排挤非主体民族，引起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和谐。其次，各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对五国联合的兴趣点也各不相同：塔吉克由于政府同反对派尖锐对抗，对莫斯科的依赖极大，几乎完全听命于俄罗斯的指挥，而与其他中亚国家合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土库曼由于国内政治稳定，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丰富，又紧邻伊朗，自然条件便利，前景看好，因此对与土耳其、伊朗和西方发展关系更为关注。最后，中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关系。苏联解体后，两国都各自宣扬“大哈萨克主义”和“大乌兹别克主义”，无形中增加了两国间的隔阂；两国暗中对中亚地区主导国地位的争夺阻碍了两国在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努力。

(2)俄罗斯因素对中亚的影响

中亚地区无论如何必须同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因素决定的。从经济的角度讲，中亚各国经济结构畸

形，对俄罗斯的依赖十分强烈。三国在原苏联时期，由于长期推行“劳动分工” 的结果，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主要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矿产品和农牧业的提供者，加工工业不发达，日用品不能自给，高技术产业尤其落后。因此，如果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彻底割裂的话，那么只能使三国的生产持续滑坡，市场供应越来越糟，所以密切的经济联系使他们离不开独联体，尤其是离不开俄罗斯。就军事而言，中亚各国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卫边境的还是独联体军队，实际上主要是俄罗斯军队，这就决定了三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俄罗斯。不仅如此，就是在中亚三国的生活中也时时刻刻显示出一种同俄罗斯无法断绝的关系：就比较正式的场合而言，人们说的是俄语，看的是俄文，往往用前苏联形成的方式思考问题和从事工作，甚至连生活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化”了。虽然这些年官方试图同俄国以外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起更多的联系，但当代历史、地缘特点和文化心理、尤其还有经济和资源上的独特构造，决定了中亚三国不得不继续维系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紧密联系。

可见，“俄罗斯因素”在中亚地区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俄罗斯也很自然地利用这个因素来控制中亚地区。俄罗斯外交部多次强调，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地区是俄罗斯利益攸关的地区，俄罗斯绝不可以忽视。

对俄罗斯而言，它既想维持自己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中亚，推行俄的大国外交，但又不愿过多地承担对中亚的经济义务；一方面口头上承认中亚各国的政治独立，愿意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保持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中亚各国家的主权。俄罗斯既不愿中亚各国彻底“离开”自己，又不愿意与其靠得“太近”。因此俄罗斯利用中亚各国对自己依赖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力图保持自己在中亚的最大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外交政策侧重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限制

中亚各国的主权，巩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控制。首先，对中亚五国进行经济援助，试图以此影响中亚各国的经济政策；其次，利用散居在中亚五国的1000多万俄罗斯族人对中亚各国施加压力，以加强控制；再次，中亚五国在国家安全上都倚重俄罗斯，俄借此机会保留了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和军事基地；又次，俄罗斯对中亚和前苏联境内其他国家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多方阻挠中亚国家组成共同体，限制它们在经济、政治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一体化进程；最后，利用中亚各国对俄罗斯在能源、工业原料和工业设备等方面的需要影响该地区。

从中亚各国的角度看，它们一方面认识到它们目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离不开俄罗斯，因而不得不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中亚五国作为新生国家又要全力巩固因苏联解体而取得的独立，因此不愿意受俄的控制与摆布，在依靠俄罗斯的关系中又表现出要逐渐摆脱而真正实现独立的倾向。在这种矛盾心态下，中亚各国程度不同地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并积极发展与伊斯兰国家、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外交联系，以摆脱过分依靠俄罗斯的关系。不过，从今后较长时间的发展趋向看，中亚各国将不得不与俄罗斯继续保持某种密切的联系。

(3)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复兴

伊斯兰教在前苏联是仅次于东正教的第二大宗教。苏联长期对伊斯兰教的压制政策是原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其后果严重伤害了穆斯林各族人民的感情。几十年来，在千千万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高加索各族人民心中埋下了不满和仇恨的种子，激起了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情绪。苏联宗教政策上的失误，是导致伊斯兰教复兴的直接政治根源。

在中亚地区，宗教和民族因素不可小觑。苏联解体之后，两种跨国民族主义开始重露锋芒。

泛伊斯兰主义是“宗教民族主义”的代表。它产生于19世纪

下半叶的西亚，创始人为自称阿富汗人的哲马普丁。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政治思潮曾在喀山、布哈拉、乌法、巴库、阿拉木图和塔时干传播。当今泛伊斯兰主义的国际背景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不可否认，目前穆斯林确实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人数众多，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5；居住地区遍及全球，而且相对集中，便于联合；并且伊斯兰教具有特别强劲的凝聚力，其宗教礼仪同穆斯林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牢固地合为一体，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全世界穆斯林几乎都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历史上的渊源，容易团结对敌。就目前状况看，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确拥有一定的势力，但是要在整个地区起到左右全局的决定性影响，也非易事。

首先，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虽然都是穆斯林，但他们接受伊斯兰教作为全民族信仰的时间较晚；并且伊斯兰文化进入中亚，必然接受中亚本土多种文化的“改造”，因而形成了“中亚模式”的伊斯兰文化。所以中亚人民对伊斯兰教信仰的程度及宗教礼仪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程度也大不同于阿拉伯人和小亚细亚人。

其次，中亚各族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与纠纷，一时难以解决。自1986年起，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哈萨克人与高加索人、塔吉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一再发生，有的酿成严重后果。几年来，在民族冲突中死亡人数已有好几千人。并且中亚各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也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尚需时日，至于泛伊斯兰主义的“联合”就更不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最后，从国际角度看，向来反对西方的穆斯林运动是不可能得到美欧等国的支持的，西方国家遏制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泛滥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始终认为独联体是自己的天然势力范围，对其有“保护”之责，当然也不会轻易让中亚地区落入泛伊斯兰主义的控

制之下。

泛突厥主义是“种族民族主义”的代表。其思想首先萌发于沙俄境内鞑靼少数知识分子。在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泛突厥主义于本世纪初在土耳其发展。一战后，土耳其开始成为泛突厥主义的活动中心。

泛突厥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要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突厥族”，并企图把它统一起来。在中亚宗教伊斯兰化的同时，民族进程表现突厥化，即一个个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致使中亚的土著居民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操起了突厥语。但野蛮的征服者不得不适应征服后面临的文化、经济环境，而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皈依伊斯兰教，致使泛突厥主义传入中亚便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极端民族统一主义。但西方国家都是有意识地抑前者，而扬后者。他们怂恿土耳其人尽快进入中亚主要就是为了抵制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因为“统一的突厥帝国”的现实性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威胁的强度比起来要小得多，因而美国和西方都乐于把“泛突厥主义”作为手中的一张牌。

综上分析，两种跨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缘于苏联对伊斯兰教的长期压抑，因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有一定的滋生土壤和相当的号召力。但是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如前所述，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全境控制局势的可能性不大，而“突厥帝国”恐怕还只是一个飘渺的幻梦。

(4)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的争夺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争夺其实就是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的争夺。

在历史上，哈、乌、土、吉等中亚四国与土耳其在语言、文化、种族和宗教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在血缘上与历史上的突厥

有亲和关系，都讲突厥语，都信奉伊斯兰教，在地缘上都彼此邻接。这种历史联系成为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发展与土耳其关系的重要原因。同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经济比较发达，与西方国家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亚各国可从土耳其获得经济援助和管理经验，并借助其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减少对俄罗斯的依靠，达到巩固政治经济独立的目的。

土耳其也利用苏联解体的有利机会，加紧同自己的夙敌俄罗斯争夺对中亚国家的控制权，用各种方式向中亚渗透。土耳其制定的中亚政策的目标是：把中亚突厥语国家纳入自己影响的范围；在与伊朗争夺对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中防止中亚国家倒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加强与中亚的经济联系，扩大土耳其商品的出口市场，从中亚获得丰富而廉价的工业原料；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尤其是在土耳其努力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利用对中亚的影响证明自己仍然对西方有重要价值。土耳其中亚政策的核心是建立由自己主导的“突厥国家联盟”。这样，在中亚国家和土耳其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关系在苏联解体后有了很大发展。

伊朗是苏联解体后与中亚五国积极发展关系的另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与中亚国家在语言、历史、民族方面的联系虽不如土耳其，但也有它独特的优势。首先，波斯帝国在历史上曾统治过中亚地区；其次，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有较大影响；第三，伊朗在地理上比土耳其等更接近中亚五国，伊朗与土库曼有长达1700 公里的共同边境，伊朗的出海口离中亚内陆国家也最近；最后，塔吉克境内有 300 多万波斯族后裔，在伊朗境内也有土库曼、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族人。由于这些原因，中亚国家在独立后也把发展同伊朗的关系放在重要地位上。

同样，伊朗对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有很高的热情。伊朗中亚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增强伊朗在中亚的影响；在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从中亚挖掘核原料、核技术和核专家，推

进伊朗核计划的发展；扩大伊朗为主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影响。所以在中亚国家独立后，伊朗积极开展了外交攻势。在中亚国家和伊朗的共同努力下，中亚国家和伊朗的关系比过去大大密切了。

由此可见，土耳其与伊朗在争夺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方面是相互竞争的。

(二)
中国与中亚三国的关系

中亚三国脱离原苏联而独立，成为中国的新邻邦。中亚各国领导人均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以此来推动中亚经济的发展，缓解国内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困难；与中国发展关系还有助于中亚国家逐渐减轻和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以此来巩固中亚国家的独立，同时也遏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中亚的影响；中国与中亚毗邻，又是亚洲大国，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该地区的和平安全有重大意义。中亚的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势必要产生一些新影响。第一步是俄罗斯联邦对中亚的争夺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才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后果问题。

(1)中亚成为中俄之间的又一缓冲地带

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俄罗斯在西段同中国的边界变得很短，只有 50 公里，俄罗斯同中国的接壤主要表现在同中国的东北部的接壤。这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因素。过去沙皇俄国和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使中国在国内政策和战略选择方面受到很大牵制。苏联解体后，中俄边境问题在几年内得到了有效的解决。1996 年 4 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中国上海签署了一项关于 7600 公里长的前中苏边界非军事化的历史性协定。这项亚洲第一份关于多国间安全保障体制的文件不仅将进一步增进中俄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且也将大幅度增进中国与中亚三国之

间的信赖关系。目前，中国西北部边境是有史以来最安定的时期。

(2)考虑“俄罗斯因素”,着力发展经贸合作

中国在观察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时，在考虑加强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时，首先应注意到“俄罗斯因素”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如前所述，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曾经隶属于它的中亚地区，因此，中国必须清楚自己在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不占首要地位。只要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中亚地区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就没有必要参加中亚地区的角逐，而破坏中俄关系。因为中亚都把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作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改革中遇到的共同性问题，以及近在咫尺的地缘关系，中亚三国把中国也摆在了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位置上。中国应着力于同中亚三国的经贸合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亚三国的独立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欧亚腹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合作区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和贸易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时代，今天，新的“丝绸之路”又一次深入中亚各国。中国同中亚三国深入开展经贸合作是具有多种有利条件的：首先是地缘优势。由于彼此是近邻，因此双方开展经贸合作距离近、运费低、效益高。其次是人文优势。中国新疆和西北其他省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民族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基本相同，彼此具有同种民族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容易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第三是互补优势。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其农牧业和采矿业较为发达，加工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落后，中国在这些部门有优势，可以弥补中亚国家这方面的不足。而中国的某些企业是 50 年代苏联援建的，陕西和甘肃这类企业的改建可以使用中亚国家的某些技术设备。

基于上述条件，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其内容是：西北地区以内地特别是以东南沿海为依托，动员全国力量，形成整体优势，联合向西开放，形成“东联西开”的新开放格局。

(3)中亚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复兴，本来中国与这种势力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与伊斯兰文化有某些历史联系的一些少数民族又恰好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那里人口相对稀少而幅员十分广大，经济不够发达却远离内地和中央政府。由于中国和中亚三国之间有一些跨境民族，所以当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泛滥时，中亚地区的一些势力便也借机向中国渗透。但目前来自西邻及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十分的严重和迫切，“双泛”思潮在中亚地区虽有发展之势，但还没有占优势。首先，中亚各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限制“双泛”思潮的泛滥；其次，在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有相近的利益；再次，在抵制泛突厥主义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能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所以从长远看，只要中国边疆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蒸蒸日上，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差距，保持对西北邻国的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位，加强中央政府及内地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亚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就不会对中国产生太重大的影响。

(4)中国对中亚的地缘政策

首先，与中亚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以维护中国西北部边境的安全。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居民在民族、宗教方面与中亚国家有密切联系，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关系对稳定中国的西北形势关系重大。

其次，积极与中亚国家发展经贸合作。中国在沿海和东南部实行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后，开始把开放的重点转到西北部地区。中国西北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政策的

实施。

最后，确立相互信任的基本原则，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以此使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积极的影响。这有利于中国保持与俄罗斯和穆斯林国家的稳定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特殊利益。考虑到中亚各国独立使中国面临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局势，因此必须在睦邻友好，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发展同中亚三国的全方位关系。

第九章

东—南线地缘:中国地缘中的热线地缘

东南线地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是海疆线最长的地区,面对的也是中国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但它的问题也最多,最大,最严重,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中国南海的国家主权,中国未来向海洋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东南线地缘的制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线地缘是中国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地区。

·第一节·
东—南线地缘:中国地缘中的战略衢地

(一)
东—南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东—南线地缘是指中国东部和南部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的沿边沿海地带。它包括了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等13国,其中缅甸、老挝、越南、朝鲜等四国与中国接壤,其他国家均为中国近海相望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与中国虽然既不接壤,也不是中国的近海国家,但历史和今天这两国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地理上它们也与越南等国有紧密联系,因此一般也把它们看成是中国的近邻。

以下是这13国1994年时的一些基本情况:

国家	领土(万平方公里)	与中国边界(公里)	人口(百万)	华人(百万)	人均GNP(美元)	出口(亿美元)	对华贸易(亿美元)	外债(亿美元)	军队人数(万)
日本	37.78		125.3	0.05	37500	4030	478	0	24万
韩国	9.9		44.7	.	10076	923	117	542	65
朝鲜	12.3	1334	22.3		904	25	6		112
新加坡	0.06		3.1	2.20	20000	888	50	0	5
马来亚	32.97		19.5	6.70	3230	484	27	188	13
泰国	51.3		60.2	5.00	2085	435	20	458	27
菲律宾	29.9		66.5	0.80	850	134	7	373	15
印尼	190.46		193.9	5.20	705	401	26	900	28
文莱	0.56		0.3	0.04	18500	26			
越南	32.96	2000	74.0	1.10	255	35	5	237	60
柬埔寨	18.1		9.7	0.20	215	2		16	9
老挝	23.68	710	4.7	0.04	225	2		11	6
缅甸	67.67	2000	46.0	0.49	290	7	5	53	23

资料来源：香港《亚洲周刊》1995年4月16日，1994年12月中国海关统计，《世界知识年鉴》(1995/9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二）
东一南线地缘的基本特点

东南线地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具有与北线和西线地缘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1)东南线地缘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缘线，这一地区，在历史和文化上均与中国有着特别的关系。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越南和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与它们发生地缘政治关系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既有血与火的战争，有中国封建王朝对它们的侵略和干涉，也有两国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不时的侵扰，但更多的是两国与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的深厚的友谊。两国

与中国山水相连，在地缘上不可分割。

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国家的文化联系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曾从中国大规模地吸取文化养料，在唐朝时这一文化交流达到了高峰。日本、越南、朝鲜、韩国四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使用中国汉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至今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仍有很多相似之处。

另一个特点是在这一地区有着众多的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约有4000多万，其中一半多在这一地区。华人华侨使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要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特殊，因为第一，华人华侨的根在中国，不管他们在外多少年，他们身上的中国人的血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使他们在这些国家当了总统，也还是如此。如阿基诺(Aquino)夫人做了菲律宾的总统后，还特地到中国寻根。他们在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政治影响，使得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国家。当中国与他们的所在国关系恶化时，他们或多或少也会受影响。因此，中国与他们发展友好的地缘睦邻关系，就有了一股永恒的动力。

第二，华人华侨利用他们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易于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成为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强大动力。在1978年以后，中国的许多三资企业，中国吸收的相当一部分外资，是与这部分华人和华侨在其中牵线搭桥，穿针引线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国家，华人和华侨经济都是这些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所在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

第三，华侨华人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文化联系的桥梁。由于血缘文化关系，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很了解，在这些国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许多问题上容易相互理解。

华人问题也具有两重性。在一些国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

题，有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2)东南线地缘是经济发展的热线。

在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发展的地区，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它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有没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能不能保持它与邻近的东南线国家和地区在最近10多年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关系，能不能参与这一地区正在快速成长的经济发展，事关中国的现代化的成败，因此，中国在这一地区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地缘利益。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中国在今后几十年期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地区。而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源相对有限，因此，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今后势必要从陆地形的经济发展战略改变为以海洋形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应在21世纪成为海洋经济大国，使我国的海洋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0%，而在沿海应占到30%以上。[509]这也是我们考虑中国的东南线地缘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国的海疆全部在这一地缘线上。

东南线地缘面临的地区和国家，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亚太经济区域这一当代世界经济的新兴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地区内，有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有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新加坡，有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马来西亚、泰国，有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的印尼和菲律宾以及越南等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已形成了世界上一个不依赖于西方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新兴的经济区域，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有人预言，在下一个世纪，这一地区可能会成为又一个经济中心。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极大关系的。

(3)东南线地缘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热线地缘。

在政治上，东南线地缘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最多的地区，世界上自苏东解体后，尚

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4个在这一地区，它还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的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较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各国对许多重大的问题，如人权、贸易自由化等的观点也不相同，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使这一分歧扩大了。

政治的热线还体现在90年代以来，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二战后的重大的政治变化。日本的自民党发生分裂，社会党的性质发生变化，自民党第一次失去政权，形成了新的政党格局。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主体的执政联盟面临着强大的冲击，政局在90年代以来发生较大的动荡。在韩国，由于有全斗焕、卢泰愚等非法收受政治贿款事件，在韩国政坛上也形成了一个政治风暴，对金泳三政权造成了政治震撼。日本和韩国的政治走向成为令人关注的新问题，并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军事上，这一地区虽然大体稳定，在90年代以来有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如在柬埔寨内战基本上结束，菲律宾和泰国、缅甸的国内政治冲突和武装斗争有所停息和减缓，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也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但在这一地区仍有三大热点和潜在的问题：第一，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仍未完全消除，南北关系还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世界上的冷战已基本结束，但在朝鲜半岛还在继续着。第二，在冷战后，这一地区的扩军备战的趋势未减，各国的军费开支都在不断上升。第三，围绕着南中国海的岛屿的主权，周边国家时有军事摩擦发生。

除欧洲外，东亚也是美国卷入最深的地区。在二战后，美国在这里打了两场重大的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一场是越南战争。美国认为，它在这一地区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卡特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曾指出："美国在东亚首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什么？美国的首要国家安全利益就是同这一地区尽可能多

的国家保持政治上友好的经济上互利的关系，以避免经济混乱，以及尽可能减少美国被拖入第二次大战后在这个地区的第三次军事冲突中去的可能性。保持稳定的政局，避免让苏联在该地区取得优势并控制其资源，还有更重要的是使日本继续保持成功的经济发展和自由的政治结构，这些对于美国上述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维护日本这个样板，使东亚各国模仿它，包括鼓励它们逐步扩大人权以及发展同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更加友好的关系，是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510]。

综上所述，东南线地缘在中国的总的周边地缘中，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也是对中国最麻烦的地区，是中国国家利益最重大的地区，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也是可能是最危险的，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地区。因此，东南地缘应当成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全力以赴地进行建设、经营和重视的地段。它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理所当然的应当成为重中之重。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代大地缘军事战略家孙子的一句话："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东南线地缘就是中国的"衢地"。

而且，它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的战略之衢地，因为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日益为各国所重视，而这一地区目前又没有一个完整和公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框架结构和秩序，因而为世界各大国和集团的介入提供了机会。

·第二节·
朝鲜半岛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策

（一）
中国地缘政治史上的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的东北部，其北部与中国的吉林和辽宁两

省接壤,是我国的一个古老的邻居,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

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就一直极为密切。秦末汉初,由于战乱,中国燕齐赵三国的居民曾有数万人之多前往朝鲜半岛,这可说是世界上一次早期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了。公元前194年,古朝鲜王被燕人卫满推翻,建立了卫满朝鲜。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大军征服朝鲜,将其置于汉朝统治之下,设置了乐浪郡等管理朝鲜北部;后在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中国东北兴起,并向朝鲜半岛扩张;到3世纪时,在朝鲜半岛形成了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国对峙,战争不断。到隋时,隋朝曾三次发大兵攻高句丽,结果大败而回,唐太宗时也曾攻朝鲜,但也失败。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与唐朝联合,于668年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又在676年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在此前一段时间内,唐朝曾在朝鲜半岛设安东都护府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统治。到元朝时,中国第三次对朝鲜半岛北部进行统治,后又以征东行省形式使朝鲜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朝鲜是中国进贡—怀柔体系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朝鲜的统治者曾对元明清朝的统治者表示忠顺,如曾派军队协助元攻日本,与明军队一起攻击后金,而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也对朝鲜给以了特别的关照。明朝曾派军队与朝鲜军队一起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付出了沉重代价,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象时,中国还不顾自己朝夕不保的形势,于1894年派军队入朝抗日,结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向日本赔款并割让台湾给日本,再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0—1953年朝鲜战争是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地卷入朝鲜半岛的地缘战争。中国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派百万志愿军入朝作战，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在今天探讨中国过去的地缘政治的经验教训时,在研究今天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时,应当运用我们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史形

成的传统和智慧，灵活地策略地和更加理智地处理今天朝鲜半岛上的复杂局势。

（二）
朝鲜半岛上的复杂局势和症结之所在

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有朝鲜的核问题，1992—1996年间虽然就此达成过协议，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韩国的90%的军人在民意测验中认为韩国应当发展核事业。在这一地区，南北双方的紧张对峙，军事装备高度密集化，在三八线南北两侧集结了约200万军队。1996年3月29日，朝鲜人民军次帅金光振还说，"有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半岛的停战即将达到极限……现在的问题不是朝鲜半岛会不会爆发战争的问题，而是何时发动的问题"。1996年10月又有所谓北方潜艇"入侵"南方事件，使南北关系再次紧张。

今天朝鲜半岛上的复杂局势，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1)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同一民族的国家在民族统一上有重大的利益矛盾。这是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的基本症结所在。光从双方对半岛的地理称谓上就可以感觉到双方的对立：朝鲜把半岛称为朝鲜半岛，半岛的居民称为朝鲜族，自称为朝鲜，而把南部称为南朝鲜；而韩国则反之，把半岛称为韩半岛，居民称为韩民族，自称为韩国，而把北方称为北韩。这让外国人为难。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称谓只是一种习惯用法，不代表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偏袒。

双方利益分歧的第一个问题是：谁主导朝鲜民族的统一？谁提出的统一方案能成为现实？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吃掉谁的问题。

现在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同一个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自676年朝鲜半岛为新罗统一后，朝鲜半岛在其后的1300多年中，就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虽然其间有897—936年间的后三国时代，但936年重新统一后，就再也

没有分开过。半岛南北的人民在一起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共同为朝鲜半岛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半岛的分裂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果。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此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越来越大。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并于1910年8月被日本强迫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为日本为所吞并。1945年日本战败时，朝鲜半岛成了美国和苏联瓜分的战利品，结果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统一的民族，硬生生为一条人为的三八度线划成两半。三八线以南为美国受降区，以北为苏联受降区，造成了半岛南北分裂的事实。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加深了南北的分裂。自此后，南北两边的人民被隔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越来越大。

1971年首先由金日成提出了进行南北对话的思想并立即得到了南方的响应。1972年成立了南北协调委员会，并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对话。朝鲜先后提出了自主和平统一的三原则，统一祖国五大纲领和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方案。韩国也在1978年1983年提出过自己的方案。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又提出《六项北方政策特别宣言》，提出求民族统一之大同，存意识形态之小异的主张。朝鲜则于此时提出四项原则，即以和平实现统一为目的，以外国军队撤出为保证，以南北裁军为保障，以对话为形式。同时还提出一揽子和平方案，即在1992年前，美军从朝鲜半岛全部撤走，韩、朝把各自的军队裁减到10万以下，朝、韩、美三方会谈，签署和平协定和南北互不侵犯条约，以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联合国。韩国总统金泳三还提出了韩民族共同体的方案。

1990年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进一步的缓和，1990年双方总理进行了直接对话，南北开始了直接贸易，1991年9月17日，双方分别加入了联合国，1991年12月13日双方总理签署了《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交流合作协议书》。同年，美国宣布在

韩国的美军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已全部撤走,美国宣布了分阶段从韩国撤军的计划,而朝鲜也于 1992 年 1 月 30 日在《核安全保障措施协定》上签字,并从 1992 年 5 月 25 日起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到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主要是双方都宣布接受和平统一的主张,而且双方公布的和平统一计划也没有原则分歧,但双方都希望对方按自己的方案实现统一。

尤其是北方在经济力量和经济实力不如南方的情况下,更担心在和平统一过程中会东德化,会为南方所吃掉,因此希望南方能有更大的让步。而南方则表现出以经济优势为基础在统一进程中占主导的倾向。问题的症结在于,南北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距太大,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而也很难在最近期间发生变化。

双方利益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谁更能在国际社会中代表朝鲜民族。在和解过程中,曾提出过交叉承认的问题,即苏联和中国承认韩国,而日本和美国承认朝鲜,但现在韩国已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关系并有很大发展,而美国和日本则与朝鲜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因此,朝鲜在最近的行动中,把争取与美国和日本发展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朝鲜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与美国打交道而不与韩国交涉,这引起了韩国的不满,担心美国和日本会背着韩国与朝鲜达成对韩国不利的协议。

(2)另一个使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的因素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干涉。

朝鲜半岛问题首先是二战后冷战对峙的产物。在战后的 40 多年中,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三角关系,韩—美—日南方三角和朝—苏—中北方三角。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这种两个三角格局已经消失,但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依然是影响该地区的重要因素。而且,如果说在两个三角存在时这些大国的利益还比较清楚和明显的话,那么今天这种利益则是错综复杂,相互交错的。除了南北对峙这一

因素外，大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也是使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产生于二战结束时。美国以苏联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和共产主义威胁论为理由，认为美国必须在朝鲜半岛“遏制”对东亚自由世界的威胁，因此投入大量兵力，在朝鲜半岛上与中国朝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虽然未打赢这场战争，但却在三八线以南扶持了大韩民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解释美国的利益时说，“美国之所以承担保卫南朝鲜的义务，不仅是要保护南朝鲜的独立，而且还要保护日本，使之免遭可能经由这个桥梁发生侵略，并避免受到由于朝鲜半岛发生这种激烈的变化而形成的政治压力。”[511]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变化。苏联威胁已经没有了，但美国并没有退出朝鲜半岛，反而在苏联实力退出朝鲜半岛后，更显得重要了。美国认为，它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是：

第一，防止“北韩威胁”。“北韩威胁论”是在东北亚地区用来代替苏联威胁论的一个理由。美国认为，北韩的威胁有：①核威胁。朝鲜在1959年与原苏联签署了《原子能开发支援协定》，开始研制核反应堆，至80年代中期，已有一定规模，据美国认为已可生产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钚，试射成功了中程导弹。这对美国和韩国的安全和利益形成了威胁。②恐怖威胁。美国把朝鲜视为在许多国家进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③北朝鲜的武器出口对美国在一些地方的利益也有威胁，特别是朝鲜与伊朗等国的特殊关系更使美国恼恨。④常规军队的威胁。认为北韩在三八线北方一侧集结大量兵力，而且使自己的军队经常处在随时可进攻的状态。而南韩的军队虽然质量比较高，但人数和常规武器比朝鲜少，而且韩国首都汉城距三八线很近。

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美国认为：遏制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不许朝鲜拥有核导弹，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首要利益。为此，美国从1992年开始压朝鲜参加《核安全保障措施协定》，又促成了朝

鲜和韩国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并坚持要求检查朝鲜宁边的两处核废物贮存场。在朝鲜于1993年3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美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威胁要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在韩国布置新的导弹,并进行军事演习。经各方调停,最后朝鲜和美国在1994年10月21日达成了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向朝鲜提供40亿美元价值的2座轻水反应堆,在10年内取代朝鲜现有的石墨反应堆,在此之前,美国应每年向朝鲜供应50万吨重油作为能源补偿;同时,朝鲜与美国就双方关系正常化进行对话,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朝鲜宣布不退出核不扩散体制,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1996年以来,美对朝的压力有所缓和,也对朝鲜实行一些援助。如美国政府1996年2月宣布对朝提供2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不再把朝鲜和伊朗等国一起称为被排斥的国家,1996年5月又以补偿朝向美提供朝鲜战争时美军士兵的尸体遗骨给以200万美元的资金,并放宽了民间对朝援助的限制,还宣布将取消对朝实行了46年的经济禁运,在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上也有所放松。美国所抱的长期目标是实现朝鲜更大程度的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并最终同南方实现统一。

美国的利益还要求阻止朝鲜对韩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并采取各种手段促朝鲜内部发生变化。为此韩美之间经常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第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还在于对中国进行牵制,对中国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同时也有防止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超过美国的意义。

实际上,美国在朝鲜半岛并无直接和现实的重大利益,它的利益是从美国充当世界"领导者",对世界进行控制的超级大国的目标派生出来的。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正如说中国在中美洲有重大的国家利益一样,是不可信的,也是不实在的。

美国为在朝鲜半岛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实行的政策,对朝鲜半岛的局势的演变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它也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如在

朝鲜的核反应堆的替代问题上,美国希望韩国能承担其中的 40 亿美元的费用,而韩国则希望这 40 亿美元能用它所提供的反应堆。但朝鲜又表示反对,不愿接受韩国的援助,一是担心会影响在国内的权威,二是担心韩国技术不过关,三还担心会在南北关系中受制于韩。对韩国来说,它自然以美韩军事同盟为基础,但它近年来也开始提出要逐步摆脱美国的军事控制,使军事指挥权回归韩国,或以韩国为主。同时它对美国直接与朝鲜对话和发展关系也有所不满。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基本是以美国政策为基础的,但日本在朝鲜半岛也有自己的特点。

日本与朝鲜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过去两国处于对立和对抗的状态,没有什么接触。自冷战结束后,日本与朝鲜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90 年,日本自民党和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日方向朝鲜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1991 年 1 月,双方就关系正常化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1991 年 2 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访问日本。但双方的谈判由于朝鲜核问题的提出而中止,未取得重大突破。因为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的任何一方拥有核武器,都会使日本严重不安,因此,日本在朝鲜的第一位的利益就在于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因为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首先会对日本形成直接威胁。因此日本在要求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进行检查上态度是积极的。

日本对朝鲜的政策也遭到了朝鲜的强烈批评。1996 年 2 月 26 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论日本的对朝政策》一文,对日本的对朝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日朝关系未得到改善的原因在日本的"对朝政策一贯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和国敌视政策和向南朝鲜一边倒政策,……在朝日关系上从来就是没有自主性,只是随声附和,忘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正是日本的历代当政者的这种政治姿态,才使试图改善朝日关系的具有先见之明的日本政治家的决定和努力化为泡影"。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第二个利益在于对付韩国日益突出的经济竞



争。韩国与日本曾在60年代达成了经济合作协议,并对韩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1967年又建立了韩日经济合作委员会,韩对日的进口曾占到总进口的50%。在70年代,韩国的外资有90%来自日本。但到80年代,韩国经济在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竞争能力。这种竞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一是在朝鲜半岛上的竞争。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的统一是将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今天韩国以现有的经济力量已在许多方面对日本的产品形成了威胁,如果以后韩国在朝鲜半岛的统一过程中占了主导地位,那时,朝鲜半岛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将加剧。所以日本现在的一种长远考虑是,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前,要尽可能地与朝鲜发展经济关系,对朝鲜的经济要有更多的发言权。自90年代以来,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发展很快,1995年,在朝鲜的20.6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日朝贸易为5.9亿,超过中国成为朝鲜的第一大伙伴国,而中国列第二,为5.5亿美元,韩国列第三,为3亿美元。除抢占朝市场外,日本还旨在利用对朝改善关系来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牵制朝美关系。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建交谈判进程会加快。

日本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有着切身的重大利益。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与朝鲜半岛有过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但日本在地缘上的这种接近并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便宜。因为日本对朝鲜民族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在1592年,日本曾大规模入侵朝鲜。在近代,日本又对朝鲜半岛进行过长达近40年的殖民统治。尤其是韩国,与日本之间关于两国历史的纠葛不断。在韩国谋求独立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两国的矛盾主要有:

第一,韩国对日本在冷战后扩大军事力量表示不满。1991年韩国的国防白皮书把日本列为潜在的敌对国。

第二,对日本对过去的战争的态度极为不满。尤其是日本的一些高官不断放厥词,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不但毫无悔过自新之意,反而大唱赞歌。1995 年 10 月,日本总务厅长官江藤竟然说,日本在殖民统治时代,在朝鲜也做过好事,而此前村山富市也曾说"从法律上说有效地缔结了日韩合并条约",这进一程加深了韩对日的不信任感。在民意测验中,有 68%的韩国人对日本没有好印象或印象极坏。在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日本都没有对韩国人承认过过去的罪行,韩国人对此是很不满的。

第三,双方的经济磨擦日益严重,韩对在日韩贸易中韩的赤字越来越大不满。

第四,有领土争议,主要是围绕独岛或竹岛的主权之争。1996 年,韩国政府宣布,将在独岛上建一码头,而日本则宣布,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行为,并表示要把"竹岛"提交国际法庭裁定。这引起韩国民众的反日浪潮。这不仅是关系这个面积为 0.186 平方公里的小岛的归属问题,而且是事关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双方都不让步。与此相关,还涉及到 200 海里经济水域区的归属问题。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使它难以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在朝鲜半岛上的主要利益有两个:一是使朝鲜半岛无核化。俄罗斯不会愿意看到在朝鲜半岛上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居。二是通过在朝鲜半岛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俄罗斯参与亚洲事务,增加自己在东亚的发言权创造条件。

在第一个利益方面,俄罗斯极力参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愿向朝鲜提供可替代石墨反应堆的轻水反应堆;在第二个利益方面,俄罗斯提出了召开多边国际会议来讨论朝鲜半岛局势问题的建议,认为"俄罗斯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拥有一

定的潜力”。

俄罗斯本来对朝鲜有较大的影响。但在 1990 年,前苏联急于承认韩国而抛弃了朝鲜,使南北关系格局发生了对朝鲜不利的重大变化。后来俄罗斯宣布不再续签 1991 年已到期的苏联与朝鲜在 1961 年签订的友好条约,并切断了对朝鲜的战略物资的供应,急于从朝鲜撤出,这些被认为是对朝鲜的背叛,因此它对朝鲜的影响力大为下降。1995—1996 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又开始重新恢复对朝鲜的联系,1996 年 5 月,俄罗斯与朝鲜政府达成了协议,俄罗斯对朝鲜在石油供应等方面给予援助。在朝鲜 1996 年 3 月宣布单方面进入非军事区导致局势紧张时,俄罗斯再次提出了召开多边国际会议来讨论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俄罗斯派其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坚科访问了朝鲜,4 月又派外交部副部长帕诺夫(Panov)访问了朝鲜,以同朝鲜政府讨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的缓和。

俄罗斯对与韩国发展关系一开始也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在苏联时期,由于朝鲜战争,苏联对朝鲜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特别是 1983 年韩国民航飞机被苏联击落,造成几百名韩国旅客的死亡,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90 年 12 月,卢泰愚访问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1991 年 3 月,韩国政府保证向苏联提供 30 亿美元的援助,使两国关系发展迅速。1992 年 11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双方签订了《韩俄基本关系条约》和经济军事协定。1995 年 9 月,俄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汉城,就俄罗斯与韩国共同修建将天然气输送到韩国的工程进行讨论。俄向韩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朝鲜提供核技术,不会在南北发生军事冲突时卷入任何一方。尽管如此,俄罗斯在韩国的影响也并没有扩大多少。韩国对俄罗斯并没有表示多大兴趣。虽然俄罗斯在许多问题上总是站在韩国一边,但从中却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1995 年俄与韩的贸易才 32 亿美元,而韩对俄的投资仅达到 4000 万美元。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韩国却与美国一起提出召开美中朝韩四方会议的建议,把俄撇在一边。

在经历了几年的实践后，俄罗斯才发现一边亲韩国对自己并非最好，因此又从 1995—1996 年起在南北方之间进行平衡外交。正如人们指出的："俄罗斯在朝鲜半岛正设法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莫斯科实质上想同南方建立关系而得到好处，但是又要保持对北方的影响……俄罗斯在北方仍有地理战略利益。北朝鲜仍然控制着靠近俄罗斯的两个不冻港，这个地区对它进入亚太地区至关重要。"[51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美日俄三大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中，三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上基本一致。但在其他问题上，却是美国的利益起主导作用。美国力图排挤俄日，不让它们在朝鲜半岛局势上起作用。如美国驻汉城大使莱尼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朝鲜半岛的涉及国，而俄日只是关注国。但这一做法遭到俄罗斯的反对。它提出了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认为俄罗斯参加解决朝鲜问题进程已不止 10 年，对它的解决做过不少积极的贡献，试图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做法，通常会适得其反。朝鲜现在对俄的接近表示欢迎，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作用既支持又反对，试图拉日本反对韩国，而日本也想借与朝鲜发展关系压韩国，对美国，朝鲜是强烈地反对，但又以只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来提高它在朝鲜半岛局势中的地位，逼美国与它直接谈判。韩国试图在和平统一进程中压倒朝鲜，但又试图阻止俄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正是各方的利益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使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化和复杂化。

（三）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家利益

有三个因素影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家利益。

第一，影响朝鲜半岛上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因素之一是南北朝鲜会以什么方式统一。

虽然双方都提出要和平统一朝鲜半岛，但实际上是双方的对峙并未见任何减缓。朝鲜的军事力量达 100 多万，每年有占 20% 以上

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开支，而韩国也在不断地增加其军事力量，如在1989—1990年，韩国的军事费用就达100多亿美元，增加和购买了一大批先进的军事武器和设施，还在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并装备大中型潜艇，使其海军拥有中远洋能力。实际上双方军备都在增加。双方在和平统一方面，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仅从经济上就可以看出，统一的进程是多么困难，经济统一只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统一。但双方在这一方面差距尤其突出。这和德国统一的模式是不同的。西德经济具有强大的实力，而东德经济也是东欧各国中最发达的经济，即使如此，当两德统一时，西德吞掉东德经济时，还是费了很大周折，至今已5年过去，也还没有完全完成。韩国经济实力和规模比西德要小得多，而朝鲜经济实力又比东德小得多，这两个差距合起来，使两国的经济统一要比两德经济统一困难大得多。可能要花费数千亿美元，而这是韩国所不能负担的。可见，朝鲜半岛的统一路程还很远很远。

一种渐进式的和平的统一进程也许对双方都最有利的。这需要朝鲜半岛的双方都以民族利益为重，逐步和分阶段的实现统一。

朝鲜半岛如何统一，一要看南北两方领导人的智慧，二要看外部力量，主要是美中俄日四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的综合力会使朝鲜半岛的局势向什么方向发展。

第二，朝鲜半岛上四大国的力量平衡和演变的结果，以及中国在整个外交格局中的战略和策略的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朝、中—日、中—美的关系，以及日—韩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如，日本与韩国同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军事盟友，但利益却有较大的矛盾，日本担心韩国的经济竞争，而韩国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以日本为其军事的潜在敌人；中国与韩国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经济贸易发展很快，但韩国对中国也不放心，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被视为对南韩的威胁，因此，韩国在把朝鲜视为最主要的威胁时，也附带把中国作为韩国的潜在敌人；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有

重要关系,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最大的技术引进国,但中国与日本又有重要的矛盾和分歧，如在钓鱼岛上的争执等。这样,中美日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一个地缘利益的三角关系,三方相互有牵制作用和互动关系。相对而言,俄在朝鲜半岛上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地缘利益的冲突。

第三,朝鲜和韩国在领土和领海上对中国的态度的变化。

中国与朝鲜的陆地疆界基本上是确定的,但近年来在韩国国内有一股对中国的延边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的潜流。从 1978 年起,韩国国内有人提出了“间岛”(即中国延边地区)是韩国领土的谬论。1983 年韩国有 54 名议员联名向韩国国会提出了“关于确认白头山所有权的议案”,未能在议会讨论；1991 年又有人在《朝鲜日报》上发表《间岛是我国领土,应努力收复》的文章；1992 年 8 月 27 日,即在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的第三天,还有人在韩国《东亚日报》上提出“间岛”的领属权问题。这些文章虽是少部分人所为,但对发展中国与韩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会产生干扰。[573]

中国还与这两国在黄海的海域划分上有分歧。黄海作为一个半封闭海,为中朝韩三国所共有,但从未有过明确划分。但 1970 年韩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却单方面在黄海划定了 4 个矿区,朝鲜在 1977 年也颁布了《关于建立经济水域的政令》,单方面宣布建立经济水域,又在同年 8 月在黄海海域单方面划定军事警戒线。由于黄海海域较小,三国如果划定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后,肯定会出现大面积的重叠,由此也会引发许多复杂的问题。在东海上,中国与韩国也有同样问题。

(四)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有这样一些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1)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朝鲜南北双方的利益，因而也符合中

国现实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朝鲜半岛任何一方拥有核武器的制造能力,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恐惧并会导致朝鲜半岛的核竞赛。这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也不利于世界和平。这一点是必须确定下来不能含糊和动摇的。

(2)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安宁符合朝鲜半岛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它的和平有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建设。而如果朝鲜半岛的双方发生严重的冲突,引起政治动荡,会对中国的和平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3)在中国的东北边境不希望出现一个对中国不友好的和敌对的政权。更不愿看到敌对中国的大国利用朝鲜半岛来为它的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服务。

为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地表明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在此问题上中国可以与朝鲜南北双方和国际社会进行协调。但中国也要坚持有关各方以谈判方式为主的立场,反对西方大国动不动就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来胁迫朝鲜的态度。在谈判解决的潜力没有用尽之前,在事实未查清楚之前,反对向朝鲜施加任何压力。1993 年 3 月,当美国向朝鲜施加压力,要其放开宁边地区接受国际组织的核检查时,朝鲜的回答是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后经中国等国的多方努力,促使美国与朝鲜进行直接的谈判并达成了有关的协议,这表明中国倡导的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是正确的。

(2)进一步调整中国对朝鲜半岛南北两方的政策,对南北两方同时发展友好合作的睦邻关系。

中国在历史上曾对朝鲜半岛有过重大的影响,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中国人民曾经与朝鲜半岛的人民一起,在 1592—1598 年、1894—1895 年、1931—1945 年三次共同抗击过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并为朝鲜半岛付出过重大的代价。因此中国与朝—韩人民都有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这对中国在半岛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特别的

意义。

中国与朝鲜在1950—1953年间共同战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结成了牢固的关系。但在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改变了过去与韩国的关系。这就必然要调整过去中国亲朝反韩的格局，奉行与朝鲜半岛的两边同时发展友好关系的方针。中国今后在朝鲜半岛的方针，不是以降低与朝鲜的关系来发展与韩国的关系，使得对南北两方的关系能够显现一种“平衡”，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把对朝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在保持与朝鲜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使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也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和实质上的发展。中国应支持朝鲜为改善国内的经济所作的努力，支持朝鲜国内的政治稳定，支持朝鲜与美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而与韩国的关系，则应继续发展两国大有前途的经济合作，同时谋求在政治上与之发展友好关系。如在反对日本国内的恢复军国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朝鲜合作，而且也与韩国合作。

在朝鲜半岛的两国又是中国的近海国家，有着共同的海域，在划分海洋经济区时也要进行充分的磋商使中国与朝、韩两国能在共同开发和共同享有海洋资源上进行更多的合作。现在中国与朝、韩两国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后，与朝、韩两国尤其是与韩国就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海上的新边界达成一致。中韩两国从1993年起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五次协商，但还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1996年韩国还再次表示反对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划分的基线。

(3)在朝鲜半岛的统一上，中国应当明确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并认为这一进程是朝鲜半岛两国人民的事情，应由两国人民自主地进行对话，自己决定统一的方式和进程，反对外国势力过多地卷入这一问题。

(4)主张让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两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

况下解决双方的问题和统一问题，为此中国主张驻在韩国的美国军队应撤出朝鲜半岛。

·第三节·
日本：中国东—南线海缘中的枢纽

（一）
日本的地缘特点及其与中国地缘的联系

日本是我国东部的邻海国家。它的第一个地缘特点是，它是一个群岛国，由大大小小 3900 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本洲，北海道，九洲，四国是主要岛屿。它北部的北海道距俄国的萨哈林岛不到 45 公里；南部的九洲岛距朝鲜半岛为 180 公里；日本的九洲岛和其他一些小的群岛隔东海与中国的东南部沿海腹地相望；其西南端的先岛群岛距中国的台湾相隔仅 100 公里。因此虽然日本与中国无陆地相通，但两国其实相距是很近的。在历史上，中国和日本有过频繁交往的时期，中国在元朝时曾跨海进攻日本，日本也曾从海上对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过大规模的侵扰和侵略，因此中国与日本在海缘上是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第二个地缘特点是，它的国土南北狭长，从北到南长约 3000 公里，这决定了日本在本土防御中不能有效地建立起纵深防线，因此在国家安全战略上侧重对周围广大海域的防守，具有一定的防御的扩张性。即其军事行动往往不受国土范围的限制，而把其军事力量布置在分布较广泛的领域之内。在对陆地相距较近的国家—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日本历来都认为是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因为如果从朝鲜的南部进攻日本，则日本就不易防守。80 年代，日本又根据本国地缘的特点，提出保卫日本本土周围数百海里；和保卫 1000 海里运输线的主张，认为确保这些海域的安全是日本人民生存

的最低需要。

日本的第三个地缘特点是，全国陆地总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有1.25亿之多，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27人，而且其国土的资源十分匮乏，市场狭小，因此其经济资源都严重依赖外国。这使它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对其生存的外部环境有一种忧虑意识，甚至很容易产生生存空间对外扩张的侵略意识。日本法西斯在发展进程中，曾借助于这种反动的地缘政治论，如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就说："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权利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利用满蒙作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的400个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来攫取整个中国的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及欧洲"[514]。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都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反动理论在国家政治中的反映。一旦外部环境紧张，日本很容易再产生这种对外扩张的理论。

在认识日本对中国的地缘关系的影响时，我们还必须对日本的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给以高度重视：

第一，日本是当今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它有着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对及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在东南亚，许多重要的经济产业实际上控制在日本企业手中，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经济已受到日本的制约；还有人认为，东南亚国家有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的危险。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反映了日本的经济影响力之深厚。

第二，中国的这个近海临国也是世界上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大国。日本虽然军队人数不多，但其质量却是很高的，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军队装备了大量的先进武器。1995年日本的军费开支达近475亿美元，大大高于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日本的军事武器有许多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如日本人曾公开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先进的军事电子设备均出于

日本之手。日本已掌握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并拥有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钚，还能发射人造卫星。一旦需要，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很快转为军用。

第三，在中国的东南地缘圈中，日本在二战中对东亚国家进行过侵略，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日本对朝鲜进行吞并和殖民统治达 30 多年，从 1931 年起就对中国进行侵略，二战中又对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此至今仍无深刻的反省，反以东亚各国的解放者自居，认为是日本把东亚各国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救了出来。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东亚各国人民的反对。这大大降低了日本在东亚各国的政治感召力，成为影响日本与东亚各国发展关系的一个无形的障碍。

第四，日本是一个正在进行政治改革并试图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自 1993 年以来，日本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为自民党一党长期把持的政权格局有所突破。先是细川护熙领导的 8 党派联合政权取代自民党，后又是新生党的羽田孜上台，1995 年 6 月又是社会党与自民党联合，村山富市当了首相，1996 年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又成了新首相。这种政局动荡的背后是日本的金权交易受到批判和否定，因此日本国内产生了对原来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二战后日本政治的大风暴。这也意味着日本的对外方针和战略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会由于今后日本政坛的变化而摆动。

日本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向政治大国的方向转变。过去日本着重其经济发展，而在国际政治上则无所作为，主要是追随美国的方针，而在 80—90 年代，日本国内要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声音一天天高涨。日本开始了它的谋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肯定要加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以表现自己。这也会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它对东亚和亚洲事务的政策。

所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即隔海相望的两个大国的关系,而且也是两个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大国的关系。处理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仅对中国在整个东南线地缘的基本战略具有全局性的关键意义,是中国在这一地缘地带的枢纽,而且具有全球战略性的意义。

(二)
日本的地缘政治及其制约因素

从日本的军事政治的因素考虑,日本的地缘政治的主要内容及其制约的因素包括:

(1)以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作为日本地缘政治的基础。这是日本地缘政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没有它,日本的整个外交和军事战略以及政治就无从谈起。

美国二战后的世界地缘战略是从东西方冷战这一特点出发的。由于日本靠近中国和苏联,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美国把日本选为它对抗苏联的重要的战略基地, 而且也是维护美国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军事影响的基础。同时,鉴于二战中日本对美国太平洋基地的进攻,美国在日本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维护美国的太平洋领土和美国西海岸的安全,也有重要的意义。

而对日本来说,二战的失败, 使日本失去了重新武装的权利,驻日美军的存在更使日本在军事上受到美国的控制。而日本要想独自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的威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苏联威胁论"把日本和美国的利益紧紧地联在一起,两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结成战略同盟。这主要以 1951 年 9 月两国签订,1960 年 1 月重新签订的后经多次修订的《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军事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为其基础。该条约规定,根据集体安全和集体自卫的权利,日本请求美国在日本驻扎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以用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还可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对日本国

内的暴乱和骚乱进行镇压。美日安全保障体系包括：美国在日本驻扎军队，最多时达到25万（朝鲜战争时），现在还有约4.48万人，是美国在外驻军的第二大基地，几乎占美国在远东的军队的一半，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美国可以使用其军事基地，主要是在日本冲绳的基地；美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1986年以来，美军每年与日军进行的军事演习在10—20次以上；建立和形成日美间经常进行安全磋商的机构，如日美防务首脑会议、两国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和防务合作小组；双方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进行合作；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日本之所以与美国结成战略军事同盟，是想借助于美国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使那些想对日本发动进攻的敌对国考虑其后果，使其要冒更大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敢轻易动手，实际上借美国的实力来对地缘对手进行一种地缘遏制。

苏联解体后，日本地缘上的一大威胁消失了，作为对付苏联威胁而产生的日美安全保障体系却继续存在。但它的意义已经有所变化，实际上是针对朝鲜和中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但这一目的是清楚的。

但是日美军事和安全保障条约对日本又是一个制约因素。因为只要美国在日本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在军事上就要受美国的制约，而这正是美国的地缘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一个一箭三雕的高招：即对付它主要的潜在敌人俄罗斯，可以同日、韩一起封锁朝鲜海峡阻止俄罗斯海军自由出入太平洋，又可以对中国形成军事遏制，从驻日本冲绳的基地可以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事件，又可以以此作为基地对中国重要的东部沿海地带形成一定的军事威胁，还可以在实际上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军事上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独立地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受到了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政治大国的形象。

（2）确保朝鲜半岛不成为对日本构成直接威胁的地区。如果朝

鲜半岛特别是南部地区为敌对国所控制,则日本本土将容易受到攻击。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针对朝鲜,日本强烈关注朝鲜的核问题,把它认为是对日本构成的重大威胁;另一个意思是针对韩国,虽然两国同为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军事盟友,但由于历史的关系,两国是有着互不信任的因素的。当然这两个目的都有赖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和政治的干预。从这种地缘关系来说,大概日本是最不乐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的了,因为不论是哪一方统一了半岛,都迟早会对日本构成比分裂时更大的和更现实的威胁。

(3)东南亚地区安全对保障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线的畅通和原料的供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资源的缺乏,所需的大部分原料都要从国外运进,而其中所需石油的80%、铜的42%和铁矿石的17%要通过这一地区的马六甲海峡,同时,日本总进口的50%要通过东南亚海区。另外,东南亚是日本所需的战略供应地和工业新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是日本的主要的投资场所。例如,日本从东南亚地区进口所需的天然橡胶的98%、锡和锡合金的96%、铜矿石的37%、木材的32%、原油的14%。日本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者,其投资占日本对亚洲总投资的70%以上。所以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对日本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这一地区发生战争和动乱,对日本的政治经济都会有重大影响。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地缘利益的保障没有特别有效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还要借助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也是很有限的。因此日本必须与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展更进一步的友好关系。现在日本主要是通过与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资金技术越来越依赖,这样就不能采取对日本特别不利的措施,以避免对双方都造成重大损失。应当说,日本在这一方面没有特别大的障碍,而且在经济上对东南亚的影响和控制已经有一定成效。

(4)日本的地缘利益的第四个方面是收回日本的北方领土。这涉及到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地缘的争夺史中,日本与俄罗斯是

一对冤家。日本在1905年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将俄罗斯驱逐出中国的东北地区；1939年，双方又在蒙古进行争夺，结果是日本军队为苏联军队击败，退出了蒙古；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宣告了日本法西斯的死刑，日本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双方在1956后建立了邦交，但两国在北方四岛的归属上发生重大分歧，以至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日本的军事力量一直以防御北方之敌即俄罗斯为主。

俄罗斯认为北方四岛应是其千岛群岛的延伸，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则认为北方四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但北方四岛一直在俄罗斯的控制和占领之下，对其归属一直不松口。1991年苏联解体后，日本曾希望通过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俄在领土上作一些让步，俄罗斯也一度在此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改变了立场。1993年10月叶利钦访问日本时，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1994年11月，俄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率领80人组成的代表团访日，根本就不提北方四岛问题。

其实北方四岛涉及的不仅是几个小岛的问题。对俄罗斯来说，日本注定是它的地缘对手。因为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通道必经过日本和韩国之间的朝鲜海峡，而日本可以和美国、韩国联手封锁这一海峡；而对日本来说，强大的俄罗斯可能是日本的一大地缘威胁，因为俄罗斯的萨哈林岛距日本本土很近，而齿午、国后、色丹、择捉四岛如为俄罗斯领土对其地缘威胁就更大了。可以说，一旦俄罗斯要对日本发起进攻，日本是很难防守的。这种地缘战略上的冲突使这几个小岛具有特别的意义，就不说它所涉及的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了。

1991年后，日本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已有很大缓和，俄罗斯已把驻守北方四岛的军队减至4000人以下。在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又向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要把军队减至3500人以下，并准备与日本就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俄罗

斯还在1996年4月第一次邀请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问了莫斯科。同时,双方也有一些共同的地缘利益,如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要求对远东进行开发,但缺少资金和技术,而日本也需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丰富的资源,以减轻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因此,双方从大局出发,不大可能为北方四岛发生重大的冲突,但也不会很快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约日本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

(三)
地缘政治中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因素

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双重矛盾的关系:对日本来说,中国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邻居,是一个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同时,日本又实际上把中国视为它的潜在的威胁之一;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但由于日本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同盟可能被用来针对中国,因此日本又可能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这里可以适用一个自古到今都是通用的一个地缘政治的规律:地缘相近的两个国家,如果互相友好,则带来的利益比相距较远的国家会倍增,相反,如果两国互相敌对,则带来的灾难也会倍增。

这一地缘政治的利益倍增规律在实践中表现为,在历史上,中日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关系,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尤其是日本,在和中国的交往,曾多次大规模的向中国派遣遣隋和遣唐使,大批日本人在华留学,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的许多养料,对日本的历史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批中国人到日本学习,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其中有一大批人后来成为对中国近代和现代起过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

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日本的资金、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也在其对外开放的经济活动中给

日本带来巨大的利益。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建立了邦交，关系正常化，此后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有迅速发展。1980 年两国的贸易额才 89 亿美元，1996 年时已达到近 579 亿。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0% 左右，其中日本从中国进口为 345 亿美元。日本是向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92—1995 年达到了 150 亿美元。日本是向中国出售和转让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仅 1981—1988 年就有 732 项。在文化方面，双方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人员的互访，其中我国在日留学生到 1994 年时已有 2 万多人。这些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可以说，在这些历史进程中，虽然中日两国也同时与远方的国家进行过友好交往，也都从中获得过许多东西，但与两个近邻国家的相互交往及其所得相比，其影响都要小得多。

地缘政治中的灾难也倍增的规律在中日关系中也体现得十分鲜明。对日本来说，曾受到过元朝侵略的威胁，但更多的是体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方面。明朝时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长达 100 多年，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灭顶之灾。1894—1895 年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台湾与大陆割裂达 50 年之久，至今仍有其消极后果。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是今日“台独”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这次战争还使中国向日本支付巨额赔偿，使中国更加贫困；1931 年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达 3000 多万。这种灾难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灾难要沉重得多。所以地缘政治上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

问题还不在于过去，而在于今天中日关系中也存在着两种因素。

一种是加强中日友好的因素，这是今天两国关系的主流。在日本方面，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广大

的日本人民。经历了二战灾难的日本人民对过去的教训是有认识的，过去的战争不仅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也使日本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广大的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特别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的这种一衣带水的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是极为珍贵的。中国的文化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厚的。这种中日友好情感是日本国民反对战争的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有深刻认识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其活动中把宣扬中日友好作为主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三是与中国有着各种贸易经济往来的众多的日本企业界的人士。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中日和平的结果，只有推动中日友好才能保证他们事业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最大的新兴市场，而且是与日本最近的国家，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是使日中关系交恶的因素，是中日关系的潜流和暗流。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有些问题却反映了日本国内有一种不健康的力量在发展。这种对日中关系不利的消极因素是：

(1)在战争的责任问题上，日本许多政治家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没有认识，甚至认为日本没有发动侵略战争，或者说日本发动了一场殖民解放战争；石原等人还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没有死 30 多万，顶多死了 4000 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没有一届政府对战争公开表示认罪的，反而有许多大臣每年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2)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有一股力量暗中阻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企图维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虽然日本政府多次声明只与台湾保持民间关系，但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明目与台湾发展半官方关系，还允许台湾官方人士甚至“部长级”和“行政院副院长级”官员访问日本，日本的各政党也不断组团访问台湾；日本朝野还推行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对台湾有深厚的“台湾情结”，不少人虽认为日本不再可能再次统治台湾，但认为中国和平统一是对日本的一种威胁而加以阻挠。

(3)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钓鱼岛历来是中国领土,而日本却有不少人鼓吹日本对该岛拥有主权。

(4)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正在漫延。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的经济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日本在许多经济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使日本从二战战败的阴影下走出来,军国主义和大国主义也开始盛行。这表现为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认为日本人的心理素质优于东亚各国;鼓吹日本经济制度优越论,应把日本的经济模式向外推广;在政治上主张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抗争,在未来的新世界中,日本应起主要作用,或者由日美两国起主导作用,而不是什么多极世界;在军事上,鼓吹突破日本宪法的限制,使日本重新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

在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下,日本对华政策在1995—1996年时发生了摇摆。日本一些人认为中日关系的蜜月已过去,两国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矛盾。日本的一些人,如日本学者友田锡1995年12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对华战略的最好和最坏的结局》文章中,主张制定针对中国的多种策略:从最好的日中协商到最坏的相互对抗。

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这种力量在日本还不占主导地位,但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却在不断上升,这表现为近年来日本各政党的向右摆动,甚至连过去高举反战旗帜的日本社会党,也在向后退,赞成日美安全保卫体制,赞成日本向海外派兵。

表现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在许多问题上加强了反华的调门,与中国的关系比过去趋于紧张。如1996年以来,在中国的核试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在台湾地区进行导弹试验表示不满,在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确定中国沿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时,日本表示异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日本许多人明里暗里鼓吹、支持或煽动"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大肆宣扬"中国是

亚洲最大的威胁”的论点，还说什么中俄韩三国正在对日本进行类似1895年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相类似的“新三国干预”[515]。日本右翼政治家冈崎还说中国向台湾发射导弹，“不光是与近邻国家为敌,也将是与全世界为敌”。另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岛还把中国向香港派军队说成是“对亚洲各国的威胁”。对于这一谬论的实质东南亚国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正如一些新加坡的学者指出的，日本在国内外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还企图趁美日安保条约的再定义而把日本的军事力量或者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展至东南亚来，这是对东南亚安全的新威胁,也是亚洲再度分裂的开始。中国威胁论的得益者甚至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很清楚,中国根本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到美国所在的美洲去把什么美洲国家划成什么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势力范围”,不会跑到美洲去宣扬什么中国在这里有重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也不会对东南亚国家构成什么威胁,因为东南亚国家没有力量搞霸权主义,也不会与中国对抗,而中国则是阻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并再次对外扩张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对日本的那些想走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构成了“威胁”,是他们实现自己的野心的重大障碍。对这一点,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已经注意到了。[516]甚至日本学者也认为,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威胁”上有分歧，“美国占上风的观点是,如果抛开战略核武器,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517]。

（四）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对日政策

既然日本的对华关系存在两种潮流,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地缘政策就必须有两手,而不能只有一手。

我们认为,对日本政策应从日本是中国最大的邻居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国之一,资金和技术的最大的引进国之一,对华友

好是日本现阶段对华政策的主流等积极因素出发，因此，中国的对日政策必须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础。但又要看到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对国内的政治影响正在上升，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在下一世纪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具有较强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的军事大国。[518]

因此，从上述两方面出发，中国对日本的地缘政策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要从中国对美国和对东一南线地缘各国的大局和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战略的高度来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如果日本成为中国的敌人那么将大大恶化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而如果日本成为中国的一个友好邻居，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会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因此至少也要使之保持在现在的关系水平上，不能任其向坏的方向发展。

(2)要以地缘经济为推动力，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不单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因此这将继续成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而又不涉及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也是最容易着手进行的事情。尽管两国的经济往来的规模已较大，但两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中国的许多大型项目将在今后陆续上马，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的容量。扩展两国的经济交往的规模，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化解两国的政治纠纷，瓦解日本国内敌对中国的力量也有积极作用。

(3)以现实的和地缘政治的观点看待美日安全保卫体制。从原则上说，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反对集团军事结盟关系，尤其反对针对中国的类似行动。反对任何旨在扩大这一体制的态势，反对美国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反对美国和日本对这一条约的内容扩大到日本必需的防卫范围之外。尤其反对日本利用这一体制参与所谓的集体自卫行动和集体防御活动，并趁机扩大日

本的军事力量。如 1996 年 4 月日美两国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提出所谓“这一条约是亚洲安全的保障的基础”的观点,美国国防部长佩里(Paley)所说的“美日同盟不只是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保障,而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安全保障”的观点,[519]就应当受到中国的抵制。

(4)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对其反华言论要给以坚决和及时的批判。过去,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从未得到过认真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一是得到了美国的庇护,二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太过宽容。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都未要日本赔偿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总以大局为重对日本的过去少有提及。现在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和对过去战争上的不悔罪言行,应予与更坚决的批驳。当然,这也要注意策略,把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

对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也要灵活对待,如在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上,应以谈判解决,不宜把它完全与日本的军国主义言行挂钩。

·第四节·
中国地缘政治的展开地区—东南亚地带

(一)
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

(1)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

东南亚地区包括东盟七国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以及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共 10 个国家,其总人口达 4.4 亿,总面积达 425 万平方公里,1990 年时国民生产总值达 4000 亿美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地区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地缘来看,这一地区的 10 个国家发

展很不平衡。政治和文化差异很大，在经济上大体上可把它们分为4组国家：一是经济上较富裕的国家，这主要是指这一地区两个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和文莱。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GNP已达到22300美元，已超过英国和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九个最富有的国家，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位居第二。有些人已开始把新加坡视为“发达国家”。另一个富裕国家是东方石油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王国—文莱。1994年它的人均GNP为18000美元，是亚洲第三富有的国家，而其国王则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其财产为370亿美元，位居世界巨富之首。

第二类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即马来西亚和泰国，1994年马来西亚人均GNP为3230美元，1995年达到4000美元，泰国则达到2100美元。

第三类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994年人均GNP印尼为700美元，菲律宾达到850美元。

第四类国家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国，1994年人均GNP不到300美元。

在政治上这些国家也实行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越南、老挝基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实行类似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则实行有亚洲色彩的政治制度，文莱则是一个君主制国家。

在文化上，这里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也以伊斯兰为主要宗教，而泰国、缅甸则是著名的佛教之国，菲律宾的居民以信仰天主教为主。

第二，东南亚地区内自冷战结束后出现军费急剧上升现象，与各地区的裁军趋势相反。

冷战后，美国和俄国先后在这地区收缩其军事存在，而地区内外的大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导致各国的安全恐慌，担心由于力量平衡的被打破而新的机制未形成，使自己在新的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

新的大国进入该地区填补力量真空，因而出现各国军费大幅上升现象。如 1993 年东盟六国军费平均增长 13.5%，1990—1995 年平均增长 7%，是世界上军费增加较多的地区。这些国家的军费多用于购买更先进的武器，以装备自己的军队。如在军用飞机方面，1990—1995 年东南亚国家就已有两轮购买新式飞机的高潮：1990—1994 年，这些国家多购买当时先进的美式 F—16 战斗机，而在 1994—1995 年则把注意力转向了更先进的 F—18 和俄式苏—27 战机和米格—27 及米格—29 战机。泰国还向西班牙订购了航空母舰，1997 年交货后，将成为二战后第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亚洲国家。新式直升飞机，海上巡逻机和远程巡逻舰和潜水艇也在东南亚地区很受欢迎。如马来西亚在 1994 年就订购了 18 架俄罗斯的米格—27 飞机和 8 架美国的 F—A18 战斗机以及 28 架英国战机，还从意大利购买了两艘可发射导弹的军舰，并打算在今后 20 年中用 16 亿美元建造 27 艘先进的巡逻艇。

第三，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在 80—90 年代都保持了年均增长 6—8% 的势头，经济力量有了很大的上升。下面是 1989—1993 年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

1989—1993 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

国　家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新加坡	9.2	8.3	6.7	5.8	9.9
马来西亚	9.2	9.7	8.7	7.8	8.0
印度尼西亚	7.5	7.2	6.9	6.4	6.5
菲律宾	6.1	2.7	−0.5	0.1	1.7
越　南	7.6	5.1	6.0	8.3	8.0
老　挝	11.5	5.9	4.0	7.0	4.0
柬埔寨	3.5	1.2	7.6	7.0	5.7
缅　甸	3.7	2.8	−1.0	10.9	5.8
泰　国	12.3	11.6	8.1	7.6	7.8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1994 年。

第四,冷战后这一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在冷战时,在这一地区有两大军事集团,一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中国支持的东盟,二是越南为首的印度支那联盟,两大联盟在柬埔寨问题上展开了较量。泰国与越南在柬埔寨前线实际上在相互斗争。冷战后,越南被迫于 1991 年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了全部军队。老挝和柬埔寨虽然与越南还有某种特殊关系,但已不再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而且越南与两国之间还常有一些矛盾。东盟也已不再是一个针对越南的军事政治集团,它于 1994 年已经吸收了越南为其第七个成员,老挝和柬埔寨及缅甸在 1996 年 11 月东盟首脑会议上也被接纳为成员国, 这也是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的。

原来影响该地区政治稳定的一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也有很大的和缓。例如, 在柬埔寨,虽然还有红色高棉与金边政权的斗争,但其规模已相对缩小,对整个地区已不再有重大影响,在缅甸,1994—1996 年间,缅甸国内的政治斗争也逐渐平息,特别是长期困扰该国的政府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冲突基本解决。

第五,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集团化倾向大大加强了。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以原来的东盟为核心,开始了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上的全面合作的新的历史进程。

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继续发挥和扩大东盟这个政治联盟的作用和正在准备成立的包括所有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大东盟—即东南亚共同体。东盟在成立之初,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冷战后,这个组织的政治作用大大增强了。东盟国家注意在外交上协调自己的立场,以一个地区组织的面目在国际重大问题和重大会议上发表见解,对亚洲的影响力比过去更大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东盟冷战后能超越意识形态、经济差异和领土争端,将各国联合起来,1994 年 5 月正式提出了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目标, 并于同年 7 月正式接纳越南为东盟成员国。这与欧洲冷战后依然存在两大集团是大不一样

的。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在政治方面的成长和与欧洲不同的政治智慧。更为可贵的是,东盟原是在美国支持下成立来对付越南和中国的冷战的产物,但东盟国家在冷战后却表现出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在许多问题上反对美国的主张,对美国试图控制东盟行动,都给以拒绝。如在 1993 年 11 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ohammed Mahathir)因与美国立场相左,甚至不去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让美国总统克林顿难堪。

在经济上,东南亚国家的集团化行动更多,步子更大。

第一个大的行动还在 1989 年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提出东盟两个增长三角之间即北部三角和东部三角之间应达成协议,协调发展。冷战后,这一协议进一步有所发展,如目前正在考虑成立的泰国、印支三国和缅甸组成的新的大三角计划。

第二个重大的行动是 1990 年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后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为名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它不仅包括东盟,还包括中日韩国家。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打破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垄断,谋求在中日支持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它明确表示不让美国参加。

第三个重大的行动是 1991 年 7 月泰国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并为各国所接受。1992 年通过了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加坡宣言》,决定用 15 年时间建成它,把关税降低到 5%。1994 年 4 月决定提前 5 年实现这一目标。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东南亚各国也把以本地区力量为主建立地区安全体系作为最近时期讨论的重点。1990 年 9 月,印尼国防部长穆达尼建议成立区域安全合作论坛,1992 年 5 月,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首脑扎因将军再次提出了东盟各国的"防务论坛"的设想。1993 年这一设想得到东盟各国的赞成,于 1994 年 7 月在泰国曼谷召开了第一次"东盟地区论坛"。除东盟成员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代表外,还有西方国家和韩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参加。

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这种地缘政治的新动向,对于这一地区今后的政治经济会有重大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东南亚地区的集团化的发展,将会在亚洲形成美国、中国、日本之后的第四极,对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形势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
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角逐和中国对东盟的政策

东南亚地区历来是大国角逐的地区。在历史上,英国曾统治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曾统治印度支那三国,荷兰曾统治印度尼西亚,日本曾在二战时占领东南亚各国,美国曾把菲律宾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苏联后来也在70年代插手东南亚,在越南的金兰湾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是各大国卷入很深的地区。如俄罗斯在一度退出后,又想继续保持它在越南的金兰湾的基地使用权,法国试图利用它过去的影响在这一地区重新发挥作用,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在削弱,但它在文莱却还驻有军队。但现在在这一地区最有影响的还是中美日三角关系。

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东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仅次于中日。在冷战时,美国在这一地区扶持东盟,把其作为与苏联在这一地区争夺的重要组织,对抗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同时也有“防范中国”含义。在冷战后,美国又看中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认为它将在2000年成为一个产值达10000亿美元的新的经济区域,而且,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东南亚成员占了多数。美国要抢占这一新兴市场,就需要在东南亚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政治上,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在推进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模式上,在核不扩散的问题上,在控制这一地区的毒品扩散和环境保护上,美国需要与东南亚地区进行合作;从军事上看,东南亚地区也是“遏制”“中国威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需要维持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过去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冷战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是防止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排斥。冷战后初期，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美情绪较高，尤其表现在菲律宾这个东南亚地区最亲美的国家，在1992年迫使美国撤出了它在海外的最大的军事基地—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美国提出的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变为经济共同体的设想也遭到了马来西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还倡议成立由东亚国家组成的经济论坛；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的观点也遭到东南亚国家的反对，新加坡多次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霸权态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改变过去在东南亚地区的趾高气扬的态度，对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政治立场表示让步。在经过多年遏制和制裁之后，美国终于认可了越南，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也是对东盟的一种让步，因为东南亚国家不想孤立越南。而东南亚国家也不想使美国完全退出这一地区，因此在近年来对美国立场也有所缓和。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表示愿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主张保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东南亚国家也想借美国的力量抗衡中国和日本，尤其是与中国在南海上发生冲突的菲律宾，又想与美国拉关系，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而美国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东南亚各国重新认识美国的作用，也有一定影响。同时，东南亚各国虽然欢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投资，但不想让日本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尤其是军事作用。继续保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以美国制衡中国和日本，建立起一种东南亚地区的三角力量平衡体制，受到东南亚各国的支持。但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大趋势是向独立的中立的地区联合体方向前进，不会允许美国把东南亚地区变成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对手实际上是日本，因为日本在这一地区已经经营了几十年。二战后，日本花大力在这一地区增加自己的影响，主要是靠它的经济力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超过了美国的94亿美元，在1994年达到110多亿，日本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最

大贸易伙伴,与各国的贸易额都超过了美国。特别是在冷战后,日本把其外交的重点从西方转向亚洲,把对亚洲的外交作为日本21世纪的最大任务。日本还谋求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它提出的政治大国的目标,也是以东南亚地区作为其起点和舞台的。这突出的表现在1990年日本作为东道国主持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国际会议,对柬埔寨的政治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它还参与海湾战争,并力图在印支半岛这个真空地区产生它的政治影响;它是老挝的最大投资国,最先对越南提供3.39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访问了东盟四国,提出了印度支那开发构想,1994年8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问越南,再次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目标是在经济上与美国进行争夺,在政治上则有制约中国之意,也是其向政治大国迈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日本的这一想法与东南亚国家的想法有出入,它们欢迎日本在经济上发挥作用,但对其在政治上的作用表示冷淡,对其军事上的动向更是高度警惕。尤其是日美安保条约将其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使东南亚国家"担心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过分增强;同时也担心日美强化安全体制会刺激亚太地区的扩军竞争……"而马哈蒂尔还表明了"强化日美安全体制很可能诱发本地区扩军形势的形成"的观点,印尼外长也认为"日本的军队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520]。

和美国日本相比,中国在东南亚能够发挥自己的应有的大国的作用。一是因为美国毕竟不是亚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对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希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制衡东亚地区的大国日本和中国的"威胁",但又不想让它干涉亚洲地区的事务,不想让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霸主,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指手画脚不高兴;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它在二战中的历史,东南亚国家对它有一种不信任感。而中国在这一地区却有一些优势是美国和日本所没有的:第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在地缘上更近,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一血缘

关系更浓更亲近;第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一样,都在历史上受到过日本和美国的侵略、压迫和封锁,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上容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第三,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独特的作用表明,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起的作用是美国和日本不能取代的;第四,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但中国的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市场,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第五,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问题虽然也很敏感,但它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已成为推动这些国家与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对这一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尽管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担心中国的"威胁",但至少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是和平相处的,甚至在中国最强大的时期,中国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对外大规模地扩张和侵占周边国家的土地。

所以在冷战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更进一步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观点受到了欢迎。和过去相比,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大大增加了,可以预料,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还会有所扩大。这种趋势的发展符合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利益,是一种互利关系。

因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策,应当是继续这一发展趋势。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是:第一,在东南亚地区的联合趋势上,中国应当持积极立场。就是说,要支持东盟现在的活动,支持东盟的"西扩"。东南亚国家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以及在军事安全体制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和平、自主、独立、中立和经济相对强大的地区。这种地区的联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它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信心,并进一步摆脱西方对它的控制。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东南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没有野心,永远也不准备对它进行侵略和扩张。中国不谋求在这一地区的特权地位,也用不着担心它会对中国形成威胁。尽管一些东盟国家在南沙问题上与中国有冲突,对中国有敌意,但大多数东南亚

国家还是希望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再说,成立和扩大东盟,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与大国在这一地区相抗衡,这首先是针对过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的,所以东南亚地区的强大和独立有助于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的进一步优化。

第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应以推动与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为主,但不能仅限于这一领域,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参与这一地区的政治的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对东南亚地区各国所关心的事情和问题,中国要给以更多的关注。例如,中国应对东亚经济论坛的活动更加积极的参与,对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的"东盟地区论坛",也可以持更积极的态度。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要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东南亚国家对此也是有戒心的。这一点正如新加坡前驻美大使所说:"东盟七国已达成共识,即亚太地区的和平有赖于美国和日本及中国之间稳定的三角关系","我们没有人愿意同美国结盟对付中国或同中国结盟对付美国"[521]。

(三)
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1)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地缘政策

东南亚地区的 10 个国家,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因此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的政策也可以有所不同。

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平稳发展的国家之一。

中缅两国在历史上虽有过元朝对缅甸的侵略和进攻,但这只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两国的胞波友谊源远流长。1950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与缅甸、印度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和缅甸是较早地解决两国边境问题的国家。

1960 年 1 月,两国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年 10 月又签订了两国的边界条约。1961 年签订了两国的议定书。这使两国的 2185 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和平边界。在两国间不存在重大的问题,在缅甸国内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之时,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甸的国内局势不干涉,不说三道四,所以在缅甸与西方关系交恶时,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却有较大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的边贸发展很快, 1994 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 5.1 亿美元。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缅甸与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缅边界,有大量的毒品经过中缅边界进入我国,对我国的毒品近年来的泛滥有直接联系,并且对我国的边境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中国应当与缅甸政府进行更有效的合作,对边境走私毒品给以更有力的打击。

老挝是另一个与中国关系很正常的国家。它与中国有 710 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在 70—80 年代,老挝曾追随越南反对中国, 1981 年两国关系曾降为代办级。1987 年以来,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了大使级关系,而且在近年来有很大发展。1991 年,两国草签了《边界协定》,基本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1996 年开通了万象至昆明的航线,这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地缘政治友好关系会有促进作用。

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较早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泰国与中国既无边界相邻,又无海疆相争,在地缘上与中国无直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两国在历史上也无大的战争。这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具有先天的条件。1975 年,两国建交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尤其是 1978—1990 年,两国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政治军事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也为 90 年代和今后的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在 1991—1992 年泰国发生政治动荡时,两国关系也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发生变化,这证明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近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相继频繁互访,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尤其是两国的贸易从 1975 年的 0.3 亿美元发展到 1994 年的 20.2 亿美元。泰国在华投资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外资中,泰国资

本已占第8位,其中仅1994年就达6亿多美元。这其中在泰国的华人起了重要作用。旅游正在成为两国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公民到泰国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1993年已达27万人次;每年互访的中泰代表团达1000多个,这对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积极作用。

因此,中国对泰国的地缘政策,应当以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为主。在近期内的重点应考虑与泰国开发中国云南的澜沧江区域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在发展中国与泰国的旅游上也有很大的前景。中国还应利用泰国与中国无地缘利益冲突,又与东南亚国家有密切联系,在东南亚地区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这一特点,通过发展与泰国的关系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泰国作为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座桥梁。

新加坡是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这种特殊性在于,第一,在历史上,新加坡与中国有很早的交往史。在新加坡曾发现有两汉到明清历代中国的陶瓷和钱币,表明新加坡与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的交往。第二,新加坡是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这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的发展。新加坡的华人如陈嘉庚等曾对中国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新加坡的领导层与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乔石、李鹏等都曾访问新加坡,是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访问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第三,新加坡虽然与中国建交在1990年,但与中国的贸易却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多的,1994年时已达50亿美元。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居第五位,累计已达68亿美元,发展最为迅速。

在对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中,中国应当利用与新加坡的“人缘”,即在民族方面的亲和性,将与新加坡的关系置于较为核心的地位。尤其是新加坡在倡导“亚洲价值观”方面,有许多观点如反对照搬西方经验,反对西方以人权为武器对付亚洲国家,反对西方制裁中

国，反对在东亚各国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主张东南亚国家摆脱西方和日本的控制，抨击日本国内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都与中国有共同点。

马来西亚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策中也和新加坡一样，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较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 年 5 月中马两国建交后，关系也发展很好。更主要的是，马来西亚把与东盟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作为它的外交重点，因此中马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点。和新加坡一样，马来西亚也是亚洲价值观的一个支持者。它反对东南亚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经济和政治建设，极力主张亚洲国家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马来西亚力图充当发展中国家的发言人，为此经常得罪西方国家。1993 年，马来西亚曾要求澳大利亚总理基廷(P.J.Keating)为其言行向马来西亚道歉，1994 年 2 月，马来西亚又以英国报刊攻击马来西亚为由，宣布对英国进行经济制裁；在与美国的关系上，马来西亚不惜与美国唱对台戏，坚持成立不要美国参加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马来西亚还经常在人权问题上抨击西方的观点。在这些问题上，中马两国能够相互理解。因此，9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立场靠近了。如，过去马来西亚的东亚战略对日本寄以很大的希望，在国内提出向日本学习的口号，在对外关系上，总想日本能带头组织东亚经济的合作，但日本总是不积极。而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却在上升，因此马来西亚在继续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时，又把过去完全依靠日本，变为中日并重，1993 年正式提出了要中日两国在东亚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马两国经贸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两国经济贸易额从 1991 年的 14.4 亿美元，上升为 1994 年的 27.4 亿美元，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居第二位。更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最经常地公开反对“中国威胁论”的国家。如 1996 年 1 月 11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新亚洲论

坛”大会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亚洲如果有什么威胁的话，那肯定不是在亚洲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中国军备有所扩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从未向海外拓展过领土，在中国极其强盛时，中国也从来没有占领过东南亚。[522]

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中，马来西亚的这种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可以用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马来西亚关系的。同时，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地位也较突出，它在经济上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按人口比越南、菲律宾、泰国等要少，但其政治影响力却要超过这些国家。中国可以透过马来西亚对东南亚国家做工作，打消其受西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上，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不利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虽然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又都与台湾明里暗里保持着某种较密切的半官方的关系，或对台湾表示同情。如在 1994 年，李登辉等台湾高级官员到东南亚国家推行所谓的“南进政策”，按理这些国家不应接待他们，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给以接待。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有陆上共同边界 2280 公里，又有北部湾等共同水域，在南海又有漫长的共同海疆，可以说如按海陆边界合计，中越两国的共同边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中最长的。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在 19 世纪末在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时中国曾与越南人民一起抗击法国侵略者。1945—1954 年，中国曾全力支持越南与法国殖民军进行武装斗争，并在中国军事政治顾问团的帮助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从越南撤军；1955—1975 年，中国又为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1965—1968 年中国应越南的请求向越南派出多达 30 多万人的部队，帮助越南军队进行防空工程和后勤等工作，并在这一期间向越南提供了价值达 200 多亿美元的无私援助。两国有过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按理两国关系应当有很好的地缘政治关系。但事实却相反，1978—1991年期间，越南却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越南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还发生了边境战争。

1991年越南与中国关系得到改善，两国最高领导进行了互访，实现了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此后，经贸发展很快，1995年两国贸易额为9亿美元；1996年初开通了河内到北京的铁路；1993年两国还达成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两国军队领导人已进行互访。两国关系自1991年来发展是好的。

但两国关系中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会在很长时间内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第一，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越南在过去的历史上大肆宣传"北方威胁论"，在越南人中间有很深的影响。在中越关系史上，是有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和扩张时期，但那是过去，新中国在成立后，对越南人民的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也是基本的事实。但由于片面地宣传"中国威胁"的论点，这将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继续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

第二，越南当局曾在70—80年代对在越南的华侨进行迫害和驱赶。原来越南有约150万华侨，但在越南的反华活动中，华人受到残酷的迫害，有20多万华人被迫逃离。这个阴影对两国关系也是一种消极因素。

第三，两国在领土争议上虽达成了原则协议，但也难于解决，会成为两国关系上一个重大的消极因素。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按1885—1897年中国清朝政府与统治越南的法国政府的协议，共2280公里，其中存在争议的地段为88处，面积为约72平方公里。但后在反华过程中，越南声称有争议地为170多个，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在南中国海上，越南不断侵占我国的岛屿，两国分歧较大。

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人口最多，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地区性大国。中国与印尼关系的特点是波折较大。1950年建交后，两国在50—60年代有过一段关系较好的时期，但

1967年的“9·30事件”使两国关系急剧下降,并最后断绝了外交关系。1990年8月,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很好。在贸易方面,两国在1994年的贸易达到了26.4亿美元,并且两国还有很大的潜力。

但两国关系中也有一些重大问题:一是两国在发展经济上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的因素较中国与其他国家要大些。如在吸引外资上,1993年我国吸引外资达270亿美元,比1992年有大幅度上升,而印尼却在1993年只吸引80亿美元,比1992年少22亿多美元,这与中国吸引了部分原可能流向印尼的外资有关。

二是在对待印尼的华人问题上。其实中国早就在50年代放弃了双重国籍,让华人选择自己的国籍。但印尼对华人一直怀有戒心。在历史上印尼也有过大规模的反华事件,1740年有过红溪事件,数万华人死于屠杀之中。从1946—1985年,印尼发生过10多起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这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最突出的。[523]甚至在印尼与中国1990年恢复关系后,还在1994年发生过反对华人的示威。1993年,印尼的一些报纸还大肆宣扬印尼华人到中国投资对印尼不利的观点。[524]1995年11月,印尼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针对华人的骚乱,1995年12月,印尼内政部长在其讲话中要求印尼华人不要参加海外华人的运动,对印尼华人在中国投资持反对态度。

三是印尼与台湾的关系较近乎。印尼公开宣布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但实际上却与台湾有很多名堂。如1993年2月,李登辉率领一个庞大的“度假团”前往印尼,印尼总统苏哈托还与其见面。

菲律宾在1975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建交较早的东盟国家。自1975年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的合作上也有很大发展。两国的贸易额从1976年时的0.8亿美元增至1994年时的7.4亿美元。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和拉莫斯曾于1988年和1993年分别访问了中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兄弟伙伴关系”。

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的最大问题,一是菲律宾与台湾的关系,它与

台湾的关系密切,成为菲律宾发展中国关系中的一大障碍;二是在南沙群岛主权上与中国争执较激烈。尤其是1995年以来,菲律宾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故意使中菲两国在南沙的争执扩大,还出动海军驱赶中国渔船,扣留中国渔民。

1996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提出保持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拓宽民间交流领域等主张，使中菲关系有较大改善。双方就南海问题达成了和平协商，搁置争议，共同规划开发的共识，共同建设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

文莱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小最富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1年9月30日,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11月,文莱国王兼首相访问了中国。两国关系发展较慢,而且文莱在我国南海海域侵占了大约5万平方公里的领海,相当于文莱本国面积的8.6倍。它的8个油田中有2个在中国海域内。

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一些复杂问题。主要是中国曾经支持红色高棉,在1979年越南侵占柬埔寨后,中国又支持以西哈努克国王为首的民主柬埔寨,后来虽然越南在1989年退出了柬埔寨,1991年达成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平协定,西哈努克和团结阵线与洪森等领导的人民党实现了和解并组成了联合政府,但实权掌握在洪森和人民党手中。在1993年11月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移交权力以来,中国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发展缓慢。

因此,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地缘政策应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总原则下,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制定不同的具体政策。这一地缘政策,大体上可以是:努力巩固和加强与第一类国家的友好关系,其中特别重视与在东南亚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对第二类国家,则要着重在双边关系框架内推进问题的解决,尤其要与越南、印尼和菲律宾三国发展友好

关系。对所有这些国家都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但也要在地区问题上,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问题上,与这些国家达成共识。

(四)
南中国海的争端与中国的地缘政策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一个问题是南沙群岛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地缘的一个潜在的危险点。还在 1985 年,一位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交流的德国学者就曾指出:南中国海是世界大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交汇点, “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它的南方海疆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显得非常重要”[525]。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它和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一样,是我国在南海海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南海海域中面积最大,岛屿最多的一个群岛。它南北长约 550 海里,东西宽约 650 海里,水域面积为 80 万平方公里,由大约 550 多个岛礁组成,其中最大的太平岛才 0.43 平方公里,面积大于 0.01 平方公里的岛有 16 个。

南沙群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开发居住和驻守的领土。早在汉朝时中国人民已在此群岛上进行捕鱼等活动, 唐朝时划归琼州管辖,明清时代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并得到各国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承认。例如,1956 年越南副外长曾向中国驻越临时代办表示, 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 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越南政府曾在 1958 年宣布,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月 4 日关于领海决议的声明。

但从 70 年代起,在南沙周围的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纷纷抢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并进行非法活动。1970 年菲律宾首先侵占我南沙之马欢等 6 岛 1 洲 1 礁,1973 年越南也派兵侵占南威岛等多个岛屿和礁洲,这其中也包括越南在 1975 年统一后所占的岛屿。尤其是在 1987—1991 年间,越南还在不断占领南沙的岛礁,使其达到 27 个之多,是侵占我南沙群岛最多的一个国家。

1977—1986 年,马来西亚也出兵抢占了南沙群岛中的弹丸岛等 10 多个岛礁。

这些国家之所以对南沙眼红,主要是近年来南沙的地缘位置越来越重要。

在地缘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南海交通线上,又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要道,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出这一地区的船队更多,因而使得南沙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更让人眼红的是,南沙海域近年来发现了丰富的经济资源,尤其是这一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藏量极为丰富,油气面积达 72 万多平方公里,总量达 600 亿吨,其中在我国南沙群岛海域里的就有 420 亿吨,被誉为海上中东,或第二个中东。

在侵占我国南沙领土的国家中,以越南侵占的岛屿最多,与中国的对抗最严重。继 1974 年越南军队在西沙群岛被我击退之后,越南把其对海上的扩张转向了我国南沙海域,连续多年侵占南沙岛礁;1988 年 3 月,中国海军在南沙群岛进行编队巡逻,与越南军队发生战斗,我海军击沉越南海军 3 艘舰船,但越南仍不停止, 到 1993 年时,侵占了我南沙一些岛屿,并使在这一地区的军队人数增加到 2000 人左右,成为侵入南沙最多的外国军队。越南还在南沙设置行政单位,企图使其占领永久化。

中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首先应明确,我国在南沙群岛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它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对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于,南沙地区的石油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今天, 我国已经开始大量进口石油的情况下。第二,它对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

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原则应当是:坚持南沙是中国的领土;既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又考虑南沙群岛邻近国家的合理要求;既要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反对以武力解决,坚持进行和平谈判方

针;不仅着眼于南沙的领土,也从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既考虑中国当前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需要,也考虑中国的百年大计。因此,从这些原则出发,中国应当反对“四化”:即反对把南沙问题国际化;反对越、菲、马三国占领南沙合法化;反对“南沙南极化”,即把南沙视为“无主区”,禁止军事活动,不提主权问题,和平利用南沙;反对南沙的主权多极化和所谓的“主权三角区”,以及菲提出的中、越、菲、马、台五方共管区方案。

我国的南沙政策要注意三个问题:

(1)不能急,但也不宜长拖。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明显的,但久拖不决对中国较为不利。因为南沙的大部分岛屿礁滩都在三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并已有进行长期经营的意图,时间越长对其越有利,而对中国不利。

(2)不能打,但也不能久“搁”。南沙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很难进行联合开发。搁置主权一久,就有可能使三国对南沙的占领合法化,而且在实际上,三国都已在进行独自开发。如越南自1978年以来,已先后与加、英、俄的10多家石油公司达成了开采和勘探协议,已建成7个钻井平台,55口井,原油产量已从1986年的6万吨增至1991年的250万吨,并计划更大规模的开采这一地区的油气资源。此外马来西亚在此地有90口井,菲律宾有7口,连印尼也进来搅一趟水,搞了17口井。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搁”,而在于如何“搁”。在越、菲、马、文、印尼等国在该地区已经进行大规模开采油气资源的情况下,久“搁”对中国极为不利。

(3)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要积极同有关国家分别进行商谈,尽力避免出现东南亚国家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

所以作者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在南沙问题上能采取的对策是:

(1)尽快开始与当事国就南沙问题直接进行双边谈判。

(2)第一阶段可以先就解决南沙问题的原则达成框架协议,其中

应包括,各方不使用武力,不扩大事态,不进一步扩大对南沙岛屿的占领。

(3)可考虑与台湾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因南沙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为两岸之共识,且台湾在南沙最大的太平岛有较好的基础。

(4)在坚持南沙为中国领土的原则之下,照顾有关国家的现实利益,可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达成有关协议。

第十章

稳定而和平的中国西线地缘

西线地缘是指中国与南亚主要国家相邻的地区。这一地区多处于青藏高原地带,在地缘上形成一个很特别的板块。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它与中国的东南地缘和北—西北地缘不同。它过去、现在都不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大概今后也不会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相对而言,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区也与印度等国有边界争议,但它还是相对和平和稳定的。中国在这一地缘线上的政策也应当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

·第一节·
西线地缘的基本特点

(一)
西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西线边界,是指东起印度东北部与中国相接的地段西到阿富汗—中国边境漫长地段。它与印度东北部、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北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等国和地区接壤。孟加拉国虽不与中国接壤,但与中国相距较近,且与中国的关系也较密切,因此也包括在西线地缘之内。除阿富汗外,其他国家都是南亚国家。

西线地缘国家的基本情况是:(1994年)

国家名称	领土(万平方公里)	人口(万)	与中国边界线(公里)	GNP(亿美元)	人均GNP美元	军队人数(万人)	外贸总额(亿美元)	对华贸易(亿美元)
阿富汗	65.23	1906	92		150	23	5.5	0.39
巴基斯坦	79.60	12450	600	523	420	53	154	7.68
不丹	4.6	137	550			1		0.0024
孟加拉	14.75	11600	无	250	220	10	41.91	3.87
尼泊尔	14.72	1849	1400	13	202	3.5	5	0.43
印度	294.47	89600	2000	2025	310	126	459	8.9
锡金	0.71	40	不详					

主要来源:《世界知识年鉴》(1995/9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从上表可见,在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人均GNP都在200—400美元左右,属于世界上的一个贫困和不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国家人口较多,上亿人口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但相对而言,印度是这一地区的唯一的大国。它的人口和领土分别占该地区的76.6%和71%强,是其他南亚国家总和的3倍多和2.4倍。印度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占南亚地区的74%,约为其他南亚国家总和的3倍。印度军队人数达130万,约为其他南亚国家兵力总和的2倍。印度是这一地区的真正的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
这一地区各国的内部较为不稳定,各种形式的冲突和矛盾较多

在政治上,这种不稳定体现在,孟加拉国政治局势十分动荡,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较为激烈,经常演化为政治对抗,两大对立的政治力量为争夺权力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是军队参与政治斗争,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1995年,由于朝野两党

的激烈斗争，迫使执政的民族主义党交权，卡莉达·齐亚总理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1996 年 2 月 15 日的大选，由于反对党抵制，本已获胜的卡莉达领导的民族主义党政府不稳，又导致了 1996 年 5 月孟加拉总统宣布解除陆军参谋长的职务。1996 年 6 月，几经磨难，才产生了哈西娜政府。

在尼泊尔，1995 年上台执政的尼共被赶下台，由大会党、民族民主党和亲善党三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三党联合基础不牢固。

巴基斯坦执政的人民党也在反对党的进攻下，穷于应付，政局潜藏危机。各种教派之间的斗争使巴政局阴影笼罩，国内政治前景难测。1996 年 11 月，贝·布托政府被莱加里总统解散，而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又面临分裂的危险，巴基斯坦的政局再次进入一个危机时期。

印度的政治局势也处在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一直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议会各政党数量多，政见分歧大，除人民党在 1977—1979、1989—1990 年两度短期执政外，其余都是国大党掌权。但 1996 年 5 月，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取得了组阁权，使印度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印度人民党在议院中才 190 多席，达不到组阁所需的半数，瓦杰帕伊总理被迫在上台后 12 天就交出了大权。来自南方的卡纳塔克邦的高达在国大党的支持下继瓦杰帕伊之后成为新总理，以他为首的联合阵线也只有 190 席，要在 545 个议席中获得多数必须依靠国大党的 136 个席位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组成的政府也多是不稳定的。印度的这一政局开始了印度政治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和过去相比，它可能是更加不稳定的。

更主要的是，在政治斗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和种族分歧的背景。这是导致印度长期不稳定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尤其是印度的三个大的宗教即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之间，宗教冲突成为制约

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947年印巴分治时，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信徒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导致50万人被杀，1400万人成为难民，成为最大的一场内战。在以后的近50年中，两大宗教之间经常发生宗教冲突，如1986—1987年两大宗教为争夺一座寺庙而展开了空前的斗争，导致数百人死亡；1992年，两大宗教再次为争夺阿育迪亚小城的一个寺庙而进行了相互屠杀，导致数千人死亡，仅在第一周内就有1200人死于非命。

另一个对印度政治影响较大的是锡克教与印度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也是民族与宗教合为一体的。锡克教教徒在旁遮普邦占了多数，他们要求更大的独立权。在1984年6月，锡克教因金庙事件与印度政府发生对抗，导致500人死亡，印度政府派兵占领了被锡克教奉为神圣的金庙，这导致锡克教徒于1984年10月枪杀印度总理英·甘地，这使两大宗教再次发生流血大冲突，导致数千人死亡。1986—1987年，局势再次恶化，印度中央政府解散了锡克人掌权的旁遮普邦政府。

对印度政治影响尤其大的一个表现是，具有强烈的印度教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在经过16年的苦心经营后，在1996年5月战胜了长期掌权的国大党，成为印度议会中第一大党。

除宗教外，印度的种姓制度，巨大的贫富悬殊，也是引起政治纷争的重要因素。

（三）

南亚各国之间经常发生较大的对抗，甚至导致战争

在南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英国过去的殖民地，但由于宗教的原因，在1947年时英国利用这一因素，制造了印巴分治，使独立后的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了死对头。

两国在1947年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战争。而领土争端，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争议，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归属上发生严重争执，巴基斯坦主张这一地区应由当地居民通过全民公决方式解决，因为这一地区的多数居民是穆斯林，而印度却通过印巴分治时它控制的克什米尔邦议会，通过了归属印度的决议，宣布克什米尔与印度合并，为此发生了第一次印巴战争；1965年，两国再次因克什米尔问题发生战争；后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又于1971年利用东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对巴基斯坦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最后于1971年底导致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印度国内的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冲突也是导致两国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1947—1996年，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对抗的冲突的状态，虽然近年来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印巴对抗的基本的地缘政治的态势未变。这对两国和整个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都有重大影响，也是中国在西线地缘方面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

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但印度在处理时不如对巴基斯坦那样强硬，而是比较灵活。如两国在廷比加走廊问题上的争吵，终于在1992年达成协议，印度将此地交给了孟加拉国；在恒河水分配问题上，在南塔尔帕蒂岛的主权争端上，在印度在印—孟边界修铁丝网问题上，虽然两国有分歧，但并未引起大的冲突。

印度对锡金、不丹两个小国的吞并和实际控制也未引起太大的冲突。1950年，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保护国，1974年，印度操纵锡金议会通过决议成为印度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印度把锡金变成了印度的第二十二个邦；对不丹，印度遭到不丹的反对之后，让不丹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到印度的控制。

所以实际上，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主要是由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的军备竞赛已有向核军备竞赛方向发展的趋势，其影响超出了地区的范围，正成为各大国注意的一

个主要问题。

（四）
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相对其他地区来说要和缓一些

在冷战时期，南亚地区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在这里进行争夺。50—60年代，美国把这一地区视为扼制“共产主义威胁”的一条战线，对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同时进行扶持。1954年，巴美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条约》，1959年两国又签订了《双边军事协定》，美国承担了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美国同意向巴提供军事设备，对巴军队进行训练，在巴遭到入侵时，美还可向巴直接派军队进行帮助。美国还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在50—60年代，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英国逐步撤出印度后，美国代替了英国的位置。美国把印度做为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一个样板。

但在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对巴基斯坦进行重点援助，对印度关系较冷淡。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卷入南亚地区，对印度进行大力支持。它先是在巴—印克什米尔冲突和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和偏袒印度，后又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援助。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长达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具有军事联盟性质，规定一旦印度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苏联可以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签约后不到3个月，印度就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进攻。苏联对此大力支持，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苏联每年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向印度出售了先进的米格—29和米格—31式飞机，还把C—2级核动力潜艇“租借”给印度。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印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美国。印度得到了苏联约4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70%的军事设备来自苏联。苏联还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70年代，苏联还把手伸向阿富汗，1979年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占领，有10万大军在阿富汗常驻，由此引发了苏美在这一地区的新一轮争夺。美国为了阻止苏联南下印度洋的战略，除直接援助阿富汗游击队外，还把巴基斯坦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一个重要基地，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进行援助。因此，在80年代形成了美—巴与苏—印的两方四角关系。

冷战后，这种格局完全打破。对美国来说，巴基斯坦已经由于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而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而苏联的解体，也使印度失去了一大军事战略的盟友。这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起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在这一地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防止在这一地区出现核军备竞赛，二是支持印度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前一问题上，美国以巴基斯坦生产核武器为由，于1990年中断了对巴基斯坦的价值约5.73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对巴施加压力。对印度，美国反对印度拥有核武器，尤其反对俄罗斯对印度提供发射卫星的技术；在第二个问题上，美国大力支持印度的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与印度发展关系。到1994年，美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到1996年，两国签订的各类经济和军事合同已达84亿美元。

除此而外，美国在南亚地区还通过与印度的关系达到三个目的：其一，利用印度来加强南亚地区的稳定，把南亚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新秩序，通过对印度的支持来维护美国在南亚的存在；其二，在美军撤出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后，美国通过与印度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并通过印度来干预南亚地区的事务；其三是美国对正在扩展的伊斯兰教势力感到担心，在南亚地区与印度发展关系，也可遏制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势力的扩张。

但美国与印度又有三个大的矛盾：一是印度本身也在发展核武

器,并拒绝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美对印的压力遭到印度的反对和抵制;二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经常批评印度国内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宣称如印度不改善人权状况,美国将停止对印度的大部分援助;三是在贸易和知识产权上,美国认为印度存在着严重的侵权行为。[526]

对巴基斯坦,美国则压其制止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同时要求巴基斯坦在反恐怖和反走私上与美国合作。尽管美国在1995年贝·布托访问美国时促成了美国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巴美关系有所回升,但美在巴的核计划上与巴矛盾较大,美对印的关系实际上已超过了对巴的关系。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一度收缩了对印度的影响,但后来又对此给以纠正。现在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是,恢复和保持因苏联解体而中断了的与印度的关系,如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坚持向印度出售火箭技术,恢复俄罗斯与印度之间的经贸关系等。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并签署了《俄印友好合作条约》和19个双边协定,俄罗斯重又成为印度的重要伙伴,成为印度外贸中的第二大贸易国。1994年7月印度总理拉奥也对俄进行了回访,使印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回升。1995年时俄罗斯把与印度的关系称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1996年3月俄外长普里马科夫就任后第一次出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外的国家就到了印度,并与印签署了一个在两国领导人之间设立电话热线的协议。但现在俄印关系与过去的苏印关系相比,是一种不同的关系,它不再具有军事同盟的关系,两国均根据各自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断,两国的军事和贸易的合作也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不像过去那样,政治关系压倒了其他。同时,俄罗斯又与巴基斯坦发展关系,过去因阿富汗问题引起的矛盾随着苏军的撤离而消失了,俄罗斯与巴基斯坦之间并无大的直接矛盾。但现在的俄罗斯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也非昔日可比。

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把南亚地区作为自己的地缘政治的

重点。对美国来说,它的重点在欧洲,在东亚,在中美洲,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重点在独联体,在东欧。这也正是美国和俄罗斯在这里相互争夺较为缓和的原因。

大国争夺相对缓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与印、巴对大国政策的变化有关。

对印度来说,冷战后,印度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从过去的对苏"一边倒",变为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搞平衡。这一变化具体表现为,在印俄关系一度冷淡后,两国又恢复到一定程度,但已不再是过去的结盟关系,而对美国关系则有较大发展,印美关系成为印最重要的关系。这是从印度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需要考虑的:(1)印度需要美国对印度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行支持,在克什米尔问题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美国的立场对印度现在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印度公开承认美国在南亚地区的作用是印度改变对美国关系的标志。(2)为了取得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印度在冷战后,对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给予了支持,让美国使用了印度的军事基地;印度还与美国联合进行了军事演习。(3)印度还就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了会谈,这些都是过去没有过的。[527]

印度这样做也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主要是可以通过与美发展关系获得最新军事技术装备,从美国手中得到支持其经济改革的资金和技术,也有借美国抗衡中国之意,至少也可以防止巴与美国关系继续发展而使印度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印苏—印俄关系从过去的结盟关系降为正常国家关系,而美—印关系从过去较冷淡变为印最重要的关系;中印关系也从过去的对抗变为现在的正常化,使印度与中、美、俄三个大国的关系处于大体平衡状态。这可以避免过去的美中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支持印度,形成两极对抗的态势,从而可以使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第二节·
西线地缘是中国地缘政治中的稳定地缘

相对于北线和东南线地缘来说，中国的西线地缘是比较安全和稳定的。这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从历史上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并无大的历史冲突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在古代，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从无大的战争，除元朝时曾有蒙古军队进入印度半岛并发生过小规模的战争，1791年清朝曾派军队与进犯中国边境的廓尔略(尼泊尔)军队进行战斗外，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泊尔以及不丹、锡金等国是相安无事的。相反，中国与这些国家倒有过十分友好的时期。如在秦汉时期，中国与当时的身毒和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半岛)人有过友好交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与这一地区的笈多王朝，犍陀罗(其都城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古国以及尼婆罗(今尼泊尔)等国有友好往来。唐朝时中国与印度半岛的国家关系发展到了高峰，佛教东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小国还曾受唐朝册封以抵抗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的进攻。宋元时，中国与这一地区也有友好关系，清朝时尼泊尔和阿富汗地区的政权还曾试图派兵协助清朝军队与中国境内的叛乱分子作战并要与清朝合击正在入侵的英国军队。在近代，中国人民和南亚地区的人民一样，都曾受到过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和经济剥削。在现代，中国和印度一起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阿富汗人民反对苏军的侵占给予了支持和援助。

(2)在地缘上，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基本上是分开的两个地理单位，中间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这是一道天然的安全屏障，对山脉两边的国家和人民都是相对安全的，如要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不大可

能在这里发生大规模的和持续的军事对抗。此外，在西线地缘上也没有什么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形，迄今也未在这一地区发现有特别重大的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这也使这一地区不如其他地区那样容易引起大国和强国的特别大的兴趣。因此从潜在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地区除了地区性的局部性的边界冲突和战争外，不可能对中国的安全形成重大的威胁。

(3)从经济上看，南亚地区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沿中国的西部边界的两侧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国的西藏虽然在建国以后经济有较大发展，但仍是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在东南线和东北部，而印度的经济发展的地区在远离中国西部边界的南部沿海地带。

(4)从外部世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卷入的程度来看，世界主要大国在南亚地区并无重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原苏联在侵占阿富汗时期的确有从阿南进印度洋与美国争霸的意图，但随着苏军撤出和苏联解体，其后继者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策也不如过去那样富于进攻性。俄罗斯也不再与阿富汗接壤，它在阿富汗—塔吉克边界的军事存在主要是为了防御阿富汗地区的战事通过塔吉克漫延到独联体各国从而影响到它的安全，具有防御性。美国在这一地区也与中国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它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不会对中国形成重大威胁。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西线地缘尽管也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是相对和平和稳定的。

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地缘利益也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中国如何面对南亚地区具有出现核扩散的现实前景。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地缘战略利益在于，如果这一地区的印巴两国进行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那会对周边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形成地缘上的不利因素，改变现在中国西线地缘上的力量对比，使之向对中国较为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南亚地区实现无核化，不仅

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对中国保持西线地缘的安全和稳定更是有利的。因此,使南亚地区无核化,应成为中国在南亚的一项重要的政策。

但现在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印巴两国都在加速发展其核能力。尤其是印度,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已有很大成就,在90年代初已建有7座核电站,并计划在2000年建成10多座核电站。它的核研究带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在生产和储存能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的能力上,已有较大进展,每年能生产300公斤,估计到2000年,印度将可拥有制造2000多枚核弹头的能力。印度还在1974年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同时,印度也已拥有了发射原子弹的运载工具,1988年2月印度已发射了第一枚战术导弹,1989年5月以来又先后进行了中程和远程导弹的试验。印度在空间方面的高技术也可用于军事上,1995年印度已研制成功了人造卫星并送入了太空。印度政策在发展核武器上态度较坚决,不签订核不扩散条约,反对核大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印度发展核武器的用意,不仅是为了对付巴基斯坦,而且也潜含有对付中国之意,并以此作为其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资本。1996年5月在大选中获胜并执政的印度第一大党—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其国防部长未到任就表示了印度将继续发展导弹的意向,并说如果需要,印度将作出核选择。虽然瓦杰帕伊政府因未获得议会多数而未能成立,但紧接着成立的高达政府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也主张印度要保留核选择。1996年6月高达政府又决定不签署《核不试验条约》。因此不能排除印度在最近时期内进行第二次爆炸核装置,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核大国的可能性。

面对将成为核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也在加紧进行其核计划。1994年8月23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公开宣称巴已有核弹,如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进攻,巴将使用核弹;1996年4月巴基斯坦政府总理贝·布托表示,"认为巴基斯坦会容忍印度进行核讹诈或者导弹讹诈将是错误的"[528]。

所以中国在西线地缘上的一个大问题是对南亚的核军备竞赛应作出正确的反应。中国反对南亚地区进行核武器竞赛。这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有重大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核援助严格控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并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动摇。中国应当积极地参与推进南亚地区的无核区计划,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但中国也要有面对南亚地区的核国家的心理准备。

第二,中国如何面对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

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两国边界、民族、宗教和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体。两国关系的矛盾又与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两国都指责对方支持本国的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对国内发生的内乱负有责任。这使两国关系更加复杂。两国关系近来有所改善,但不排除两国因克什米尔主权归属等问题而发生第四次印巴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在改善关系的同时,又在不断扩大军备, 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处于对抗状态,1994 年以来关系在恶化,巴基斯坦还关闭了在孟买的总领事馆, 1995—1996 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两国都以对方作为地缘战略中的主要敌人。在力量对比上,印度对巴基斯坦占压倒优势, 巴印兵力对比为 1:3,巴基斯坦在人数、战略物资供应、军工生产能力、军事技术装备以及综合能力上,都远不如印度。

印度凭借其各种优势,主张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力图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压倒对方,反对将巴—印矛盾国际化,反对由国际社会出面调停克什米尔地区的争议;而巴基斯坦虽要对抗印度,但也知道在与印度的长期对抗中处于劣势,因此强调对印度以防御为主,同时通过外交谋求大国对印度—巴基斯坦矛盾和冲突的调解。但近年来印度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政策有所强化,特别是新上台的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会更加强硬,因此,印巴两国的冲突会有所加剧,军备竞赛会加剧。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

我们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是:(1)印巴两国的和平有利于中国的西部地缘的安全。中国反对加剧这一地区的任何行动,中国主张通过双方谈判解决争端;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中国在西线地缘上的国家利益;(2)中国认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双方来解决,中国将不卷入印巴两国之间的冲突。

这一地区的冲突的扩大,会对我国的西部边界造成一定的安全压力。如,一旦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会造成难民进入我国邻近地区的局势等。但从大局来看,不会对中国的西部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只能对此作出有限的和局部的反应,而不应支持其中的一方而大规模的卷入。

中国可以采取的立场是:

第一,为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国可以充当双方的调解人的角色。如果其中一方提出要求,中国可进行具体的调解工作。

第二,中国要加强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关系,但要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使得中国对南亚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的关系能相对平衡。这就是说,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两大强国之间应当奉行双重点政策,对两国一视同仁。

巴基斯坦是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与中国保持友好和亲密关系的一个国家。它于 1951 年 5 月 21 日与中国建交,之后两国人民和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关系不断稳定发展。巴基斯坦历届总统和总理都强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固然有以中国来牵制印度的考虑。1962 年中印两国关系恶化后,中国也对巴基斯坦的关系更加重视。这其中当然也有以巴基斯坦来制约印度的因素。自 1979 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后,巴中两国在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共同利益使两国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

在冷战结束后,印巴关系有了改善,中印关系也发展较快。因此,对中国来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针对第三国的

地缘政治关系，成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同制度的国家发展关系的成功的范例。因此中国将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坚持向巴基斯坦提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有关技术，也是从维护两国的长时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出发的。

但如果说过去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展关系或多或少有一些牵制印度的因素的话，那么现在中国应当在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上保持适当的平衡。在不降低中—巴关系水平的条件下，中国应当更进一步与印度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往来。

中国与印巴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不仅符合三国人民的相互利益，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印巴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中间调停作用。

1996 年 12 月 2 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了中国与南亚各国共同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一、扩大交往，加深传统友谊；二、相互尊重，世代睦邻友好；三、互利互惠，促进共同发展；四、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五、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国的这一面向南亚各国的基本主张，将对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宁、和睦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节·
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

（一）
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保持中国的西线地缘安全、和平的重要因素。在西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还有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三国，但这三国程度不同地受到印度的控制和制约：它使锡金成为它的一个邦；不丹虽然保住了独立国

家的地位,但其行动受到印度的很大制约;尼泊尔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印度有紧密关系,印度通过经济援助控制了它的经济命脉,印度在尼泊尔的投资占尼泊尔工业总投资的3/4,其经济贸易也为印度控制,尼泊尔的军事也受到印度很大的影响。因此,尽管中国的西部边界与三国有漫长的边界,但对中国的西部边界影响最大的也是印度。

中印两国在历史文化、民族、外交战略、政治经济等均无太大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的两大问题中的第一个是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

在中国的西部邻居中,中国与阿富汗在1963年11月22日达成了边界协议,并于1965年3月24日正式勘定了两国的边界,使阿中两国92公里长的边界成为无争议边界。

中国、尼泊尔两国也在1961年10月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圆满地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也早在1963年得到解决。

但在中国的陆地边界中,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是争议最大的,涉及的领土面积也最大。

中印两国的共同边界长约2000公里,分东、西、中三段,在历史上,两国遵循历史上的传统习惯,本无大的争议,但由于英国的侵略,使两国边界留下了不少纠纷。特别是英国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和英国搞的"麦克马洪线",更是给后来的中印两国边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尽管中印两国在1950年4月1日就已建交,印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国家之一,但1956年以来,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目前,中印边界全线有8处较大的争议区,涉及到的领土面积达12.55万平方公里。

中印边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西段、中段和东段。西段地区是指中国新疆和田地区、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占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接壤的边界。它的面积为32850平方公里,有三处较大的争议,主要是阿

克赛钦地区、班公湖地区和碟木绰克地区，除碟木绰克地区的巴里加斯地区的约 45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印度所控制外，其余均在中方控制之下。中印边界的中段地区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接壤的地区，其中有争议的地区有巨哇、曲惹地区，什普奇山口以西地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和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等四处，面积约为 2650 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大多为印军所实际控制。中印边界的东段地区西起中印不三国交界处，东到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库阳山口，长约 650 公里，有争议的地区面积为 9 万平方公里，是中印边界争议最大的地区。这一地区为中印两国分别控制。

中印两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1954 年印度出版的地图将历来由我国控制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形成 8 处争议地区。1958—1959 年，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不断挑起事端，并于 1961 年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中国边防部队于 1962 年 10—11 月被迫进行了边界自卫反击战，将印度军队击退。为表明中国的诚意，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 1959 年 11 月我国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 20 公里以外，并交还了所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释放了被俘的印军人员。此后，虽然中印边界大体平静，但印方一直声称要夺回被中方占领的印度领土。1979 年 2 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印度外长瓦杰帕伊时提出，边界问题应从大局出发，可以一揽子解决，并且非正式提出，东段中国方面让，西段印度方面让，而瓦杰帕伊则坚持东中两段实际控制线和法律上的线差别不大，可以先解决，西段阿克赛钦地区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双方陷入僵局。1986 年 12 月，印度议会两院通过决议，宣布在印占的东段中印边界地区成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到 1988 年，拉·甘地一边表示要加强中印关系，但一边又表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他在访华前夕还到阿鲁纳恰尔地区进行视察，1991 年在中国总理回访印度前夕，印度总统还到阿鲁纳恰尔地区再次进行视察。边界问题成为制约中印两国关系的一个

大障碍。

(二)
西藏问题

与边界问题连在一起,西藏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障碍。西藏是中国一个组成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本不应成为妨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西藏与印度有很长的边界线,边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西藏与印度相邻地区的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印度对我国西藏抱有错误的立场。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印度官方和民间有一部分势力对西藏一小部分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进行支持,对我国西藏怀有不轨之心。这表现在:

(1)宣染西藏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印度国内一部分人宣称,西藏先民源于印度,西藏的文化与印度文化关系密切,西藏的佛教来自于印度,鼓吹西藏在历史上与印度的关系好于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实际上是对西藏怀有吞并之心。

(2)鼓吹使西藏成为印度北部安全的缓冲区。长期以来印度军方就一直鼓吹,西藏与印度北部接壤,是中国能对印度发起进攻的唯一地区。传统的喜马拉雅山脉已不能对付中国这一潜在的敌人,因而为了印度的安全,应当使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军方要拥有打击拉萨的能力,切断中国军队对印度发起攻击的供给线。

(3)认为尼泊尔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为了尼泊尔的安全,印度必须关注西藏问题。这实际上是要使印度对尼泊尔进行控制。

印度官方曾多次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部分,但实际上印度国内一部分人对流亡印度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活动给予支持和纵容。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及其追随者在印度就一直得到印度政府的支持。达赖在印度多次组织其追随者进行分裂祖国的

活动,如在中国驻印使馆门口进行示威、集会，甚至对使馆进行暴力骚扰,而印度政府一般不进行干涉,有些印度领导人还到其集会上发表反华讲话；如1987年印度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干涉西藏的内政；1989年印度还召开了“西藏与南亚和平”的会议；甚至在中印官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的1991年10月,还发生了流亡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冲击来访的四川歌舞团演出的事件；1992年3月还有9名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袭击中国使馆的事件。这表明印度对西藏的干涉成为妨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对印度的地缘政策

自中印发生边界战争以来,印度军方一直在扩军备战,以中国为假想敌,其作战能力也以制服中国为其目标,以图在未来的战争中报仇雪恨。30多年来,印度三军兵力已达130多万人,虽然从人数上还不足以与中国军队相抗衡,但其军事实力却比过去增强了不少。它拥有作战飞机700多架,其中有很先进的米格—27、米格—29和幻影—2000以及美洲虎歼击机，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在远洋作战能力方面,印度已拥有航空母舰、核潜艇等,陆军也装备了先进的主战坦克,并拥有能打到中国南部的导弹。这使印度比过去更可能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实际上这种可能与过去相比,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

冷战结束后,有几个因素促使印度改变其对华政策。

第一个因素是冷战后,苏联不复存在,印度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可以依靠的军事战略盟友。尽管俄罗斯还强调印—俄之间的战略关系,但这种关系已远非昔比。而且中俄两国关系迅速改善和发展,使印度过去利用中俄不和与中国对抗的机会大大减少。即使美国与印度改善了关系,但美印关系与过去的印苏关系也是意义大不相同的。

第二个因素是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在美苏对抗中有很大影响的不结盟运动,也失去了过去的独特的优势,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相对下降。而作为过去与南斯拉夫、印尼、埃及等国一起发挥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印度,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所下降。过去,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时,印度作为有影响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往往能起一定的调停作用。现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比过去的苏联的影响要少得多,印度因而失去在两大阵营之间游刃有余的资本,尽管它在第三世界还有很大的影响,但和过去相比是大大不如了。印度要作为一个地区和世界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要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与中国更好的合作。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大市场,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印度如果要积极的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成长进程,也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

第四个因素是印度希望对南亚地区有更大的影响,要全力对付在南亚出现的各种事情,同时国内的各种民族和宗教冲突也很频繁,印度尤其要对付巴基斯坦。因此,印度必须缓和它在北部与中国的紧张局势,避免与中国发生更严重的对抗,这对它在南亚称霸的战略可能更有利。

这些因素使印度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从过去的亲苏俄重美国对抗中国变为在中俄美三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从那时以来,中印关系从过去 50—70 年代的恶化对抗阶段,到 70—80 年代的缓和但较冷淡的阶段,进到 80—90 年代的积极发展阶段。1988 年印度总理拉·甘地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是 30 多年来印度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印度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到 90 年代这一改善对华关系的步骤也加快了。1991 年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了印度,使印中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印度的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也相继访华。1993 年印度总理拉奥

于9月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又使中印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取得了以下重大的进展:

两国政治关系大大改善,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的相互信任气氛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两国的经济关系在长期的停顿之后,有了迅速发展。1990年,中印之间的贸易额才4100万美元,1992年猛增至3.4亿美元,1993年又达到了6.75亿美元,1994年,中印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巴贸易,达到创纪录的8.95亿美元;1995年又达11.6亿美元;1996年又超过1995年,达13亿美元左右。

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局势大大缓和。印度自90年代以来,逐渐放弃了以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观点,1993年拉奥总理来华访问时,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标志着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虽然离解决问题还很远,但毕竟在原则问题上有了共识。

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再次重申了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不承认西藏的问题,也不干预西藏自治的事情,印度也不容许第三势力利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等立场。中国与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比过去缩小了。

这些表明,尽管中印两国在边界、西藏等问题上还有差距,但两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能够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根据这种大势出发,中国应有信心使中印两国的边界变成更加和平和友好的边界。中国对印度的地缘政策应当是:

在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把中印关系作为重点,优先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中印两国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尤其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两国的经济贸易额才13亿美元,有很大的潜力;

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上也有共同点,可以在国际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对印度与南亚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任何行为都表示支持,中国也积极的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相邻的巴基斯坦发展友好关系,中巴关系的发展不针对印度,中印关系的发展也不针对任何其他的南亚国家。

边界问题不应当成为阻碍中印发展关系的因素。中印两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两国维持现状,不激化边界上的冲突和矛盾。相信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海划分上冲突更容易解决。

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印度时,中印的地缘政治关系朝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与印度总理高达的会晤中,江泽民主席和高达总理都强调中印两国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还达成了《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协定》,同意各自削减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江泽民主席还指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互不构成对对方的威胁,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在的分歧。对中印边界问题,中方一贯持积极态度,并相信中印两个大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印边界最终成为一条友好、互利的纽带。[529]在江泽民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外长古杰拉尔还强调,印度领导人多次表明,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决不允许达赖集团在印度的领土上从事反华政治活动。江泽民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国稳定西线地缘的战略目标得到具体实现。

注释

[1] 见《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2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6 页。
[2] 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0—291 页。
[3]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8 页。
[4] 见《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9 页。
[5]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2—303 页。
[6] 见王韬:《弦园文录外编·使才》,引自《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5 页。
[7] 见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时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8、157、184 页。
[8] 见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 20 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 页。
[9] 见《边防局局长尼古拉耶夫大将谈边界问题》,《俄罗斯报》1996 年 5 月 31 日。
[10] 数字参考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参见《中国国情国力》,1993 年第 2 期,第 74 页。
[12] 见科尔图诺夫:《俄罗斯寻求盟友》,《国际生活》月刊 1996 年 5 月。
[13] 见哈特相:《现代世界中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

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转引自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Saul Bernard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纽约:朗道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6 页。

[14] 见威特利瑟:《土地与国家》(Derwent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纽约:亨利·霍特出版公司 1944 年版,第 585 页。

[15] 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中文版,第 360—361 页。

[16] 同上书,第 357 页。

[17] 见斯特拉博:《斯特拉博地理学》(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伦敦:玻恩出版公司 1854—57 年英文版,第 191 页。

[18] 同上书,第 174 页。

[19] 参见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7—108 页。

[20]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1960 年中文版,第 7 页。

[21] 同上书,第 278 页。

[22] 同上书,第 275 页。

[23] 同上书,第 259—261 页。

[24] 同上书,第 282 页。

[25] 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62 页。

[26] 见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Saul B.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伦敦:麦杜恩出版公司 1964 年版,第 23 页。

[27] 见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花园城,纽约:双日出版公司 1966 年英文版,第 191 页。

[28] 见拉泽尔:"论国家的地域增长"(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States),转引自美国:G.R. 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学: 1890—1987》(G.R.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6 页。

[29] 见拉泽尔:《政治地理学》,慕尼黑:R. 罗登堡出版公司 1903 年版,第 15 页。

[30] 见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这是 1901 年出版的《国家有机体》一书的第 2 版),莱比希:希尔泽勒出版社 1917 年版,第 218—220 页。

[31] 见马汉:《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波士顿:小布朗出版公司 1897 年版,第 281—329 页。

[32] 见马汉:《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伦敦:桑斯彭劳和马尔斯顿出版公司 1900 年版,第 47—55 页。

[33] 参见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1890—1987》,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93 页。

[34] 见马汉:《美国的海权利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Power),伦敦:桑斯彭·劳和马尔斯顿出版公司 1898 年版,第 6—7 页。

[35] 同上书,第 6—7 页。

[36] 转引自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6 页。

[37] 见麦金德:《历史上的地理学中枢》(The Geographical Pivot in History),(《地理学月刊》1904年第23卷,第422页)。

[38] 同上书,第422页。

[39] 同上书,第434、436页。

[40] 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伦敦:康斯太勃出版公司1919年版,第194页。

[41] 同上书,第195页。

[42] 同上书,第70页。

[43] 见麦金德爵士关于南俄罗斯局势的报告,内阁报告第24、97页,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页。

[44] 见麦金德:《环形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外交季刊》1943年第21卷,第600页。

[45] 同上书,第276页。

[46] 同上书,第276—277页。

[47] 见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29页。

[48] 见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The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纽约:哈尔科特·布赖斯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182—183页。

[49] 见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Peace),纽约:哈尔科特·布赖斯出版公司1944年版,第43页。

[50] 见豪斯浩弗:《地理上与政治上的疆界》,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 66 页。

[51] 见豪斯浩弗:《今日世界之政治》,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1 页。

[52] 见豪斯浩弗:《海洋的召唤》,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70 页。

[53] 见豪斯浩弗:《疆界意识》,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70 页。

[54] 见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伦敦: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出版公司 1939 年版,第 597 页。

[55] 见豪斯浩弗:转引自威特利谢:《德国征服世界的战略》(D. Whittlesey: German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伦敦:F.E. 罗宾逊出版公司 1943 年版,第 70 页。

[56] 见特洛尔:《1933—1945 年间的德国地理科学》(C. Troll: Geographic Science in Germany during the Period 1933-45),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学》,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44 页。

[57] 见豪斯浩弗:《地缘政治学之声》(Stimme Der Geopolitik),转引自威斯特利谢:《德国征服世界的战略》,伦敦:F.E. 罗宾逊出版公司 1943 年版,第 63 页。

[58] 见豪斯浩弗:《作为一种科学的地缘政治学的义务和要求》(Pflicht und Auspruch der Geopolitik als Wissenschaft),转引自威斯特利谢:《德国征服世界的战略》,伦敦:F.E. 罗宾逊出版公司 1943 年版,第 72 页。

[59] 见豪斯浩弗:《地缘政治学的奠基石》(Baustein zur Geopolitik),柏林:K. 沃温克尔出版公司 1928 年版,第 27 页。

[60] 见豪斯浩弗:《边界的地理和政治含义》(Grenzen in ihrer Geographischen und Politischen Bedeutung), 柏

林，沃温克尔出版公司 1931 年版，第 13 页。

[61] 见亨宁：《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国家的学说》(R. Henning: Geopolitik — die Lehre vom Staat als Lebewesen)，柏林和莱比希：托布纳尔出版公司 1931 年版，第 194 页。

[62] 同上书，第 29 页。

[63] 见豪斯浩弗：《地缘政治的泛区观》，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6 页。

[64] 见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70 页。

[65] 同上书，第 72 页。

[66] 见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39 页。

[67] 见希特勒：《我的奋斗》，伦敦：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出版 1939 年版，第 603 页。

[68] 见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32 页，注 11。

[69] 见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74 页。

[70] 同上书，第 74 页。

[71] 见豪斯浩弗：《大日本》，柏林：米特勒出版公司，第 262—263 页。

[72] 见多尔帕兰：《豪斯浩弗将军的世界》(A. Dorpalen: 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纽约：法雷尔和莱因哈特出版公司 1942 年版，第 161 页。

[73] 见道格拉斯—哈密尔顿：《一项使命的动机》(J. Douglas-Hamilton: Motive for a Mission)，伦敦：麦克米兰

出版公司 1071 年版,第 25 页。

[74] 见德塞维尔斯基:《美国:太年轻不会死亡》(America: Too Young to Die), 纽约: 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 1961 年版,第 36—37 页。

[75] 同上书,第 113、118、134 页。

[76] 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39 页。

[77] 见胡森:《苏联的新大陆腹地?》,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41 页。

[78] 参见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伦敦:麦杜恩出版公司 1964 年版,第 xxi, 55—82、285—287 页。

[79] 见康托利和斯皮格尔:《国际区域政治》,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56 页。

[80] 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69 页。

[81] 见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2 页。

[82] 参见《哲学问题》1994 年第 7 期。

[83] 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中文版,第 176 页。

[84] 同上书,第 180—194、261—265 页。

[85] 同上书,第 257 页。

[86] 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外交季刊》1993 年夏季号, 第 31 页。

[87] 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中文版,第 231 页。

[88] 见杜尔特:《论制空权》(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纽约:蔻尔德—麦克肯出版公司 1942 年版,第 10—11 页。

[89] 见艾莫里:《对 H.J. 麦金德〈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一文的讨论》(Leopold S. Amery, Discussion of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地理学月刊》,1904 年第 18 期,第 439—441 页。转引自美国:道格拉斯·杰克逊编:《政治学与地理关系》,第 45 页。

[90] 见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伦敦:麦杜恩出版公司 1964 年版,第 29 页。

[91] 见斯普路特夫妇:《革命性时代的地理学与国际政治》(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道格拉斯·杰克逊编:《政治学与地理关系》(W.A.Douglas Jackson: Politics and Geographic Relationships),新泽西:普伦提斯—霍尔出版公司 1964 年版,第 7 页。

[92] 同上书,第 41 页。

[93] 见斯普路特夫妇:《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道格拉斯·杰克逊编:《政治学与地理关系》,第 80 页。

[94] 见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连续与变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 年第 2 期,第 26 页。

[95] 转引自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81 页。

[96] 参见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03、94、96 页。

[97] 见克里斯托弗:《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演变》,《冲突解决月刊》1960 年 3 月,第 19 页。

[98] 同上书,第 93 页。

[99] 转引自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92—93 页。

[100] 见里斯卡:《寻求均衡:美国与大陆和海洋的实力平衡》(George Liska: Quest for Equilibrium: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 页。

[101] 转引自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84 页。

[102] 转引自利维尔泽:《马汉论海上力量》(W. Liverzey: Mahan on Sea Power),诺尔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 1947 年版,第 133—134 页。

[103]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1 页。

[104] 见洛奇:《我们搞错了的外交政策》(Our Blundering Foreign Policy),《论坛》1895 年第 19 期。

[105] 见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01—102 页。

[106] 见罗斯福 1904 年 12 月 6 日的国情咨文:《1904 年的美国对外关系》,第 41 页。

[107]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5 页。

[108] 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09 页。

[108] 同上书,第 125 页,注 69。

[110] 见达勒克:《富兰克林·罗斯福与 1932—1045 年的美国

外交政策》(R.Dalleck: F.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1 页。

[111] 见罗斯福 1941 年 9 月 11 日的广播演说,转引自格雷布纳尔:《理想与外交》(N. A. Graebner: Ideas and Diplomac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10—611 页。

[112] 见罗斯福对格鲁(J. C. Grew)的谈话,见格鲁:《动乱年代》(Turbulent Era)第 2 卷,伦敦:哈蒙德父子出版公司,第 1259 页。

[113] 见 1981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泰晤士报》。

[114] 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17—118 页。

[115] 见 1941 年 6 月 24 日《纽约时报》。

[116] 见《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71 页。

[117] 见埃佐德和加迪斯编:《1945—1950 年美国政策与战略中的遏制战略文件》(T.H.Etzold & J.L.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3 页以下。

[118] 见麦克阿瑟与乔治·凯南的对话,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38 页。

[119] 见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纽约:哈尔库特·布赖斯出版公司 1942 年版,第 3—18 页。

[120] 见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上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54 页。

[121] 转引自《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5 页。

[122] 见班宁·加瑞特等：《从尼克松到里根》，时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9 页。

[123] 转引自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505 页。

[124] 见 1970 年尼克松在美国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年度报告，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76 页。

[125] 见基辛格：《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伦敦：怀登非尔德和尼可尔森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915 页。

[126] 同上书，第 914 页。

[127] 见何超春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1—322 页。

[128] 见王春良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7—528 页。

[129] 见温伯格 1981 年 5 月 5 日的讲话，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95—196 页。

[130] 见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讲话，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97—198 页。

[131] 同上书，第 197 页。

[132] 见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4 页。

[133] 见里根政府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特温曼

(J.W.Twinman) 1981年9月25日的报告，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6页。

[134] 见里根政府负责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西格尔(Sigur)的报告,转引自斯牢恩:《美国战略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苏萨克斯：威特谢夫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8—199页。

[135] 见1986年3月15日《纽约时报》。

[136] 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注①。

[137]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第1卷,伦敦:开塞尔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86—187页。

[138]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139] 见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395页。

[140] 见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5年版,第232页。

[141] 同上书,第236页。

[142] 同上书,第238页。

[143] 同上书,第240页。

[144] 见马德佐耶夫斯基等著:《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345页。

[145] 转引自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84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146]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147] 见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 1977 年中文版，第 319 页。

[148]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2 页。

[149] 参见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 页。

[150] 见莫内：《回忆录》，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8 页。

[151] 见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中文版，第 184 页。

[152] 见《阿登纳回忆录》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中文版，第 31 页。

[153] 同上书，第 3 卷，第 291 页。

[154] 同上书，第 2 卷，第 424 页。

[155] 同上书，第 3 卷，第 3 页。

[156] 同上书，第 4 卷，第 373—374 页。

[157] 同上书，第 4 卷，第 378 页。

[158] 同上书，第 1 卷，第 372 页。

[159] 同上书，第 3 卷，第 503—504 页。

[160] 见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 1979 年中文版，第 94 页。

[161]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7 页。

[162] 见施密特：《均势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中文版，第 12 页。

[163] 见 1991 年 9 月 19 日《德国商报》。

[164] 本章主要介绍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以及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理

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国家实体无论就其国土范围还是政治内涵来说都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又始终构成了这三个国家形态的主体,并且使之表现出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包括在地缘政治方面。

[165] 见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年中文版,第 457—459 页。戈尔什科夫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包括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制成等等。

[166] 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1—214 页及第 271 页。

[167] 同上书,第 206 页。

[168] 转引自马大正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 页。

[169]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9 页。

[170] 见马大正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57 页。

[171] 同上书,第 11—43 页。

[172]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5 页。

[173] 同上书,第 46 页。

[174] 见《六韬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 页。

[175] 同上书,第 47 页。

[176] 同上书,第 19—20 页。

[177] 同上书,第 34 页。

[178][179] 同上书,第 62 页。

[180] 同上书,第 162 页。

[181] 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84页。

[182] 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496 页。
[183] 同上书,第 393 页。
[184] 同上书,第 615 页。
[185] 同上书,第 435 页。
[186] 同上书,第 451 页。
[187] 同上书,第 484 页。
[188] 同上书,第 482 页。
[189] 同上书,第 484 页。
[190] 同上书,第 483 页。
[191] 同上书,第 447 页。
[192] 同上书,第 425 页。
[193] 同上书,第 437 页。
[194] 同上书,第 484 页。
[195][196] 同上书,第 485 页。
[197] 同上书,第 486 页。
[198] 同上书,第 435 页。
[199] 同上书,第 517 页。
[200] 同上书,第 435 页。
[201] 同上书,第 462 页。
[202] 同上书,第 630 页。
[203] 同上书,第 438—442 页。
[204] 同上书,第 518 页。
[205] 同上书,第 508—509 页。
[206] 同上书,第 513 页。
[207] 同上书,第 516 页。
[208] 同上书,第 531 页。
[209] 同上书,第 533 页。
[210] 同上书,第 534 页。

[211] 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612 页。
[212] 同上书,第 624 页。
[213] 同上书,第 627 页。
[214] 同上书,第 629 页。
[215] 同上书,第 611 页。
[216] 见《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5 页。
[217] 同上书,第 362 页。
[218] 同上书,第 355 页。
[219] 同上书,第 357 页。
[220] 同上书,第 358 页。
[221] 同上书,第 359 页。
[222] 同上书,第 361—362 页。
[223] 同上书,第 362 页。
[224] 同上书,第 356 页。
[225] 同上书,第 360 页。
[226] 同上书,第 361—362 页。
[227] 同上书,第 362—363 页。
[228] 同上书,第 363—364 页。
[229] 同上书,第 357 页。
[230] 同上书,第 365 页。
[231] 见《白话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232] 同上书,第 25 页。
[233] 同上书,第 45 页。
[234] 同上书,第 25 页。
[235] 同上书,第 45—46 页。
[236] 同上书,第 46 页。
[237] 见《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9—20 页。
[238] 同上书,第 20 页。

[239] 见《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 页。
[240] 同上书,第 54 页。
[241][242] 同上书,第 59 页。
[243] 同上书,第 65 页。
[244] 同上书,第 72 页。
[245] 同上书,第 156 页。
[246] 同上书,第 54 页。
[247] 同上书,第 65 页。
[248] 《白话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 1995 年版,第 160 页。
[249] 同上书,第 160 页。
[250][251] 同上书,第 161 页。
[252] 见《孙膑兵法·尉缭子》,北京燕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194—195 页。
[253] 同上书,第 218 页。
[254] 同上书,第 214 页。
[255] 同上书,第 264 页。
[256] 同上书,第 225 页。
[257] 同上书,第 228 页。
[258] 见蔡尚思主编:《诸子百家精华》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6 页。
[259] 同上书,第 366—367 页。
[260] 同上书,第 379—380 页。
[261] 同上书,第 387 页。
[262] 见《庄子浅注》,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9 页。
[263] 同上书,第 96 页。
[264] 见《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7 页。
[265] 同上书,第 33 页。
[266] 同上书,第 32 页。

[267] 见《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 页。
[268] 同上书,第 162 页。
[269] 同上书,第 107—108 页。
[270] 同上书,第 109 页。
[271] 见胡星斗:《白话鬼谷子》,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272] 同上书,第 56—69 页。
[273] 同上书,第 84—86 页。
[274]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1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 页。
[275] 见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6 页。
[276] 同上书,第 64 页。
[277] 同上书,第 90 页。
[278] 同上书,第 106 页。
[279] 同上书,第 111 页。
[280] 同上书,第 176 页。
[281] 同上书,第 201—203 页。
[282] 同上书,第 623—624 页。
[283] 见《诸子百家精华》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4—786 页,另见《韩非子》(评析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6—257 页。
[284] 见《韩非子》(评析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59 页。
[285]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7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 页。
[286] 见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2 页。

[287]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7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0 页。

[288] 同上书,第 121 页。

[289] 见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2 页。

[290] 同上书,第 887—888 页。

[291]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11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1 页。

[292] 同上书,第 12 卷第 1 册,第 221 页。

[293] 见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 页。

[294]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14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0 页。

[295] 见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3 页。

[296] 同上书,第 888 页。

[297]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15 卷第 1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3 页。

[298] 同上书,第 15 卷第 1 册,第 276 页。

[299]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42 页。

[300] 见房立中主编:《纵横家全书》,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27 页。

[301] 见《三国志》,卷 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45 页。

[302]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 181 卷第 3 册,改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88 页。

[303] 同上书,第 181 卷第 3 册,第 3789 页。

[304] 见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第180卷第3册,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4页。
[305] 同上书,第187卷第4册,第3918页。
[306] 同上书,第191卷第4册,第3993页。
[307] 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8] 见叶光大等译注:《贞观政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309] 同上书,第474页。
[310] 同上书,第476页。
[311] 同上书,第498页。
[312] 同上书,第479页。
[313] 同上书,第477页。
[314] 同上书,第513—514页。
[315] 同上书,第517页。
[316] 同上书,第487、492、494页。
[317] 见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318] 同上书,第152页。
[319] 见《续资治通鉴》上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页。
[320] 同上书,上卷,第1441页。
[321] 同上书,上卷,第1457页。
[322] 同上书,下卷,第839—840页。
[323] 同上书,下卷,第840页。
[324] 同上书,下卷,第843页。
[325] 同上书,上卷,第552页。
[326] 同上书,上卷,第381页。

[327]　见《续资治通鉴》上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 页。
[328]　同上书，上卷，第 77 页。
[329]　同上书，上卷，第 137 页。
[330]　同上书，上卷，第 138 页。
[331]　同上书，上卷，第 143 页。
[332]　同上书，上卷，第 924 页。
[333]　同上书，上卷，第 192—193 页。
[334][335]　同上书，上卷，第 280 页。
[336]　同上书，上卷，第 575 页。
[337]　同上书，上卷，第 176 页。
[338]　同上书，上卷，第 192 页。
[339]　同上书，上卷，第 192 页。
[340]　同上书，上卷，第 258 页。
[341]　同上书，上卷，第 517 页。
[342]　同上书，上卷，第 625 页。
[343]　同上书，上卷，第 628 页。
[344]　同上书，下卷，第 349 页。
[345]　同上书，下卷，第 456—457 页。
[346]　同上书，上卷，第 1073 页。
[347]　同上书，上卷，第 1371 页。
[348]　同上书，上卷，第 874 页。
[349]　同上书，上卷，第 908 页。
[350]　同上书，下卷，第 1309 页。
[351]　同上书，下卷，第 1413 页。
[352]　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2 页。
[353][354]　同上书，第 271 页。

[355] 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356] 见费正清,赖肖尔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6—197 页。

[357] 见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3 页。

[358] 同上书,第 341 页。

[359] 同上书,第 318 页。

[360] 同上书,第 324 页。

[361] 同上书,第 325 页。

[362] 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刊:《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1932 年版,卷 2,第 2 页。

[363] 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中译本,第 102—103 页。

[364] 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8 页。

[365] 见刘洪海著:《全球战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0 页。

[366]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 2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50—151 页。

[367] 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 1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72 页。

[368] 同上书,第 101 页。

[369] 见上书,第 107—108 页。

[370][371] 见上书,第 103 页。

[372] 见刘洪海:《全球战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1 页。

[373]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374] 见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375]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292—293页。

[376]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4页。

[377] 见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378]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0页。

[379] 见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54—55页。

[380] 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0—651页。

[381] 见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764—765页。

[382] 见刘惠吾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83] 见赵佳楹编著:《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注①。

[384] 见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金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85] 见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卷,商务印书馆

1985 年中译本，第 49 页。

[386] 见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金禾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387] 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 1 卷，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64—65 页。

[388] 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43 页。

[389] 同上书，第 614—615 页。

[390] 见顾明义编著：《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 页。

[391] 见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8 卷，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579 页。

[392] 同上书，第 7 卷，第 2675 页。

[393] 同上书，第 7 卷，第 2674—2675 页。

[394] 见杨公素：《外交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6 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 卷，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5 页。

[395]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8)p30—33.

[396] 见杨公素：《外交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7 页。

[397]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中译本，第 470 页。

[398] 同上书，第 125 页。

[399]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2 卷，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700 页。

[400] 见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 24 卷，金陵1905

年刊本，第11—12页。

[401] 见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402] 见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1页。

[403] 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0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页。

[404] 见赵佳楹编著:《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405] 见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9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7224—7232页。

[406] 见郑汕等:《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1—2254页。

[407] 同上书,第253页。

[408]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394页。

[409]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9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页。

[410] 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金陵1905年刊本,第3页。

[411] 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金陵1905年刊本,第26页。

[412] 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24卷,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年版,第5—6页。

[413] 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年版,第14—17页。

[414] 见《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奏稿)第2卷，金陵1905年刊

本,第14—15页。
[415] 见《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文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37页。
[416] 见郑汕等:《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417]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5页。
[418] 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2卷,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年版,第3页。
[419] 见郑观应:《郑观应集·边防》,引自《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420] 见顾明义编:《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421] 见杨公素著:《外交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
[422] 见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二)》(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7,173—174页。
[423] 见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424] 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4—87页。
[425]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426] 见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6页。
[427] 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193 页。

[428] 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4 页。

[429] 同上书，第 216 页。

[430] 见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1911—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431]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2 页。

[432] 见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0—221 页。

[433] 同上书，第 74—75 页。

[434] 同上书，第 86 页。

[435] 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8—9 页。

[436]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25 页。

[437]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7 页。

[438] 同上书，447—454 页。

[439] 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440]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9、681 页。

[441] 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1475 页。

[442] 见《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66 页。

[443] 见《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3—1194 页。

[444] 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41 页。

[445]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00 页。

[446] 见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 页。

[447]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0 页。

[448]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4 页；《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1960.5)，《红旗》杂志，1960 年第 10 期，第 1—2 页。

[449] 见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6 页；董保存著：《毛泽东和世界风云人物》，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9 页。

[450] 见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中译本，第 267 页。

[451] 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5 页。

[452] 同上书，第 186 页。

[453] 同上书，第 122、121 页。

[454] 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91 页。

[455] 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2、130—131、178—180 页。

[456] 同上书，第 8、10 页。

[457] 同上书，第 52 页。

[458] 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8、171 页。

[459] 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

[460] 见《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28 日。

[461]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462] 同上书,第 126—127 页。

[463] 见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464]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128、3 页。

[465] 同上书,第 98—99 页。

[466] 同上书,第 373 页。

[467] 同上书,第 49 页。

[468] 见《人民日报》1988 年 4 月 16 日。

[469] 见《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5 日;《人民日报》1982 年 10 月 22 日。

[470]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471] 同上书,第 87—88 页。

[472] 见王景科编著:《陈毅的外交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 页。

[473] 见纽豪斯:《苦寒的拂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内幕),三联书店 1974 年中译本,第 268、288—289 页。

[474] 见《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7 日。

[475] 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序言。

[476] 同上书,第 124、129、188 页。

[477] 见《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第32页。

[478]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479][480] 同上书,第105页。

[481] 见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430页。

[482]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

[483] 同上书,第630页。

[484][485] 见谢益显著:《外交的智慧和谋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486] 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487] 见符浩等主编:《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88] 见董长芝等:《中华开放强国策》(中国历代经贸政策研究),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3页;韩漳编:《中南海外交珍闻录》,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489]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490] 见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491]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492]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493] 见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

社 1994 年版, 第 123 页。

[494]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4—25 页。

[495] 见史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晨社 1946 年中译本, 第 303 页。

[496] 转引自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57 页。

[497]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88 页。

[498] 见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3 页。

[499] 见季明等:《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20 页。

[500] 见王景科编著:《陈毅的外交艺术》,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9 页。

[501] 见杨公素:《外交理论与实践》,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59 页;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37 页。

[502] 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42 页。

[503]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63—164 页。

[504] 见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53 页。

[505] 见《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6 年 4 月 26 日。

[506] 见汉学家华克生:《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位置》,

《自由思想》1996年1月。

[507] 见A. 阿尔巴托夫:《俄罗斯:90年代的国家安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8—9期合刊。

[508] 见《江泽民阐述中俄友好关系四点基础》,载《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509] 见张海峰等:《争取20—30年把中国建成海洋经济大国》,载《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

[510] 见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

[511] 同上书,第138页。

[512] 见《莫斯科在朝鲜和韩国之间平衡其利益》,载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5年11月30日。

[513] 见杨昭全等:《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35页。

[514] 见陆俊元:《从地缘政治看日本的安全战略》,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3期。

[515] 见名越健郎:《日本的噩梦—中俄韩"新三国干预"》,载《世界周报》1995年11月21日。

[516] 见黄彬华:《日本与亚洲,认识有差距》,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4月14日。

[517] 见森本敏:《日本在对华政策上面临艰难选择》,载《世界周报》1995年12月26日。

[518] 见薛君度:《论中日关系:回顾与前瞻》《面向21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351页。

[519] 见佩里同日本记者的谈话,载《朝日新闻》1996年4月17日。

[520] 见《亚洲不信任日本的心态依然根深蒂固》,载《朝日新

闻》1996年5月20日。

[521] 见许通美:《东南亚国家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美日中三角关系》,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5月14日。

[522] 见1996年1月12日新华社吉隆坡电讯稿:《马哈蒂尔再斥"中国威胁论"》。

[523] 见黄阿玲:《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524] 见金湘主编:《腾飞的东盟六国》,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525] 见汉斯.J.迪得里希:《朝鲜和南中国海—世界大国的地缘政治交汇点》,《国际政治研究》1987年第1期。

[526] 见段喜群:《对印美关系发展的初步看法》,载《南亚研究季刊》1995年第2期。

[527] 见杜幼康:《印度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其国际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1995年第2期。

[528] 见《贝·布托答本刊记者问》,载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4月4日。

[529] 见《江主席同印度总理高达会谈》,载《人民日报》1996年11月30日。

后记

作者近年来在研读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文献时，对中国地缘政治学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进行比较，并发现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从起源到内容，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内对西方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都很不够，在研究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时，往往否定批判的较多，对其发展变化也不甚清楚，尤其是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更是少有整理。当西方的许多有影响的作者引用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的名言为自己的文章著作增加色彩时，国内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论及地缘政治时，给人的印象却是地缘政治源于西方，似乎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受西方影响才产生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有必要加以澄清，因此，由此产生了写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和特色的著作，并对中国历代的地缘政治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检讨，目的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人们对我国当今的地缘政治形势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再重复过去历史的教训。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地缘政治研究的有关成果，在此也向这些成果的作者们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而地缘政治又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在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还请读者一一指正。

本书由叶自成主编。

本书的各章作者是：序论：叶自成；第一章：唐士其；第二章：唐士其；第三章：叶自成；第四章：方向勤；第五章：叶自成；第六章：王福春；第七章：王福春；第八章：仇　昱、叶自成；第九章：叶自成；第十章：方向勤

作者

1997年4月9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叶自成等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2
ISBN 7－200－03339－1

Ⅰ. 地…　Ⅱ. 叶…　Ⅲ. ①地缘政治学-影响-中外关系-研究 ②中外关系-影响因素-地缘政治学-研究　Ⅳ. D8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476 号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DIYUAN ZHENGZHI YU ZHONGGUO WAIJIAO

叶自成　主编

*　*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93 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　*

ISBN 7－200－03339－1

D·279 定价: 19.00 元